

國立聯合大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春光關不住：

楊逵在綠島時期的生活圖像與文學活動

The unchained light of spring : Yang-Kui's life  
image and literary activity in Lyudao prison.

研究生：謝彩鳳 撰

指導教授：黃惠禎 博士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 國立聯合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考試委員審定書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學系 研究所 碩士班 謝彩鳳 君所提之論文

春光關不住：楊逵在綠島時期的生活圖像與文學活動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任委員 楊 芳 (簽章)

委員

何雅芳  
吳志強

指導教授

楊 芳

系(所)主任

盛 鍾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6 月 29 日



## 謝 辭

「學術研究」是矛盾的複合體，它的本質是孤獨的，常與寂寞和夜半孤燈相伴，卻必須靠親師好友的支持滋養，否則會如同流星即逝，無法在浩瀚的河漢中發出自己的螢光。

讀了四年的研究所，何嘗不是如此？每當我可以在課堂上汲取教授們的智慧，每當我可以交出了一份報告，每當我層層疊疊的堆出這本論文的架構時，每一步，踩的都是周遭人的犧牲與支持。心裡常感到艱辛又愧疚，因為想圓了自己深造進修的夢，得依賴老師和家人們的付出，絲絲縷縷的感恩織就這四年來的心情。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黃惠禎老師，這一身的功夫是她從我一進研究所後手把手所教導出來的，她嚴謹地指導我學術知識與倫理，卻也包容我身兼數職的無奈，在她自己也是病痛纏身的同時，卻又關懷我崩潰的心靈，助我度過人生最難的一道關卡。在最後修改論文的階段，老師仔仔細細地提醒我所有該注意的事項，提點我論述的缺失，只希望讓我盡可能地不要留下任何遺憾。面對老師的付出，我常感到愧疚與感激，總覺得無以為報，只能化作字字句句的水滴，涓流到這本論文裡。

感謝楊翠教授和邱雅芳教授，在百忙之中接下了這本論文的書面審查及口考，從我拙劣的遣詞用字中找出我思維上的盲點，指點我如何更加精進本文，使我的觀點得以開展。其實研究楊翠教授的祖父讓我很惶恐，回想當時所提出的審查資料相當拙劣，但是楊翠教授卻以一名學者身分告訴我如何研究她最親最熟悉的人，專業的觀點及態度令我嘆服。邱雅芳教授在我就讀研究所期間對於批判理論以及臺灣新文學上的指導，對於我這個本來是只有中國文學底子、卻無臺灣文學概念的菜鳥有著很大的引導與啟發，尤其是行文架構部分，她所指出的重點既犀利又清晰，時常讓我有種突破既有思維的感受。

感謝王幼華教授，從我一開始在尋找自己的研究目標時，他便一直給予關心和引導，他讓我先行摸索有所感悟之後，再劍指當時所訂的題目問題所在，讓我瞬間瞭解訂題的方法，使我少走許多冤枉路。撰寫本論文過程中，他也不時地鼓勵，給予我關懷。

感謝楊建老師，雖然只和他見過這麼一次面，他和楊達的形象卻在我眼中重疊了起來。記得在楊達的墓前，惠禎老師引薦，告訴他我也要走上研究楊達之路，他輕輕點點頭，眼中倒映我的身影，自此他在我心中刻下了印象，也透過我的筆將他刻在我的論文裡。我想著，才疏學淺的，也沒辦法突破前人研究提出什麼更好的見解請教楊建老師，那就待這本論文完成時，獻給楊建老師懇請指教。只可惜，這個願望將一輩子成為遺憾。

感謝我的父母，自小啟蒙識字以來，「追求知識」這件事除了是自己所喜愛，也是我榮耀與回饋父母的方法。那個年代，母親從飯裡自苦購書，培養出我閱讀求知的興趣，奠下我知識的基礎。那年萬籟俱寂的夜晚，嚴肅的父親與我剖心談話，盡訴他的辛酸和期盼。那一刻起我知道讀書這件事不再只是興趣，也是責任。那是我們父女唯一一次秉燭夜談，現在的他處在一個我跨不進的世界，我只能無力地看著他的肉體逐漸走向衰敗，唯一能為他做的就是獲得學位榮耀他的生命，我相信他會隔著眼角膜的玻璃窗笑看我更上一階。

感謝外子排除眾議、力抗傳統支持我進修，雖然這四年裡風風雨雨，最終他還是用行動助我完成這本論文。感謝我的妹妹淑娟，在最後如火如荼的拼論文趕進度時，她用她的資訊專業協助我處理很多文書問題。感謝我的同學琪甄和秋英，一起在研究所的課程走過、笑過，學習有友，則豐富而廣聞。抱歉我的兩個寶貝，因為當媽媽的自私，讓他們的童年要跟一本論文分享母親的時間。

諸多感謝，盡在不言之中。

## 摘要

1949 年 4 月楊逵被捕，以叛亂罪入監服刑 12 年，〈和平宣言〉成為罪證。同年的 5 月 20 日，全臺進入長達 38 年的戒嚴時期。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整肅之下，臺灣人噤若寒蟬，日治時期以來臺灣新文學的左翼批判思想亦隨之中斷。1951 年移送綠島之後，受到獄中規訓制度的影響，楊逵理應創作困難。然而監禁綠島 10 年，卻成為楊逵另一個大量創作的階段。可惜截至目前為止，楊逵研究雖已展示豐碩的成果，楊逵在綠島監獄實際的生活樣貌，僅有極為簡略的介紹；綠島時期楊逵的文學活動方面，亦多側重於劇本與家書的探討。至於楊逵在獄中採集記錄的謠諺稿與歌譜集，雖已收入《楊逵全集》正式出版，學界迄今未曾進行整理與研究。

本論文以史料的爬梳，尤其是多筆未曾被研究者引述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官方文書與國家檔案局所收藏獄中的原始檔案，針對綠島時期的楊逵進行全面性的研究。首先，從法學史的角度，並引判決書的內容，釐清 1949 年楊逵入獄的背景和緣由。其次，借助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全景敞視的概念，分析新生訓導處的規訓系統，並藉由綠島監獄政治犯的口述歷史，以及楊逵的考核表、基本資料表與教化心得等，建構楊逵在綠島時期的生活圖像。再者，除了綠島時期楊逵的各類型文學寫作之外，主要針對前行研究所忽略的謠諺稿與歌譜集進行分析。最後，從楊逵的創作與《新生活壁報》、《新生月刊》的編輯，解讀他試圖突破國語政策、反共文藝、監獄規訓的三重禁錮，所表現堅持日治時期以來臺灣話文創作的主張，以及強調文藝大眾化的理念。從中發現綠島時期的楊逵思想一貫，上承其四〇年代的政治與文學思想，下啟七〇年代的草根文學理論。綜合來看，綠島獄中面臨思想改造的楊逵，如同他在當時創作的小說〈春光關不住〉裡，從水泥塊縫隙底下伸出來的玫瑰花苞，展現的是力抗強權壓迫的身影。

關鍵詞：楊逵、綠島、監獄文學、國語運動、反共文藝、臺灣文學





## Abstract

In April 1949, Yang Kui was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12 years in prison on the charge of insurrection, with *A Declaration of Peace*, a document drafted by Yang, serving as the evidence. On May 20 of the same year, Taiwan entered a 38-year period of martial law. The Taiwanese were silenced under the political purge of the White Terror, which ended the left-wing critical thinking of Taiwan's new literature that had followed Japanese occupation. After being transferred to Green Island in 1951, Yang should, theoretically, have faced difficulty in writing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s from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in prison; however, his 10-year imprisonment on Green Island became another stage of Yang's active literary creation. Despite the fruitful results obtained in research on Yang, his actual life on Green Island has only been given a brief introduction. Yang's literary activities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also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scripts and family letters. Although the folk songs, proverbs, and scores collected and recorded by Yang in prison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ly publish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Yang Kui*,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not sorted through and studied them thus far.

In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Yang's life on Green Island was conducted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particularly several first-hand materials that have not been cited by researchers, including official documents and the original files in priso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First, the background of and reason for Yang's imprisonment in 1949 was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history, in combination with citations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court's judgement. Next, using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s of discipline and the panoptico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the Freshman Disciplinary Camp on Green Island was analyzed, after which

the oral history provided by political prisoners on the island as well as Yang's assessment forms, basic inform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and education experience were used to construct his life image on Green Island.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Yang's various types of literary works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on Green Island, th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olk songs, proverbs, and scores overlooked by previous studies. Finally, from Yang's literary work and his editing of the *New Life* posters and *New Life Monthly*, his attempts at breaking through the triple confinement of the Mandarin promotion policy,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and prison discipline; his insistence on writing using local Taiwanese languages ; and his ideal of emphasiz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we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Yang's thoughts during his imprisonment on Green Island had been consistent, continuing hi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thoughts from the 1940s and enlightening the grassroots literary theory in the 1970s. Overall, in the face of id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Green Island Prison, Yang demonstrated resistance to the oppression of power not unlike the rose buds that protruded from under the cracks in the cement block in his novel *The Uncontainable Light of Spring*.

Keywords: Yang Kui, Green Island, prison literature, Mandarin promotion movement,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二章 楊逵與綠島監獄.....	21
第一節 楊逵的入獄與判刑 .....	21
第二節 綠島監獄的建置與沿革 .....	35
第三節 新生訓導處的監控與規訓 .....	48
第三章 獄中的楊逵圖像.....	61
第一節 監禁期間的規訓生活 .....	61
第二節 國家檔案的相關記載 .....	68
第三節 難友視角呈現的楊逵 .....	76
第四節 跨越禁錮與醫病共生 .....	83
第四章 楊逵在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 .....	93
第一節 創作與編輯 .....	93
第二節 謠諺的採集 .....	101
第三節 民歌的應用 .....	106
第五章 楊逵獄中文學與時代的對話 .....	115
第一節 民眾語言與多元文化 .....	115
第二節 以民為本的階級立場 .....	124
第三節 監獄生活與寫實主義 .....	133
第六章 結論 .....	145
附錄 .....	151
附錄一：楊逵的〈逐月考核總結〉 .....	151
附錄二：楊逵的〈新生處理考核表〉 .....	159

附錄三：楊逵的〈新生調查表〉 .....	161
附錄四：楊逵歌譜集曲調細目表.....	163
參考資料.....	173



# 第一章 緒論

## 一、研究動機與範圍

楊逵（1906～1985）是臺灣知名的社會運動家與文學家，晚年自稱為「人道的社會主義者」，<sup>1</sup>是臺灣 1930 年代以降寫實主義（Realism）文學重要代表性作家。1915 年發生噍吧哖事件，日軍屠殺臺灣人，在楊逵心中埋下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種子。後來，楊逵到日本留學，正值經濟蕭條時期，勞農運動頻仍，楊逵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也在此時正式開始社會運動之路。1927 年因參加朝鮮人的演講會被捕。同年 9 月，應農民組合的邀請回臺，從此活躍於臺灣的農工運動，多次被捕亦不畏懼。1931 年滿州事變後，日本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組織管制趨於嚴厲，臺灣總督府一一解散臺灣的政治團體，楊逵將活動重心轉為文學運動。1934 年，楊逵的小說〈送報伕〉（日文原名〈新聞配達夫〉）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第一名從缺），這是臺灣作家第一次進入日本文壇，也確立楊逵的文學家身分。此後，楊逵大量創作，作品展現他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反殖民的抵抗精神，又創刊《台灣新文學》雜誌，繼續宣揚左翼文學觀。1937 年，臺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1941 年成立「皇民奉公會」，全力推動文學為日本國策進行宣傳，楊逵雖受到壓迫不得不寫下〈泥娃娃〉（〈泥人形〉）、〈鵝媽媽出嫁〉（〈鵝鳥の嫁入〉）等作品，仍不改抵抗的姿態，後被稱為「抗議文學」的代表。<sup>2</sup>

1945 年二次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前，楊逵組成「新生活促進隊」，在臺灣政治真空時，維持臺中地方治安。<sup>3</sup>在三民主義風行臺灣的同時，楊逵創刊

---

<sup>1</sup> 陳春美訪問，〈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原載於《前進廣場》15 期（1983.1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頁 271。

<sup>2</sup> 稱楊逵的作品為「抗議文學」者不少，例如林載爵的〈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稱楊逵的文學有抗議精神，葉石濤的〈日據時代的抗議文學〉將楊逵〈送報伕〉列為抗議文學代表作。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 卷 7 期（1973.12），頁 14。葉石濤，〈日據時代的抗議文學〉，《聯合文學》5 卷 8 期（1989.06），頁 164、166-167。

<sup>3</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07），頁 52。

臺灣戰後第一份雜誌《一陽週報》，介紹三民主義與孫文思想以及轉載大陸五四以來文學。隨著中國經濟凋敝、內戰不斷，陳儀的行政長官公署無異於臺灣總督府的政治作為，讓臺灣人從支持走向不滿。楊逵原本期待國民黨能實踐三民主義，但在看透國民黨專權的作為後也逐漸失望。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引發全臺的反抗行動，楊逵撰文〈從速編成鄉下工作隊〉支持武裝抗爭，而後和葉陶雙雙被逮捕，所幸因為〈從速編成鄉下工作隊〉被神秘註銷，兩人被囚禁 105 天獲得釋放。這是楊逵在戰後首次被捕。<sup>4</sup>

1949 年四六事件發生，當局除了逮捕學生之外，不少藝文界人士陸續被捕，包含楊逵、鍾平山、史習枚、孫達人、董佩璜等人，另外還有農人、工人等。<sup>5</sup>上海《大公報》所刊登的〈和平宣言〉被作為楊逵的罪證。1950 年經軍法審判處十二年徒刑，1951 年轉而囚禁於綠島的新生訓導處。綠島孤懸於太平洋上，當時在此設置囚禁政治思想犯的監獄，意圖將犯人隔絕於世，改造成為恭順人民。可以想見，無論犯人的身體、言論、思想等勢必在監控之下，更遑論對外溝通與傳遞訊息。直到 1961 年 4 月 6 日，楊逵才結束將近 10 年的火燒島生活，重新回到家人的身邊。

回顧楊逵被捕的歷史語境，二次大戰之後中華民國接管臺灣，派遣陳儀著手文化重建工作。1946 年 4 月，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推行國語運動，獨尊北京話文，要求臺灣人要能達到國語文的言文一致，並壓抑本土文化活動，剝奪臺灣人的語言認同。同年 10 月，禁止報紙刊行日文欄，在尚未習得新

<sup>4</sup> 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原載於《臺灣與世界》21 期（1985.05），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0-92。

<sup>5</sup> 「四六事件」的導火線發生在 1949 年 3 月 20 日晚間，臺大學生何景岳和師院學生李元勳騎乘腳踏車雙載，遭警察謝延長取締逮捕。師院學生先展開包圍警局的抗議活動，並提出嚴懲警察與賠償等三項要求。隔日臺大與師院學生自治會提出人權與自由的聲明，事態逐漸擴大。3 月 29 日臺大和師院學生舉辦營火晚會，於會中跳共產黨的扭秧歌，刺激國民黨當局。陳誠早在 3 月 15 到南京述職時，覺得南京狀況無望。後爆發南京軍隊與學生衝突的「四一事件」，故面對臺大、師院學生的行動，陳誠於 4 月 5 日會晤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臺大校長傅斯年、師院校長謝東閔，決定「求安定，肅清匪諜」。陳誠認為臺大與師院是匪諜大本營，所以當天發布第一波學生逮捕名單並逮捕麥浪歌詠隊成員，引發學生的抗議行動。4 月 6 日包圍臺大、師院宿舍進行逮捕。其實，第一波學生逮捕名單中已有孫達人，當時亦為「橋」副刊記者，而 4 月 6 日當天《新生報》主編史習枚、《成功日報》董佩璜也同時被捕，4 月 7 日下午《新生報》臺中辦事處主任鍾平山被捕，和楊逵一同被送往臺北。〈二記者被拘訊〉，《公論報》，1949.04.08，3 版。〈被捕學生已送地院〉，《公論報》，1949.04.13，3 版。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7.12），頁 77-109。



語文，同時被要求放棄原有熟練的日文情況下，臺灣的作家無法順利進行創作。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敗勢已露，決議將島上異議份子進行整肅，以穩固政權，作為未來反共的復興基地。四六事件發生之後，逮捕大量政治思想犯，臺灣隨即進入戒嚴時期，無論臺灣本島或是綠島上的人民，全被一張綿密的監控網籠罩著。人人憚於談論政治，連同文字也是被字斟句酌地運用，閃避一些政治敏感議題。

1949 年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1950 年韓戰爆發，臺美進入戰略的合作關係，在美援協助下，蔣介石政權穩定了臺灣的政治與經濟局面。對於國共內戰的落敗，國民黨內部檢討後認為是宣傳策略失敗導致，因此推動反共文藝，臺灣藝文界的發展便被官方強力主導。五〇年代的國家機器不僅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也箝制人民的思想自由，無孔不入的特務隨時搜索任何可能與共產黨相關的人物，閱讀左翼書籍都能成為構罪的原因，更遑論是充滿政治批判性的言論，使得整個臺灣儼然是一座巨大的無形監獄。<sup>6</sup>不少人更是被特務機構以政治犯的身分銬鎖下獄，進入世界知名的政治犯監獄——綠島的新生訓導處。除了與臺灣社會一同籠罩在白色恐怖的社會氛圍中，新生訓導處的犯人更是陷入監獄規訓的禁制之下。

綠島上的犯人之所以被稱為「新生」，即被視為政治思想不正確，必須改造思想以「重獲新生」的人。相較於臺灣本島，新生訓導處的反共思想被執行得很徹底，更無所逃避。該處唯二能閱覽的報紙，只有中國國民黨創辦的《中央日報》與國防部的《青年戰士報》，而兩份刊物正是當時軍中文藝展演之處。<sup>7</sup>反共文學已不僅是臺灣本島官方推動的強勢文藝，更是蔓延到遠在太平洋上與世隔絕的綠島。在這樣的艱難情境之下，監獄外的臺灣作家除了響應反共文藝，或者如同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以個人歷史記憶來規避附和，或者因為國語運動而被迫停筆，三〇年代的左翼文學就此斷裂。<sup>8</sup>獄外已是如此，監獄之中更是不存在「自由」的地方。楊逵身處在一個被噤聲瀰漫的時代，被海洋包圍的離島，被高牆圍住的牢房，他的文學活動受到監視，卻依然創作不輟，在監獄封閉的語境下持續發表作

<sup>6</sup> 楊翠曾提出在戒嚴時期，臺灣本島與綠島均為禁錮的雙島概念，論述內容請詳見：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逵「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5.01），頁 420-478。

<sup>7</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02 第一版第二刷），頁 77。

<sup>8</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10 增訂二版四刷），頁 288。

品。

當時的楊逵利用監獄內的刊物《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發表不少題材豐富的散文，同時也擔任這兩種監獄刊物的編輯。事實上，楊逵一生中創作的中文劇本都是在綠島時期完成，部分劇作還在監獄內舉辦的康樂活動中演出。小說創作雖然只有 4 篇，〈大牛與鐵犁〉在借調臺北時投稿並刊載於《東方少年》；〈春光關不住〉於出獄後的 1976 年被選入國中國文教科書，促成了出獄後的楊逵重新活躍於文學界。詩歌創作不多，除了童詩，其他主題多配合紀念節日而作。寫作之外，楊逵在獄中向獄友們採集民間文學，留下了用筆記簿記錄的 3 本謠諺稿、1 本歌譜稿，收錄不同語言與族群的謠諺與歌曲。至於楊逵辭世後輾轉送回家屬手中的綠島家書，每一篇都充滿楊逵對家人的關愛與心聲。如此看來，楊逵的文學世界不因為受到監禁而慘淡，絲毫不遜於他在日治時期或戰後初期的文學成就。

初步整理楊逵相關研究，會發現多著重在日治時期的文學與社會運動，而綠島時期的研究比例相對較低。楊逵本人在晚年接受不少的訪問，對於綠島時期的生活與事蹟大多簡略帶過。學者林瑞明（林梵）1978 年所著的《楊逵畫像》，是作者貼身觀察楊逵約一年的紀錄，其中記述楊逵的生平事蹟、文學與社會運動，可說是研究楊逵生平必須參考的專書之一。可惜楊逵 1949 年起入獄服刑 12 年的歲月，相關事蹟未曾多言。<sup>9</sup>1994 年出版的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sup>10</sup>始出現楊逵綠島時期文學概述。20 餘年後，楊翠的《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sup>11</sup>於 2016 年出版，對綠島時期的楊逵樣貌才有更進一步呈現。包含學位論文在內的相關研究數量，與楊逵綠島時期豐富的文學成就相比，不僅差異頗大，楊逵入出獄的緣由與綠島時期的活動少人提及，采風活動不是僅有簡略的敘述就是被完全忽視，謠諺稿與歌譜集亦未曾有人深入探討。解讀楊逵如何突破困境進行書寫，成為筆者亟欲一探究竟的動機。

再深入考察楊逵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其文學活動，令人好奇的是：楊逵處在國

<sup>9</sup> 林梵，《楊逵畫像》（臺北市：筆架山出版社，1978.09），頁 153-155。

<sup>10</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07）。

<sup>11</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08）。



語運動、反共文藝、監獄規訓的多種限制之下，創作應遠比其他獄外作家艱難。尤其新生訓導處是個感化教育機構，企圖將政治犯改造思想，發表文章很容易被檢視思想內容。社會主義者的楊逵為何還能夠進行大量創作和藝文活動？反共文藝與國語運動對綠島時期的楊逵是否產生限制？綠島監獄與規訓是否給了楊逵什麼樣的影響？楊逵因應外界環境是否採取了何種寫作策略？或者放棄了他的社會主義信仰，迎合統治者的思想尺度？尤其筆者蒐集資料時，檢索到國家檔案局收藏楊逵入出獄官方文書與相關檔案等，目前尚未有研究者運用。筆者認為，這些史料文稿可擴展綠島時期楊逵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因此希望藉由綠島時期的楊逵生活樣貌與文學活動的研究，補充楊逵生平論述所缺的空白，為相關研究盡一份心力。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探討楊逵在新生訓導處的生活圖像及文學活動。楊逵作品使用版本部分，由於已知楊逵在綠島時期的文本種類有：戲劇、小說、散文、詩歌、家書，均完整收錄在《楊逵全集》，是目前研究楊逵最完善的作品集。其中《第十四卷・資料卷》收錄王麗華、何昀等人對楊逵的訪談紀錄，詳實地記錄楊逵有關綠島的回憶，若再佐以同時期獄友的口述歷史，有助於本研究勾勒楊逵綠島時期的生活境遇。因此，本論文以《楊逵全集》為主要研究文本。至於家書部分，由於《綠島家書》是楊逵寫給家屬的私人信函，楊逵次子楊建曾經逐篇註記，有助於瞭解家書內的人物關係與家庭瑣事，《楊逵全集》則未收入。為方便研究者查考，本研究採用目前通行由大塊文化於 2016 年出版，附有楊建註解的《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一書。藉此，筆者希望能釐清楊逵入出獄的緣由，探究他在新生訓導處的規訓生活，以及楊逵在監獄體系與反共文藝的國家霸權寫作限制之下，如何進行書寫，並解讀楊逵獄中的文學活動，以瞭解他的思想流動。

## 二、 相關研究回顧

七〇年代臺灣國際形勢危急，面臨外交危機與社會經濟的變遷，民族意識高漲，臺灣知識份子出現回歸鄉土與自立自強的氛圍，連帶引起鄉土文學論戰，繼

承臺灣新文學精神的寫實主義。<sup>12</sup>在鄉土文學尋根的熱潮之下，楊逵重返文壇，學術研究便掀起一波波熱潮，無論是楊逵的社會運動、人際網絡、文藝活動、作品分析、版本研究、文學評論等，皆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加上來自日本學者的論述，可從多面向的研究瞭解楊逵。

六〇年代便有楊逵其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偏重小說文本的分析，尤以〈送報伕〉最受學界關注。但涉及到綠島時期相關研究的，河原功可以說是重要人物。他蒐集了許多史料並編寫〈楊逵生平寫作年表〉、〈楊逵氏「著作目錄」〉，建立研究楊逵生平與著作的基本資料。<sup>13</sup>1978 年林瑞明（林梵）出版《楊逵畫像》，是第一部描寫楊逵生平事蹟的傳記，但是楊逵 1949 年被捕後，獄中 12 年的生活卻是一片空白，原因在於寫作當下仍處於戒嚴時期，楊逵不能說，林瑞明也不能寫。1985 年楊逵過世後，有關綠島時期事蹟的相關資料與文學作品紛紛出土，使得此時期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首先，王麗華和何昀先後公開楊逵的訪談紀錄，可以一窺楊逵在獄中的活動。王麗華〈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sup>14</sup>以原始的筆記形式直接呈現，是楊逵口述中提到綠島比例最多的資料，內容包含草擬〈和平宣言〉及被捕緣由、偵訊與判決過程、火燒島的生活、被借調臺北的周旋過程，以及出獄後和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與獄友們的見面事宜。何昀〈二二八事件前後〉<sup>15</sup>同樣記錄楊逵因為〈和平宣言〉被捕的經過與審訊過程，以及在火燒島的獄友與生活，特別提到「米上校」和楊逵的接觸，與「米上校」最後的下場。這兩篇口述紀錄是研究楊逵被判刑 12 年的原因與審判過程，以及入獄後生活的情狀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

建立在前述兩篇楊逵口述紀錄上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sup>16</sup>一文，提到現存〈和平宣言〉原件的由來，以及楊逵入獄的時

<sup>12</sup> 葉石濤，〈八〇年代本土文學的意識形態〉，《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7.06），頁 164-166。

<sup>13</sup> 這些資料楊鏡汀將之翻譯中文版為〈楊逵的文學活動〉，《臺灣文藝》95 期（1985.07），頁 194-213。

<sup>14</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原載於《文學界》14 集（1985.05），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0-88。

<sup>15</sup> 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89-98。

<sup>16</sup> 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原載於《台灣新文化》創刊號（1986.09），引自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02 二刷），頁 315。

代背景，再藉由王麗華所錄的楊逵回憶資料，討論〈和平宣言〉是楊逵獲罪的證據，並提到當時的楊逵研究受到史料缺乏與政治因素的限制。另外在〈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sup>17</sup>中，張恆豪針對國民黨借調綠島獄中的楊逵，有意派他到日本滲透廖文毅組織一事，在楊逵過世後出現了他是否接受任務的兩種說法，佐以楊逵綠島同學的口述資料，以及王麗華對楊逵的訪談紀錄，認同王麗華所說，楊逵是個不願踏死他人也不讓別人先踏死自己的人，並指出在國家霸權下的作家之掙扎與糾葛。

其次，除了楊逵的口述筆記公開與研究，楊逵的家屬也從遺物中整理出一批手稿，其中多本新生訓導處筆記原是記載楊逵綠島時期作品的底稿。隨後，楊翠經由友人之手輾轉獲得楊逵綠島時期家書的筆記本，經家人整理註記後於 1987 年出版《綠島家書》。<sup>18</sup>這些都成為日後綠島時期楊逵文學研究的重要依據。而 1987 年向陽（林淇瀾）發表的〈陽光一樣的熱——讀楊逵先生《綠島家書》〉，記述綠島家書手稿的出土過程、手稿內容，以及從 1986 年 10 月 18 日起於《自立副刊》連載的狀況。指出楊逵愧對妻兒，在歸不得的無奈中，其生命能源從最陰暗深處的牢獄中散發出來，照耀子女晦暗的生活困境，是「逆風何所懼的樂觀主義者」，<sup>19</sup>為《綠島家書》的出土提供見證，並提示了家書中表現的重要精神。

1990 年出版的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sup>20</sup>將所有楊逵劇作手稿整理成〈楊逵劇作表〉，有助後人的相關研究。該書提到綠島時期的劇作大多是初稿，類型多為喜劇，手法較為粗糙，故事發展有頭重腳輕之感，並注意到劇本的臺語韻腳運用。但是，焦桐認為置於五〇年代的背景，楊逵仍是傑出劇作家。其次，評介每部劇作的內容時，佐以反共文藝下劇作發展的背景，焦桐認為楊逵劇作的特色，具有「不屈不撓的園丁性格、強烈的民族意識、熱情的理想主義」的特色，並注意到楊逵時常在劇中呈現烏托邦世界的熱情理想，其街頭劇呈現對鄉土的關懷，以行動實踐草根文化的理念。

<sup>17</sup> 張恆豪，〈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南方》2 期（1986.11），頁 122-125。

<sup>18</sup> 楊逵，《綠島家書》（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87.03）。

<sup>19</sup> 向陽，〈陽光一樣的熱——讀楊逵先生《綠島家書》〉，原載於《自立晚報》，1987.03.12，10 版，收入楊逵，《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臺北市：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09），頁 17-25。

<sup>20</sup>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06），頁 72-108。

後來，黃惠禎於 1992 年完成的《楊逵及其作品研究》，<sup>21</sup>是楊逵當時已出土手稿的第一次整理。在收集大量的報章雜誌，包含楊逵公開發表過各種不同版本的各類作品、晚年受訪的口述資料、演講與座談會紀錄等龐大的史料，仔細爬梳資料之後，勾畫楊逵生平事蹟、思想活動、各時期各類作品的不同版本與風格，成為研究楊逵必備的學術專書。該書是首部探究綠島時期楊逵所有著作的論述，發現楊逵此時期散文與劇作的成就最高，風格亦不同於入獄前；少人關注的謠諺、歌謠亦有所概述，是第一本全面性探討楊逵生平與作品的論文。

之後黃惠禎繼續挖掘楊逵的遺稿與史料，《左翼批判精神與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sup>22</sup>主要論述楊逵從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的文藝活動與社會運動，建構出楊逵在四〇年代間如何實踐社會主義的理念，並且釐清與楊逵生平相關的歷史問題。書中附錄的〈楊逵文學活動年表〉，將楊逵的文學活動與重要時事並列，以瞭解楊逵當下活動與時代背景的對話。另外〈楊建先生訪談紀錄〉對於建構楊逵在綠島時期的活動圖像，以及與當局的互動是相當重要的佐證資料。之後再出版的《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sup>23</sup>在學界對楊逵統獨意識的爭辯中，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為基礎，總結出楊逵以臺灣為主體，訴求民主自治的精神。這兩本專書研究楊逵的思想脈絡，補足四〇年代楊逵研究的闕漏，對於本研究在建構楊逵於綠島時期思想的發展，具有指標性的重要意義。

1998 年，林安英發表碩士論文〈楊逵戲劇作品研究〉，<sup>24</sup>評論楊逵 4 部日文劇作、8 部中文劇作，以劇種分類及戲劇內容來分析劇作文本。借重 1990 年出版，收錄綠島時期中文劇作的《睜眼的瞎子》<sup>25</sup>與《樂天派》<sup>26</sup>，林安英分析戲劇類型，發現楊逵的劇作從典型性出發，融合擬寫實主義與社會劇，往問題劇發展，主題性強，角色多為典型人物。林安英也將焦桐曾注意，卻未深入討論的楊逵劇本中臺語韻腳使用狀況，作進一步的研究，摘錄劇本臺語韻文與俚語製成表格，

<sup>21</sup> 為黃惠禎之碩士論文，1994 年由文建會補助出版為專書。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07）。

<sup>22</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07）。

<sup>23</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07）。

<sup>24</sup> 林安英，〈楊逵戲劇作品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102-165。

<sup>25</sup> 楊逵，《睜眼的瞎子》（臺北市：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03）。

<sup>26</sup> 楊逵，《樂天派》（臺北市：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03）。



提到楊逵標音方式是「隨意取音」，並提示歌仔戲四句七字的民間小調對於劇本的影響。

由以上研究發展脈絡可知，綠島時期研究的停滯和進展，與資料龐雜、手稿取得不易有關。後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教授主持《楊逵全集》的編輯與翻譯計畫，提供作品的日文版與中文翻譯對照，並收錄生前未發表的遺稿與相關文字紀錄等，成為日後研究楊逵最重要的憑藉。《楊逵全集》解決楊逵作品複雜的版本問題，和日文作品不易解讀的困難，使得楊逵研究的數量有著顯著的提升。2001年後，楊逵綠島時期作品被納入各相關學術論文的研究範圍，但多以文類區分研究主題，並以劇本、小說、家書為主。

其中，以劇本文類為研究主題者，還有吳曉芬的〈楊逵劇本研究〉，<sup>27</sup>以戲劇藝術方向來探討劇作文本方向，有別文學研究的技巧分析。敘述楊逵生平時，側重在他戲劇接觸的經歷，並且將楊逵的生命經驗與劇本寫作的影響進行互文。文本分析時，採用讀劇工作坊的形式，讀劇後演員進行討論。另從每一部劇作內的情節對話，點出楊逵的批判精神，以及社會主義的理想之間的關聯性，並注意到劇場的藝術性問題。其次，從人民劇場觀點推及楊逵推動的草根文化，討論楊逵如何將民眾素材融入劇場之中。最後提出楊逵的劇作可為當代戲劇創作者的借鏡，也認為置於當代仍有被搬演的價值。該論文是第一部以劇場觀點分析的專論，在文本分析上堪稱鉅細靡遺，並提到楊逵的創作多受傳統戲劇影響，綠島時期的中文劇作具有社會批判意識，以及楊逵運用臺灣閩南語的素材在劇作中的呈現。

邱坤良〈文學作家、劇本創作與舞臺呈現——以楊逵戲劇論為中心〉，<sup>28</sup>從劇本應具有技法的角度來論述，提到楊逵從觀劇中透過民間戲曲教育民眾的觀點，注重戲劇的功能性，認為劇本應由作家來加強。邱坤良認為楊逵的劇作多寫實，主題意識強，編劇技巧弱，但是劇作角色多社會底層，為農工發聲，文本的教化意味濃厚。文中將楊逵現存中、日文劇本作簡單評介，多著力在《怒吼吧！中國》一文評析，以及臺中藝能奉工會劇場演出狀況。論文的後半內容則從臺灣戲劇史

<sup>27</sup> 吳曉芬，〈楊逵劇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sup>28</sup> 邱坤良，〈文學作家、劇本創作與舞臺呈現——以楊逵戲劇論為中心〉，《戲劇研究》6期（2010.07）頁117-147。

的作品與演出來看楊逵之作，認為街頭劇有聚眾效果，但楊逵創作於綠島，受到嚴格管控，不易演出。邱坤良還提到先前研究楊逵劇本者大多撇去劇場技巧，側重楊逵的人格特質及時代意義；而楊逵的劇本情節類型化，藝術性不高，演出時演員的即興能力要強，否則劇本走向案頭劇或教化劇，極難演出。此文從劇場實作角度解讀劇本，提供另一種文本分析的角度。

其次，以小說為研究主題者，有吳素芬的碩士論文《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sup>29</sup>入選為臺南縣文化局「南瀛文學叢書」，已出版。此書主要從小說的主題意識、創作形式，討論作者背景與小說場景之間的關連性，最後以文學成就與歷史定位作結，肯定楊逵在臺灣新文學的貢獻。針對綠島時期，提及楊逵入獄的原因，並對監獄生活和小說、戲劇、散文、家書的文學活動有簡單記述。吳素芬認為楊逵此時期創作風格改變，缺乏與時代脈動的呼應；散文以生活經驗為主，不涉及思想議題，並認為政治的影響導致他修正左翼思想，小說不再出現抗議題材。但是楊逵作品提到不少文藝大眾化等觀點，頗具延續日治時期的思想，〈春光關不住〉也被其他研究者視為不屈服強權的象徵，<sup>30</sup>故對於綠島時期楊逵作品應可再深入理解與研究。

另一篇與綠島時期楊逵小說相關的研究，是郭勝宗的碩士論文〈楊逵小說作品研究〉。<sup>31</sup>這篇論文先從楊逵生平、思想與社會運動，以及現實主義的文學觀架構論文骨幹，接著從小說文本討論楊逵如何觀察並書寫勞動者的立場，在殖民遭受階級壓迫的背景，探討文本內律法、教育與醫療的題材如何諷刺統治者，以及運用文學偷渡策略嘲諷殖民統治的荒謬等，較無超越前行研究之論述。綠島時期小說僅列〈八十五歲的女人〉於「女性書寫」的研究範圍，著墨不多。結論認為綠島時期作品不如日治時期光輝耀眼，平淡無奇，婉曲隱約也不復存在。楊逵綠島時期小說作品雖不多，〈春光關不住〉與〈大牛與鐵犁〉均是重要著作，卻未被列入討論。另外，該文僅以〈八十五歲的女人〉一文代表綠島時期小說創作，

<sup>29</sup> 吳素芬，《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5.12），頁 56-61。

<sup>30</sup> 例如張良澤曾以「不屈的文學魂」為題，羅列楊逵的七篇文章討論文中反抗的精神，其中包含〈春光關不住〉。張良澤，〈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中央日報》，1975.10.22~25。

<sup>31</sup> 郭勝宗，〈楊逵小說作品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論述也稍嫌簡短。

楊達的作品文類中，家書出土最晚，相關研究以楊翠的論述最為精闢。〈楊達的疾病書寫——以綠島家書為論述場域〉，<sup>32</sup>從疾病書寫的觀點出發，認為楊達的疾病是他的生命本質與文學材料，也是與身體的對話。在綠島這個特殊封閉語境中，楊達身兼患者與醫者雙重身分，呈現強大的精神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sup>33</sup>這是首篇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全景敞視觀點，分析綠島時期楊達的論文，並以《綠島家書》為研究文本，針對楊達政治犯身分探討其心靈世界。楊翠先從綠島的封閉語境論述到白色恐怖中臺灣的封閉語境，提到楊達的獄中生活與創作困境，及以書信方式參與家庭生活，顯露在獄中的焦慮。

前述兩篇論文為基礎，楊翠在 2016 年出版楊達的傳記《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sup>34</sup>是從小就和楊達一起生活在東海花園的楊翠，為完成幫阿公寫傳記的心願而作。楊達在出獄後被監控的許多心事，多數向孫女傾訴，因此書中關於楊達綠島時期生活事件、文學活動、交友往來有概要的紀錄，可作為研究楊達綠島監禁生活，與家人視角書寫楊達的參考資料。今年(2020 年)，《文訊》415 期設立「作家的手寫信」專題，楊翠和黃惠禎分別應邀撰文介紹楊達的《綠島家書》。楊翠的〈即使只是一線光隙〉，<sup>35</sup>以楊達角度書寫楊達在獄中寫信的心境，如何地努力用家書將一絲光線遞給家人。黃惠禎的〈綠島家書——監獄中的楊達心事〉，<sup>36</sup>則以歷史脈絡的文本探究法，解讀楊達家書的寫作背景及其意義，並且提及楊達在綠島的考核資料，對照楊達借調到臺北的史實。

另有數篇論文跳脫既有文類的限制，對楊達綠島時期進行綜合研究者。首先，有關楊達綠島時期文學活動的論述，以監獄文學觀點論及楊達者，有黃文成以臺

<sup>32</sup> 楊翠，〈楊達的疾病書寫——以「綠島家書」為論述場域〉，楊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2004.06.19~20)，頁 9-13。

<sup>33</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20-478。

<sup>34</sup> 楊翠提及對楊達的承諾時說：「我已經大四，成績不錯，上過一門臺灣史，阿公開始跟我談說他在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火燒島的經驗與見證，祖孫倆常談到深夜。他說你學歷史，這些臺灣史你都該知道，我說，阿公那我來幫你寫回憶錄好了，我文筆不差，你相信我。」楊翠，《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299。

<sup>35</sup> 楊翠，〈即使只是一線光隙〉，《文訊》415 期(2020.05)，頁 60-62。

<sup>36</sup> 黃惠禎，〈綠島家書——監獄中的楊達心事〉，《文訊》415 期(2020.05)，頁 30-33。

灣監獄史為背景的博士論文〈受刑與書寫——臺灣監獄考察〉，後來出版成專書《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sup>37</sup>書中時代跨越日治到 2005 年，分析多位有過牢獄經驗的作家及作品，以此尋找監獄文學創作的主軸與精神。其中以文類方式扼要論述楊逵綠島時期文學重點，散文雜記部分包含楊逵的藝文觀，對孫文思想的推崇與思想性題材的書寫；詩歌部分提到運用臺語押韻的童詩與諷諭手法；小說以寓言手法表達人生的豁達；家書具有超越時間的性質，表達楊逵積極樂觀的獄中哲學、記錄身體疾病的困頓；劇本建構理想社會並呈現楊逵無神論的宗教觀，人物兼具典型與扁平特色，語言的運用變化豐富，將臺語的音韻、人名的諧音以及民歌融入劇本中。除了謠諺與歌曲的採集活動外，將楊逵綠島時期文學創作重點提述，可惜的是篇幅精簡，無法深論文學與思想之間的互涉。

接著，張朝慶的碩士論文〈楊逵及其小說、戲劇、綠島家書之研究〉，<sup>38</sup>是綜合綠島時期楊逵作品的文類方式進行探析。內容以楊逵的抗議意識為研究脈絡，將楊逵生平進行分期，再評介各時期的小說、戲劇與家書的作品意識、風格與技巧。針對楊逵綠島時期的作品，認為小說主題具激勵人心的精神，與日治時期反壓迫反階級的意識截然不同；而技巧方面，僅針對〈春光關不住〉作簡單評介，並無提出特別看法。戲劇部分，提示楊逵的劇作是「草根文學的大觀園」，注意到社會背景的呈現，臺語對白與歌詞的韻腳運用具有語言實驗性。劇中諺語部分，引用吳曉芬的整理資料，佐以重新爬梳，認為符合楊逵草根文學的訴求。但這些論述在前行研究多已談及。創新部分在於注意到女性角色的形象設計，以及根據劇情內容說明劇本中的舞蹈。家書部分，整理分析楊逵如何面對嚴峻時代背景，先是保持沉默，再利用《新生月刊》發表，最後將家書分寄各處的家人手上，形成對話網路時局，算是目前學位論文中對於家書內容分析最細膩的。文學特色提到日語、北京話文、臺灣閩南語的跨語創作，但論述相當簡短，分量不重。

此外，楊明青〈抗議與隱忍風格之外——楊逵與鍾理和書寫及其背後的家族群像〉，<sup>39</sup>論述重點探及楊逵與鍾理和之於家族書寫的共通之處，以及兩位作家文

<sup>37</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04），頁 129-157。

<sup>38</sup> 張朝慶，〈楊逵及其小說、戲劇、綠島家書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sup>39</sup> 楊明青，〈抗議與隱忍風格之外——楊逵與鍾理和書寫及其背後的家族群像〉（新竹：國立新



學創作的精神，並分別從作品建構兩人的家族群像。論及楊達的文學時，主要在於困境中的樂觀精神與抗議精神，探究《綠島家書》中楊家人的圖像，重點在於綠島監獄外家人具有「政治犯家庭」的陰影，並談及第三代的楊翠與楊菁所承受的影響。此文之後，迄今再無楊達綠島時期相關的學位論文，以分析《楊達全集》文本發展論述的研究型態差不多告一段落。

綜合前述來看，楊達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與思想研究的發展，與新史料的發掘或文稿的整理有密切相關。如今啟動新研究的契機，或許可以放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上。該局典藏歷年來官方檔案資料，開放民眾調閱檢索，筆者查詢楊達綠島相關資料之後，發現楊達入獄的判決書、獄中的〈逐月考核總結〉、〈新生調查表〉、〈新生處理考核表〉，以及入出獄的相關公文等，可從官方角度檢視楊達的獄中規訓狀況。至本論文定稿之前，尚未有任何已發表的相關研究使用這批檔案資料。而這批資料包含楊達入獄確切的罪名，入出獄的確實日期，他所面對的監獄監視制度、教化思想紀錄等，是目前最貼近獄中楊達樣貌的官方文書，可彌補回憶錄記憶遺漏的缺失，互相比對將有助本論文勾勒不為人知的獄中楊達圖像，藉以補相關研究之罅隙。

### 三、 研究方法與綱要

由於楊達綠島時期的作品是監獄中的創作，為瞭解監獄這樣一個特殊空間，本論文便以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來進行論述說明。傅柯從歐洲的刑法史結合人文社會科學觀點，開始論及人身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早期刑罰是公開的、羞辱的，針對肉體給予痛苦，但是當人道主義崛起後，懲罰變得隱密而仁慈，背後就變成權力經濟學，將處刑的儀式化為符號進入人的精神觀念，以剝奪、強制、限制對人身加以控制。傅柯認為：「懲罰是君權的一種儀式。」<sup>40</sup>而懲罰手段包含監禁，在鞏固自身政權時，監禁懲罰會是必要

---

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sup>40</sup> 傅柯（Foucault, M）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苗栗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05 初版七刷），頁 128。

之惡的工具，顯然這種君權／威權的彰顯是當政者所需要的。因此規訓懲罰其實是人身控制的政治權力的技術發展，並且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功能。當規訓和懲罰用於各個領域的人身關係時，變成是一種政治策略。

監禁就如同將人身的權利、時間作為抵押品般，要求它償清負債（也就是罪刑），甚至是君權的權力與實踐的結合，藉由改造技術以塑造恭順的人民，便能習慣聽命於威權。其中技術包含透過身體的勞動改造其思想，所以對人身認識是改造的規劃中必要的，整個監禁期間需要觀察欲改造的個體。這樣的觀察紀律、層級監視，搭配利用全景敞視的建築模式，<sup>41</sup>產生被關注、被可見的、被分配的感受，不需要肉體的懲罰就能夠體現出權力的增強。這種被高度凝視的效果會出現隨時隨地被監控感，久而久之，便會出現被想像出來的凝視，從而開始內化，自我約束和紀律，達到更高一階的支配技術。監獄的囚禁則是所有支配技術中最徹底而嚴厲的手法，對犯人展現絕對權力，並且有壓迫與懲罰的機制，所以監獄就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建立權力與服從關係的場域。以現代監獄的觀念，傅柯也提出監獄的教養輔導功能，所以監獄等同於改造、分類、刑罰調整、工作權利義務、教育、專業的監管等綜合體。

傅柯以權力／知識的概念分析十七世紀的懲罰技術發展過程，從公開審判與酷刑轉型，到現代監禁與規訓的手段，如何逐步在犯人的身體上發展新的權力技術。當懲罰從公開處以極刑轉而成為監禁與改造，肉體的折磨轉為權利的剝奪，那麼刑罰就進階到心理的層面。<sup>42</sup>不僅身體在監禁中柔順服從，連心靈也被重新訓練、改造，合乎現在教育刑的目的——不僅能改變犯人之行為，亦能從心中認可感化之內容，最後犯人能自我紀律。而這當中的方法主要在於規訓的手段、監禁的空間，以及無所不在的全景監視的系統。

首先，傅柯提到若想製造柔順臣民，其方法便是控制機制與力量，也就是將人體的活動拆解分部控制，將所有人體的活動、時間、空間進行編碼，持續不間斷地操作，這種方法便是「規訓」。<sup>43</sup>而規訓的技術主要在於兩大方向，能掌握空

<sup>41</sup> 監獄呈現環形，中間設一瞭望塔，塔的四周皆是大窗戶，正對著環繞瞭望塔一間間囚房的窗戶。囚房另有一扇窗，方便光線透射，提高可見性，便能方便瞭望塔注視觀察囚房內部一舉一動。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99-200。

<sup>42</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0-11。

<sup>43</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6-137。

間與時間的機制，透過二者編碼控制及安排人們活動的動向，以利達到柔順的目的。在空間編碼方面，必須將人們置於封閉的空間，依分割原則安排被規訓者的空間與角色定位，便於監督，並且設立一個能夠控制評估這些被分割的空間與角色的機制，例如行為表現的表格紀錄評分。再將等級作為分割單位，做強制性的序列，而序列間是可以移動的，致使操控技術者得以利用規訓進行層層監督與管理。<sup>44</sup>也就是說，監禁需要被改造的犯人於一個絕對封閉的監獄之中，給予分隊與編號以及負責的勞務工作，有相對職權的監獄管理人員給予不同分隊與部門的人犯監控與評分，將人犯化作可以被記錄的文字對象，並且可視狀況將犯人隨時安置在每個不同監禁空間、勞務工作或是分隊。而這種流動卻是要經過監控人員的同意與安排，等於確立規訓者與被規訓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以確保個體的順從。規訓的展用是在封閉的空間之中，靈活運用打散、分配、安置，再利用等級作連續性間隔，所以規訓是一種排列技術，例如學生的座位、名次，在既有封閉空間內可以進行不停流動，序位的更換位置。如此，時間、行為便可以支配，對人身灌輸新的知識，以達到獲得柔順服從的個體的目的，紀律於焉形成。

而在時間編碼方面，時間表的重複周期可產生紀律，在肉體上的分解動作加上時間表的循環就會出現程序。故監獄當中的時間規範非常嚴格，按表操課，在各項活動當中，一個指令一個動作，得到肉體上系列的約束，以及強迫其積極具有效率。這種支配技術可以將新的知識灌入個體而獲得新的客體，只是，這個客體是「被權威操縱過的肉體」，並非是自然的有機物。<sup>45</sup>

這樣的規訓系統之中，將有效實施的手段建立在建築空間的設計與配置，讓目光便於穿透，有利於清晰而仔細的監控，進行有效的全景敞視的監視，而且是具有層級的監視結構，構成內部由上而下緊密聯繫的權力關係。對於表現優良的給予獎勵與赦免，對於模糊、不被規範的也會進行懲罰。而這種懲罰是屬於內部的、特殊的、被合法化的司法特權，透過不斷地矯正性的操練，反覆重申規訓的機制。這種將個體表現進行好與壞的等級分配的分殊化過程，也就是規範化裁決。<sup>46</sup>再藉由檢查／考試制度，將層級監視與規範化裁決合而為一，形成一種儀式化

<sup>44</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41-147。

<sup>45</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50-154。

<sup>46</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78-182。

的凝視，展現規訓的權力，也就是「在一個使對象客體化的機制中控制對象。在這個支配空間中，規訓權力主要是通過整理編排對象來顯示自己的權勢。」<sup>47</sup>並且利用規訓書寫的權力，將個體寫入文字之中，讓個體變成可被表格化、敘述、紀錄、分析、標示的客體／檔案／個案，建構成知識體系下的一個個可被觀看的文件。<sup>48</sup>

規訓的手段中最重要的成就條件便是在於封閉空間，其中以監獄是絕對嚴明的。傅柯說：「監獄的『自我證明』的性質首先基於『剝奪自由』的簡單形式上。」

「監禁是最明晰、最簡單、最公平的刑罰。此外，它能夠用時間來量化刑罰。」在合法監禁個體償還行為後果中進行教養，可以說是「一種在法律體系中剝奪自由以改造人的機構。」<sup>49</sup>不像其他一般的規訓機構，因為空間內的個體是因為違反法律而必須被改造的，所以監獄擁有絕對的權力、高壓的強制性、高度的懲罰性、嚴厲的徹底教育、絕對的隔離空間、充滿透視的監視，整個規訓的體制會被嚴格執行並強化。監獄將犯人視為體系的一個部件，將他所有的活動使用分解技術切割，利用時間表將犯人所有時間加以占據進行勞動，呈現一種權力關係下的服從，並利用全景敞視的監視技術，構築出一個無可遁逃的空間建築。傅柯引用邊沁的新式監獄設計說明全景敞視的概念，藉由外在的規訓與監視，最後能達到自我規訓與監視，終而服從權力者所訂下的規範，如此改造於焉完成。

總而言之，監禁法規是司法賦予的懲罰制度，利用反覆的強制手段控制犯人的時間、活動、勞動、習慣養成、遵守法度等，最終改造成為恭順聽話的臣民。<sup>50</sup>這種藉由知識與權威所營造出來的管理系統，將犯人肉體與心靈的活動列入改造計畫中，可以說是懲罰權力的體現。<sup>51</sup>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學成為在規訓下思想流動的證明。由於楊達綠島時期的作品寫於監獄，因此監獄文學的定義尚須釐清。

其實，監獄文學並非是新的文類，古時即有知名文人下獄的例子。學者廖振富在〈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

<sup>47</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87。

<sup>48</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88-189。

<sup>49</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32-233。

<sup>50</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27。

<sup>51</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28。



件」相關作品為例〉中，指出監獄文學的定義是：

所謂「監獄文學」，顧名思義，一般的含意應該是指寫作者因入獄服刑而產生的文學創作，而不論其身分與入獄原由。如當代作家歐銀釗等人，曾多次赴各地監獄指導一般受刑人寫作，後來並結集成書發表，一般即以「監獄文學」指稱之。

不過本文所指的「監獄文學」，則可說是屬於「政治文學」的一支，特指知識精英因政治案件而入獄服刑所寫的文學作品。<sup>52</sup>

此外，王建國認為監獄文學不離政治範疇，是政治犯在獄中或出獄後，將監獄內的見聞、感觸等情事付之書寫。根據書寫場域的不同，王建國對於監獄文學的定義可分為獄中文學與監獄文學。日治時期至五〇年代初期，文人多是在獄中進行書寫，此為獄中文學。五〇年代中期後，不少人因為懼於獄方規定或是害怕引發禍端，而未留下文字紀錄，待到出獄後或是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出現集體書寫監獄經驗風潮時，甚或是解嚴之後，才針對曾經經歷的牢獄記憶進行寫作，即為監獄文學。王建國合併在獄中書寫的「獄中文學」，以及出獄後書寫監獄經驗的「監獄文學」二者之義，統一稱為監獄文學。<sup>53</sup>

在劃分研究範疇時，王建國排除獄中非文學性的活動，例如柯旗化編纂教科書，柏楊編寫歷史專書，並將楊逵的劇本歸為「戲劇之編導」，與蔡瑞月的舞蹈並列。可見他未注意到劇本亦是文學活動，僅針對戲劇演出的性質，而將楊逵的劇作列屬於表演藝術的範圍。另外，他舉呂秀蓮《情》、王拓《台北，台北！》為例，認為雖然均是在獄中書寫，但內容與監獄無關，也不歸於監獄文學。由於王建國限定監獄文學乃由政治因素而入獄者所書寫，所以非政治犯的獄中書寫也未被列入研究範圍。<sup>54</sup>由此可知，王建國研究監獄文學的範圍，在於政治犯書寫其

<sup>52</sup> 廖振富，〈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3.02），頁 136-137。

<sup>53</sup>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06），頁 15。

<sup>54</sup>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06），頁 15。

監獄經歷或政治相關意識之文本。

另一位學者黃文成對於監獄文學的研究，則是認為「限定於作家個人生命歷程中，有入獄經驗者的文學作品為考察對象；而文本擇取與分析，則包含獄中創作所有的文學作品，及作家出獄後書寫獄中經驗的文學作品為討論之文本。」黃文成提到監獄文學與政治有著相關性，並引用弗洛姆（Erich Fromm）的人本精神分析，說明人的內心活動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人在監獄中囚禁的不只身體，甚至是心靈。為避免精神世界的崩壞，所以書寫成了一種苦悶精神的出口，是宗教式救贖的窗口，像《新生月刊》便是這樣的一個功能性刊物。<sup>55</sup>

黃文成觀察監獄文學的書寫主題，具有時間和空間的超越性，分別是歷史情境書寫和烏托邦情境書寫。也就是在監獄封閉性的空間中想像過去或未來，突破被囚禁的現況，<sup>56</sup>因此監獄文學就成了特殊的心靈呈現。在分析臺灣監獄文學面向時，黃文成則是提到時代環境、書寫場域、作者與文本產生互相影響，創作本身應該是自由的，但是時代與監獄場域卻是相對困境。為了避免思想檢視招來更多刑罰，文本逐漸走向脫離監獄經驗的純文學，並且產生兒童文學、家書文學、自傳文學等次文類文學。<sup>57</sup>而監禁經驗之所以可成為強大的寫作素材，究其原因，他提出以下說法：

獄中書寫，可謂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治療。寫作的過程，便是一趟精神療程。「監獄文學」的精神，無非是從苦悶的現實環境中，試圖從書寫過程中找出一個出口。<sup>58</sup>

依其所言，將監禁視為一種創傷，犯人藉由書寫進行精神上的自我療癒，也是在銅牆鐵壁處境中尋找生命困頓的出口的心理活動。

由此可知，監獄文學的定義與作家受到政治迫害的經驗有關，書寫場域不限於獄中獄外，書寫的時間限度可以穿越整個生命歷程，故凡因政治意識型態影響

<sup>55</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1-3。

<sup>56</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31-33。

<sup>57</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424-429。

<sup>58</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2。

而獲罪入獄者，其獄中書寫的各式文類及有關監獄經歷之文本，均可列為定義之範疇。因此，楊達撰寫〈和平宣言〉觸及當政者的逆鱗，明顯因為政治因素下獄，在獄中進行的各類書寫，皆可視為監獄文學之內容。

綜合以上，會發現監獄與肉體、監獄文學與心靈皆是「政治—權力」的關係場域。監獄以體制、規訓、懲罰進行對人身的支配與政治技術的展現，被支配的人身何嘗不是以文學的超越性來做反支配抵抗？一如楊達信奉社會主義，入獄前以文學與社會運動進行一連串抵抗威權行動的同時，也是在與當時政權建立溝通關係。而關係的建立，不該只有一方的獨語。所以本文的研究重點將放在楊達入獄原因的時代背景，探討綠島獄中生活的情狀和規訓權力展現，分析楊達在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並從文本解讀五〇年代下楊達的文藝與政治思想。各章節綱要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研究成果的簡介，以及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各章節內容。

第二章，楊達與綠島監獄。第一節探析楊達獲罪被囚於綠島的緣由，以法學史概念對照日治與國民政府時期相關律法上的相異處，釐清中華民國政府囚禁楊達的法律制度。第二節整理綠島監獄的建置與中華民國感化教育的沿革，從空間探討新生訓導處全景敞視的設計，和新生訓導處的制度與環境管控。第三節結合傅柯的監獄論述，以理解新生訓導處的監控與規訓制度。

第三章，獄中的楊達圖像。第一節先以楊達與獄友的口述歷史，整理出楊達在獄中的生活，以及楊達對規訓制度的因應。第二節引用楊達獄中考核表、基本資料及官方文書，探究考核制度的實施項目。第三節從獄友視角探究楊達在獄中的形象。第四節爬梳相關史料，呈現楊達在獄中與家人互動的情況，以及借調臺北的相關細節。

第四章，楊達在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第一節整理楊達在綠島時期的創作特色與編輯活動，分析楊達在文學創作上的理念。第二節整理未曾有人研究的謠諺稿，推及楊達對於民間文藝的看法，並研究謠諺稿中語言標音的使用。第三節整理歌譜集並分類製表，再分析歌曲的曲種組成、多語言現象，探究與街頭劇劇本內標注唱譜之關係，釐清楊達對於歌譜集的採集與再創造的問題。

第五章，楊達獄中文學與時代的對話。解讀楊達在國語政策、反共文藝、監

獄規訓三重禁錮中所呈現的文學精神。第一節分析國語政策對楊逵創作的限制，以及楊逵如何突破語言困境進行寫作，並強調大眾化的語言以貼近民眾生活。第二節探討反共文藝對於楊逵的影響，楊逵如何以殖民經驗寄託作品之中，如何描繪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圖像，以因應反共文藝的要求。第三節討論反共文藝運動結合監獄規訓迫使楊逵必須創作情形下，楊逵如何巧妙運用守門人的決策權避開監視系統，將《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作為作品展演的場所，持續他寫實主義文學的實踐。

第六章，結論。在探討楊逵綠島時期的生活圖像與文學活動之後，解讀楊逵所要傳達的政治思想與文學主張，呈現獄中的楊逵與五〇年代下臺灣文藝發展之關聯性，以及綠島時期在楊逵文學生涯中的意義。





## 第二章 楊逵與綠島監獄

### 第一節 楊逵的入獄與判刑

談到楊逵的入獄，最為人注意的便是他在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兩大統治政權下的牢獄經驗：日治時期 10 次，共 45 天；中華民國時期 2 次，卻高達 12 年又 105 天。楊逵在東海花園接待張良澤時，對於這樣的結果有著以下的對話紀錄：

辭行前，我考慮了一下，向老人問道：「日本帝國那麼嚴酷，您為甚麼那麼不怕死呢？」

楊老開懷笑道：「我也是怕死的。只是日本帝國再嚴酷，它也要依法辦罪，因為它是法治國家。所以我們要演說、寫文章，只要翻查一下『臺灣六法全書』，便可算出自己可能被關幾天，結果只會少不會多的。大致來說，以演說、寫文章攻擊帝國政府，最重是坐牢二十九天。所以臺灣話有句口頭禪『拘留二九工』，就是說，了不起你關我二十九天好了。」楊老停了一下，臉上一沉，接著說：「不過，回到祖國懷抱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它有憲法，也有六法，但怎麼算就莫宰羊了。我寫那篇『和平宣言』，總共不過五、六千字，結果關我十五年，平均一字關十天，這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稿費。」<sup>1</sup>

這段對話中，顯然楊逵並不認為日本政府的殖民手段殘酷，反倒是他稱為「祖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待異議份子的方式，最讓他耿耿於懷。在日後的訪談記錄中，被視為抗日象徵的他，記憶最深的並非是日治時的坐牢經驗，而是多次提到的被監禁 12 年的心得與感慨：

因「和平」招來牢獄之災，對我是很大的諷刺。我認為，我自己的看法誤

---

<sup>1</sup> 引文中的「關我十五年」應是楊逵口誤，實際為 12 年徒刑。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01 初版三刷），頁 229。

了自己，是這種心境。唉！我有什麼辦法！自己的判斷，誤了自己，只好自己認了。<sup>2</sup>

楊逵是政治運動的老手，在日治時與司法機構交手多次，理應有著豐富法律攻防經驗，但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處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何以楊逵自言誤判形勢？也許可從日治與國治時期律法窺知一二，並且瞭解楊逵的〈和平宣言〉究竟是如何使他獲罪。

首先，日本引進西方法治系統，訂定諸多法律作為執法依據，以殖民者姿態來面對被殖民的臺灣人各式各樣的抗爭。楊逵所謂之「臺灣六法全書」，其實係指各項在臺灣延用日本律法（例如帝國刑法、違警罪等），或是臺灣總督府以各項命令刑執之條例（例如府令、律令等），無論法院或犯罪即決，皆需援引律法予以判刑。

學者王泰升提到日治時期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執政者，皆以「不依法律程序處斷」、「依特別司法程序審判」、「依通常司法程序審判」三階段處置政治犯，目的同樣是以立威手段鞏固統治權。<sup>3</sup>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針對武裝抗日頒布嚴厲法令來對付這些反抗者，尤以 1898 年的《匪徒刑罰令》為最，不管成因為何，凡是欲以暴行或脅迫達到其目的者皆視為「匪徒」，很多反抗者無須經由審判一律遭到武力鎮壓。1915 年，影響楊逵反霸權思想的「噍吧哖事件」便是《匪徒刑罰令》最後一次執行的事件。<sup>4</sup>這種「不依法律程序處斷」類型的處置，在對付這些政治異議份子時動輒死刑、大屠殺，留給後世「日本嚴酷治國」的印象。

之後，臺灣總督府不再以極刑對付政治犯，改以專為異議人士設政治刑法來壓制，進入「依特別司法程序審判」階段，刑罰逐漸寬鬆。1920 年代，臺灣不少留學生接受西方法治洗禮，改以請願運動代替武力抗日。自從「治警事件」<sup>5</sup>後，

<sup>2</sup> 戴國輝，〈楊逵憶述不凡的歲月〉，原以日文刊於《文藝》22 卷 1 號（1983.01，東京），題為〈一台灣作家の七十七年一五十年ぶりの來日を機に語る〉，引自黃惠禎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4・楊逵》（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03），頁 180。

<sup>3</sup>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07），頁 301-302。

<sup>4</sup>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11 二版一刷），頁 110。

<sup>5</sup> 1923 年，蔣渭水等臺灣知識份子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利用臺灣與日本互為獨立法域的矛盾，成功聲請設立政治團體組織。同年臺灣實施《治安警察法》，檢察官便以違反治警法第 8 條「保持安寧秩序之必要」禁止結社。審理過程檢察官的重點卻在蔣渭水等人反對總督府施政，

法院的輕判強化政治運動份子依循律法的活動模式。雖然臺灣總督府針對異議份子設有政治刑法，但在 1920 到 1930 年間，真正使用正式刑罰處罰異議份子其實並不多。<sup>6</sup>例如 1923 年的「治警事件」，雖然臺灣總督府想以《治安警察法》禁止臺灣人結社，但是法院判定下來，多數人無罪，領導人士最高的刑度也不過四個月而已。<sup>7</sup>因此當時從事農民運動、政治運動者，如前引楊達所述：「要演說、寫文章，只要翻查一下『臺灣六法全書』，便可算出自己可能被關幾天。」此時臺灣人在表達意見的彈性空間，相較於日治初期自由得多。

另外，1885 年日本發布太政官公布第 31 號「違警罪即決例」，授與地方警察署長、分署長、代理官員司法判決權，只要是拘留或科料（罰金）的輕罪，皆可不經司法審判而即決判罪。<sup>8</sup>日本領臺後，1896 年即將此法於臺公布擴充使用。日治初期，法院對於刑法內有期徒刑的判決，很多是重禁錮三個月、罰金百元以下的輕罪。為減輕司務負擔，以及配合臺灣人的司法觀念多停留在傳統地方官員同時具有行政與司法權的慣習，1904 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四號發布「犯罪即決例」強化警察權限，只要「拘留或科料」之刑、「主刑在 3 個月以下重禁錮」、「主刑 3 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百元以下罰金」這三類輕刑，皆可以由警察判決。<sup>9</sup>但是當時犯罪率上升，每年全臺因犯罪即決例而判刑者達 3 萬多人，<sup>10</sup>若是以禁錮於監獄來處理輕罪犯人，法院相關事務以及獄政費用會是龐大負擔，而且當時也沒有那麼多的監獄空間可供收容罪犯。因此臺灣總督府在 1904 年同時搭配笞刑與罰金刑，並且將各地警察單位的拘留處當作留置場，以圖減少監獄收容量。

---

而被告也多闡述政治意見，雙方重點並非在「違反治警法第 8 條」上，因此審判長堀田以「法為依據」判定被告全數無罪。檢方不服，一路上訴到高等法院，才有被告被判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禁錮 4 個月，三審時維持二審判決。該案件實屬政治案件，但是 4 個月的禁錮僅高於輕罪中「最高禁錮 3 個月」1 個月，對於臺灣政治異議份子而言大振人心。在「法為依據」的司法結構下，更加強以政治運動取代武裝抗日的模式。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09 修訂二版），頁 159-160。

<sup>6</sup> 雖然總督府設立了政治刑法，但是王泰升統計從 1927 到 1929 年的臺灣農民運動罪名來看，屬於政治刑法所判決的罪名頂多佔四分之一，表示 1930 年左右的政治活動，其實並非動不動就受到限制。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54-258。

<sup>7</sup>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54-255。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頁 158。

<sup>8</sup>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 I》（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12），頁 101。

<sup>9</sup>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頁 245。

<sup>10</sup> 〈留置場之監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6，2 版。

<sup>11</sup>不過日本的監獄法第 1 條第 3 項另有規定，留置場雖可代用監獄，但不得超過 1 個月。<sup>12</sup>

日治後期臺灣人流傳的一句話「拘留二九工」，說的就是警察在犯罪即決制下，對於輕刑擁有類似法院的判決權以及代監執行權，雖然有權判處禁錮 3 個月，實際執行上通常以 1 個月為限，不會超過 29 天，並且可以決定犯人是要拘留在警察衙署的留置場，或者是移送檢察官執行，關到刑務所。<sup>13</sup>對於當時的政治運動人士來說，這樣的刑罰不僅有依據可循，而且被送至留置場的機率比送往監獄的機率高。而留置場的目的多在盡速執刑、減少監獄收容量，並非感化，因此受刑人失去自由的時日不多。例如楊達曾在 1976 年《夏潮》的訪談中，提到他在日治時期的一次被捕經驗：

對了！被捕坐牢十多次中間，竟有一次「坐得非常愉快」的經驗，也許可以提一提，我從日本回臺參加農民運動的第二年（1927 年），在梅山召開了一次盛大的農民大會，大會決議通過一件抗議文，由我執筆寄給日本總理大臣和臺灣總督府而被捕了。經過三審在臺南高等法院開庭，法官唸起訴書時，竟把抗議文中的一句話「日本政府是土匪」也唸出來，引起了熱烈的掌聲。結局，雖然被判決拘留七天，但坐滿刑期出獄時，監獄看守卻向獄友們，把我的所作所為大大的捧了一場，說我是替臺灣農民犧牲的義士，還教訓他們好好學我，不要再做盜雞換狗的小偷。這是我們的抗日宣傳活動竟然也在獄卒中發生了影響的實據，也許可以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

14

---

<sup>11</sup>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68。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49-50。

<sup>12</sup> 〈代用監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09.25，2 版。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49。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57-58。

<sup>13</sup>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68-270。

<sup>14</sup> 楊達於 1927 年回臺，所以第二年參加農民運動應該是 1928 年。楊達口述，〈我要再出發——楊達訪問記〉，原載於《夏潮》1 卷 7 期（1976.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62。



楊逵以文字抗議的對象是日本與臺灣最高的行政長官與機構，並以「土匪」一詞「公然侮辱」，理論上必須接受對國家領導人大不韙的罪刑，所以警察應是不會以犯罪即決制來處理之，改交由司法單位審判。日治時期 1919 年後司法採歐陸的二級三審制，而楊逵一路與檢察官攻防到三審才獲判「拘留」——1908 年（明治 41 年）後的新刑法中的拘留，刑期僅一日以上，不滿三十日，可謂是輕罪。於是這 7 天的文字獄，楊逵是「坐得非常愉快」，不僅能向總督府與日本當局充分表示抗議，又能引起獄中看守者的認同及討論，可見當時氛圍並非全然壓抑。但在中華民國政府時期，楊逵憑著以往豐富的坐監經驗，在明知會有一番法律攻防戰發生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選擇同樣以文字向臺灣執政者表達建言與鄭重聲明，結果卻是大大脫離他的料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衝突氣氛趨濃，楊逵參與組織文化界聯誼會，與編輯友人決定發表〈和平宣言〉，由楊逵起草。此文被上海《大公報》特派記者在歌雷處看到，在該報刊載而惹怒陳誠，陳誠直斥「台中有一支共產黨第五縱隊」。有文字獄經驗的楊逵聽說了，「當時心裡就有數。果然幾個月後，爪牙就來了。」<sup>15</sup>1949 年 4 月 6 日發生「四六事件」，原起因於臺大和師大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但事件中除了學生被捕之外，楊逵、鍾平山、歌雷，甚至其他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士均同時被逮。一般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擴大事件，藉此鞏固二二八後有掌控危機的執政權，這並不只是學運相關事件，更是一樁意欲全面性打擊政治異議份子的政治事件。<sup>16</sup>

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針對政治犯的處置方式，並非銜接日治時代「依通常司

<sup>15</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5。

<sup>16</sup> 彭瑞金對於四六事件與楊逵有一論：「臺灣五〇年代前夕開始的戒嚴，可以視為中國內戰的延長，事實上中國內戰蔓延到臺灣來，早在警備總司令部發佈全省戒嚴令的一個多月前已經有加緊步調的跡象，臺大、師院學生被捕的『四、六事件』就是個警訊，戰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動機之一的楊逵也在四六這一天，為撰寫『和平宣言』再度被捕，被囚於綠島，而且一去十二年。楊逵的被捕，論者咸信是為陳誠的統治政權鋪路，擔任大清掃的工作。」而陳芳明亦有類似論點：「所謂四六事件，表面上是師大學生腳踏車違規造成，實質上是陳誠政府透過微小的細故介入當時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從而對大多數的知識份子進行恫嚇。當時陷於政權危機的國民政府，已經決定要撤退到臺灣。因此，如何在這最後政治據點維持穩定的環境，就成為陳誠政府的優先考量。」黃惠禎在梳理楊逵與臺大、師大學生之間關係時，也推論：「當局在整頓學風之際，加強對於言論的控制。」統整以上所論，四六事件在鎮壓學生運動事件表象的背後，政治因素與之相關密切。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頁 66。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 264。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頁 56。

法程序審判」下來，而是再次重複前文曾述日治時期處理政治犯「不依法律程序處斷」、「依特別司法程序審判」、「依通常司法程序審判」的三步驟。戰後由於人民代表機關尚未成立，依循《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可由國民黨代以訓導，開啟訓政時期。《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 30 條又規定訓政時期可由國民黨代表國民大會行使統治權，所以基本上戰後的政局是以黨治國。<sup>17</sup>但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內戰失利，統治權岌岌可危，面對臺灣人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質疑與不滿，在查緝私菸的導火線引爆之下，便以軍隊「不依法律程序處斷」鎮壓異議份子，引發二二八事件的慘劇，不少臺灣菁英份子折翼於此次事件中。

四六事件發生後，1949 年 5 月 19 日發布戒嚴令，隔日開始實施，從此進入戒嚴時期。早在 1948 年 5 月 10 日所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便針對任何可能顛覆國家的行動、思想、文字、言論、集會提出罰則。1935 年公布施行《刑法》內亂罪（刑法 100 條）多以重刑明列，特別刑法另有 1949 年〈懲治叛亂條例〉、1950 年〈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sup>18</sup>均在戒嚴時期「依特別司法程序審判」下成為處置政治犯的依據。雖然「對於政治思想異議人士均以特別法來處置」這點與日治時期雷同，但與治警法或犯罪即決例因循法而輕判的結果相較，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特別法相對嚴苛。例如《刑法》第 100 條規定：

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sup>19</sup>

《刑法》第 101 條規定：

以暴動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sup>17</sup>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頁 152。

<sup>18</sup>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11），頁 103-104。

<sup>19</sup> 〈中華民國刑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1630 號，1935.01.04，頁 17。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sup>20</sup>

內亂罪的懲罰最高可處無期徒刑；假若以暴動實行，首謀者可能被判處死刑。即使是預謀犯罪者，最少也要六個月以上的徒刑。相較於日治時期禁錮三個月來說，相當沉重且嚴酷。

1949 年的〈懲治叛亂條例〉，更是將刑法的內亂罪刑罰層級提高到極致苛刻，尤其是第 2 條第 1 項規定：

犯刑法第一〇〇條第一項第一〇一條第一項第一〇三條第一項第一〇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刑法第一〇三條第一項第一〇四條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sup>21</sup>

此條款乃是時人聞風喪膽的「二條一」。本來在《刑法》中 101 條，暴動內亂罪才可能會以死刑處之，但在「二條一」中凡被認定叛亂者，皆處唯一死罪，連以無期徒刑留命的機會都沒有。再者對於刑罰與罪名的訂定，法界有「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也就是必須將罪名明文規定。此二法對於內亂的判定相當不明確，「意圖」、「預備」、「著手實行」的定義毫無依據，容易落於主觀判斷。最後凡是只要與政府執異議者，均變成叛亂犯，導致冤獄的發生。<sup>22</sup>

1950 年，為了防堵中共滲透所頒布的〈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更是擴大「政治犯」定義的內容：

第二條 本條例稱匪諜者，指懲治叛亂條例所稱之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

第四條 發現匪諜或有匪諜嫌疑者，無論何人均應向當地政府或治安機關告密檢舉。

<sup>20</sup> 〈中華民國刑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1630 號，1935.01.04，頁 17。

<sup>21</sup> 〈制定懲治叛亂條例〉，《總統府公報》第 230 號，1949.06.27，1 版。

<sup>22</sup>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頁 109-110。

第九條 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或縱容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sup>23</sup>

原本匪諜應指滲透到臺灣的中共地下人員，或是參與共產黨組織者。但〈檢肅匪諜條例〉第 2 條卻將非匪諜者等同視之，只要被視為有匪諜和勾結的嫌疑，便可以用〈懲治叛亂條例〉處置。而第 4 條的強迫告密與「有匪諜嫌疑」的模糊主觀認定，當政府或有心人士意欲排除異己時就變得更加容易。甚至因為告密獎金的設立，誣告情事頻仍。<sup>24</sup>此外第 9 條對於知情不報者的處罰，更被視為連坐法的再生。<sup>25</sup>

而在審判系統上，戒嚴法第 8 條「戒嚴時期接戰地域內，關於刑法上左列各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之。一、內亂罪。二、外患罪。」，<sup>26</sup>〈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 11 條「匪諜牽連案件，不分犯罪事實輕重，概由匪諜案件審判機關審理之」，以及〈懲治叛亂條例〉第 10 條「犯本條例之罪者，軍人由軍事機關審判，非軍人由司法機關審判，其在戒嚴區域犯之者，不論身份，概由軍事機關審判之」，比較起日治時期以警察行政機關代監即決處理輕微案件，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軍事機關代替司法機關處理的均是重大罪刑。1956 年修訂的軍事審判法，雖接近刑事審判的三級二審制，但是在戒嚴初期楊逵面對的軍事審判，是沒有辯護人的不公開審判的會審制，會審結果交給軍事長官做覆核。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擁有最高的核定權，即使會審結果已下，覆核時仍有可能改變判決。<sup>27</sup>

其實在楊逵被捕後，被轉送保密局、臺北監獄、警務處招待所等由不同單位

<sup>23</sup>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總統府公報》第 253 號，1950.06.15，6 版。

<sup>24</sup> 由於陳誠發言：「寧可錯殺一千，也不容漏掉一個。」便依此法鼓勵告密，檢舉一個嫌犯可獲新台幣 6000 元，而當時高職畢業生任稅捐處公職起薪僅 60 元。張振騰回憶，曾有公務員在蔣介石誕辰拜壽時，僅是用臺語問旁人「今天星期幾？」，被人以「今天拜鬼」而密告為思想犯，判七年的徒刑。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1.07），頁 24-25。

<sup>25</sup>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頁 119-120。

<sup>26</sup> 〈戒嚴法第八條修正條文〉，《總統府公報》第 203 號，1949.01.14，1 版。

<sup>27</sup>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頁 252。另外，蘇瑞鏘以蔣介石所核覆過的公文進行研究，認為最高軍事長官是在 1930 年制訂的《陸海空審判法》中獲得合法的核覆權，並且在模式上有一般核可、發回覆審、指示刑度、改判結果的最後裁決權。時有不當判決的現象出現，是 50 年代「恐怖」之因。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 卷 4 期（2012.12），頁 209-239。



訊問，當中有許多對他不利的質問。<sup>28</sup>幸而，楊逵在這樣完全黑箱作業的政治氛圍中是相對幸運的。首先，審訊是否參加共黨組織，又在被意圖做大罪名的情況下，楊逵未被刑求，自白書寫了，也未被再審訊一字一語，<sup>29</sup>已是難得一見。畢竟當時遭刑求認罪參與組織，而送至馬場町槍決的冤案實在太多。其次，陪審者中應該是不同立場的米少校，竟拍他的肩道：「你有甘地一般的風度。」<sup>30</sup>楊逵被關到軍法處後，看守衛兵客氣喚他楊先生，並且優待他多半小時可以梳洗淨身。當葉陶受「光明報事件」波及，被捕至軍法處時，看守衛兵也讓楊逵可以跑出自己的牢房和葉陶說說話，衛兵則幫他把風。所以楊逵自言：「這件事與『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一文同樣，我受到保護，我想，那時他們裡面這樣的人很多」。<sup>31</sup>

如同楊逵在日治時被捕入獄，曾經受到監獄看守的尊敬，視之為義士；到了中華民國時期，楊逵因為堅持和平，理應是不同立場的審問軍官及獄兵都對他的風範表達敬意。只是仍舊不敵國家機器的霸權系統，在極為粗糙的審判下，落實了楊逵入獄的命運。因此，楊逵追憶中提及：

這個案子由軍事審判，不能請律師，也是秘密的，像古時縣官判刑，隨便問問就判。在場只有一個法官、檢察官、書記官和警衛，如此而已，判完，就送去台北監獄，等期坐船送火燒島（綠島）。<sup>32</sup>

比較起楊逵於日治時能在公開場合中上訴到三審，為自己爭取輕判數日拘留的經

<sup>28</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178。

<sup>29</sup> 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4-95。

<sup>30</sup> 楊逵的記憶中稱為「米上校」。依據楊翠的考據，得知該人為米蔭庭，河北省臨城縣人，在楊逵被捕時擔任少校。當警備司令部改組為保安司令部時，米蔭庭被派到國防部大陸工作處任少校參謀，遭指控洩漏保安司令部情報給「北峰區工作委員會案」案首葉敏新而遭到槍決。當楊逵在軍法處時，從保密局轉到軍法處的朋友告知他說，「米仔」請朋友轉告楊逵他即將被槍決。楊逵記憶中除了「米上校」的鼓勵外，也觀察到米蔭庭手上有一本劉少奇的《組織問題》。從對楊逵的同情，洩漏情報給葉敏新，以及手上書籍來看，米蔭庭也許是左派思想者。楊翠臉書（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462523961>，2019.05.05）。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3-94。

<sup>31</sup> 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5-96。

<sup>32</sup> 楊逵口述，何昀記錄，〈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4。

驗，戰後楊逵所面對的是非公開、快速，以及對犯人沒有任何保障及辯護權的秘密審判。<sup>33</sup>甚至可以說犯人的生死去留，皆掌握在審判人與覆核人的手中，完全沒有招架餘地。對此，他曾在晚年感嘆道：

軍法官說我不滿現實，就是左傾。過去我會抗日，就會反抗我們的政府。說我以文字為叛徒做有利的宣傳。我正要说，我們的社會是非莫辨，我們應該保障言論自由，把缺點提出來，讓大家討論，才能改善，才會進步。尤其言論自由是憲法所保障的。而且這些材料卻是取自報紙刊載的事實，並不是我個人主觀的意見。如果我們有過即改，就不會讓共產黨有機可趁。而能夠保持一片乾淨土。他不等我說完，就截住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帶下去。」沒多久，就被遣送到火燒島。<sup>34</sup>

楊逵被軍法官無厘頭的類推法認定是叛亂份子，以曾經抗日行動作為叛亂動機，顯然是預加之罪，何患無辭。楊逵冀望以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與事實客觀兩大觀點，試圖為自己說明脫罪，然而再多的準備，再有理的說詞，當場被堵住不得說出，並且直接判刑，這樣的審判系統自然也在楊逵的生命中留下了驚嘆號。

晚年的楊逵雖偶有談及這 12 年的牢獄生活，但對於入獄的理由，在後人訪談紀錄中，自言是因為〈和平宣言〉一文，「呼籲國共停止內戰並謀求和平而被問罪」。<sup>35</sup>張恆豪曾以此推論〈和平宣言〉似是入獄證據。<sup>36</sup>黃惠禎則很早就認定，楊逵的入獄不僅是筆禍而已。<sup>37</sup>至於楊逵入獄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實」，他說

<sup>33</sup> 王麗華在採訪楊逵時曾問及審判過程，楊逵回憶在軍法處受到審判，而當場僅有他、憲兵、書記、審判官，並無設置任何辯護人，亦非是公開的法院場合。宣判過程也非常粗糙：「審判官：『還有話說嗎？』我要開口辯說。審判官搶入：『免講啦！免講啦……』憲兵拿我押下。」面對遭判的罪名連自辯機會都沒有，被迫接受。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1。

<sup>34</sup> 楊逵，〈我的卅年〉，原載於《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5.03），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頁 437。

<sup>35</sup> 戴國輝、若林正文訪問，〈台灣老社會運動家的回憶與展望——楊逵關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的談話記錄〉，原載於《台灣與世界》21 期（1985.05），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84。

<sup>36</sup> 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 315。

<sup>37</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頁 55。

自己是以「叛亂罪」被逮捕。<sup>38</sup>張恆豪曾提過罪名是「台共份子」。<sup>39</sup>藍博洲明確指出，是「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sup>40</sup>曾與楊達在東海花園一同生活，與晚年楊達關係最為親密的孫女楊翠，2016 年為祖父寫的傳記則明白指出，楊達是以「為匪宣傳」罪名被處 12 年徒刑。<sup>41</sup>由此來看，〈和平宣言〉確為罪證，卻不是簡單的筆禍，涉及到了被視為「叛亂」的程度。

楊達自認撰寫〈和平宣言〉的重點在於：

- 1、二二八事件責任在政府，不在人民，要求釋放政治犯。
- 2、開放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因為台島並無共產黨的勢力。<sup>42</sup>

然而楊達卻因此文而被認定「為匪宣傳」。在中華民國政府眼中，楊達究竟是犯了什麼「罪」而必須予以處置？楊達自言：

民國三十八年，我在軍法處被判徒刑十二年之時，法官對於我的判決作了如下的結論：「不滿現實就是左傾，你會反抗日本統治，就會反抗我們的政府！」就這樣確定了我的叛亂罪。而我將本省籍和外省籍因二二八事件所產生的鴻溝鋪橋所寫的「和平宣言」，就是叛亂罪的證據。<sup>43</sup>

這裡所指的「叛亂罪」，其實就是〈懲治叛亂條例〉中第 1 條「叛亂罪犯適用本條例懲治之」。「叛亂罪犯」的定義由此而來。根據保安司令部的判決書，楊達確實係因「犯叛亂罪」合議審判，主文為：「楊達共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sup>44</sup>此乃依據〈懲治叛亂條例〉中第 8 條，

<sup>38</sup> 楊達口述，楊翠筆錄，〈我的心聲〉，原載於《自立晚報》，1985.03.29，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66。

<sup>39</sup> 張恆豪，〈楊達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南方》2 期，頁 123。

<sup>40</sup> 藍博洲，〈楊達與中共臺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評與再造》12 期（2004.12），頁 39。

<sup>41</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178。

<sup>42</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5。

<sup>43</sup> 楊達口述，楊翠筆錄，〈我的心聲〉，原載於《自立晚報》，1985.03.29，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66。

<sup>44</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sup>45</sup>也就是說，楊達確實因〈和平宣言〉一文入獄。但是此文如何被認定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決書的事實陳述指出：

被告楊達在日本大學讀書時曾研究共產主義理論，自稱為共產主義理想者。三十八年元月初旬共匪在北平鼓吹局部和平時，以臺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名義撰擬「和平宣言」，謂「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臺灣民心，造成威懼局面，把此比較安定的乾淨土以戰亂而毀滅。」等語響應之，並先將原稿交與台中新生報分社主任，即被告鍾平山閱覽，經同意後□□台北各文化人士轉寄上海大公報發表。……均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案。<sup>46</sup>

1948年至1949年國共三次會戰中，國民黨連敗，喪失大量軍力與立足之地，隨後才有布局臺灣的安排。1949年1月楊達撰寫〈和平宣言〉時，正值平津會戰國民黨敗北和談，情勢不利國民黨，連派出去和談的張治中、邵力子也消失，<sup>47</sup>因此共產黨可謂是國民黨仇痛的對象。而判決書中所引用〈和平宣言〉片段，恰巧顯示國民黨認為楊達意有所指，挑動了戰敗者的敏感心理。偏偏擅長文宣的共匪「在北平鼓吹局部和平」同時，臺灣文化界具有重量級影響力的作家恰好寫下了〈和平宣言〉。無論楊達是否與中共有所聯繫，在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風聲鶴唳的情況下，這篇文章在國民黨眼中確實是不利於己的宣傳文案。

判決書的審判理由中，更明確指出國民黨認定楊達這段針對「不要重武裝」的呼籲，「意在使國軍退出臺灣，便利共匪入侵，係與共匪製造北平局部和平同出一轍。」<sup>48</sup>由此可知，當時國民黨在中國戰場的敗局已經確定，僅能退守緊緊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4、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5。

<sup>45</sup> 〈制定懲治叛亂條例〉，《總統府公報》第230號，1949.06.27，1版。

<sup>46</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4、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5。

<sup>47</sup> 楊達口述，何昀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92。

<sup>48</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抓住臺灣的掌控權。為了避免重蹈在大陸的敗因，連最後據守點皆無法守住，必須增強國家暴力，務必肅清異議人士與「共匪」的滲透。

楊逵認為於四六事件中被捕，是因為他時常去師院演講，而讓當局認為四六事件與他有關。<sup>49</sup>有此認知，來自於他對麥浪歌詠隊的支持，甚至公開稱讚麥浪歌詠隊以民歌傳遞民情。<sup>50</sup>其實，在楊逵的判決事實首句便提出，「楊逵自稱是共產主義理想者」，開宗明義地昭顯國民黨捕捉的不只是楊逵，而是針對共產黨以及其共犯組織，以及有左傾思想者，皆被視為逆黨，需予以消滅。

加之同案的鍾平山和陳軍皆和楊逵一樣，「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為罪名，陳軍甚至是「連續以文字為匪宣傳」，卻獲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sup>51</sup>輕於楊逵「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的刑罰，顯然國民黨重看楊逵的身分與話語權。然而，三人同案罪名可以得到一個獲罪的集合概念，便是與共產黨的關係以及為之宣傳。

現今研究普遍認為楊逵是左翼文學家，政治立場上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者，因此楊逵與左右派亦皆有交遊。至於楊逵與在臺地下黨的關係，也曾引起熱烈的討論與研究。目前相關研究均認為，楊逵與共產黨之間無組織關係。楊逵孫女在答覆學者黃惠禎詢問時，回答楊逵在世時對此並無說明，但是以楊逵的性格與處事方式推想，認為楊逵並無加入共產黨的可能性。<sup>52</sup>事實上，楊逵本身是文學家，以文字為劍直指朝政時有所見。而楊逵與地下黨員的交往與個人情誼，以及戰後楊逵將大陸左翼文學與共黨的文藝作品編選在他所主編的刊物中，<sup>53</sup>容易引得中華民國政府聯想楊逵與共產黨組織有關，列入捕捉的黑名單之一。所以無論楊逵是否加入組織，以文字宣傳左翼思想的行為，已是政府欲除之而後快的一根心頭刺。

其次，楊翠認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底下，一個案件的成立未必因果分明。」

---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4、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5。

<sup>49</sup> 楊逵口述，何昀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3。

<sup>50</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76。

<sup>51</sup>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

<sup>52</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 76-85。

<sup>53</sup> 詳情請參閱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 82-108。



<sup>54</sup>張恆豪也針對當時政治環境提出「濫捕亂判，極有可能。」<sup>55</sup>從判決的理由、客觀條件以及楊逵與共黨人士的關係看來，縱使沒有四六事件與〈和平宣言〉做為導火線，楊逵有可能是國民黨用來殺雞儆猴的肅清名單上的一員，被捕也只是遲早的事。於是，當南京政府的局勢越來越嚴峻，越加深當局安定臺灣的決心，楊逵便列入第一波掃蕩的名單而被捕。

除此之外，有關楊逵 1949 年遭到逮捕的日期，不同於楊逵晚年的回憶、次子楊建與林亨泰記憶中所說的 4 月 6 日，<sup>56</sup>新生筆記本的〈自傳〉中楊逵寫下：「當年四月七日被捕」。<sup>57</sup>楊逵女兒楊素絹提及父親被捕時說：「三十九年四月七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星期三」。「三十九年」應該是楊素絹筆誤，實為民國三十八年。查詢萬年曆，1949 年 4 月 7 日是星期四，與楊素絹所言不符，但她卻清楚記得那天是星期三，也有當天上圖畫課的印象，這項證言出現矛盾。<sup>58</sup>同時期白色恐怖受難者周賢農曾說：「我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日上午從省立竹中學被捕的」，「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依法應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刑期屆滿之日釋放。」<sup>59</sup>可知刑期年算法是以完整一年 365 天計算之。若以釋放日回推被捕日，執行期滿紀錄為 1961 年 4 月 6 日，那麼楊逵的被捕日應為 1949 年 4 月 7 日。隨著國家檔案公開，筆者查詢發現楊逵的〈新生調查表〉記載：「民國卅八年四月七日被捕，即日送保安處。」<sup>60</sup>。對照與楊逵同時間被捕的鍾平山檔案紀錄，<sup>61</sup>以及楊逵

<sup>54</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逵「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頁 421。

<sup>55</sup> 張恆豪，〈關於〈和平宣言〉及其他〉，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頁 315。

<sup>56</sup> 楊逵口述，何昀整理，〈二二八事件前後〉，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93。楊建，〈萬水千山，見父一面——一九五四年楊逵、楊建的綠島父子會〉，《臺灣日報》，1997.08.11，27 版。林亨泰，〈見者之言〉（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3.06），頁 226。

<sup>57</sup> 楊逵，〈自傳〉，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頁 675。

<sup>58</sup> 楊素絹，〈心襟上的白花——父親與我、兼記母親葉陶女士〉，《聯合文學》8 期（1985.06），頁 29。

<sup>59</sup> 周賢農，〈一個中學生政治受難者的自述〉，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一·秋蟬的悲鳴》（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頁 133。

<sup>60</sup> 〈新生調查表·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sup>61</sup> 〈新生調查表·鍾平山〉，《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044=159=036=0000223480004(fix)。

的〈身分證〉、〈開釋證明書〉、〈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執行書〉等資料，<sup>62</sup>官方文書均顯示楊達收押日期為 1949 年 4 月 7 日。一年後的 1950 年 5 月 6 日，經由軍法處審刑，刑期 12 年。1951 年 8 月 1 日被移送綠島，繼續服剩下約 10 年的刑期，也進入了他與綠島這個監獄空間不可分割的歲月。

## 第二節 綠島監獄的建置與沿革

綠島向來以監獄空間展示於人前，政治犯、大流氓、重刑犯等名詞亦如影隨形於這一方小小離世島嶼。由於綠島有著獨立隔世、不利交通的地理特性與位置，規劃人犯的囚禁規訓時往往是最佳的選擇，因此日治時期綠島上設置了「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亦在此成立「新生訓導處」來安置政治犯。1949 年楊達被捕後，另一段重要的文學創作時期便是在此展開，其文學內容與思想呈現亦與此監禁空間有著密切相關。

綠島，始稱尚仔嶼，日治時期則稱為火燒嶼，最早紀錄見於 1696 年（康熙 35 年）《臺灣府志》。位於臺東東南方太平洋上，與本島隔洋相望，<sup>63</sup>距離臺灣本島 18 浬（約 33 公里），經略與開發則未若本島發達。開發綠島的契機說法主要有二，一是因隨洋流捕魚，二是因為遭遇颱風。<sup>64</sup>可見海域環境影響綠島的拓殖與移民之深。而清領時期的史書經略記錄多停留在地理標示，主權宣示意味較深。後因甲午戰爭使清朝重視海防，綠島的戰略價值才被注意。<sup>65</sup>而綠島與監獄的關係卻是在日治時，因為浮浪者的問題才開始產生連結。

<sup>62</sup> 〈身分證・楊達〉，《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1。〈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開釋證明書・楊達〉，《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2。〈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執行書・楊達〉，《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3。

<sup>63</sup> 趙安雄總編，《綠島鄉志》（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1988），頁 43。趙仁方，〈地理篇〉，臺東縣政府，《臺東縣綠島鄉誌（上）》（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12），頁 46。

<sup>64</sup> 李玉芬，〈開發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上）》，頁 140-141。

<sup>65</sup> 趙安雄總編，《綠島鄉志》，頁 48。

「浮浪者」也就是地方無賴。日治時期資本主義興盛，中下階層受經濟所苦，導致地方流氓的猖獗，以非法為生，<sup>66</sup>甚至是武裝抗日的人力資源。<sup>67</sup>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浮浪者利用戰爭時人心浮亂，造謠成風，趁亂牟利，不只臺灣人民，連同是日本人都對日本政府產生不信任，讓原本在平定武裝反抗勢力後逐漸建立起的兒玉一後藤統治威信出現動搖危機，加深總督府取締浮浪者的決心。<sup>68</sup>

1903 年警察機關取締先於法源，在沒有法源根據下利用保甲制度進行預防性犯罪的勸說，督導並強制要求所有浮浪者必須就業。同年有 40 多名被認定難以改善的浮浪者被遣送至台東開墾，<sup>69</sup>此舉在浮浪者間獲得極大威嚇效果。原因在於一般人認為後山地處偏僻、瘴氣極盛，加上當時原住民出草的威脅性與交通不便，難以生還的想像中，皆認為一旦被送到了後山，就沒有活著回來的一天。這樣的刑罰類似過去中國人的「流刑」（流放之刑），使得再兇狠的浮浪者也會畏懼，因此逞凶鬥狠的風氣確實有所改善。<sup>70</sup>於是，1906 年通過《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並積極尋找強制就業收容處的建設點。1907 年告示在台東廳設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1908 年開所。兩年間收容人數幾乎抵達收容上限，因此另外選擇火燒島北東海岸，認為此處有流麻溝流經，不僅可提供水源，亦可洗滌兇惡之心，<sup>71</sup>並且可開發東部產業。<sup>72</sup>故在 1912 年告示設置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同年開所。

<sup>66</sup>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35。

<sup>67</sup>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頁 132。另外《臺灣總督府沿革誌》亦在土匪的通略中提到：「然而匪徒中性喜遊手好閒之不法奸民亦眾，故並不為一時獲免罪之恩惠，感激而革心改面勤於生計職業……（中略），背後依然與土匪藕絲不斷，互通氣息按操匪行，搜查官署之動靜相報以利土匪。」可見浮浪者不僅人數不少，更是透露給匪眾有關當局搜查動向的幫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Ⅱ）》（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11），頁 48。

<sup>68</sup>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40-43。

<sup>69</sup>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267。蔡伯壘所譯註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Ⅱ）》，則記錄 45 人被強制送到台東與賀田組簽約一年，月薪 7 圓，這些浮浪者或裝病或企圖逃逸，但被當地警察與農場的管理者嚴厲管制。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壘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Ⅱ）》，頁 574-575。而《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五·武備志》認為，這些浮浪者被直接送到當時在台東拓墾的吳全城之賀田組農場進行勞動，可視為流氓送到台東管訓的開端。莫光華、陳伯鏗，《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五·武備志》（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12），頁 64。

<sup>70</sup>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63-65。

<sup>71</sup> 〈火燒島（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4.03，2 版。

<sup>72</sup> 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sup>73</sup>直到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因為風雨侵襲，且地處偏僻而修繕不便，1920 年告示廢止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浮浪者轉收於台東岩灣。<sup>74</sup>

臺灣總督府在研究各國法律後，發現只有拘留刑罰是對浮浪者無效的，須加上強制勞動才有效果，為此必須要有勞動空間。此外，收容所的封閉性必須被考慮，而台東除了被一般民眾視為化外之地，交通不便也增加它的封閉性。<sup>75</sup>尤其綠島孤懸於東臺灣太平洋上，正好位於黑潮主流的流幅之中，而主流的最大流速線恰好流經綠島與臺灣本島中間，若是想從本島到綠島勢必得橫越此條流速線。

<sup>76</sup>《恆春縣志》記載：「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便是在說明沒有動力船的時代，綠島多因黑潮以及氣象造成船隻往來交通不便，容易發生船難，因此與本島之間少有交流。其封閉性正好符合收容所的條件，且有足夠的戶外空間進行強制就業。加上民眾對於後山未開化的原住民有著獵殺的恐怖想像，以及日治時期曾為流氓的管訓集中營，綠島自然就成為黑暗、非人權的符號。這樣的一個歷史與地理條件，當然也適合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綠島建造監獄處理政治犯的理由。

戰後綠島監獄設置的歷史，主要曾有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處（1951-1965）、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即綠洲山莊，1972-1987）、綠島技能訓練所（1993-2002）、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1987-），較之本島其他區域來說，監獄幾乎成了綠島的符號表徵，甚至也成為綠島居民密不可分的生活區塊。<sup>77</sup>由於本文主要論述楊達在綠島時期的相關活動，因此除新生訓導處之外的監獄空間便暫略而不述。

回顧中華民國新式監獄制度的由來，最早可上溯到晚清。當時西學漸盛，舊

---

所碩士論文，2010），頁 72。

<sup>73</sup> 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12），頁 23。

<sup>74</sup>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79-84。

<sup>75</sup>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76-77。

<sup>76</sup> 李玉芬，〈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24-26。

<sup>77</sup> 由於監獄長期駐於綠島，不少居民依附監獄而生，例如公職與觀光。2001 年 10 月，法務部宣布欲裁撤綠島技訓、綠島監獄，由於當地居民不少任職監獄，引發失業危機的恐慌，於是第一次集體北上向法務部抗議陳情。近年來，因為監獄與人權議題、綠島的歷史與自然，以及人權園區的成立，發展所謂的黑暗觀光（監獄觀光），除了人權園區、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等遺跡，亦有搭配監獄主題的商業活動，例如監獄冰、紀念品，在在成為綠島觀光業中特殊的一頁。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頁 32、63-64。



式懲罰性質的監獄制度，也被教化精神為主的新式獄政逐漸取代。1902 年（光緒 28 年）山西巡撫趙爾巽在管轄境內設置罪犯習藝所，是感化教育中職業訓練的嚆矢。1905 年（光緒 31 年）進行司法教育的改革，建立京師法律學堂附設監獄專修科，成為中國新式監獄學校的創始。<sup>78</sup>另外在全國法律的改革，有學習西方獄、律法而編成的《大清監獄律草案》。因此後來在民國建立初期，北洋政府以此草案為基礎，佐以各項已頒行、未頒行的獄法，於 1913 年頒布《中華民國監獄規則》，成為中華民國第一部獄政基本法規，對於犯人管理制度有著明確的規定。

1928 年南京政府統一全國軍閥勢力，1935 年公佈《刑事訴訟法》以為基礎，於 1946 年頒行《監獄行刑法》，作為監獄行政的主要母法，並陸續頒布如《監獄條例》、《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等犯人管理獄政系統。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因為了對抗共產思想與鞏固政權，便另有軍人監獄與反省院法律系統的特殊獄法的設立，<sup>79</sup>主要針對具有馬克斯主義或共產思想等政治思想與南京政府有所牴觸，或是危害其統治者，並以感化教育為手段，灌輸三民主義，進行思想改造。<sup>80</sup>

政治犯的感化教育實源於 1927 年「上海清黨」。中、晚清時，中國開始關注國外感化院的獄政系統，民國後開始重視少年感化教育。北洋政府的新式獄政顯然已將犯人的感化作為重要改良項目，以勞役、教誨、教育作為感化教育內容的金三角項目，<sup>81</sup>便於 1922 年公布《感化學校暫行章程》。到了 1923 年時，便將晚清設立的感化院改為少年犯收容機構，各地紛紛建立感化院收容並感化少年犯。<sup>82</sup>但是在上海清黨、剿共政策確立之後，南京政府先後頒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

<sup>78</sup> 丁道源，《監獄學》（臺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法律學系，1974.12 五版），頁 12-13。

<sup>79</sup> 中國國民黨為了清黨設置的特殊監獄，目的在於監禁共產黨員與反革命份子，並授予訓育課程。清黨委員會決議在浙江設立反省院，於 1928 年 5 月正式成立，之後陸續在其他省設立，成為感化教育重要的機構。〈國民政府訓令·第 782 號〉，《國民政府公報》第 255 號，1929.08.29，頁 7。王志亮，《中國監獄史》（廣西省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02），頁 270-271。

<sup>80</sup> 王志亮，《中國監獄史》，頁 257、267、270-271。

<sup>81</sup> 王志亮，《中國監獄史》，頁 263。

<sup>82</sup> 王才友，〈高牆內的「派系」輪替：國民黨感化教育政策在江西的推行〉，《民國檔案》3 期（2016.08），頁 87。劉明憲，〈政治犯思想改造——白色恐怖時期感化教育初探〉，《通識論叢》21 期（2018.06），頁 61-62。



<sup>83</sup>、《共產黨人自首法》<sup>84</sup>、《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sup>85</sup>，捕捉為害南京政府政權的言論與行動者的法源更加強化。1929 年根據《共產黨人自首法》第 8 條另定〈反省院條例〉，在中國各地廣設反省院，接收感化院，將思想犯以及清剿獲得的共軍送進反省院及感化院，施以感化教育手段，加上收容受軍法處置的軍人與民眾的軍人監獄、中統與軍統特務機構下的集中營結合，成為清除共產主義思想與鎮壓異議反動的機構網絡。<sup>86</sup>因此感化教育除了矯正少年犯的行為之外，也用來馴化政治犯的思想。

待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於 1945 年 10 月 25 日所有司法行政全數依中華民國法務制度改制，<sup>87</sup>將 4 個刑務所（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和 4 個支所（宜蘭、花蓮港、嘉義、高雄）改制為監獄，附設看守所。<sup>88</sup>但這些只是普通監獄，多拘禁一般罪犯。一如南京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控制方式，對於思想政治犯的囚禁另有特別監所統一收容，並且將感化教育與特殊監獄的管理在臺灣複製重施，對象依然直指共匪與思想犯。情治特務機構與軍法審判系統乃得以在臺灣延續，為鞏固中華民國政權服務，最後在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掀起波瀾。

若是依據政治犯處置流程，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監獄則可分類為偵訊監獄（如保安司令部保安處、保密局南北所）、審判監獄（如初審的保安司令部軍法看守所、覆審的國防部軍法看守所）、服刑監獄（如新店軍人監獄、內湖新生總隊）。

<sup>83</sup> 1928 年 3 月 9 日頒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第 2 條有關刑責中提及，意圖顛覆中國國民黨或國民政府者、反革命者，情節嚴重最高可處死刑。〈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39 號，1928.03.09，頁 2。

<sup>84</sup> 1928 年 10 月 20 日頒布《共產黨人自首法》。清黨無法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國民黨只好另以懷柔手段提供自首減刑機會，並於此法中出現送到反省院的處置，顯示國民政府企圖從思想上做清黨感化。〈共產黨人自首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2 號，1928.10.27，頁 1-2。

<sup>85</sup> 1931 年 1 月 31 日頒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中央執行委員會在 1931 年第四次全體會議中對於懲治共產黨的辦法中，認為《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中對於危害民國之行為，應該要加重處罰；而且只要是共產黨案件，直接援引該法處置即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688 期，1931.02.03，頁 1。〈國民政府訓令·第 6 號〉，《國民政府公報》第 672 號，1931.01.15，頁 3-4。

<sup>86</sup> 王志亮，《中國監獄史》，頁 268、270-272。王才友，〈高牆內的“派系”輪替：國民黨感化教育政策在江西的推行〉，《民國檔案》3 期，頁 87-90。劉明憲，〈政治犯思想改造——白色恐怖時期感化教育初探〉，《通識論叢》21 期，頁 61-62。

<sup>87</sup> 黃玉齋主編，《臺灣年鑑（1）》（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03），頁 287。

<sup>88</sup> 黃玉齋主編，《臺灣年鑑（1）》，頁 295-296。

<sup>89</sup>綠島屬於第三類，主要用途在安置情節重大需予以感化之政治犯。自從日本政府在 1920 年關閉浮浪者收容所後，原地空置約 30 年，直到中華民國政府於 1950 年 3 月通過監獄的興建計畫，6 月前便請高雄的營造廠整地，進行新生訓導處的營房施工，整地範圍在日治的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一帶。<sup>90</sup>

1949 年四六事件爆發，5 月 20 日戒嚴令實施，對於政治犯的捕捉工作如火如荼展開。收監的犯人眾多，案件數量最高峰落在 1949 年至 1954 年間，涉案人數就高達 9406 人。<sup>91</sup>大量犯人拘禁，導致監獄收容空間出現問題。1950 年上半年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及新店軍人監獄便已容納不下，其擁擠的現象難以想像。政治受難者許火炎自言監禁於在軍人監獄四年多，牢房空間不到四坪，卻擠入了三十多位難友。<sup>92</sup>李鎮洲也對當時狹隘的監獄空間，有著更具體而深刻的形容：

我們的監房差不多十二台尺的四方形（十二台尺正好兩個人高，兩個人躺下，腳底相碰或腳與頭相碰），等於臺灣烤菸室一般大，睡二十五個人之外還有一個馬桶。……（中略）我們被關在這樣擠得像沙丁魚一樣的牢房，據說還算好的，以後聽曾經關在保密局的人說，他們不但沒地方睡，連站都沒地方站。<sup>93</sup>

因此可知在 1950 年左右，臺灣肅殺氣氛濃烈，在極短的時間內，逮捕到的犯人數量急遽攀升，急迫需要收容空間。1951 年 3 月國防部便要求將政治犯移送綠島，<sup>94</sup>於 4 月 1 日改制設「新生訓導處」。<sup>95</sup>

<sup>89</sup> 蘇瑞鏘，〈政治犯的歸屬——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監獄和「獄外獄」〉，《傳記文學》100 卷 1 期（2012.01），頁 115-116。

<sup>90</sup> 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頁 25。陳瑞琪，〈記憶變奏曲——「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沿革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頁 19。

<sup>91</sup> 劉育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審判結果之研究——就已知二百二十個案件的分析〉，《臺灣文獻》56 卷 2 期（2005.06），頁 320、339。

<sup>92</sup> 許火炎於 1959 年至 1965 年移監到新生訓導處。許火炎，〈尋回歷史的正義〉，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臺北市：人間出版社，1999.04），頁 113。

<sup>93</sup> 李鎮洲，1950 年以匪諜企圖陰謀叛亂罪判 5 年 3 個月，1951 年 5 月移監至新生訓導處，成為首批大量入監的新生。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10），頁 137-138。

<sup>94</sup> 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頁 25。

<sup>95</sup> 趙安雄總編，《綠島鄉志》，頁 192。

一般皆言新生訓導處的第一批新生在 1951 年 5 月 17 日抵達，但是第一批到綠島的新生有著不一樣的紀錄。例如王文清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我再次被放逐到隔海相望的火燒島。」<sup>96</sup>顏世鴻言：「五月十四日上船。……（中略）登陸時是五月十六日。」<sup>97</sup>阮紅嬰言：「五月十六日早上到達綠島，五月十七日第一次參加新生訓導處的升旗典禮。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這天，剛好新生訓導處成立周年的紀念日。」<sup>98</sup>而曹欽榮查考發現少數紀錄在 5 月 14 日便已移送了，但到達日期因為年代久遠，受訪者的記憶模糊而不明。<sup>99</sup>

再者，5 月 16 日之前，其實早已有一批無罪但接受感訓<sup>100</sup>的犯人到此，參與整地後的營舍建設與環境整理工作。人數大約有 100 人，<sup>101</sup>被編為第一、二中隊。<sup>102</sup>5 月移送的人犯則被編入第三至七中隊，第八中隊設而無人。<sup>103</sup>因此有些新生會定義這票無罪感訓的人為第一批，像 5 月 16 日到達綠島的阮紅嬰，便認

<sup>96</sup> 王文清戰後參加國語補習班學習國語，後受國語老師計梅真「郵電總支部案」波及被捕，於 1951 年 5 月 17 日移送綠島，至 1964 年出獄。王文清，〈獄中獄外的人生〉，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28。

<sup>97</sup> 顏世鴻於 1950 年因「學生工作委員會案」遭捕，判刑十二年，1951 年移監新生訓導處。1962 年臨出獄之際，因拒絕賄賂而被改送小琉球，至 1964 年出獄。顏世鴻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塵世霜白，鴻雁丹心〉，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臺北縣：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4.11 初版二刷），頁 228。

<sup>98</sup> 阮紅嬰因「基隆市工作委員會鍾浩東等人案」，於 1950 年 5 月至 1960 年 5 月服刑。1951 年 5 月 16 日移送新生訓導處。阮紅嬰口述，李福鐘採訪，〈白色記憶回想〉，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三·喚不回的青春》（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頁 23。

<sup>99</sup> 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鄉綠島鄉誌（下）》，頁 25。

<sup>100</sup> 筆者查詢手邊資料，無罪感訓最少有兩種情況：一是政治或經濟犯，例如陳紹英提到台糖公司協理赴上海賣砂糖但未返台，捲款逃跑，政府認定高層串謀，總經理以下有階職員分別有死刑、有期徒刑處分，主任秘書潘甲志則被判無罪感訓，也就是思想改造。1949 年鍾浩東被抓時尚未公佈《懲治叛亂條例》，也是先判為無罪感訓，待該法通過後，才被軍法處重新判為死刑。另一種則是從律法來看，1985 年《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第 2 條對於流氓的定義以及判處流氓接受感訓處分，可以呼應於 1935 年公布之《刑法》第 90 條規定對「犯罪習慣或是遊蕩懶惰成習而犯罪者」可判以強制工作。於此，我們可以推測，最早到綠島整理環境的可能是一批被判定會破壞社會秩序，具惡劣品性或遊蕩無賴而需要接受感訓處分的流氓，便也類同於日治時期的浮浪者，或者是因故判刑但可能罪證不足，或是思想左傾須受感化之人。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06），頁 219、225。〈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法務部公報》第 61 期，1985.07.19，頁 3。〈中華民國刑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1630 號，1935.01.04，頁 16。

<sup>101</sup> 顏世鴻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記錄，〈塵世霜白，鴻雁丹心〉，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228。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68。

<sup>102</sup>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4.06），頁 332-333。

<sup>103</sup> 李鎮洲猜測可能是國共合作期間，共軍被國軍編制為第八路軍，後來國軍反被共軍所敗，因忌諱而避之。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68。

為自己是「第二批到綠島的政治犯」。<sup>104</sup>故若欲定義「第一批」到達綠島的日期，以 1951 年 3 月後分批將犯人遣送綠島，5 月 17 日首批大量犯人抵達，完成第一大隊（第一至四中隊）、第二大隊（第五至八中隊）的編制概論之較為合宜。

新生訓導處收容人數最多可高達 2000 多人，加上監獄管理人員，總數將近 3000 人。相當於綠島全島人口全部擠在鱸鰻溝西岸的克難房。所有收容人編為 3 大隊，下分 12 中隊，字號分別為「團結新生同志完成革命任務」（或「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sup>105</sup>標榜反攻大陸的精神。其中第六隊附設女生分隊，收容近百名女性政治犯，生活管理上為了避免與男犯接觸，另外在營區中建築圍籬隔離，形成獄中獄的現象。

空間分配方面，居民多數由南而北，定居於沿著綠島西半邊的南寮、中寮、公館等村落，公館村再往東則是人跡稀少之處。新生訓導處營區位於公館村的東半部，已與居民有分區勢態，將平民與犯人進行身分上的切割。不過一開始因為新生訓導處的環境尚未完備，初期的營區並不具封閉性質，盧兆麟<sup>106</sup>提到：

新生訓導處像部隊的營房，不像監獄，講起來就是集中營。剛到時連圍牆都沒有，只有三個大隊的營房，一個大隊有四個中隊，都是木板房子。寢室裝鐵門，用舊鐵軌改的，有木頭窗子。<sup>107</sup>

從初期營造的材料可知，新生訓導處的木材建築體與木頭窗子並非堅固防逃脫的建材，因此連犯人本身也不覺得這裡是監獄。連圍牆都沒有，確實無法達到封閉的效果。

<sup>104</sup> 阮紅嬰口述，李福鐘採訪，〈白色記憶回想〉，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 23。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68。

<sup>105</sup> 字號的用字說法有二，一是胡子丹和李鎮洲所言的「團結新生同志完成革命任務」，二是綠島人權園區展區說明牆和曹昭蘇記為「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2001 年版》（臺北市：國際翻譯社，2001.01），頁 168。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68。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臺北縣：曹祁碧愛，2000.12），頁 213。

<sup>106</sup> 盧兆麟在戰後就讀臺灣師範學院教育系，參與過四六事件。1950 年以看禁書為由被捕，1951 年 5 月 17 日移送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sup>107</sup> 盧兆麟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爭取平反，終結迫害〉，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34。



其次，新生訓導處的位置相當接近一般民眾，在管理上無法進行監控與管制，也難以避免犯人獲得資源潛逃。所以在營舍的空間分配上再度進行劃分。情形如下：

我們到新生訓導處，第一個工作就是蓋圍牆，把自己圍起來。剛進新生訓導處時，這裡只有像軍隊的木造營舍，與散落周圍的碉堡。較平坦的地上蓋三處營舍。每處是一個大隊，下分四個中隊。中隊營舍前面出口連接起來，蓋一棟橫式營舍如 E 字母再加一橫，橫式營舍前面有個較小的營舍當大隊部用。新生訓導處入口大門旁，另有一棟營舍，是處部辦公室之用。三個大隊如 C 字，在缺口有處部。圍牆就沿著碉堡把營舍圍起來。包圍住全部營舍，到入口大門對面的四維峰兩邊下面，整個圍牆像一個袋子，袋口就是四維峰峭壁。圍牆材料就地取材，將海邊凹凹凸凸的咾咕石打下來，搬到築牆預定地，壘起高約三公尺，底寬約一公尺半的石頭牆。<sup>108</sup>

從張振騰<sup>109</sup>的敘述可知，訓生訓導處與民舍之間有一道非常分明的圍牆，一般稱為「萬里長城」，以就地取材方式築成，進行第二層的空間分割。內部分為三大隊，每一大隊的建築物皆如 E 字母再加一橫，於是大隊的空間再次被分割並且進行大隊編碼，而每一大隊的橫式營舍共有四排，恰好與一大隊之下分為四中隊的數量符合，再次將中隊編碼，並且給予「團結新生同志完成革命任務」<sup>110</sup>的字號，在字號中賦予提醒新生反共思想的任務，因此空間編碼完成。

然而「整個圍牆像一個袋子」這樣層層封閉的空間，竟然詭譎的在政治難友的回憶中卻是有相對自由的感覺。例如：「雖然仍是困苦不堪，但比起軍人監獄，卻有了較寬闊的生活空間。」<sup>111</sup>也就是說，這樣的相對自由感來自於比較。相較於其他政治監獄來說，綠島的空間感較為海闊天空。加上為了補給生活物資，中

<sup>108</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34-35。

<sup>109</sup> 張振騰因被控在高職時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的讀書會，而於 1950 年 4 月 12 日被捕。以「參加匪偽組織企圖顛覆政府」判 12 年有期徒刑，1951 年 5 月 17 日到達綠島。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15-19。

<sup>110</sup> 另一說為「團結新生同志完成第三任務」，如前所述。

<sup>111</sup> 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頁 115。



隊會選出伙食委員，負責和綠島島民進行交易採買，所以會獲得外出的機會。<sup>112</sup>而生產班除了種植與畜牧工作，也包含上山捕羌，砍草砍樹，下海抓龍蝦，並且在幹事不注意時藉由工作職務之便在營舍外活動，只要在集合時間回到集合地點即可。<sup>113</sup>這點確實是不同於其他監獄，因此新生訓導處在新生眼中比較像是集中營。但是層層分割封閉的空間和看守者的監視，在新生的意識中自動產生桎梏的暗示——「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逃得出去」，<sup>114</sup>「新生訓導處是個集中營。雖然可以自由活動，但是命運由人，萬一有狀況，官兵還是可以把我們全部擊殺。」<sup>115</sup>蔡焜霖也回憶說：「當時監管『新生訓導處』的警總，有個『殺雞儆猴』的辦法，即隨時挑了些較不聽管訓或他們心目中較具影響力的囚犯，遣回本島的監獄，以莫須有的罪名重判，甚至判刑槍決。」<sup>116</sup>由此可知，這樣一個表象自由但隔絕的地方，只要管理者有心，自由與生命隨時面臨威脅，並因此成為政治犯恐懼的陰影。

綜合前述，新生訓導處的空間監視系統，可以傅柯藉邊沁的圓形監獄設計說明全景敞視的概念。簡言之便是規訓者與被規訓者處在不對等的單向監視空間之中，監視軌跡可以是直線的、穿透的，加上層級的監視機制，致使被規訓者處在無處不被監視的網絡中，必須隨時隨地地自我提醒並自律。最終規訓者可以輕易掌握被規訓者所有舉動，而被規訓者則能將監視內化，形成自我監視。

<sup>112</sup> 黃克武、陳儀深、許文堂、沈懷玉訪問，李郁青、潘國華、曹如君、鍾玉霞紀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12），頁 445。

<sup>113</sup> 黃克武、賴惠敏、陳儀深、胡國台、許文堂、沈懷玉訪問，丘慧君、李郁青、潘國華、曹如君、鍾玉霞、林秀貞紀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三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12），頁 1022。閻啟明，〈白色恐怖，所見所聞〉，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二·看見陽光的時候》（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頁 156。

<sup>114</sup> 黃克武、陳儀深、許文堂、沈懷玉訪問，李郁青、潘國華、曹如君、鍾玉霞紀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頁 445。

<sup>115</sup> 涂南山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煉獄與天堂〉，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94。

<sup>116</sup> 因高中讀書會同學發「共匪」傳單而遭到波及被捕的蔡焜霖，以「綠島叛亂案」的蔡炳紅為例，蔡炳紅與難友及管理階層友好，但因為曾遞字條鼓勵臺南女中獄友而被關碉堡禁閉，遣送回台不久，便被槍決。後來蔡焜霖拿到了「綠島叛亂案」的卷宗，發現蔡炳紅其實只要原來刑期再加感訓三年即可。但是判決書在列舉他們的犯罪事實時，有一條說『被告在新生訓導處管訓期間常在散步時唱匪歌〈歌唱祖國〉以鼓勵叛亂情緒』。動輒得咎的活動與荒謬的判決理由，讓政治犯相信自己的行為舉止很容易有危在旦夕的危機。蔡焜霖，〈少年書呆子牢獄之歌〉，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59-61。

根據綠島人權園區展示的新生訓導處立體模型（圖 1），以及展區內第三大隊克難房的建築結構，可以清楚看見新生訓導處雖非邊沁的圓形建築，以 E 字多一橫的方式規劃犯人起居空間，四座橫向監舍如長廊狀（見圖 1、2），只須站在一端，視線便可直線穿透整個監舍，一望到底，立即掌握犯人的動靜（見圖 3）。四座長廊監舍開口處是軍官幹部的臥室，和政治犯的統鋪中間隔著一道鐵柵門，犯人如想往外移動，必須先經過管理者的房間前狹窄通道，方便幹部管理（見圖 4）。





圖 1 新生訓導處全景模型局部—克難房



圖 2 新生訓導處全景模型局部—三大隊營舍



圖 3 克難房新生寢室展區



圖 4 克難房幹部寢室展區



圖 5 新生訓導處全景模型



圖 6 新生訓導處說明牆面

以上攝於 2018.08.04，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除了克難房的透視設計，整個營區也具有全景敞視的功能。新生訓導處展區說明牆面，指出整個營區的監視系統事實上有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是新生訓導處三面環山面海的地理位置，只有往海邊的路線便於逃生；第二道防線是錯落在山區和海邊的警戒碉堡，共計 10 座，從四維峰山區往海邊看去一望無際，從營區到海邊的動靜非常容易掌握；第三道是「萬里長城」以及城牆上四個碉堡，無論是圍牆內的監視，或是圍牆外鱸鰻溝的對岸後來開闢的生產農田，皆可以由上而下，由內而外，將四維峰及四維峰下全景盡收眼底，無所遁逃（見圖 5、6）。

綠島的政治犯並非沒有想過逃獄，只是監獄是他們親手蓋的，也知道在這樣的監控視線下，逃命幾無可能：

綠島的「新生」生活，等於半開放式監獄管理，監獄四周除了我們自築的「長城」便是山，山的延伸便是「長城」。在囚舍四周、「長城」彎處，以及山路叉口等地，都有衛兵二十四小時瞭望的碉堡，而山的那一邊以及環繞「長城」約有百公尺的岩石海灘，外側則是太平洋。因此，即使用直昇機，囚犯們也難離開綠島一步。當然，如果求得了漁船的協助，應該是可以用一逞逃脫之快。但是，如何避開碉堡的視野？如何忍心連累漁民？即使逃到了本島又如何避免二進宮？<sup>117</sup>

胡子丹的記錄，將新生訓導處的監視系統清楚描述：以新生訓導處為中心點，往外擴展的長城是第一層地面包圍網，長城外是天然山脈做為第二層更高的包圍網，而長城線上、山上有著高處碉堡，其交錯的監視視線將長城與山脈逐層往上的包圍，監獄空間上方等同被覆蓋，形成三維立體的監視空間。加之綠島的離島性質、交通的不便，以及太平洋一望無際的全景敞視的視野，地理條件便在新生心中產生一道無法跨越的藩籬認知。因此可知，新生訓導處的「點—線—面—體」空間結構，加上結構中繁雜交錯的透視線，其監控機制幾乎是全面性的滴水不漏，足以掐熄囚犯任何逃生念頭的火苗。

---

<sup>117</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138。



況且離開綠島的方式只有海運或空運，可是監視點散佈山上、城上、海邊，宛如張目細密的漁網，即使勉強成功逃回本島，等於重新落入另一個巨大的白色恐怖之網：

臺灣地小人多，我在新生訓導處時調到政戰部康樂室，才知道連綠島那麼小的地方，都到處放「點」；有些點是老百姓，他們看到什麼狀況都會通風報信。<sup>118</sup>

碉堡的「點」是有形的，全台更多的「點」是來自於無形的全民監視。即使是綠島也被安排了不少「抓耙子」，等於是活動型的「碉堡」，亦成為全景敞視系統下的一部分。

因此，解析新生訓導處的全景敞視空間結構之後，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犯人可以獲得其它政治監獄得不到的自由感，以及有自由活動、開小差等機會。原因是在重重的監視網下，軍官幹部有足夠的資源，確保掌握所有人的一舉一動，讓個體也不得不柔順服從了。



### 第三節 新生訓導處的監控與規訓

《監獄行刑法》第 1 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之目的。」<sup>119</sup>說明中華民國的刑罰是以徒刑與拘役為主要手段的自由刑，本質上乃為教育刑。雖然剝奪罪犯之人身自由，但仍強調以人道精神對待罪犯，務使犯錯之人有機會改過向善。因此教誨、勞動、教化終及社會化為中華民國監獄行刑重要的精神。<sup>120</sup>學者丁道源對於我國法律的教化目的論述如下：

監獄教化之最終目的，不僅止於消極的不再犯罪，而需積極的激發受刑人

<sup>118</sup> 盧兆麟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爭取平反，終結迫害〉，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41。

<sup>119</sup> 〈監獄行刑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962 號，1946.01.19，頁 1。

<sup>120</sup> 李甲孚，《中國法制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06），頁 181、187、189-190。



良知良能，誘導其改過遷善，糾正其不良習慣，培養其崇法精神，灌輸其民族道德，提高其國家觀念，訓練其簡樸生活，扶助其自力更生，促使其變化氣質，重建其完美人格，使其成為一個知恥，明禮，忠誠，尚義，守廉，而德，智，體，群，美五育兼修之健全國民，化無用為有用，轉庸劣為賢能，不但使其出獄後，消極的不再犯罪，而以其所得，積極的勸導於他人，而達消滅犯罪之境地，這才是教化的真正目的。<sup>121</sup>

可見現代刑法不僅控制人身活動，企圖「誘導其改過遷善，糾正其不良習慣」，「訓練其簡樸生活，扶助其自力更生」，「使其出獄後，消極的不再犯罪」，進行行為矯正，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型態；心靈在國家機器的掌控下，要達到「激發受刑人良知良能」，「促使其變化氣質，重建其完美人格」，「灌輸其民族道德，提高其國家觀念」，意指不僅從心向善，也要能改造人格，並且將國家權灌輸在思維之中。

前提是，該人犯是在有罪的情況下，才能使他有「改悔向上」的認知。若是冤獄，抑或只是因為思想不同而獲罪，那麼監獄的思想改造不見得可以讓無辜之人相信自己是犯有罪的，且必須要改造的；監禁反而會變成肉體的折磨與靈魂的監控，以強制性操作塑造恭順的人民。新生訓導處便是擔任改造思想機構的角色，其封閉環境的運作方式，無時無處不存在著國家機器設計規訓改造的痕跡。

傅柯的規訓懲罰理論中，以封閉空間做為理論的起始。在此空間之中會先進行空間和角色的分割，所有被規訓者會被進行人身、空間、角色、勞務等活動的編碼，所有流動的決定全在於規訓者的權力之上，被規訓者只能接受自己被分割且受制他人的結果。<sup>122</sup>

在身分及勞務活動的分割編碼上，由管理者將人犯分成三大隊中的十二個中隊，放在已然劃分好的營舍內，再將他們的身分用勞務工作進行區分。初期犯人多是在進行營舍的興建，此時勞務工作大多重在基礎建設上。王文清回憶說：

<sup>121</sup> 丁道源，《監獄學》，頁 386。

<sup>122</sup> 傅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136-167。

初到時，營區已建在一片荒蕪、丘坡起伏、高低不平的沙洲上，迫不及待要勤勞的是環境整理。什麼都沒有，用我們僅有的臉盆作搬運工具，猶如螞蟻扛蟲般地挖高填低，砌坡隔區，開闢集合場地兼球場用地，挖移花木造園地，遼闊海邊，砗磲石之多，只要有囚工無止境地去打石頭，就有無盡藏的石材，為日後的砌牆造壁、建房造屋、築堡壘、砌圍牆，自築圍一道越區之界，豪稱「綠島長城」。<sup>123</sup>

不同於其他監獄，新生訓導處是由囚犯自己蓋監獄囚禁自己，相當弔詭。而建築方式採就地取材，工具也相當克難，可想之初期新生生活非常刻苦，身體上的勞累不亞於心理上的負擔。加上必須蓋出囚禁自己的營舍，再蓋一座長圍牆將自己的自由套上另一層枷鎖，這樣的基礎建設其實也是用來建立新犯人們對身分的認知。

除了身體勞苦，新生訓導處的生活條件也充滿匱乏窘迫之感。盧兆麟說：

每天的作息是半天上課，半天勞動，但工作忙起來就不上課了；像一開始做圍牆，我們就整天搬石頭砌牆。最要命的是搬運補給品，像大米、麵粉和煤炭。貨從南寮上岸，搬到訓導處要走六公里，沒有卡車，全靠我們的肩膀和兩條腿。趕工的時候一天搬運三趟，來回三十六公里，而且不是空手，要扛東西。兩個人抬一包米，重五十公斤，煤炭稱過，也是五十公斤；我們都沒有肩扛的經驗，扛起來實在不得了。自己帶去的鞋子，折磨一個禮拜就壞了，鞋底整個掉落，因為走的是海灘旁邊，鋪咾咕石的小路。鞋子穿壞以後，赤腳來回，更加辛苦。<sup>124</sup>

由上述可知興建新生訓導處的浩大工程，幾乎落在新生身上，建設同時還要自行處理民生問題，肉體的消耗折磨可以說達到最高點。島上又缺乏勞務與交通工具，

<sup>123</sup> 王文清，〈獄中獄外的人生〉，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28-29。

<sup>124</sup> 盧兆麟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爭取平反，終結迫害〉，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35。

打石頭只能用臉盆盛，運送到工地只能靠雙腳，初期工作幾乎都是吃力的苦工。所以在口述記錄中，不乏初期到達綠島開闢新生訓導處營舍的政治犯對於生活艱辛的敘述，並且不約而同地提到為了生存，將大家的身分依照能力進行角色分配。例如王文清所言：

雙手萬能下創建了可媲美『羅馬競技場』的宏偉劇場舞臺，我們的水力建造可供千人洗滌澡浴又兼泳賽場地，築路引渠做土木工外，鐵工、木工乃至醫療專業、養豬、養雞、牧羊、農牧等，洋洋大觀，何諸枚舉。<sup>125</sup>

一般說來，角色的分配通常是由規訓者權力運作施加於被規訓者的結果。然而在新生訓導處中，除了由分隊長安排工作，為了能生存下去，政治犯自己也會提供能力進行身分規劃。規訓與自我規訓互相交錯，源於綠島生活條件實在太差。加上島上物資缺乏，沒肉沒菜，食材多是運自本島的補給品，營養不良與疾病如影隨形，<sup>126</sup>於是以勞務進行的角色切割自然而生。張金爵說：

剛到綠島的時候，吃飯配菜乾，沒有油只有沙，女生都拉肚子。我們要家裡寄豬油來，豬油裝在竹筒裡，大家輪流去舔。後來組成生產班，才有青菜可吃。男生先砍芒草，堆在畦溝裡，澆上熱水再覆上，一個禮拜以後就可以下種。也曾經整年沒有魚吃；綠島人說魚有魚瘟，三年一瘟，那一年就抓不到魚。<sup>127</sup>

人有生存本能，當生存條件過差以致影響生命時，不會有人抗議勞務剝削，反而自行分割身分並進行標籤化。例如受難者的現身說法：

我們分為「菜圃班」，專門種植蔬菜類及瓜類，木工組、鐵工組、石工組

<sup>125</sup> 王文清，〈獄中獄外的人生〉，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28-29。

<sup>126</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69。

<sup>127</sup> 張金爵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省工委風雲之女〉，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140。

等等，從此我們不再依靠買入的蔬菜。<sup>128</sup>

又如：

勞動作業在環境整理大致告一段落之後，接著是建造高牆，材料是使用敲碎的海岸岩石。這種作業屬於土木工程，因此由農民、工人出身的人負責。工差除搬運補給物資之外，還幫忙廚房、挑糞等許多工作。<sup>129</sup>

從紀錄可知，當基礎建設告一段落之後，除了服外役的人，<sup>130</sup>其他人為了改善生活機能而開始進行勞務分組，基本上就分為勞動班和生產班。<sup>131</sup>勞動班除了石工、木工，還有上山砍草砍樹，搬運補給品，另外就是處理伙食。因此中隊設有伙食委員進行採買和宰殺牲畜，而伙食委員由各中隊自選若干人，工作分為採購、主廚、記帳<sup>132</sup>。因為每人每天副食費只有 1 元，一個中隊每天只有 150 元左右的經費，<sup>133</sup>難以獲得較好的伙食內容，因此囚犯們便成立生產班，<sup>134</sup>工作有種菜、養豬雞鴨鹿和挑糞。種子一開始是拜託家人寄來，因為隊上有農業專門人士進行改良，所以收穫頗豐，生產結果販售給伙食委員處理以改善伙食，多餘可另售予綠島島民。<sup>135</sup>生產班班員由於工作辛苦，時常要處理隊上排泄物作為肥料，

<sup>128</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0。

<sup>129</sup>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 259。

<sup>130</sup> 外役係因各項處部需求而產生的其他技術型工作，例如胡子丹擔任英文助教，歐陽文和陳孟和畫壁報和攝影。楊達擔任壁報和月刊的編輯，胡鑫麟和呂水閣擔任醫療工作，閻啟明到康樂室編排戲劇……，有時可藉由外役減少勞動時間。

<sup>131</sup> 楊田郎口述，江志宏採訪，〈木棉花又開了〉，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 167。

<sup>132</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12 二版一刷），頁 352。

<sup>133</sup> 鍾逸人回憶每人每月 15 元，葉雪淳則指每人每月 18 元，數目不一。筆者根據《法務部獄政史實紀要》紀錄得知，光是 1940 至 1961 年間，臺灣的監獄主副食用費便經歷了七次的調漲。因改制與物價上漲，可得知鍾葉二人的記憶差異在於時間點的不同。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51。葉雪淳，〈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台灣風物》60 卷 3 期（2010.09.30），頁 161。法務部監所司，《法務部獄政史實紀要》（臺北市：法務部，1990.11），頁 187-188。

<sup>134</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38。

<sup>135</sup> 由於生產組也需要錢買種子與農藥及農作工具等，所以由伙食委員用副食費向生產組購買，組員可獲得微薄獎勵金，約 15 至 20 元，剩下盈餘則被官兵拿走。但依照《監獄行刑法》第 34 條規定：「作業收入以百分之二十五充作業賞與金，百分之四十充作業基金，百分之十歸屬國庫，其餘充改善監獄內部設施及獎勵用。」也就是說在法律的允許下，幹事是可以取走大部分犯人辛勞的成果，所以對幹事來說是執行公權力，在囚犯眼中就成了國家機器進行階級剝削。葉雪淳，

因此較受人尊敬。<sup>136</sup>

大量的工作可使個體無暇思及其他，況且綠島環境生存欠佳，政治犯忙於生存問題自然無法顧及他事。勞務活動責任如同一個已被分好的空間，只要把人安置其中，那麼其人的功能就會被啟動，行動就會如同規訓者原本預期他能做的，於是柔順配合的肉體就完成了。監獄的規訓中獲得犯人柔順的肉體後，藉由不斷反覆的操練，才能達到行為與心靈上的改造。除了分解動作之外，加上設計過的時間表，按表操課不斷演練，將能成為一種新知識的支配技術以及思維程序。藉由口述記錄，可以勾勒當時新生訓導處的時間表，以瞭解這套反覆操練的模式。例如：

在這裡的每一天，都是清晨六點吹起床號叫起床，六點十分早點名，六點半早餐，十二點午餐，然後午休到下午一點。晚餐是下午六點，晚上八點吹晚點名號，九點熄燈。由於一切都還未上軌道，因此除了上述時間之外，每天都是勞動作業，也就是勞動服務時間。不久就改為上午上課（洗腦），下午做工，可是後期又改為相隔一天。週日或國定假日原則上休息，但經常被趕去做工。此外，每個星期一都會開週會，處長會長篇大論訓話，大隊長偶爾也會集合隊員訓話。<sup>137</sup>

由於基礎建設佔據大多日常時間，所以一開始的時間安排並非精準嚴格的規劃，必須建設到一個段落後，才開始具有日課表雛形。但生活條件基本具備後，思想課程便會開始加進來。

上課時間雖然規定從早上八時到十一時，但中間有兩次各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所以實際上，只有兩個半小時的上課時間。<sup>138</sup>

---

〈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臺灣風物》60卷3期，頁166-167。  
蘇振明、蔣榮春、林昌華，《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3），頁73。〈監獄行刑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962號，1946.01.19，頁4。

<sup>136</sup> 簡萬坤口述，江志宏採訪，〈我的十年牢災〉，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61。

<sup>137</sup>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256。

<sup>138</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396-397。



既然新生訓導處基本上以感化教育為主，在一般認知上容易認為思想課程應該會佔據課程表的大部分。但扣除掉用餐時間，上課時間其實並不長。

既然是「新生訓導處」，那麼要訓導我們的「上課」當然是最首要工作，可是生產勞動又是同樣不可少，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形下，「處部」想出了變通的辦法，就是一天上課，一天勞動，一星期之中三天上課，三天勞動服務。星期天在原則上是休假，但是很少得到真正的休假，大部分要勞動服務，沒有勞動服務就是要參加既不康又不樂的「康樂活動」。<sup>139</sup>

由此可知，新生訓導處的時間規劃是逐步修改的，雖然一開始新生的工作都在做基礎工程建設，但是監獄的嚴格起床休憩的生活作息優先建立。在建設工作有部分成果後，便將勞動與上課時間進行粗略規劃。首先有上下午之分，之後變成隔天輪流實施，僅於星期日作名義上的休假以進行康樂活動。此安排確實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32 條規定，紀念日、星期日午後、直系親屬與三等親旁系親屬過世或其他特殊狀況，這些時間犯人是可停止作業的。<sup>140</sup>實際上，處部所辦理康樂活動需要時間排練或準備，所以安排給犯人休息時間是不多的。

為了達到思想改造、感化異議份子，相關思想課程包羅萬象、緊湊嚴密。陳紹英陳述課程內容與授課目的時說：「上課是以國父（孫文）遺訓、領袖（蔣介石）言行、共匪暴行等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反共教育來洗腦。」<sup>141</sup>因為思想犯一開始便是針對共匪及其相關組織分子，在課程安排上便以黨國教育為主，試圖用思想感化削弱共黨的組織力量。除了孫文與蔣介石的言論之外，延伸出去的課程也非常具有反共與國家政策宣傳的特色。李鎮洲說：

我們的上課，課目比內湖時代多出很多，計有國父遺教、領袖言行（蔣介石的言行）、蘇俄侵華史、共匪暴行，中國革命史、中國歷史、土地政策、

<sup>139</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1。

<sup>140</sup> 〈監獄行刑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962 號，1946.01.19，頁 4。

<sup>141</sup>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 258-259。

三七五地租、生產講話（原為「勞動服務講話」，後來因為有人戲稱勞動服務時不出力只講話而改為「生產講話」）、毛澤東批判，此外也有晚間輔導課，即識字班（專教不識字者）、國語班、國文班（又分為初級、高級兩班）、英文補習班（後兩班自由參加）等等。<sup>142</sup>

從紀錄中，我們可以看到課程形式大致上分成講授課與小組討論。授課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黨國思想灌輸（如國父遺教、領袖言行）、批判共黨（如蘇俄侵華史、共匪暴行）、政策宣講（如土地政策、三七五地租）、補助教育課（如國語班、英語班、數學班）<sup>143</sup>等，多數以政治思想改造為中心的課程。縱使是輔導課，也是在附和政府推行國語運動的政策，以及為了讓新生看懂思想教材。利用嚴密的課程，毫無間隙與喘息時間地以灌輸知識展示權力與壓迫，以期將這些「企圖顛覆政府」、「有共產解放思想」者進行改造，從此服膺三民主義。

另外，重覆操作以期達到改造之目的的方式是小組討論，藉由不停地討論／操作，使思想灌輸的成效具體呈現。其實操作過程也是新生回憶時印象最深的過往，陳紹英說：

早餐後約有四十分鐘的小組討論，是在幹事的監視下進行，討論的題目由新生訓導處政治部統一發佈。<sup>144</sup>

小組討論並非是自發式學習，而是在監視體系下做的思想檢視，討論題目由政治部統一發佈，使得討論過程更具有針對性，以及引導的可能性。

毛扶政也說：

上了軌道，除了平常要做的工作，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每天早上起來，早餐以後的小組討論。這是思想洗腦，你不得不照著那樣講。你講錯話，劃上一個不好的問號，就是你厄運的開始。小組討論正常一點，有三民主

<sup>142</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3。

<sup>143</sup>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臺北市，人間出版社，2013.01），頁 164。

<sup>144</sup>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 258-259。

義、國父遺教、實業計畫這些。還有一本最重要的：《毛澤東批判》，天天讀，上面出題目。要討論這些，那本書要先看，不要講錯話，講錯話，給你記上一筆，懲罰關碉堡，就有得你去反省。<sup>145</sup>

由此可知，小組討論的背後是架設著懲罰機制的，也就是所謂的討論並不存在自由思想與自由言論權。假使想要藉由緘默逃避檢視的可能，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個體也變成開放區域，任憑監試視線穿透，變成全景敞視。久之，個體自然在行為上受到規訓，自行閱讀思想教材。所以，確實可看到柔順服從的個體被形成：

每天早飯後，都有一小時的「小組討論會」，討論的題目由處部統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課課程中抽出，小組以班為組，設組長一人，討論時主席一人，由新生輪流擔當（不識字者除外），每一題換一次主席，紀錄一人，也和主席一樣輪流，每一組有一個經過政工訓練的官長幹事做旁聽，隨時注意每個人的發言，每個人都要發言，沒有沉默的自由。……（中略）如果在小組討論會的發言，稍微有了差池，就會被中隊的幹事或指導員叫去解釋。……（中略）每個人到了這個時候，因為看得多聽得多，看和聽的累積，已不再在言行上出岔子。<sup>146</sup>

以上說明，小組討論安排在早餐後，進行時間約 40 至 60 分鐘，以班為單位，犯人中要有主席 1 人主持討論，記錄 1 名將大家所說的內容進行紀錄。討論題目是統一由新生訓導處政治部公佈，題目取材來自平時上課的思想教材，但以批判毛澤東為主。因此與其說是討論，反倒像是批鬥大會。同時在幹事的監視下，大家都必須發表意見，而且「不能說錯」也「不能不說」，否則會有嚴厲的處罰。可見不僅左傾思想是不容見的，也不能不發言，一點模糊立場都不可存在。只要被認定有左傾的意圖，那麼等待新生的是可怕的獨居房禁閉。<sup>147</sup>久而久之，為了避

<sup>145</sup> 毛扶正，〈烽火中的家〉，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二，看見陽光的時候》，頁 82。

<sup>146</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3-174。

<sup>147</sup> 島上的碉堡常常被用為處罰頑劣不聽話的新生，一人一間，空間狹小，吃喝拉撒睡皆在其中，屎蟲橫行。白天夜晚的溫差很大，一整日無法與人溝通，有隨時被槍斃的恐懼，而且一天只給一

免被處罰，就知道該怎麼回答了，出現自我紀律，自然是能回答出符合當局所要的答案，如此就可以具體呈現右派思想改造成功的狀況。

然而，如此是否真正得到了柔順而且規訓的心靈了呢？從郭振純<sup>148</sup>的敘述可知：

一般的日子裡，周一至周六都要勞動，中間有幾天安排上課；上課日不用勞動，只聽課。聽的課是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總統嘉言這類。說歸他說，我們坐歸坐，休息就是了。晚上還要集會，小組討論等等，可以說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不時也要考試。大家都知道，當官的只要有個成績可以交代就好。考卷發下來，我們哪有辦法答，沒有人聽課也沒看書，所以都把發下來的書本帶進場。他站在那裡也不管，大家當場翻書找答案，找得到就抄，找不到抄別人，抄一抄交卷。還發獎品，頭名、二名、三名發得不亦樂乎。我也拿過第一名，發一本好大的中文字典。<sup>149</sup>

實際上，思想授課的內容是左耳進右耳出。小組討論的過程，無論是獄官為了業績或是犯人避免處分，全部都是敷衍了事的心態。抄書作弊的結果，還能出現名次與獎勵。由此清楚可知，新生訓導處利用嚴明的時間表強迫個體反覆練習，企圖使個體慣性思想的改造方法，其實僅獲得政治犯在應付課程中所產生自我規訓——「只要你一切聽命令、守規矩、不犯錯，日子還是容易過的。」<sup>150</sup>而且為了批判共產主義與馬克思思想，思想教材講述不少相關知識，反而讓本來不認識共產黨理論的人，學了不少紅色思想，<sup>151</sup>其結果頗為諷刺。

---

碗飯和一碗水，飢渴難耐，身心受到極大折磨。重點是，禁閉的時間全然由軍官決定，因此平日裡新生不得不配合，避免被酷刑對待。王文清，〈獄中獄外的人生〉，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61-62。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23。

<sup>148</sup> 郭振純，臺南人，為葉廷珪多次輔選，被有紅色背景的翁姓男子供出有臺獨意識，遭特務捕捉，企圖藉著郭振純來羅織葉廷珪之罪。郭振純受盡酷刑仍未承認，故被監禁 22 年。郭振純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天生反骨的獨俠客〉，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163-182。

<sup>149</sup> 郭振純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天生反骨的獨俠客〉，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184-185。

<sup>150</sup> 林約幹，〈我所知道的白色恐怖〉，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97。

<sup>151</sup> 阮紅嬰口述，李福鐘採訪，〈白色記憶回想〉，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



當規訓的機制在封閉的監獄空間不斷地反覆操練，其矯正結果的呈現，均用文字與數字將一個個人犯化為檔案，作為是否改造成功的檢視，判斷個體是否可以結束感訓抑或延長，這就是規範化的裁決。新生訓導處中擁有這個書寫權力的是看管犯人的政治幹事，同時他們也是監視系統下的一環。幹事所呈上的資料能決斷政治犯最後是準時結訓，還是改送往槍斃刑場，因此監獄中的權力結構呈現更加鮮明。關於感訓的成績，新生盧兆麟批評道：

第一任處長姚盛齋，原任基隆要塞司令。他的感訓政策，是要我們拋棄對黨國的厭惡，信仰三民主義，效忠國民政府。他口頭上說，接受感訓成績好的，會給你好處，譬如提前釋放云云。事實上當然沒這回事，十年就是十年，無期就要關你一輩子。<sup>152</sup>

從這段口述記錄中，我們發現新生訓導處規範化的裁決兩個特點：一是以黨國政治的思想教育作為感訓內容，二是感訓成績的優劣會影響結訓的時間。而這兩項特點其來有自。

《監獄行刑法》第 21 條規定「對於刑期一年以上之受刑人為促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應分為數個階段以累進方式處遇之」，因而另訂〈行刑累進處遇條例〉<sup>153</sup>。其第 13 條將累進處遇分四級；第 19 條根據刑期與級別劃分不同的責任分數；第 20 條則是將評分項目分為「作業」最高 6 分、「責任觀念及意志」最高 3 分、「操行」最高 3 分；第 65 條規定「累進處遇審查會審查受刑人之個性、心身狀況、境遇、經歷、教育程度、人格、成績及其分數、編級與進級、降級等事項，並得直接向受刑人考詢」，更進一步提出基於綜合考量，明列審查細項。第 75、76 條則指明對於合於刑法假釋條件者可予以假釋。<sup>154</sup>也就是說，新生訓導處的規範化裁決可能是根據累進處遇的規定，將新生的身心靈狀況解剖成各個可被量化的細項，給予評分。若考核結果優良，在律法條例下是有機會提早結訓

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三・喚不回的青春》，頁 27。

<sup>152</sup> 盧兆麟口述，胡慧玲、林世煜採訪紀錄，〈爭取平反，終結迫害〉，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頁 34。

<sup>153</sup> 1946.03.06 制定，1957.01.07 修正，但是關於累進處遇的分數計算與 1946 年的相同。

<sup>154</sup>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1001 號，1946.03.06，頁 1-6。



的。因此姚盛齋對新生所言也並非全然作假，只是最終沒人真的提早假釋，以結訓成績不良而被延長刑期的反而大有人在。因此假釋云云，應只是為了誘導政治犯配合管理，而政治犯也心知肚明。

但是，〈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65 條評分的細項中，很多是抽象無法直接量化的，如果要量化就必須要先具體化。其依據如下：

當時新生訓導處結訓出獄成績的計算是分兩部分。一是思想考核，由政治幹事他們給分。另一是學業考核，由自己平時參加考試成績及結訓前舉行的「結訓考試」計算分數。思想考核與學業考核各佔一半。……（中略）而思想考核只要刑期滿了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會給七十分的基本分。<sup>155</sup>

結訓成績考核分為學業與思想兩方面，學業成績可藉由考試而量化；但是思想成績要具體化，其過程與細項就相當具有爭議性。實務上新生訓導處的感訓成績會有一份考核表，以文字和分數將考核實際狀況作成表格紀錄。在新生處理考核表中，綜合表現項目中，分為「教、訓、管」，三項，即思想、學習、生活，分別佔 45%、30%、25% 的分數。<sup>156</sup>其中思想和生活考核的評分方式其實沒什麼標準，明顯的是依據政治幹事對這個人的印象分數。例如吳大祿<sup>157</sup>在綠島和家人會面，必須有政治指導員在場，並且記錄雙方所有的言行。但是在軍官的監督下，既不能暢所欲言，也不能表委屈和不滿，吳大祿只能講一些很不著邊際的話。結果到了結訓時，又被多關了一年半。可是他自言學習成績很好，最有可能的因為是當初在和家人會面時，政治指導員覺得久未見家人應該要痛哭流涕才合乎常情，吳大祿的反應卻太過冷漠，因此給予不高的思想考核分數。<sup>158</sup>

而學習成績的具體表現，通常是在思想課程的考試和小組討論。思想考試非

<sup>155</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59-60。

<sup>156</sup> 〈新生處理考核表〉，《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4。

<sup>157</sup> 吳大祿，1951 年因「臺盟王子燿」一案遭捕，但他和王子燿卻素不相識，遭判五年，至新生訓導處服刑，刑滿卻被指導員刁難而多關一年半。

<sup>158</sup> 吳大祿口述，曹欽榮、林世煜採訪，〈第一次看到陽光〉，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二·看見陽光的時候》，頁 23-25。

常密集，「有月考、期考、年中考、年終考，對於考試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原則，就是考試分數絕不高過八十分，也不低於六十分。」<sup>159</sup>另外尚有結訓考，除了利用考試反覆複習，強化思想記憶，也是為了要進行每個月的成績登錄。這些成績也是教官們的業績呈現。為了讓績效好看，教官們會壓迫犯人，一向敢怒不敢言的政治犯也許藉此利用成績結果，來進行沉默的抗議。

小組討論的執行方式，「經常是一星期換一個題目，而每星期有一次的生活檢討會，也被列入小組討論會的範圍，輪到紀錄的這個星期就不必參加勞動服務，而整理每個人的發言送給幹事，幹事看過後，簽上意見，再送到中隊指導員，再經大隊部，最後送到處部政治部。」<sup>160</sup>考核方式也具有層級性，而且小組討論的內容都是在監督下完成的，必須繳交筆記，內容不外乎是撻伐紅色思想，讚譽黨國德政，思想檢討等，以此來作為學習成果的呈現。

總而言之，新生訓導處的感訓系統確實嚴謹。依傅柯的懲罰監禁理論檢驗之，學者楊翠認為最終監獄的權力管理，最成功處在於「受刑人身體監獄空間化」。<sup>161</sup>最後政治犯在自己的體內形成了自我規訓，禁錮自己的靈魂與思想以求生存。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新式律法重視的人道精神、反省矯正，企圖從內感化罪惡，以抑制罪惡再生的方法，是自我規訓技巧最好的溫床。但若施展於無辜之人，或是思想不同之族類，便會成為凌遲生命與心靈的屠刀。然而，感化教育重點在於個體改造與柔順化，一直具有抵抗精神的楊達在這絕對階級剝削的空間中，自然也無法逃離這樣的一個監獄規訓系統的限制。

---

<sup>159</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3。

<sup>160</sup>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頁 173-174。

<sup>161</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39。

### 第三章 獄中的楊逵圖像

#### 第一節 監禁期間的規訓生活

國家檔案局的檔案開放使用，為瞭解楊逵監獄資料與樣貌多了一些可以探究的材料。一般皆言楊逵是在 1951 年被移送綠島，而在楊逵的〈新生調查表〉中記載：「民國四十一年八月一日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後編入高級班以至於今」，<sup>1</sup>有別於其他論文所言。翻尋楊逵次子楊建的訪談紀錄提到：「被抓走後，經過兩年才審判定讞，發送綠島服刑。」<sup>2</sup>依楊建所言，楊逵應於 1951 年移監綠島。後於楊逵手稿中發現〈自傳〉，記下「民國四十年八月一日到綠島來」<sup>3</sup>一事，即楊逵明確記錄 1951 年是移監年。因此依楊逵自傳與親屬記憶，新生調查表就有記錄錯誤的可能性。由於島上的犯人是被分批送達，若論及第一批的話，可推至 1951 年 5 月 16 日之前被派來整理島上的無罪管訓犯，被編入了第一、二中隊，第一批大量的政治犯則是在 1951 年 5 月 17 日移送綠島。相較起來，楊逵在 8 月 1 日抵達算是早期新生中稍晚登島的，說法上較不適宜稱為「第一批送到綠島的政治犯」。

在紀錄中楊逵一進綠島就被編入高級班，這是監獄內的補助教育，會在晚上進行上課，並根據程度分班。有國英數三科，分成三種程度班級，依序是高級班、初級班、識字班。<sup>4</sup>而楊逵之所以能被直接編入高級班，也許這跟紀錄上他的學歷被標註「日本大學文學系畢業」有關。但實際上他就讀的是「日本大學文學藝術系」，且因立志投入臺灣的社會運動而提早返臺，大學學歷只有肄業，這點在〈新生調查表〉上有誤。

在調查表中另外註明「特長：園藝」，<sup>5</sup>由於新生訓導處初期基礎建設尚未完

<sup>1</sup> 〈新生調查表・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sup>2</sup> 楊建口述，楊翠採訪記錄，〈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黃富三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歷史》（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12），頁 19。

<sup>3</sup> 楊逵，〈自傳〉，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75。

<sup>4</sup>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164。

<sup>5</sup> 〈新生調查表・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

善，新生便是現有的人力資源，從克難房到萬里長城，所有建設皆由新生包辦，因此在勞務分組上便依特長進行標籤編碼，因此楊達自然在身分編碼上被歸於生產班進行農業生產。

新生訓導處為了各項管理原因，有必要時則會重新編隊。大規模的編隊有兩次，第一次很明顯是為了便於管理，新編的第五中隊幾乎都是被新生訓導處徵用的各面向人才，例如編教材、作壁報、編《新生月刊》等等。楊達便是編進第五中隊，進行《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的寫作與編排工作。<sup>6</sup>而後因為颱風來襲，將克難房吹倒毀損，於是再一次重新編隊，楊達被改編至第二中隊繼續負責菜園的工作。<sup>7</sup>

獄中生活，每日早上六點起床，六點十分點名後唱〈新生之歌〉、反共歌曲，喊口號，這是楊達最討厭的事。<sup>8</sup>不能不開口，因為政治幹事會盯著你，不配合會有苦頭吃。六點半才開始吃早餐。<sup>9</sup>每周一周會時間還要聽處長訓話一、兩個小時。但一般而言早餐後要進行小組討論，在政治幹事監督下，楊達無法避免地必須面臨批判馬克思主義、左派思想的場面。由於小組討論的題目重複性過高，刑期久一點的新生幾乎都可以背出討論稿的內容。<sup>10</sup>楊達選擇的方式和大多數人一樣是「逐字念稿」。<sup>11</sup> 因為他屬於文化界的名人，通常幹事會希望他多講一些，

---

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sup>6</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218。楊達，〈輕公差〉，原為新生筆記簿「生活雜記」（1）之手稿，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99。

<sup>7</sup> 交叉比對胡子丹、葉雪淳等其他同隊獄友的回憶，楊達起初確定是被編在第五中隊。重新編隊後，胡子丹記憶楊達可能被編入第一中隊，語氣並不確定。同期獄友龍劭瑞記錄楊達待在第一中隊；同為第二中隊的曹昭蘇之回憶錄說楊達是他的同學，同時董登源也在同隊，兩人才有機會為子女（楊建和董芳蘭）談論親事。鍾逸人提到第二中隊的儲藏倉庫是楊達管裡的小王國，以及呂水閣是楊達在第二中隊的知己。筆者在調閱楊達的考核表時，發現考核表封面標示「新生訓導處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因此確定楊達是待在第一中隊無誤。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221。龍劭瑞編，《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233。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頁 285。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4、367。〈新生處理考核表〉，《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2。

<sup>8</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4。

<sup>9</sup>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153。有些新生的記憶是六點起床，但是起床後的時間安排無異。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29-30。

<sup>10</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94。

<sup>11</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221、350。



<sup>12</sup>所以對楊達來說，真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sup>13</sup>看在獄友胡子丹眼中，總覺得楊達是苦澀的，豈是心甘情願。<sup>14</sup>

小組討論後，就會有一日勞役、一日上課的內容。若是輪到勞役日，打石搬石塊，還要挑水、挑煤炭、砍柴、割茅草等等。有重大工程時，除了年輕人要打石，抬石則是要全體出動，所有人早飯前、晚飯後都要各抬五次。楊達雖然年逾五十可以不用打石，但是搬運石頭仍不可免。他總是靜靜地跟著勞動，如同新生中最不引人注目的風景。<sup>15</sup>此外，因為年齡關係，在獄中的不成文規定中，楊達可以擁有免出「晚公差」的特權。可是若被派殺魚或挑石頭的臨時工，他從沒拒絕過。胡子丹覺得楊達是「以順民姿態做沉默抗議。因為，他不屑向他的『上司』申訴理由。他執著：讓他們自己發覺自己的錯誤吧！」<sup>16</sup>楊翠對楊達的認知則是「將農作勞動視為日常生活」。<sup>17</sup>至於楊達本身則曾經針對值星官因為覺得他年紀大，而叫他去出輕公差一事感到不服氣，表示他是喜歡活動的。楊達說：

五十來歲就算老了，這樣的觀念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希望再有機會多活動一下。我相信，只不要體力透支，多一点活動與磨練，對於健康是有益的。只要是不太過重的工作，如上山找樹苗來種植，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sup>18</sup>

楊達自身有「生活苦一點也是一項磨練」<sup>19</sup>的正向思維。因此，與其說楊達以沉默作為抗議手段，不如說是如林淇養（向陽）所言，那是楊達以樂觀主義作為不被擊倒的「能源」，安之若素地來面對生命中種種的陰暗。<sup>20</sup>

若是輪到上課日，每個人都要按照課表聽著各省口音教官的上課內容。坐在矮板凳上，沒有桌子，只能依靠膝蓋和自製的墊板，一邊上課還要一邊用新生筆

<sup>12</sup>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169。

<sup>13</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4。

<sup>14</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221、350。

<sup>15</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221。

<sup>16</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350。

<sup>17</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193-194。

<sup>18</sup> 楊達，〈輕公差〉，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98。

<sup>19</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100。

<sup>20</sup> 向陽，〈陽光一樣的熱——讀陽達先生《綠島家書》〉，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23。



記簿寫筆記，後來這些筆記簿成了楊逵獄中寫作重要的手稿紀錄。因為教官聲音沒辦法傳到每個角落，所以不少人聽不到，很多人選擇想著自己的事。<sup>21</sup>上課內容很多是批判共產主義，單向右派思考，明顯政治思想灌輸，妖魔化馬克思主義的言論。聽在左派思想的楊逵耳裡，想必不是滋味。

除了平日上課和小組討論要不斷地歌頌監禁他的政府，因為作家的身分，理所當然地被分配到壁報寫作和月刊的編排工作。壁報和月刊不外乎是政治思想宣傳品，很多時候要應付來自上面的壓力。上頭長官應該也想藉機審視楊逵是否「思想正確」。尤其在政府眼中，楊逵是「共產主義者」，是知名人物，更是「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獲罪的政治犯，所以由楊逵來編寫政治洗腦文能彰顯國家霸權的強大力量。既然「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上頭又隨時虎視眈眈地監視著他，楊逵也只好無法拒絕地刊登了不少稿子在兩刊物上。

本來是日文作家的楊逵，寫作時多日語語法以及注音符號，所以在月刊編輯中，需有人協助將楊逵的作品進行潤飾與修改。至於他所寫的內容，鍾逸人描述是：「他每個月都得寫那些『反共八股』、『歌功頌德』、『無病呻吟』的文章給『政戰部』。」由於楊逵本身是具有抵抗意識的作家，鍾逸人認為「這都不是他願意的，他心裡的掙扎痛苦，又豈是那些喜歡說無聊話的人所能懂得？」<sup>22</sup> 胡子丹說他都寫些「生活點滴」，<sup>23</sup>顯然這時楊逵的寫作題材不免要應付長官們的要求，若不想違背思想原則，那麼生活紀錄會是折衷的方向。後來唐湯銘接掌新生訓導處，開明作風讓楊逵的創作壓力減輕，也獲得較開放的空間繼續創作與思考。<sup>24</sup>

上課之外，尚有被稱為一點都不康樂的康樂活動。一開始為了迎接外賓而成立軍樂隊，後來引發新生克難自製樂器的風潮，作為苦悶生活的精神糧食。其實，當時整個臺灣皆籠罩在白色恐怖網中，楊翠論述指出，當時國民黨政府以監督視角進行「全景敞視」，臺灣人民亦處在一個巨大的監牢之中，人人說話前得先謹慎再三，形成「身／心監獄化空間」，臺灣島與綠島則互為禁錮雙島。<sup>25</sup>因此當楊

<sup>21</sup>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164-165。

<sup>22</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6。

<sup>23</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366。

<sup>24</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逵「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41-442。

<sup>25</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逵「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46。

達面臨嚴密的思想改造同時，臺灣本島上也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集中營課程，所有政策皆指向一個思想核心：反共、去紅、黨國至上。根據 1961 年的《中華民國年鑑》記載，為了徹底實施反共思想教育，此時的國防策略將康樂與文宣結合，除了早已推行的反共文學，亦將觸角伸向電影、播音、形象劇、舞劇等，以期達到「寓宣教於康樂」的目的。<sup>26</sup>

由國防部管轄的新生訓導處也受到首波軍中文藝浪潮襲捲，除了成立軍樂隊，每三個月由一個大隊安排康樂活動內容，每次由一個中隊進行演出，新生訓導處全員必須觀賞。反共抗俄的內容連他們看得也很痛苦，但多數新生不願意如此政治化，因此話劇、歌仔戲、舞蹈等都是康樂活動的項目之一。<sup>27</sup>而這些康樂活動也成為軍民一家的手法之一。綠島居民與新生最常憶及的便是春節活動，新生包辦所有街頭民俗活動，「龍燈、青獅、春牛舞、豐年舞、踩高蹺，以及各種街頭雜劇，環遊各村，以娛鄉民，每至一處，男女老幼，輒爭相圍觀如堵，且多延至其家」。<sup>28</sup>聯歡晚會時各項戲劇表演，也是軍民聯歡的重點，時常引起轟動，成為島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對楊達而言，日治時成功排演出「怒吼吧！中國」一劇，獲得熱烈迴響的經驗，已讓他看到戲劇用於宣洩人民情感思想的力量。相信在綠島聯歡的場合當中，更能體會到表演藝術教化的力量，也因此在此獄中發表多篇論及街頭劇的文章，此時也是楊達大量創作劇本的時期。

勞動之餘的時間不多，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偷時間的方法。伙食委員會利用出公差購物的機會，偷偷呼吸一下圍牆外的空氣；山上割芒草的人會趁機享受山野奔跑的自由。楊達則是藉由勞役工作的分配擁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鍾逸人說：

洗過澡，到緊靠泳池南端、一棟十四、五坪大的克難房，找老友楊達喝一杯熱茶，聽聽他對時事的分析，跟他討論十四年前的往事，已成為我每日的功課。

<sup>26</sup> 中華民國年鑑社編，《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中華民國年鑑》（臺北市：中華民國年鑑社，1961.11），頁 348。

<sup>27</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47。

<sup>28</sup> 曹欽榮，〈監獄篇〉，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頁 58。

這棟以礁石疊成、茅草蓋頂的克難房，原為二中隊的儲藏倉庫，兼生產組放置工具的場所。除了下午五點左右或下雨天，生產組的人馬會湧到這裡外，這間克難房已儼然成為楊達的「小王國」。<sup>29</sup>

除了楊達是生產組而理所當然地使用工具室克難房，在可以利用出公差的空檔時間，以四面牆壁暫時隔絕監控的視線，揭下安靜認份的面具，這時他粗糙皮膚下的血管，隱隱顯出從事社會運動時的熱血本色。

楊達尚有另一個「報紙管理人」的工作。處內訂有《中央日報》和《青年戰士報》，大家閱畢後會由楊達收到這間克難房保管整理。這兩份報紙是國民黨與軍方的御用報紙，而新生訓導處訂購這兩種報紙的目的也是在於政治洗腦。但是「楊達還是充分利用時間，耐心的在報上探索，以他敏銳的視角及精密的思維，不但透視出隱藏在報導後的問題，對時事的分析，更有其精闢獨到之處。」<sup>30</sup>因此我們可以確定，楊達雖然處於封閉的監獄空間中，但善於利用手邊有限資料，以精闢的眼光解讀充滿「反共」、「反攻大陸」字眼背後的國際形勢，瞭解高牆之外的臺灣本島政治情勢，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他，自然將社會主義的理想寄託到一個號稱以人民為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上。<sup>31</sup>故他的眼界並未因受到監禁而一無所知，反而試圖透視國家機器的運作，尋找新的理想出路。

對於楊達「報紙管理人」的工作背後，所包含監獄管理員政治算計的意涵，鍾逸人有一番看法：

楊達在隊上的職稱，便成為『報紙管理人』。……（中略）其實這是隊上「長頭毛」為了「慰勉」楊達的「合作」。……（中略）也許「新生營」對這位有來頭的人物，尚有所期許，故示優待。如此，既可炫耀他們「重視

<sup>29</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4。

<sup>30</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70。

<sup>31</sup> 鍾逸人回憶和楊達討論中共政權的看法時，提到：「有一次，我們論及中共政權本質的問題時，他曾說，中共匯聚工、農、兵，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人在國際上揚眉吐氣，掃除自清末以來所受的恥辱，令他感到非常興奮。他並強調：『這才是台灣人希望所在！』」由此可知，綠島時期的楊達在政治理念上是期待中國共產黨的。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70。

人權」到如何照顧老人，也可以進一步攏絡楊逵及其家族。<sup>32</sup>

從這段敘述可以解讀到幾個訊息：首先，楊逵的工作來自於「配合」態度的嘉勉，表示楊逵在幹部的眼中是個乖寶寶，除了平時勞動時無多言、不推拖地去做，他在運動會時以堅毅不拔的精神和超高齡的年紀，參加五千公尺馬拉松與十趟來回的長泳比賽，不僅為自己獲得「自強不息」的錦旗，也變成管理幹事眼中的「模範生」，時常被拿來作為修理不配合的新生的最佳範例。再者，政府當時曾計畫利用楊逵的影響力，赴日本為政府進行針對臺獨組織的特務行動。只是後來政府收回這項滲透計畫，於是楊逵又再次回到了綠島。

回憶錄中楊逵認為計畫未能實行是因為「中日大勢已改變」，王麗華推測「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之後，美軍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台建立合作關係，台灣局勢趨於穩定。是否此時執政者打消了利用楊逵先生的念頭？或者找到了比楊逵先生更合適的人選？」<sup>33</sup>其原因尚未可知。但楊逵終究未能藉由特務工作獲得他想要的條件（詳如後述），一切回到原點。卻因為他被派任特務工作，以及配合的態度盡佔涼差（報紙管理人、壁報社和《新生月刊》的寫手），引起獄中部分新生為之不服而造謠攻擊。楊逵本身又不屑解釋，他的獄友則為之不平，鍾逸人曾引用呂水閣對楊逵的分析，將楊逵當時想法和應對上頭的策略記錄如下：

楊逵一個人在鱸鰻溝的克難房，表面上好像過得很悠閒，煞是令人羨慕。但事實上，並非如外人所想的那般輕鬆。……（中略）這都不是他願意的，他心裡的掙扎痛苦，又豈是那些喜歡說無聊話的人所能懂得？身繫囹圄，罪刑已定，便應面對現實。在這裡做任何抗爭、任何消極抵抗，都無濟於事。何況那些「長頭毛」都是因為不得志、在臺灣沒有靠山、沒有背景，才會被流放到這裡來。抓我們進來、定我們罪的，又不是他們。因此何必與其為敵，為難他們？抵制、怠工、抗爭，猶如以卵擊石，徒增彼此的仇恨，迫使對方惱羞成怒，限制我們的自由空間。如此一來，漫長歲月將如

<sup>32</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4-365。

<sup>33</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4、85。



何挨下去？所以凡事與其斤斤計較、消極抵制，不如姑且與其合作，爭取更大的空間，既可充實生活內容，又可鍛鍊身體，將來出獄後才能適應「娑婆」生活……。這就是楊達的生活哲學。<sup>34</sup>

呂水閣身為楊達的獄中知音之一，所解讀當時楊達的哲學態度，和楊達日後在特務工作上的說詞是可以互文的。楊達並非屈服於規訓之下，他受監視系統所透視，他也透視了系統，採取了表面配合以爭取空間的策略。楊達不缺乏以個人抵抗國家霸權的經驗，也許審訊的歷程讓他獲得警惕與警覺，知道現在面臨的政府不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是可以講道理的，黑獄、違造犯罪事實、秘密槍決皆可能發生在這個大時代中。因此楊達的做法便是順勢而為儲備實力，才能在機會來時抓住時機。

## 第二節 國家檔案的相關記載

楊達所處的空間規訓制度，可從國家檔案局所收藏的楊達獄中檔案窺探一二。當中包含〈逐月考核總結〉表（詳見附錄一），是記錄考核官每個月在「思想」、「學習」、「生活」各項表現給予的描述與分數；〈新生處理考核表〉（詳見附錄二）內記錄了在綠島時期所有考核項目的綜合分數；〈新生調查表〉（詳見附錄三）則是記錄了楊達的基本資料、家庭成員、交友人物、偵查審判執行情形、罪名、刑期起迄、羈押與執行日期、教化前後的感想。

首先，從〈逐月考核總結〉表的格式來看，每個月監獄的幹事們會寫逐月考核表格，將評語與分數按月記載，針對「思想、學習、生活」給予評分與評語，每年會將分數總結平均一次。考核結果必須要經過考核官（分隊長和政治幹事）、初核官（中隊長、副隊長、輔導員）、復核官（大隊長、副大隊長、大隊指導員）等三個階層。表上雖然有 8 個身分欄位，但是「副大隊長」的欄位沒有蓋任何職章，實際只有 7 人核章。表格明顯呈現層級管理的特色，代表層疊綿密的觀察監

<sup>34</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6-367。



視，讓個體無所遁逃。

楊達的罪名於 1950 年 5 月 6 日判決，1951 年 8 月 1 日到達綠島，在此之前應拘禁於臺北的軍人監獄。而目前楊達的逐月考核分數，筆者僅查詢到 1953 年至 1960 年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整理的表件，未見 1951 年 8 月 1 日至 1952 年 12 月 31 日之紀錄。由於〈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在 1946 年便已制定，因此楊達入獄時應該已經被納入評分系統中。只是這段時間的資料不知何故，在國家檔案局的資料系統中闕漏。而 1961 年 1 月 1 日至 1961 年 4 月 5 日的紀錄雖然也未見，警備司令部與軍人監獄的公文遞送內容寫有：

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50）監克字第 0589 號

文別：呈

受文者：軍法局 轉呈參謀總長彭上將

事由：為呈代監執行叛亂犯楊達乙名刑期屆滿後可否予以開釋 恭請 鑒核

中華民國五十年壹月廿日發出<sup>35</sup>



可得知新生訓導處於 1961 年 1 月 20 日已為楊達函送申請開釋。2 月 4 日〈國防部令（50）鏡榮字第 213 號〉文說明：

查叛亂犯楊達一名經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奪公權十年，其刑期至五十年四月六日執行屆滿，既據考核思想已改正感訓總成績乙等，准予刑滿時飭具妥保依法開釋，另依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之規定加強考核嚴予管教。<sup>36</sup>

<sup>35</sup> 〈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50）監克字第 0589 號〉（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2=0000227620001、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2=0000227620002。

<sup>36</sup> 〈國防部令（50）鏡榮字第 213 號〉（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1=0000227610001

已可看見國防部准予開釋，讓楊達得以結訓。足見監獄 1 月時就將楊達成績結算送交國防部查核，等待下令核准，1961 年 1 月後的成績也沒有評鑑的必要，可能是 1961 年後沒有考核成績的原因。

成績方面，楊達在起初 1953 至 1954 年這兩年的成績落在 60 至 70 分區間，平均看來持平但略有波動，而且評語部分多偏負評的字眼，例如「未見改進」、「學習敷衍」、「服務尚可」、「不積極」等。其中很明顯地當「生活」與「學習」項目分數略為上升時，思想項目卻一直被壓在低分區。一開始被打在 60 分及格邊緣上，而且評語多數為「未有改進」。1955 至 1956 年楊達的分數出現明顯向上的曲線，甚至在「生活」項目出現 86 的高分，之前被壓抑給分的「思想」項目也隨之成長。這兩年的文字評語上也出現較多正評，如「言行正確」、「學習努力」、「服務努力」、「工作努力」，而後出現 3 則較明確的評價：「有遠大理想」、「研究學問是他的興趣」、「抱病工作能耐勞吃苦」，考核官對楊達的認知與感想逐漸呈現正向的評價。

1957 年分數波動最大，其中尤以 6 月至 7 月的生活項目落差可以達到 23 分，思想和學習項目也略為下滑。從現有史料無法判定原因，何以導致考核官突然在 6 月給予低於 70 的分數。唯一可從文字評語看到考核官給的解釋是「工作欠努力未能盡責」，7 月卻是評予「奉公守法」，用詞正負面向很明確。此外，1957 年的文字評語有個特色，除了 6 月的負評之外，整年度的評語幾乎是正向讚許的，而且下半年度的評語敘述較為詳細。1958 年 5 月之後的成績，並未因為楊達的間諜任務未成行而有所影響，尚能維持在高分區，可想見這趟任務的未能執行，並未讓楊達承擔後續的懲戒或為難。1959 年 1 月之後，評分突然急轉直下，尤其 2、3 月的思想與學習分數難得落回 60 分區，查看評語卻是「認識正確」、「認真學習」、「生活規律」等正面的用詞。1959 至 1960 年的分數常有類似狀況出現，如 1959 年 3 月、1960 年 1 月、1960 年 11 月，分數直接降到 70 分以下，但是文字評語大多數是正評。

總結來看，楊達每個年度間每月的分數與文字評語的變化，分數時常有所起伏，雖然有時高於 80 分，不多時就會出現被壓抑得分的現象。但分數被打低同時的文字評語卻是較為好評，監獄的評分標準或許與考核官的評語標準是各自表述的。這些顯示評分高低與評語並不必然相關，難以據此瞭解楊達在獄中的實際

表現。

其次，當新生要結訓之前，考核官會將〈逐月分數總結〉表整理成〈新生處理考核表〉，分成「綜合考核」分數成績與「考核意見及處理意見」的文字評述兩部分。和〈逐月分數總結〉表不同的是，該表標示「思想」、「學習」、「生活」下個細項，清楚呈現三大項目下的主要要求是什麼。「生活」下分信仰（主義、領袖、國家）20%、言論 15%、行動 10%，「學習」下分測驗成績 15%、學習情緒 8%、筆記心得 7%，「生活」下分品德氣質 9%、勞動服務 8%、服從表現 8%，並有優到丁的等第評量以及各等第的評語。<sup>37</sup>在〈考核意見及處理意見〉欄以下，層層分級考核，並且需要蓋章證明與負責。處長欄處蓋上的是「唐湯銘印」的私章，從處部、大隊、中隊以下，每一欄格均蓋上 2 至 3 個軍職章，更顯這個考核制度的嚴謹。筆者將〈新生處理考核表〉內的「綜合考核」評分表整理如下：

表 1：楊達的「綜合考核」分數表

項目	區分	得分	等第	評語	各項得分	總分
思想 (45%)	信仰（20%）	15.2	乙	信仰尚堅	34.2	77.2
	言論（15%）	11.4	乙	言論平常		
	行動（10%）	7.6	甲	循規蹈矩		
學 習 (30%)	測驗成績（15%）	12.5	甲	各科均優	23.99	
	學習情緒（8%）	6.1	甲	孜孜不倦		
	筆記心得（7%）	5.39	甲	整潔充實		
生 活 (25%)	品德氣質（9%）	6.8	乙	個性剛強	19	
	勞動服務（8%）	6.1	甲	熱心公益		
	服從表現（8%）	6.1	甲	奉公守法		

從表格看來，楊達的「學習」項目表現較好，均獲得甲等的分數。從細項來看，楊達的「測驗成績」、「學習情緒」、「筆記心得」的表現是相當不錯的；「思

<sup>37</sup> 〈新生處理考核表〉，《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4。

想」項目多乙等表現，給分相對保守。最終獲得 77.2 的乙等分數。同是綠島政治犯的張振騰曾提過：如果要結訓必須要達到 70 分以上，<sup>38</sup>由此可知新生訓導處的犯人要能夠離開監獄，並非服滿刑期即可，還必須達到分數的條件，否則有可能期滿仍留訓。楊達的成績雖然不高，也達到可以出獄的標準。

另外，文字評述部分亦具有層級考核的特色，從處長、處部（下分政治處、第一組、第二組）、大隊（下分思想、學習、生活、體格的檢核意見）、中隊（下分思想、學習、生活、體格的初核意見和基層考核），必須各層長官對該新生提出觀察跟意見，完成一張類似總結性評量的表格，最後在申請開釋刑文時附上作為證明。因此這張考核表的紀錄是相當重要的。比較有趣的是在思想項目方面，從處部、大隊意見到中隊的初核意見，以及基層考核給的評語都是「思想已改正」，顯然不容易具體化的思想被量化處理，只要達到分數的標準便是思想改正。張振騰曾提到：「思想考核只要刑期滿了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會給七十分的基本分，讓其順利離開綠島回去與闊別多年的家人團聚，這是人之常情。」<sup>39</sup>可見考核制度留於形式，此處的「思想改正」並非如同字面所言，受刑人改變其政治思想，僅能代表刑期已滿。

另一份〈新生調查表〉則是包含楊達的基本資料、家庭成員、交往人物、經濟狀況、偵查審判執行情形、罪名、刑期起迄、羈押與執行日期、教化前後的文字敘述等等，儼然是結訓前的資料彙整表。長期研究楊達手寫稿，並曾擔任《楊達全集·資料卷》責任編輯的學者黃惠禎翻閱後表示：〈新生調查表〉上的字跡極似楊達筆跡，該表應是楊達本人書寫。官方表件由受刑人自己書寫，則表示處部是要他在權力者監視的眼皮下自白，從他所書寫的內容試圖透視楊達的思想。

表格上除了要填寫個人基本資料、謄寫入出獄與被捕時間，還要交代交往人物與教化前後的心得感想。相關基本資料尚無問題，只是家人欄中缺少了長女楊秀俄之名。根據《綠島家書》楊建的註解，楊秀俄於 1949 年 12 月 21 日與葉金

<sup>38</sup> 張振騰說：「當時新生訓導處結訓出獄成績的計算是分兩部分。一是思想考核，由政治幹事他們給分。另一是學業考核，由自己平時參加考試成績及結訓前舉行的『結訓考試』計算分數。思想考核與學業考核各占一半。」雖然所言的評分分項少了評分表上的「生活」，而且分數比例也不盡相同，但是依他所說的可知，所謂的出獄成績標準七十分，是指各項目的總平均分數。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59-60。

<sup>39</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60。

得私奔，葉陶曾經對於這件婚事不能諒解。<sup>40</sup>而楊達於 1951 年被移送綠島，或許如此，在楊達的調查表上面缺少已離家的楊秀娥的資料。另外，交代交往人物時，往往考量到當局是否利用來擴大檢視思想對象。此欄填上的是楊雲萍、黃得時、張文環。

楊雲萍在戰後擔任臺灣省行政公署的參議、臺灣省編譯館編審與臺灣研究組主任、臺灣文化協進會理事，民報社編輯顧問與委員等，後由許壽裳推薦給臺灣大學，破例聘為歷史系教授，專心於研究文史，被認為是延續連雅堂後臺灣人治史的重要學者。<sup>41</sup>黃得時戰後活躍於文化界，曾加入「臺灣文化協進會」、《臺灣新生報》副總編輯、《國語日報》董事，後受聘臺大擔任副教授，長期注重教育與兒童文學。<sup>42</sup>張文環戰後當選臺中縣第一屆參議員，二二八事件中曾躲避山中，之後輟筆 30 餘年。1948 年起擔任「臺灣省通志館」編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兼總務組長，轉戰保險業、銀行業、商業、飯店業，擔任過經理、總經理等職。<sup>43</sup>此三人的經歷與政治界、學術界、商界的關係良好，也都任職過官方機構。楊達填寫此三人為他的人際網絡進行交代，應該是用心篩選過的結果。

最後在「教化前後」欄的「教化心得」寫著：

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為求國家獨立，社會安定和民生建設，最適合我國國情。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客〔按：「容」之誤〕在中國存在，也無法發展。<sup>44</sup>

「受教化感想」則是：

<sup>40</sup> 楊達，《綠島家書》，頁 76。

<sup>41</sup> 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師大臺灣史學報》9 期（2016.12），頁 64-66。林春蘭，〈楊雲萍〉，《臺灣文學辭典》（來源：<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179.html?keywords=楊雲萍>，2019.06.10）。

<sup>42</sup> 江寶釵，〈黃得時〉，《臺灣文學辭典》（來源：<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175.html?keywords=黃得時>，2019.06.10）。

<sup>43</sup> 柳書琴，〈張文環〉，《臺灣文學辭典》（來源：<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165.html?keywords=張文環>，2019.06.10）。〈張文環〉，華人百科（來源：<https://www.itsfun.com.tw/張文環/wiki-0201019-8407778>，2019.06.10）。

<sup>44</sup> 〈新生調查表・楊達〉，《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半工半讀，手腦並用是民生主義最理想的教育方式。日常生活的自治訓練是民權主義的堅實基礎。<sup>45</sup>

楊逵在心得與感想的字面上皆以歌頌三民主義為主，並且批評共產主義。看似配合思想改造的教材內容，也非常符合當局所想要聽到的答案，但若因此認為楊逵屈服於規訓系統，成為柔順個體，此評便會流於表面認知。

楊逵在東京留學時便醉心於馬克思主義，在彰化、鹿港一帶組織讀書會時，並曾翻譯研讀相關文獻，例如〈勞働者階級的陣營〉一文提到，「共產黨要對掠奪者無私的、大膽的、無客氣的激烈鬥爭中啟蒙、組織、訓練、勤勞工農大眾，而且使他們守一定的規律。」<sup>46</sup>文章內容不僅與共產主義有關，也可看出他確實堅信社會主義的合法鬥爭可改造世界。<sup>47</sup>日治時期，楊逵積極參與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組織活動，堅持山川主義路線運動，正如〈勞働者階級的陣營〉所言：「雖然工人階級鬥爭的各種問題總在黨討議，黨決不可墜於辯論俱樂部。在政治鬥爭起初才會發現黨的價值。這個時機，黨不只是要演說，更要鬥爭，而且要証明有指導工人大眾的能力。」<sup>48</sup>楊逵一生的社會運動，堅守實踐高於理論的行動原則，我們也明白他的社會主義其實較為接近共產主義。<sup>49</sup>在東京求學同時，楊逵接觸到日文翻譯版的三民主義。而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中，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基於經濟問題而產生的思想，也就是民生主義，為瞭解決貧富差距與剝削，利用階級鬥爭來達到共產的理想社會。然而，國際上的社會黨卻是用鬥爭來解決政治問題，自然是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孫文提出，在中國皆屬貧窮階級，工商業並不發達，僅有地主階級產生的地權不均問題，所以馬克思理論中資本家

<sup>45</sup> 〈新生調查表・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sup>46</sup> 關於此稿，《楊逵全集》並未標註是否為楊逵所著。黃惠禎曾說明因《楊逵全集》編輯當時尚無法確定，只能先歸類於未定稿。後引鄧慧恩確定未定稿中的〈戰略家列寧〉、〈革命與文化〉為譯文的考證結果，再以〈勞働者階級的陣營〉使用之稿紙與〈戰略家列寧〉、〈革命與文化〉二文同款式，推測應是 1929 年楊逵在彰化參加讀書會時翻譯而來的。楊逵譯，〈勞働者階級的陣營〉，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483。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41-42。

<sup>47</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43。

<sup>48</sup> 楊逵譯，〈勞働者階級的陣營〉，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481。

<sup>49</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 130。

剝削工人階級的問題並不存在，根本無需階級鬥爭手段來解決貧富不均，因此認為「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sup>50</sup>

這個問題也存在於當時的蘇俄。馬克思理論中革命力量來自工人，但是蘇俄的無產階級卻是龐大的農奴，所以列寧修正馬克斯理論的路線，擴大革命力量範疇，同時納入農工階級，讓理論可以落實到運動實踐上。對於當時中國與殖民地的人民來說，藉此尋找如何抵抗霸權、處理政治與經濟之失衡與不公之法。陳芳明從楊達譯文〈戰略家列寧〉認為，楊達確實受到列寧修正理論影響，所以終其一生，楊達思想與政治活動的核心從未離開過農工。<sup>51</sup>

總結以上，楊達對於孫文三民主義的認知，與他信奉的社會主義路線是相似的，這點可以也從楊達在戰後編輯《一陽週報》的內容得知。孫文將三民主義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並且重視農工階級的觀點，獲得楊達青睞。因此當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後，除了編輯《一陽週報》宣揚三民主義外，楊達還印刷 5000 本《三民主義》，打算藉著書刊編印來教育民眾認識三民主義，可見三民主義與他的理想有相當程度的謀合，<sup>52</sup>他也認同孫文說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希望以此營造均富的大同世界。只是，從《一陽週報》的編者按語也可知道，楊達看透手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其實有著獨裁集權的問題，<sup>53</sup>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後他就退出國民黨部，產生失望的情緒是針對國民黨，而非三民主義。由此可見，楊達在教化心得欄書寫三民主義適合於國情，共產主義的階級鬥中不容存在於中國等字樣，並非是為了迎合當局，否認之前自己的運動路線以及社會主義的信仰，而是一直以來楊達對於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關聯的一貫認知。

在教化感想中最值得咀嚼的一句話便是，「日常生活的自治訓練是民權主義的堅實基礎」。楊達在此暗藏了兩大關鍵字：「自治」與「民權」。楊達在戰後編輯《一陽週報》，於第七號刊登了張士德談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立目標中提到「確立自治」，於第十二號選錄〈地方自治機構〉為刊頭。學者黃惠禎從楊達的編輯

<sup>50</sup> 孫文，〈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第二講〉，《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來源：<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32/g3web.cgi/ccd=2F5JUhg/rapheviewer1?dbid=CF7777777779>，2019.06.22）。

<sup>51</sup> 陳芳明，〈臺灣文壇向左轉——楊達與三〇年代的文學批評〉，《臺灣文學學報》7 期（2005.12），頁 107。

<sup>52</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87。

<sup>53</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89。

方式認為他不僅認同自治，也認為自治是臺灣的理想政治形態。<sup>54</sup>二二八事件中，楊逵支持武裝抗爭，並非企圖做為解決當時臺灣問題的手段，只是希望能促使臺灣自治。<sup>55</sup>即使撰寫〈和平宣言〉，亦是以臺灣自治為訴求，主張還政於民。<sup>56</sup>例如，楊逵呼籲「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為使人民意志不被包辦，各地公正人士須要加速組織地方自治促進會、人權保證委員會等」<sup>57</sup>亦可證明。楊逵於教化感想中寫出的是他一貫的政治訴求，並且在此所指自治也是孫文所提倡的地方自治，乃人民權利，自治為民權之基石。楊逵瞭解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號召，也在思想改造中作為攻擊共產主義的旗幟。他認同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加上他是因為被當局扣上「為匪宣傳」的罪名而被捕，以讚揚三民主義來交代其思想傾向，既不需違反本心，又可以符合當局所要的標準答案。

根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的條文規定，將受刑人各項表現化為分數計算表，把人犯級分化，凡達到分數要求，便可順利出獄。其意義在於利用規訓的書寫權力，將犯人個體全部化為可被監視的檔案／文字／數字，然後利用這些檔案作為評論個體是否完成改造，思想是否馴服的依據。綜觀其結訓單內容，不僅不能證明楊逵屈服於國家霸權，反而清楚可見當時新生訓導處下的考核制度，具有層級分明的獄中規範化裁決之性質。

### 第三節 難友視角呈現的楊逵

在諸多規訓的系統下，難友記憶中的楊逵是印象清晰的。賴丁旺<sup>58</sup>說：

楊逵也是綠島的難友，他是作家，那時已經很有名。楊在第二大隊，我沒機會和他來往。……楊逵人很矮，身體不差，有一次開運動會，他參加 5000

<sup>54</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 137-138。

<sup>55</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68。

<sup>56</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80-281。

<sup>57</sup> 楊逵，〈和平宣言〉，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315-316。

<sup>58</sup> 賴丁旺於 1950 年遭誣控參加共匪集會被判十年監禁，於 1951 年 5 月移監新生訓導處，直至 1960 年出獄。

米賽跑。<sup>59</sup>

這段的記述雖簡短，卻概括楊達在他人眼中幾個特點：作家身分、外貌不突出、參加長跑，其他難友在鋪陳上亦多著墨於這幾個特色。例如曾與楊達同在第二中隊的曹昭蘇說：

他運動的毅力真使我佩服，在運動會大操場上他參加五千公尺的馬拉松和三百公尺的游泳比賽，他年已五十多歲和二十多歲的年青〔按：「輕」之誤〕囚犯新生並肩出賽，博得全處獄官、兵、囚犯同學的熱烈掌聲，後來編隊他編到第二中隊，在山下菜園班飼養火雞和種菜挑水，他不忙時總是坐在火雞旁看書沉思，身邊放著紙筆，他常寫些生活小品刊登在「新生月刊」或壁報上，他亦常煮些排骨米粉湯類給我打牙祭，他沉默寡言我們常見面，但彼此很少交談。<sup>60</sup>

楊達長跑之所以令人記憶深刻，在於長跑里程數與高齡，和參賽年輕人呈現反差感，襯托楊達的精神可嘉。實際上對於楊達來說，也是津津樂道的一項紀錄。他自言：「我不僅保持著一定的速度跑完五千公尺，最後還能有油可加的，跑了半圈的快步進終點。不但沒有勞煩大家拿出擔架來，至今還是照常吃飯，照常工作」，並將長跑的精神視為愚公移山的毅力，用來鼓勵生活上的自己。<sup>61</sup>

此外，楊達看書與寫作的畫面也時常在獄友的回憶中出現，標示出難友視角的楊達作家身分。事實上，有些人接觸楊達就是基於文學交流的動機。例如陳紹英說：

那時他大概已將近五十歲，看他輕鬆挑起兩桶三十公斤的水，非常佩服。

為了接近他，我請過去曾在臺北地方監獄與楊先生關在一起的林月濤陪同，

<sup>59</sup> 賴丁旺，〈火燒島（下）〉，龍劭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頁 233。

<sup>60</sup> 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頁 285。

<sup>61</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40。



到菜園拜訪他，並請教他我所寫的「大海的新娘」劇本。<sup>62</sup>

陳紹英除了請教楊達寫作技巧之外，其眼中的楊達和賴丁旺有一點相似，便是楊達看起來「身體不差」，因為尚能「挑起兩桶三十公斤的水」。但楊達年幼時體弱多病，被同學戲稱為「鴉片仙」，青年時罹患的肺結核曾在獄中再度復發，坐牢後期發生肝衰弱，其身體狀況和難友眼中「老當益壯」的印象有著一段落差。

楊翠曾言：「楊達確有他獨特的耐力與韌性，這是從長年貧窮、疾病、強權壓迫中所提煉出來的。」「他不僅甘願，更化被動為主動，將農作勞動視為日常生活。」<sup>63</sup>故楊達身體硬朗的表象，其實源於社會主義者認為勞動神聖，而且藉由勞動體現生命的韌性。勞動之於楊達，如同呼吸般地自然存在。這些行為與角色標註，對比在一副非常平凡的外貌上，引來記錄者的觀察與書寫。胡子丹說：

臺灣著名文學家楊達先生，當時也同在訓導處內另外一個中隊。我曾多次在處內簡陋的游泳池看見過他。大家只穿一條內褲（不是游泳褲），等於是袒胸露背相處啦。他個子矮小，不多話，一副和藹謙虛的模樣。<sup>64</sup>

又說：

眼前走過的那個矮矮瘦瘦的老頭子，貌既不驚人，相更談不上出眾，一副可憐兮兮的癩三勁兒。看那一身裝備，大概是洗澡去，兩手捧了個鋁製的洗臉盆，一條又破又黃的乾毛巾搭掛在肩頭上，最令我不能忍耐的，這位老同學還滴滴答答地穿了雙木屐，木屐卻又是兩隻兩個樣，一大一小，一橫帶，另一隻是交叉布帶。<sup>65</sup>

<sup>62</sup> 陳紹英於 1950 年遭控參加謝雪紅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被判監禁 13 年，移送到新生訓導處服刑。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 269-270。

<sup>63</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達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193-194。

<sup>64</sup> 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一・秋蟬的悲鳴》，頁 130。

<sup>65</sup> 胡子丹，〈楊達的長跑精神〉，原載於《自立晚報》，1983.11.07。引自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343。

文章起頭便以「臺灣著名文學家」特別標籤楊逵，故而在書寫視角上以特寫手法描寫楊逵的動靜模樣。觀察結果卻是「貌既不驚人，相更談不上出眾，一副可憐兮兮的癩三勁兒。」腳踩的木屐不對襯到更令胡子丹「不能忍耐」。「癩三」與「臺灣著名文學家」兩者的形容天差地別，卻全套在同一人身上，看似描寫楊逵的其貌不揚，卻也寫出他在物質困苦與環境下的安然自若。

從前述難友的側記，我們可以勾勒出綠島上的楊逵：以其貌不揚的老人樣態，透露出高反差的堅毅印象：矮小病瘦的身姿對比著刻苦耐勞的精神，安靜而謙虛的樣貌對比著文學家與運動家的盛名。大家都知道那是楊逵，也忍不住注意他，靠近他卻發現與其他新生一般似乎並無不同。直到在運動會上，他以高齡的年紀參加長跑和長泳，雖然成績是最後一名，可是他永不放棄的精神，在整個運動會中卻最受到注目與喝采。勇往直前的楊逵，不畏懼他人眼光，只是看著路向前跑的專注，令在場人士感動到熱淚盈眶。「三天的運動會完了，一切恢復正常，人與人之間，表面上仍如往昔，但是，在每個人心底，卻有了個『楊逵』存在。」<sup>66</sup>胡子丹所言，其實指的是楊逵展現的生命韌性。

楊逵於獄中寫下的〈園丁日記〉曾道：「在火熱的小島上，我們都期望著一點綠蔭」，「我們不能讓颱風的摧殘來破滅了大家的美夢。」<sup>67</sup>便是不斷藉著《新生月刊》向獄友們傳達堅強不屈、積極樂觀的意志。他亦在晚年自言道：

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在挫折來時更加振作，在苦難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sup>68</sup>

楊逵以自身具體行動，落實了寫在《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上的樂觀，將他的積極與永不放棄的身影活躍在這方絕世的島嶼上。從此楊逵的存在不再僅是

<sup>66</sup> 胡子丹，〈楊逵綠島十二年〉，原載於《傳記文學》46卷5期（1985.05）。引自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頁353。

<sup>67</sup> 楊逵，〈園丁日記〉，原載於《新生月刊》（1956.1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37、343。

<sup>68</sup> 楊逵口述，方梓記錄，〈沉思、振作、微笑〉，原載於《自立晚報》，1983.04.3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43。

「一名新生」，而是新生心中一抹堅強活下去的希望。

然而這些記憶圖像中，亦投射中難友們心中楊達的不凡。一則是因為楊達本身具有知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的身分。二則乃因楊達呈現於外的不像其他新生一樣頹靡、憂鬱與憤恨，自在自適地宛若只是換個地方種種菜，甚至樂觀積極，將思想控制、強權霸道的氛圍化做心志的磨刀石。三則是楊達的不凡圖像對於沉淪苦海的新生有著具體的精神依託，冀望自己也能如此超然，堅持到出獄的一天。

這種趨近聖人的形象顯得有距離感，酒精卻成了楊達從神主牌降為凡人的媒介。自從新生組成生產班，改善綠島的農作技術以及伙食內容，糧食不僅富足尚能外賣以獲取金錢。所以每個月一次的慶生會，另外還有紀念日、長官的迎送會、婚喪喜慶等，連母豬生下小豬，豬圈落成，都能成為打牙祭的理由。<sup>69</sup>平均兩天半，各中隊輪流一次打牙祭，越吃越好，甚至可以舉辦持續一個月的伙食大賽，並且由楊達所屬的第五中隊的醫師難友團作裁判，根據營養內容決定勝負，讓眾人嘴越來越刁。<sup>70</sup>

除此之外，尚有公賣局的福壽酒以及受刑人自釀烏梅酒可喝。<sup>71</sup>而楊達喜歡杯中物，在七〇年代尚有白色恐怖餘威的情境下，出獄後的楊達很多事情避而不談，但關於火燒島的少數口述紀錄中，特地提到喝酒一事：「頭幾年，沒辦法喝到酒。後來，年節時，福利社有賣。我派守菜園，有時從外頭的民房走私酒進來。」<sup>72</sup>楊達在獄中一直有著守規模範生的形象，但是為了喝酒而進行陽奉陰違的偷渡行為，呈現他為了滿足口腹之慾平凡的一面。

和楊達同中隊的葉雪淳也在回憶文中，記下楊達愛喝酒的樣子：「尤其那位老是把沒有酒就說『欠一味』當成口頭禪的老文學家——楊〇難友，更是高興的唱起歌，跳起舞來喔。」<sup>73</sup>另外，鍾逸人則對楊達喝酒一事感到頭疼：

<sup>69</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51。

<sup>70</sup> 葉雪淳，〈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臺灣風物》60 卷 3 期，頁 162-163。

<sup>71</sup> 葉雪淳，〈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臺灣風物》60 卷 3 期，頁 163。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402-403。

<sup>72</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紀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7。

<sup>73</sup> 葉雪淳，〈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臺灣風物》60 卷 3 期，頁 163。

楊逵喜歡喝酒，酒量卻不大。他平素說話頗知分寸，不隨便信口開河，也頗能察言觀色，進退得體。可是三杯黃湯下肚後，他就開始語無倫次，頻頻失態，將其神秘的內心世界，一表無遺。因此，二隊幾位特別親近楊逵的朋友，如陳水泉、何茂松、呂水閣等仁兄，都曾提醒我，要特別注意楊逵喝酒的狀況，別讓他因此得罪別人或鬧出笑話。

他每次到「世外桃源」，必帶一瓶米酒和一大包花生米。而大胖子張信義，也會帶著最愛的烏梅酒，在七隊教室前，等候楊逵，然後一胖一瘦齊赴「世外桃源」。<sup>74</sup>

所謂的「世外桃源」，指鍾逸人被分配到從事種植生產的一處農場與茅舍，位在九隊和中正堂廣場後二十公尺高的山坡地。這裡距離部隊大約 300 公尺，最近的十隊營房也要 100 公尺。居高臨下的位置可以鳥瞰處部動靜，若遇班長檢查，還可以從容不迫地準備應變。在此處相當自由自在，不受干擾。<sup>75</sup>楊逵的克難房每逢假日會湧入生產組的人員，眾人談論歌唱，好不熱鬧；而楊逵喜靜，只好跑到鍾逸人的農場茅舍休憩飲酒，<sup>76</sup>遁入「世外桃源」享受隱士般的時光。楊逵在監獄苦熬的日子如果隨時保持戒慎恐懼，在精神方面的壓力頗大，因為訴求臺灣和平而被迫拋家棄子，被迫中止理想運動，對楊逵來說，無論他的外表如何平靜接受，內心總是抑鬱無奈。在「世外桃源」的隱蔽和酒友的陪伴下，楊逵可以縱情喝酒談論，也是他紓解精神壓力的一個辦法。

喝酒並非楊逵特有的行為，因為新生在綠島生活需要常常上山下海，一旦遇到驟雨或氣溫驟降，為避免生病，指導員會指示伙委準備薑湯或太白酒驅寒。身體有所病痛時，會製泡藥酒，尋求療效。漸漸地新生們染上酒癮。大約在 1959 年，有次蘭嶼居民到新生訓導處作客，處部開宴宴請他們，婦女們開始跳起豐年祭舞，場面熱鬧萬分。眾人一邊飲酒一邊歌舞，當場所有官兵民均喝到酒酣耳熱。新生訓導處的思想犯很多是十年以上的重刑，長期處在絕對身心規訓中，產生焦慮、憂鬱也不意外，不免伴隨而來的就是酒精麻痺。當新生與蘭嶼居民共舞之時，

<sup>74</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403-404。

<sup>75</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383-386。

<sup>76</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403-404。



他們平時的不平與怨恨一時湧發，當場數百人同時又哭又笑又跳，宛如失控。這次非理性的酒後衝動使警衛連長非常緊張，甚至加強戒備與警力以防萬一。<sup>77</sup>

酒精對中樞神經有去抑制作用（disinhibition），使人容易有「顯得比較好說話，較富攻擊性等興奮現象」。<sup>78</sup>在自我醫療假說中，飲酒者認為酒精可以幫他減輕焦慮的不舒適感，酒量逐漸增加，可是酒精也是引發焦慮的原因，反而更依賴酒精助他解脫，因而產生酒與焦慮的共病現象。<sup>79</sup>這種病態性的飲酒，與其說是追求治療身體的藥效，不如說是精神上的自療。如同鍾逸人所敘述的：「與其說藥效如何，還不如說米酒的效力更勝一籌。」<sup>80</sup>

影響楊逵至深的賴和，詩作時常出現詠酒字眼，多半是藉由酒從苦悶中獲得解放感。<sup>81</sup>這並非消沉，而是藉由酒精釋放苦抑的理性，讓真性情容易流露，與友酬唱時可獲得集體療癒效果。因此從難友描述酒後的楊逵，「唱歌跳舞、失態、語無倫次、得罪、鬧笑話」等詞彙中可以知道，楊逵酒後的言論應該是理智時的他未曾說過的放肆內容，形態舉止也會相對解放不拘。可見酒精能暫時釋放他的感性，讓他的內在得以呼吸，讓他享受一回心靈自由的感覺。藉由酒精療癒難以言盡的鬱悶，獲得精神上的修復，楊逵才能繼續他樂觀積極的動力。

至於監獄裡種種不由自主的事情中，對楊逵來說最能如魚得水的應該是菜園的工作。在獄友胡鑫麟的眼中，「人家叫楊逵去做菜園，他就乖乖去做菜園」<sup>82</sup>，根本也不反抗。學者楊翠認為他曾經歷連糧食、農作工具都買不起的極苦日子，管理菜園不比他要處理全家溫飽的問題來得大，農務勞動對他來說只是日常工作，並不會讓他被收編在身體勞動規訓之下，而經營農園更是他適性歡喜的事情。<sup>83</sup>另外，學者黃惠禎曾引〈勞動禮讚〉一文，說明楊逵在日治時寫下〈增產之背後〉的真正用意：楊逵希望啟迪大眾去瞭解勞動者經由工作鍛鍊體魄，與面對困境時護衛同伴的美麗之心，並且為英美社會以知識水平和外表來輕蔑勞動者感到不平。

<sup>77</sup> 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頁 347-349。

<sup>78</sup> 吳潮聰，〈酒，飲酒及酒癮〉，《當代醫學》8 卷 12 期（1981.12），頁 33。

<sup>79</sup> 徐瑋怡、張宇岱，〈酒癮與焦慮症的共病機制〉，《慈濟醫學雜誌》17 卷 2 期增刊（2005.10），頁 51-52。

<sup>80</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81-382。

<sup>81</sup> 陳淑娟，〈賴和漢詩中的“酒”字探析——兼論其生命觀與處世哲學〉，《國文學誌》8 期（2004.06），頁 198-199。

<sup>82</sup> 胡慧玲，《島嶼愛戀》（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10），頁 133。

<sup>83</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 193-194。

黃惠禎認為這是楊逵批判資本主義對於勞動的膚淺觀點。<sup>84</sup>可知，勞動在楊逵眼中不像他人認為是痛苦與消極接受，對於信奉社會主義的他來說，他眼中的勞動是美麗的而且是樂於接受的。他曾言：「如果有人問我：那麼，哪一種人比較美？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勞動。」<sup>85</sup>「他們藉著勞動接受千錘百鍊，就像被雨水澆林的煤炭一般，散發出黯沉的光輝。這可不是因為我當不了紳士才這麼說，而是因為我深深嚮往勞動者的美。」<sup>85</sup>因此勞役雖是規訓的方法之一，農耕的工作卻是他最讚美也最喜樂的事務。相較於其他將勞役視為精神與肉體折磨的難友，楊逵不覺得被壓迫，樂在其中，其精神凌駕於規訓之上。

#### 第四節 跨越禁錮與醫病共生

在獄中，楊逵最掛念煩惱的是他的家人與他病體的復發。學者楊翠指出《綠島家書》直接記錄楊逵獄中心靈活動，主要內容便在於獄中病體書寫和藉由家書參與獄外的家庭活動。1936年楊逵創辦《臺灣新文學》後染上肺結核，未曾治癒。在綠島惡劣環境當中，不斷掏空他的健康，楊逵在疾病與監獄的隔離語境中追求積極與樂觀。他無力抵抗體外的監獄空間，那他便將心力放在對抗超越身體內的小宇宙。針對家中成員的困境時，便化作醫病諮詢者。例如楊資崩長期的精神耗弱，楊逵和獄中醫生朋友討論，給予藥箋建議，並且分享自己疾病的經驗；家中的經濟困窘，他便發明製圖，希望家中申請專利來獲利；家中花圃發生土地糾紛，他便規劃出獄的美好藍圖，哺餵家人精神雞湯。楊逵藉由病體、精神與經濟等話題，突破空間阻隔的困境，獲得與家人的同步聯繫，聯結出家族同在的虛擬空間，達到自療與他療的效果。<sup>86</sup>

然而這些聯繫僅能靠每週一封三百字以內的書信，隔洋紙箋往來的接觸未若晤面來的真實。在12年的監獄生活中，楊逵和妻小有過幾次會面的機會。楊逵

<sup>84</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陽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200。

<sup>85</sup> 楊逵，〈勞動禮讚〉，原載於《臺灣文藝》第1卷第4號，日文版，1944.08。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164。

<sup>86</sup> 楊翠，〈楊逵的疾病書寫——以「綠島家書」為論述場域〉，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2004.06.19~20），頁9-13。

曾言：「那時，管理比較開明。囚犯家屬可以在寬敞的地方自由會見，囚犯只須登記，就可以整天與家屬相聚，也在那兒用餐。」<sup>87</sup>第二任處長唐湯銘偏向人治管理，由於綠島偏遠，家屬來一趟不容易，所以凡是能到綠島會晤的，基本上是不加以刁難的。

1954 年，高三畢業的楊建想利用救國團暑期活動到綠島三天的行程，趁機去看爸爸。結果沒想到旅程中綠島行程被取消，他不死心又去找高雄的親友幫忙，湊齊旅費才到綠島。這一待就是十五天，隊部讓楊建住在楊達管理的茅舍，而楊達晚上必須要回營舍報到。到了白天，楊達便穿過了包圍處部的大圍牆「萬里長城」的小門，來到營區外鱸鰻溝旁的菜圃找楊建，帶著他上山下海，度過一段綠島上父子天倫之樂的日子。<sup>88</sup>這種不像是在坐牢情境下的狀況，大概是因為鱸鰻溝上游的山區與「萬里長城」上都建有碉堡，而楊達所帶楊建走過的路線皆是在全景敞視下進行，管理人員自恃人犯是逃不出去的，所以在管理上較為寬鬆。

楊建回憶說：「爸爸每天都陪我在綠島的山上、海邊遊玩，都沒有人監視，父子都很快樂。」<sup>89</sup>綠島之行，盡是父子密切互動的欣悅筆觸，並未顯露任何在綠島被監禁的憂鬱色彩。推測應該是因為新生訓導處相對開放的空間，加上當時處長唐湯銘較人性化的管理，不刁難家人的相聚，還有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見到父親的喜悅，讓楊建未曾注意或是記憶不起那隱蔽卻存在的監視，以及新生訓導處生活陰暗、壓迫的一面。但楊翠卻提到這次見面其實給了楊建一輩子重大的影響：「雖然在綠島與父親度過愉快的半個月，然而，親眼見證了政治犯們的生活處境，在密集的思想感訓與勞動改造之間，度過漫長的晨昏日月，肉身的痛楚不說，思親之痛、失去自由之憾，更是如影隨形，縈繞不去。」<sup>90</sup>父親為例，見證了白色恐怖的冤獄現場，楊建對於文字感到恐懼，害怕隨同父親走上文字獄一途。回到臺灣之後，楊建決定放棄文組，轉考理工。<sup>91</sup>結果因為準備不及，大學聯考名落

<sup>87</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紀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7。

<sup>88</sup> 楊建，〈萬水千山，見父一面——一九五四年楊達、楊建的綠島父子會〉，《臺灣日報》，1997.08.11，27 版。

<sup>89</sup> 楊建口述，楊翠記錄，〈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黃富三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歷史》，頁 24。

<sup>90</sup> 楊翠，〈孤島的行旅〉，《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233。

<sup>91</sup> 楊建，〈萬水千山，見父一面——一九五四年楊達、楊建的綠島父子會〉，《臺灣日報》，1997.08.11，27 版。楊建口述，楊翠記錄，〈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黃富三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

孫山，第二年才重考錄取大同工專。

1957 年 10 月 17 日，楊資崩到達綠島與楊達會面，<sup>92</sup>直到 26 日這天登船離去。<sup>93</sup>在此之前，葉陶已經寫信告訴楊達，由於向電力公司借用的土地被催討，家中的經濟眼看要陷入危機，楊資崩情緒不穩，常與葉陶起衝突。葉陶想用婚事穩住楊資崩的情緒，並且通知楊達。<sup>94</sup>楊達一方面對葉陶下指導棋，不要影響年輕人自由戀愛的權利；另一方面，當楊資崩到時，他看出自己大兒子自卑，認為是為改變家境輟學而來。正好 10 月 18 日舉辦游泳比賽，楊達請彭康樂官將父子倆也排進賽程中。比賽中楊資崩擔心楊達身體，一邊游一邊看顧著他，而楊達也想藉著比賽告訴兒子他的身體健康。<sup>95</sup>之後兩人懇談，楊達鼓勵兒子從事文學工作，並且希望他能復學，重新建立自信心。<sup>96</sup>為了結婚成家的問題，1959 年 5 月 14 日楊資崩再到綠島尋求父親的開導。<sup>97</sup>

楊達其實不知道，白色恐怖籠罩著楊家，特務不時騷擾家中，親人走避，致使原本就不富裕的經濟雪上加霜，他的五個孩子沒辦法挺直做人，<sup>98</sup>這才是楊資崩真正自卑的原因。也許見到父親的喜悅，以及父親當面的殷殷期許，楊資崩答應了楊達的要求，而後去信告訴父親他想編寫臺灣抗日史。楊達很高興地幫他取筆名為「萌」，希望「理想之芽該萌發了」，認為第二代可以延續他的理想。<sup>99</sup>可是楊達無法驅逐楊資崩的自卑沮喪，楊資崩時常寄出消極的信。面對楊資崩的悲憂，楊達不禁自責於自己在家庭中的缺席，一邊藉由家書開導大兒子的心病，一邊尋求治療自己肺結核的藥方，不斷在醫／病的雙重角色中游移轉換。

可是楊資崩後來卻與葉陶發生激烈衝突，情緒失調，惹得楊達一度對資崩產

---

口述歷史》，頁 28。

<sup>92</sup> 楊達在新生筆記本《生活雜記》(1)中紀錄：「十月十七日——正在大運動場練習賽跑，老黃跑來告訴我說：『你的兒子來了！』……七八年不見了，……。」對照《綠島家書》1957 年 10 月 22 日楊達在給楊素絹信中提到「大哥在這裡很高興地玩了幾天」，推算楊資崩抵達新生訓導處應是 1957 年 10 月 17 日。楊達，〈父子游泳賽〉，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702-703。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36。

<sup>93</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36。

<sup>94</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34-35。

<sup>95</sup> 楊達，〈父子游泳賽〉，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702-703。

<sup>96</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36-37。

<sup>97</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112。

<sup>98</sup> 董芳蘭，〈父祖身影中找自己的臉——楊達與他的愚公世代（上）〉，《中央日報》，1997.03.22，19 版。

<sup>99</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47。



生失望的情緒。<sup>100</sup>不過楊達快速調整自己的心態，放軟姿態，繼續勸導楊資崩。楊資崩無法撕落「政治犯家屬」標籤，因失學而無法伸展理想、經濟困頓，又背負父親莫大期許的種種壓力中，生命不斷遭受挫敗。楊達出獄後，楊資崩依然無法完成父親的期望，最終在 1977 年，以一封明信片向楊達道歉，說他決定放棄文化事業。<sup>101</sup>然而放棄並未讓他的生命找到出口，他仍舊哀怨抑鬱，甚至到死前都推卸責怪是葉陶的偏心，讓他無法如同楊建有機會回到學校讀書，<sup>102</sup>無法脫離困頓魔咒的資崩，終而染上酒癮，死於酒精中毒。<sup>103</sup>

1956 年，廖文毅在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給國民黨政府帶來很大的震撼，擬定的政策中有一項就是派人滲透該組織。1958 年，國民黨政府想讓楊達到日本，滲透廖文毅的組織，故將楊達從綠島借提到臺北。關於楊達借提至臺北的時間說法不一，王麗華記錄楊達口述資料：「一九五九年，一度被送回台灣，軟囚於新生南路一幢屋內。」「兩個月後，被押返火燒島。」<sup>104</sup>但是楊建撰文回憶：

一九五七年我就讀於大同工專二年級，十二月某一天中午，吃過便當午休時，守衛老王忽然來到教室，遞一張紙條說會客室有一位來賓找我，隨後我來到會客室，一看，出乎意料之外地，會客室裡坐著兩個人，其中一人竟然會是我日思夜想、應該正被羈押在綠島的爸爸……（中略）到了一九五八年初農曆除夕前夕，什麼條件都沒談攏，我也已放寒假，於是爸爸請假五天和我回台中家裡……（中略）五天的假期一轉眼就過了，學校初五就要開學，爸爸的假期也到了，於是我和他一同回到台北，各自歸隊報到，不料沒幾天爸爸就被遣返綠島去了。<sup>105</sup>

<sup>100</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169-170。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454-457。

<sup>101</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58。

<sup>102</sup> 楊建口述，黃惠禎記錄，〈楊建先生訪談記錄〉，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509。

<sup>103</sup> 楊翠，〈家族斷離事件——1949 的一個斷片〉，《文訊》285 期（2009.07），頁 89-90。

<sup>104</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74。

<sup>105</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 版。

依楊建於 1999 年所言，從 1957 年 12 月起算兩個月，至 1958 年農曆過年後，楊達尚在臺灣本島，沒過多久就被遣返。但是在 2001 年和 2003 年楊翠與黃惠禎分別向楊建進行口述訪談，確認借提時間是在 1958 年。<sup>106</sup>楊翠也曾為這個問題論述過，以楊建的回憶記錄，佐以《綠島家書》1958 年 7 月 12 日的信函為證，確認提調日期為 1958 年 1 月底，而非王麗華記錄中的 1959 年。<sup>107</sup>筆者調閱楊達的〈逐月考核總結〉表，發現 1958 年 1 月至 4 月沒有評分與評語，該欄位寫上「該新生 47.1.19 至 47.4.20 調司令部公差」，於此確認楊達借調到臺北是在 1958 年。<sup>108</sup>

至於楊達的軟禁地點，也有著不一樣的說法。楊達自述是被軟囚在新生南路，<sup>109</sup>而楊建在 1999 年的《自由日報》刊文中，對於這個據點的描述卻非常詳細。他說：

我們越過中山北路三段從德惠街向東，來到新生北路三段，左轉向北沿基隆河岸直走約五十公尺，再右轉過橋，過了橋是一條不到四公尺寬的產業道路，來到距橋頭不過百來公尺，右側有一座白色單層木造獨立屋，面對著不遠處的圓山大飯店。<sup>110</sup>

後來在黃惠禎的訪談中，楊建直言是在榮星花園附近。<sup>111</sup>若以圓山大飯店、榮星花園為大標的看臺北市地圖，確實較接近新生北路附近。加上楊建已在大同工專就讀三年，對當地街道應該是比較清楚的。而且當時楊建寄住在酒泉街，依照每晚楊達會到楊建住處見面一事來判斷，新生北路距離楊建的住處比較近，也較方

<sup>106</sup> 楊建口述，黃惠禎記錄，〈楊建先生訪談記錄〉，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510。

<sup>107</sup> 楊翠，〈不離島的離島文學——試論楊達「綠島家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頁 421。

<sup>108</sup> 〈逐月考核總結〉，《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7。

<sup>109</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

<sup>110</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 版。

<sup>111</sup> 楊建口述，黃惠禎記錄，〈楊建先生訪談記錄〉，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510。

便每晚相見。

故楊達在 1958 年 1 月 19 日時，和另外一男一女一起從綠島借提到臺北，住在新生北路榮星花園附近的一棟獨立木造屋，由陳姓上校和兩個勤務兵看守，另有伙夫老張照料飲食。<sup>112</sup>楊達白天接受思想加強課程與理念溝通，並且不斷和特務幹員針對條件進行談判。特務要楊達利用聲望打進日本地下組織作反間工作，藉機收集內部資訊，並且輪流以功名利祿、剩餘刑期抵消等條件，恩威並施地企圖勸服楊達接受任務。

關於楊達是否接受了特務工作，後來的資料陳述各有歧異。王麗華在楊達晚年進行採訪，楊達口述如下：

某單位幹員來晤談，暗示將公開或偷渡送我到日本，做特務工作。我心想：能到日本也不錯，到日本後，要怎麼做，到時再看吧——

我就回答說：希望我兒子能同行，不然事隔多年，東京的街道恐怕也大半忘了，何況，已年過五十，腦袋有點糊塗了。<sup>113</sup>

王麗華認為以她對楊達的瞭解，楊達是個「不願被對方『踏死』，同時地無意『踏死』對方，更不會先『踏死』自己」的人，所以她判定楊達所言可信度高。<sup>114</sup>

當楊達借調結束回到綠島後，在獄中問過楊達當間諜心得的鍾逸人曾說：

接到消息時，他也很傷腦筋，心神不寧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想到臺灣的「解放」暫時無望，蔣幫既然要派他去日本，他便能離開綠島和臺灣，也等於掙脫枷鎖回復自由身。他在日本朋友很多，只要讓朋友們知道他已到了東京，再透過關係給北京方面知道，相信他們一定會派人跟他聯繫，安排他前往。<sup>115</sup>

<sup>112</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 版。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

<sup>113</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

<sup>114</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85。

<sup>115</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405。

楊達獄中所言，顯然是針對當時臺灣現況的評估，瞭解國民黨右傾路線是不容左派作法的，他的社會理想無法在臺灣實踐，所以他考慮是否藉由特務工作先暫離桎梏的現狀，待到日本之後再試圖進入中國。

張恆豪同時採用王麗華的楊達口述記錄，以及楊達的獄友鍾逸人之言，認為除了這些話都是楊達親自跟王、鍾二人所說，可信性極高之外，提出楊達性格是「不被教條綁死、伺機權變」，即使楊達確實接受了特務工作也不足為異。<sup>116</sup>

另外，當時得以和父親重溫父子之情的楊建回憶說：

其實，爸爸是有智慧的，他思慮縝密，他老謀深算，早已穿透當局的政治把戲，他料到他們不會答應自己的要求，而萬一他們真的答應了妻兒同行的條件，他還暗槓有第二、第三個條件會提出來，他說九年都過來了，只要剩下的三年平安挨過去，還他自由之身，能讓他自由發揮他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他還說十二年都已經耽誤了，還有很多未了的理想與任務要實現，總不能為了一時的榮華富貴，把時間浪費在替國民黨工作，違逆他一生最執著、最熱中於追求人道社會主義思想而奮鬥為職志。<sup>117</sup>

楊建之言透露出楊達對於時局相當清楚，也清楚自己的籌碼，如何趁勢而為達到最高效益。綜合楊建與鍾逸人的說法，楊達沒有無條件地配合特務工作的打算，當時他的盤算可能有三：第一是脫離監獄恢復自由，第二是帶著家人脫離政府的監視與控制，第三則是前往已實施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去實現他的政治理想。顯然楊達打算以配合的表象，獲取最大的自由。

有關楊達談判特務工作的條件，要求與之同行者的說法不一。楊達本身的說法是「希望我兒子同行」。<sup>118</sup>楊建在 1999 年撰文提到的是「妻兒同行」，<sup>119</sup>後來 2003 年接受黃惠禎訪談時，細言楊達提出妻子和五個孩子一起去，但政府只答

<sup>116</sup> 張恆豪，〈楊達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南方》2 期，頁 125。

<sup>117</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 版。

<sup>118</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

<sup>119</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 版。



應讓葉陶去，並說政府可以幫小孩們找工作。<sup>120</sup>鍾逸人則說楊逵是要求特務讓葉陶能和他一起去。<sup>121</sup>張恆豪認為鍾逸人和楊逵同被關在綠島，可說是歷史的見證人，佐證楊逵同時期獄友吳坤煌的說法，認為楊逵要求讓葉陶與之同行的可性度較高。<sup>122</sup>無論楊逵到底提出由誰同行，這次的談判最終破局。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兩方條件互不相讓，無法達成協議；二是楊逵認為的「因中日大勢已改變」；<sup>123</sup>三是按王麗華猜測，認為 1958 年八二三炮戰後，台美關係趨於穩定，國民黨便打消要楊逵當特務的念頭，或是另外尋得適合人選。<sup>124</sup>實際情形則已無法確定。

其次，談判時間長達數月。根據《綠島家書》1958 年 7 月 12 日信中所寫，「離開你們快要兩個月了」，楊建附註楊逵於 5 月間遣送回綠島，故計算在臺時間為四個月。<sup>125</sup>但筆者以〈逐月考核總結〉上紀錄楊逵於 1958 年 1 月 19 日至 1958 年 4 月 20 日出公差來計算，應該是實際上為三個月。陳上校讓楊逵回臺中與家人團聚時日也不過 5 天，無法湊齊一個月之間的落差。由於無法判定總結表上出公差結束之日如何認定，尚需要其他資料來證明楊逵被押返綠島的確切時間。

當初楊逵到達臺北時，在監視下到大同工專找楊建，楊建頗為意外並驚喜。畢竟距離上次到綠島看父親也已過了三年，而這一次竟然是在獄外相見。楊逵每晚都會到楊建住處，告訴楊建他每天和特務的斡旋內容。後來楊資崩得到消息，也趕來會見父親，父子三人甚至到北投遊玩。楊逵因為拘禁過久，突然重新感受自由的氛圍，狂喜萬分，又叫又跳，因此被打小報告，結果是陳上校將責任擔起來。<sup>126</sup>

在監視楊逵的日子中，陳上校跟他分享當特務的甘苦談，並表示自身也想脫離特務工作，但是他知道自己是逃不了的。所以陳上校的態度是同情楊逵的，給與楊逵極大的自由與信任，並且以利益交換為由建議上頭長官，讓楊逵常常和楊

<sup>120</sup> 楊建口述，黃惠禎記錄，〈楊建先生訪談記錄〉，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510

<sup>121</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405。

<sup>122</sup> 張恆豪，〈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南方》2 期，頁 123。

<sup>123</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4。

<sup>124</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85。

<sup>125</sup> 楊逵，《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頁 70。

<sup>126</sup> 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73。

建共處，也讓楊達在有人監視的情況下活動，還能投遞〈大牛和鐵犁〉至《東方少年》刊登。<sup>127</sup>最後談判破裂時，楊達面臨必須遣返綠島的情狀，陳上校甚至在過年期間陪楊達回台中，和楊達定下自動返回報到的君子之約。楊達也不負陳上校的信任，自動在五天後回去報到。<sup>128</sup>受到與自己不同立場的看守者照顧，和1949年被捕之初米少校一樣的情義相挺，更顯得受刑人與監刑人之間只是立場之不同，同樣對於國家制度與霸權有著不認同的心態。

這五天內，楊達重享天倫之樂。過年回家，葉陶對自己的丈夫展露溫柔的一面，同攜孩子一起出遊。不像他在《綠島家書》中表達的只能隔洋焦慮與自責，當下他可以真真實實得將他在獄中只能靠書寫傳達的父愛當面傳遞給子女，全家感到莫名的喜悅。<sup>129</sup>

之後的1960年2月5日至13日，<sup>130</sup>葉陶帶著二女兒楊素絹、小女兒楊碧到綠島。<sup>131</sup>在這幾天的探望中，葉陶借宿在民家，晚上才到營區探望楊達。<sup>132</sup>如同楊建到訪一樣，葉陶也未受到任何刁難，唐湯銘還特地為她辦了一場歡迎晚會。按照往例，晚會當天必定加菜加肉，紅標米酒觥籌交錯。大家酒酣耳熱之際，葉陶和女兒受邀上台引吭高歌「甜蜜的家庭」，並且讚頌當局的德政。<sup>133</sup>也許唐湯銘是位人道管理者，但畢竟他的職位背後代表的是國民黨政府，一個不可違背的霸權。鍾逸人曾提及，若是讓他的未婚妻面臨同樣要上台歌功頌德，她一定拒絕，而「這等於投下一顆炸彈，必然引起軒然大波，也會使我十分尷尬。」<sup>134</sup>因為無

<sup>127</sup> 當時楊達以「公羊」為筆名在獄外投稿了〈大牛和鐵犁〉，7月時刊登在《東方少年》第5卷第7期，成為他唯一在獄外發表的作品。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472。

<sup>128</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73。

<sup>129</sup>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達〉，《自由時報》，1999.08.29，37版。

<sup>130</sup> 根據《綠島家書》1960年2月6日信中所寫：「媽、妹們昨天來了。」2月13日則寫「媽、妹們今天回去了。」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158-159。

<sup>131</sup> 楊達在1983年口述紀錄中只提到二女兒素絹，但是在《綠島家書》1960年2月20日中，楊達是指明給「陶、絹、碧」，表示1983年楊達忘記提到小女兒。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160。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77。

<sup>132</sup> 楊達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達回憶錄筆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77。

<sup>133</sup> 楊建，〈萬水千山，見父一面——一九五四年楊達、楊建的綠島父子會〉，《台灣日報》，1997.08.11，27版。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387。

<sup>134</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387。

論新生訓導處的晚會是如何地賓主盡歡，都無法改變這裡是一處思想改造的監獄之事實。長官的邀請只是表面的客套，監獄的肅殺之氣仍然被隱藏在表面的平和氣氛中，在監獄久待者均瞭解這潛藏的危機。這亦表示，如果葉陶當時選擇拒絕，所謂的「引起軒然大波」有可能會帶給楊達麻煩。

葉陶早期與曾投身社會運動，二二八事件時也曾隨著丈夫進出監獄，一度面臨生死關頭，對於丈夫被囚於綠島之因與當下情勢也了然於心，對監獄的生態一定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她也明瞭晚會的舉辦和處長的邀請，代表著宣傳監獄人道對待犯人的假象。加上葉陶本身就是一位口才佳的社會街頭運動家，若只是鼓動一張嘴就能獲得安全，她為何不做？因此從葉陶配合的姿態可以推知，她的讚頌謝辭僅是一種順水推舟。只是在兩人孩子的心中，難免比較起他們在外面受盡生活困頓、遭人白眼相待的日子，難以理解楊達在獄中不愁吃穿，又受到難友與管理階層尊敬的情狀。<sup>135</sup>

綠島會面時，葉陶不斷和楊達交換家裡的重建計畫，畢竟楊達出獄在即，家人均期待他的歸來，楊達本身也對未來充滿樂觀與期待。《綠島家書》中，葉陶與楊達交換想法的均是家事，包含資崩的工作、媳婦的生產、經濟的問題，這也是在楊達家書中最重要議題。這次獄中與家人的接觸後，楊達於 1961 年 4 月 6 日刑期屆滿出獄，回到家庭的懷抱之中。

---

<sup>135</sup> 楊建口述，楊翠記錄，〈楊建先生訪談紀錄〉，黃富三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歷史》，頁 28。

## 第四章 楊逵在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

### 第一節 創作與編輯

文學為人類心靈思想活動的具體呈現，獄中作家可能為了避免獄內文字迫害而選擇棄筆，也有像楊逵這般持續以文字進行各文類的書寫者。在監獄特殊語境之中，一言一語均受監控，不像獄外尚有不說話的自由空間。一旦形成自我規訓之後，自然也會規避涉及批判、理念性的言論，而以各種文類與家人形成跨境溝通、自我內心的踽踽獨語，或是利用大量象徵投射現況與憤懣，最後構成特殊的監獄文學。

對於楊逵來說，寫作不僅是他社會運動的文宣，也是他心靈運動的範疇。綠島時期楊逵完成了 40 篇散文、4 篇小說、13 部劇本、14 首詩歌、3 本謠諺稿、1 本歌譜稿，創作文類顯然以劇本、家書、隨筆雜文為主，另有歌謠創作與民間文學採集。不若他在日治時期大量創作小說、文學評論等具有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作品，與其當時推動新文學運動與社會運動有關；<sup>1</sup>楊逵於綠島時期多創作純文藝作品，由於受到自我規訓性質的影響，並且為了達到自我療癒效果，敘事治療的書信與象徵、寓言之手法，在他的作品中不斷出現。

將綠島十年所見人事作為書寫題材的楊逵，書寫獄中生活的手法偏向客觀瑣事敘述，極少透露內心世界。<sup>2</sup>不少其他的監獄文學作品，在寫自己牢中感受時呈現時空靜止的狀態，例如柯旗化：「終日靜似山中小禪寺／達摩法師是我老前輩／面壁不語一天二十四小時／春夏秋冬三百六十五天。」<sup>3</sup>詩中意象，時間在面壁的空間中呈現停滯，人像畫面孤獨而單薄。相較之下，楊逵書寫出的卻是充滿群像熱鬧的獄中生活，時間和空間是流動的。例如〈抬紅土記〉、〈上山砍茅草〉、〈園丁日記〉都是記錄和難友們一起出公差，合力完成的經過；〈季節風侵襲之下〉、〈颱風小姐〉、〈捕鼠記〉則是記錄楊逵和難友們一起與大自然環境抗爭的過程，多為客觀的寫實書寫。甚至在〈捕鼠記〉文末邀請大家一起思考如何對付狡

<sup>1</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頁 103。

<sup>2</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135。

<sup>3</sup> 柯旗化，《明哲詩集／鄉土的呼喚》（臺北市：笠詩刊出版社，1986.05 再版），頁 72。



猞的大鼠，完全符合楊達喚起讀者／難友們的經驗共鳴和參與的寫作目的，不僅讓難友讀者共享相同的經驗，也試圖讓讀者進入文章內動腦回饋產生互動。

學者林淇濇（向陽）早在 1987 年，即以綠島家書的文本內容提出楊達是樂觀主義者。<sup>4</sup>而後其他論述者在提到綠島時期相關作品時，均不脫離「樂觀」的特質。黃文成認為楊達在綠島時的作品充滿極度的陽光性，除了具有他樂觀積極的特質外，亦有不同於其他監獄文學悲傷色彩的「豁達感」，呈現他面對生命困頓時的理智與對生命的熱情。<sup>5</sup>除此之外，他會試圖打破年齡的刻板印象，填入熱愛生命的精神世界，或利用陽光與綠意驅逐監獄陰暗的氛圍。楊達入獄時的年紀為 44 歲，移至新生訓導處時 46 歲，直到 56 歲才刑期屆滿而返家，在獄中常被視為年紀較長的一群。楊達給獄友的形象常常是一名瘦弱老人，連值星官也為此常常叫他做輕公差，他感到很不服氣：「五十來歲就算老了，這樣的觀念我是不能接受的。」<sup>6</sup>所以在寫作時會不時出現不服老的言論。

例如〈談青年〉中楊達先用人類的平均壽命已經提升的統計數據，以及科學衛生的進步能持續延長人類壽命，反駁「四——五十歲是老年，人生五十就算完了」一說，再提不少五、六十歲的人們仍充滿活力地為自己安排學習與生活，反倒是二十幾歲的人變成了「年輕老太婆」。<sup>7</sup>〈永遠不老的人〉中回憶當他二十幾歲時，和年紀比他大的余姓朋友為了宣傳民族思想，到處翻山越嶺，卻不見余姓朋友的倦態。此人直到七十歲才過世，但在楊達心中留下了永遠不老的形象，所以他認為身體和精神是可以被鍛鍊的，言下之意年齡並非是問題。也許是這位余姓朋友的故事，楊達在小說〈才八十五歲的女人〉中，創造出一個八十五歲卻能條理地操持家務的老婦人，揹柴爬山也能健步如飛，並且用「才八十五歲 nia nia」一句話，生動勾勒出一名精神矍鑠的老嫗樣貌，讓旁人都感到精神振奮。<sup>8</sup>楊達一再強調永不放棄的精神層面重於年紀上的數字，其實也從他一再參加一堆年輕人

<sup>4</sup> 向陽，〈陽光一樣的熱——讀楊達先生《綠島家書》〉，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23。

<sup>5</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139。

<sup>6</sup> 楊達，〈輕公差〉，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98。

<sup>7</sup> 楊達，〈談青年〉，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4），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34-335。

<sup>8</sup> 楊達，〈才八十五歲的女人〉，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7），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八卷，小說卷（V）（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0.12），頁 233。

參與的馬拉松與五千公尺長泳比賽中獲得了驗證。

此外，楊逵的詩歌與童謠創作充滿樂觀、夢想和希望的寄託，希望通常藉由象徵手法出現。例如：〈明年還要更好〉以小寶寶做為未來的希望；〈我要克難一把琴〉則是將一家團聚的希望寄託在琴聲中，「雞啼天大明」即是天亮代表光明的未來，〈黎明曲 公鷄叫〉末句「清爽的早晨，光明照耀，花開心也開」<sup>9</sup>也是相似的概念。〈園丁日記〉中則是以「樹」藉物寓理：「在火熱的小島上，我們都期望著一點綠蔭」，「這個工作一開始便喚起了大家的美夢」，「這個還有希望嗎？還有一點希望」，「我們不能讓颱風的摧殘來破滅了大家的美夢」，<sup>10</sup>通篇眾人話題皆環繞著移栽的大樹，以此寄託著眾人的希望和美夢。

綜合前述，不難發現楊逵的創作之所以樂觀積極，在於他筆下的空間與實際空間出現了對比的映照。監獄建築結構的營舍、高牆，獄內的編制與活動，以及監獄所在的綠島具有離世而原始性質的地理位置，均是以囚禁與剝奪自由為主而具體存在的空間。這些符徵在進入文學創作時，經過作者的挑選後製碼，進而構築出作品中的世界。當其他受刑人運用牢房、小窗、鐵柵、枷鎖等字眼，呈現出陰暗、絕望、束縛、死亡的意象時，楊逵運用的卻是綠樹、農園、陽光、啼叫公雞的島上風光，營造出寬闊、活躍、希望的想像。這樣的空間感有別於一般讀者對監獄既有的認知，也有別於其他的監獄書寫。綠島的空間在楊逵的虛擬世界中，被轉譯成正向的圖像。

在時代的壓迫下仍能夠咬牙持續前進，往往是因為有個希望或夢想。楊逵的作品不乏樂觀精神，更在摹寫苦痛的同時給予讀者理想的未來藍圖，才能有動力向前。楊逵慣以屢遭失敗也絕不氣餒的精神作為寫作中心思想，傳達遇到挫折時仍抱持本身／內心不屈服的態度，因為即使有美麗的梦想，但沒有堅強的意志力如同沒有了動力，也完成不了美夢。為了產生讀者共鳴，用詞往往是直白而不拐彎抹角，例如〈人生〉、〈學習〉、〈工作〉明明是詩，幾乎不用象徵、轉化等修辭，或是運用表態句型修飾遣詞用字，反而多以敘事句行文。敘事句的結構確實較明快直觀，淺白的句子連教育程度低的人都能看懂。楊逵曾自言：「作家的任務就

<sup>9</sup> 楊逵，〈黎明曲 公鷄叫〉，1959年作，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頁460。

<sup>10</sup> 楊逵，〈園丁日記〉，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37-344。

是要塑造這種不斷打拼、不斷追求光明的動力形象」，「作品中主角的意識清楚，意志堅定，但並不是不會失敗，只是在失敗中不喪志。」<sup>11</sup>他認為人生並非順利的，但就是要一步一步克服困難，才能走向理想。因此不屈不撓的精神是楊達有意安排，因為這是作家的任務。

另外，由於監獄特殊的隔絕語境，對受刑人來說時空會出現停滯的狀態，通常會停留在人生中美好的過往，以跨越時間的方式，尋求心靈桎梏的解方。楊達筆下最美好歡樂的時光，便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例如〈我的小先生〉<sup>12</sup>中提到次女楊素絹充當小老師，教他們夫妻倆學國語的種種趣事，親子間溫馨的情感流動，在他筆下都變成一盞盞透著溫潤暖光的燭火，在《新生活壁報》上照亮受刑人陰暗的心房。楊達除了追憶美麗過往，也會將家人報告「二兒子戒菸」、「二女兒會打工賺十塊錢」等家中瑣事的書信，以輕鬆的筆調將親情的傳遞視為好消息刊登在《新生月刊》上。例如〈太太帶來了好消息〉一文，<sup>13</sup>企圖藉著分享家庭的生活，喚起並鼓舞難友對家人的一些念想。

綠島時期楊達的作品多發表在《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楊達也是這兩份刊物的編輯。由於作品發表除了可供檢視思想，也可疏導教化，所以新生訓導處便成立了「壁報社」與「新生社」負責編輯前述兩份獄內刊物，連同「助教室」，能在此三處出公差都是被公認為文化人士。為了鼓勵寫作，新生訓導處也舉辦寫作比賽。<sup>14</sup>有關《新生月刊》，相關研究如學者黃文成道：

臺灣獄政制度中，有一份專屬於受刑人的刊物。這份刊物本名為《日新月刊》，由警大負責出刊，民國六〇年代後改為《新生月刊》，由法務部矯正司負責接收出版相關業務；民國九十三年《新生月刊》再度改為雙月刊

<sup>11</sup> 楊達口述，〈我要再出發——楊達訪問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166。

<sup>12</sup> 楊達，〈我的小先生〉，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01-305。

<sup>13</sup> 楊達，〈太太帶來了好消息〉，首次發表於《新生月刊》（1956.04），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23-330。

<sup>14</sup> 楊達口述，譚嘉記錄，〈訪台灣老作家楊達〉，原載於《七十年代》總第154期（1982.1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30。

形式。月刊雜誌裡文章的作者，為全臺各獄所受刑人創作之作品，也因為如此，《新生月刊》所收錄文章的內容，有著極為統一的屬性。<sup>15</sup>

根據國家圖書館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之記載，《新生月刊》原刊名為《日新月刊》，1971 年 10 月更名為現刊名，內容為受刑人心得與文藝作品。<sup>16</sup>可見黃文成便是與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上同一筆。當中「由警大負責出刊，民國六〇年代後改為《新生月刊》」，與楊達所處的 1950 年代綠島獄中刊物發行單位完全不符，可知該資料與新生訓導處之《新生月刊》無關。

筆者另外查詢到一筆年代與《新生月刊》相近之資料。1951 年 3 月，曾在南京《救國日報》擔任總編輯的成鳳彩與人合辦新生出版社，向臺北市政府提出申請《新生月刊》的登記證，其發行旨趣為「宣傳反共抗俄」，並且有 1000 個基本訂戶。但是 5 月 14 日內政部回覆依照〈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用紙節約辦法〉之規定，將申請駁回。<sup>17</sup>從發行人與申請地為臺北市，最後被撤銷登記來看，顯然亦與新生訓導處之刊物無關。

目前可尋找到新生訓導處所發行的《新生月刊》<sup>18</sup>，見於楊達之遺物，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其內容已被整理出版《楊達全集》。由於這一份《新生月刊》是楊達利用月刊的封面，將自己在此發表過的作品裝訂的一本冊子，除此之外缺乏其他史料，所以其編輯手法與選編的內容無法探究。但是有關《新生月刊》之訊息，尚可從稿約頁讀取一二：

出版者：八七八五部隊

編輯者：政治處

<sup>15</sup>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頁 412。

<sup>16</sup>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來源：[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detail.jsp?sysId=0006496300&dtdId=000075&search\\_type=detail&mark=basic&la=ch&checked=&unchecked=0010006496300,0020006495249](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detail.jsp?sysId=0006496300&dtdId=000075&search_type=detail&mark=basic&la=ch&checked=&unchecked=0010006496300,0020006495249)，2019.12.02）。

<sup>17</sup> 〈新生月刊登記撤銷案〉（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藏，1951.04），檔號：0070/T1010/R20015。

<sup>18</sup> 楊達，《新生月刊》（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1955.04）。此刊為楊達將他在綠島時期刊登於《新生月刊》不同卷期的六篇作品重新合製，再用《新生月刊》的書皮作封面，並非是《新生月刊》的原刊物。



通訊處：綠島台字第〇一五七信箱卅卅號

稿約

- 一、 本刊以闡揚 國父遺教 總統言行，揭發共匪賣國，俄帝侵略之罪行，暨推廣時事瞭解，加強訓練效能，充實精神生活為宗旨。
- 二、 徵稿範圍：
  - (一) 論著
  - (二) 文藝（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
  - (三) 譯作
  - (四) 時事評述 團生活報導（包括處訊、受訓心得、自我檢討）
- 三、 論著、小說、戲劇以五千字為限，譯作、散文、生活報導勿超過三千字，詩歌以精短為宜，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例。
- 四、 文稿須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五、 文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所屬單位番號，發表時筆名聽便，譯稿須註明原稿出處。
- 六、 文稿登載後，由本刊致送薄酬三千字以下新台幣一至十三元，三千字以上每增加一千字增加一元，舊詩以首計算，兩首以下一至四元，新詩以行計算六至三十二行二至六元，特約稿及特殊價值稿件不在此限。
- 七、 本刊對文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八、 官兵來稿請逕送政治處，新生稿件請各隊指導員彙轉。

國防部軍中報刊登記證（45）昇晨新字第〇八〇二號<sup>19</sup>

稿約第一點的「揭發共匪賣國，俄帝侵略之罪行」，昭示《新生月刊》的宗旨與反共思想教育有關。其次，從「推廣時事瞭解」與徵稿範圍的「時事論述」，並致送稿酬以鼓勵踴躍投稿，可知新生訓導處藉此檢視政治犯的思想活動。

<sup>19</sup> 楊達，《新生月刊》（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1955.04）。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文學館文物典藏查詢系統》（來源：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tl\\_collectionsweb/GalData.aspx?GID=MZMNMRMGMNMD](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tl_collectionsweb/GalData.aspx?GID=MZMNMRMGMNMD)，2020.01.23）。

《新生月刊》的稿酬對於政治思想犯來說，無疑是一筆重要收入。因為日常用品、藥品是要自己花錢支付的，如果家境尚好，家裡會寄來費用；但如果家裡經濟窘迫時，很多人得依靠自己想辦法。因此，對於獄中的知識分子來說，《新生月刊》的稿費有如甘泉。胡子丹回憶：「在綠島三分之二的日子，我是有收入的，『助教』月薪十五元『新生券』（等值新台幣，僅限於處內流通。）新生月刊和壁報的稿費每月兩三篇也有十元左右。小吃部的陽春麵五毛錢一碗，『香蕉』牌香菸八角一包。」胡子丹以當時新生訓導處的物價，來比對其每個月兩三篇文章便得十元稿費，確實算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獄中因病而需購買藥品的楊達，很常在家書中請家人寄錢或其他藥品物資，甚至有次要得急了，便叫家裡把古書賣掉讓他能夠買藥吃。<sup>20</sup>受到獄中書信字數規定的限制，楊達曾想和長子楊資崩討論的問題投稿到《新生月刊》上，在對資崩提及這個計畫時說：「每月又可以得到二十元前後的稿費，一舉兩得。以後零用錢不要寄來，你也該用那些錢去訂報刊、買書本。」<sup>21</sup>可見楊達能夠在獄中創作不輟，民生問題有時也變成一種動力。感到捉襟見肘時，楊達也體諒家人，希望能自己另闢賺錢蹊徑：

我曾鞭策自己疲乏的腦筋，想寫些故事向外投稿，這是我唯一可能弄到錢的辦法，我們指導員也答應可以替我辦理了，不過要向外投稿的手續煩難得很，有一位朋友說他曾在自由談發表的一文，是經過一年多時間才達到目的的。

22

可見當時獄外投稿發表並非不行，只是其過程非常艱難。無怪乎在綠島服刑被借提至臺北時，楊達能以「公羊」為筆名，將〈大牛和鐵犁〉投稿至《東方少年》刊出，這也成為他當時唯一在獄外發表的文章。

獄中另一個可以發表文章的地方便是《新生活壁報》。當時《新生月刊》和各大隊的「壁報社」屬於新生訓導處的文化組織，壁報的內容除了文字稿件也需

<sup>20</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82-83。

<sup>21</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59。

<sup>22</sup> 楊達，《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達心事》，頁 83。

要插圖，畫家歐陽文曾口述：「政治處知道我是美術教員，先是讓我去牆上寫標語，後來又成立一個壁報社，把楊達調去寫文章，我負責畫壁報。」<sup>23</sup>陳英泰對此也有記憶：「編寫壁報被認為是一重要的教育工作，由各隊調一兩位有學問的人在壁報室編寫，有名的台灣本土文學家楊達也是主編之一。」<sup>24</sup>唯獨胡子丹在其回憶錄中，曾針對陳英泰所記有所辯駁。雖然胡子丹不否認楊達在《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刊載不少文章，但是他認為當時楊達幾乎在生產班，沒有被派過其他固定工作，而且學習國語寫作的狀況，日文文法居多，很多注音符號拼寫，「這可能是他沒有被派到壁報社或《新生月刊》的原因。」<sup>25</sup>胡子丹又自言：「在綠島期間，我和他未曾同過隊，也未曾同過工，但有過無數次的『狹路相逢』，時地不拘。」<sup>26</sup>胡子丹未曾與楊達同隊同工，僅以楊達的文筆作為是否擔任編輯工作來定論，有待商榷。

其實楊達在新生筆記本的手稿上寫有一篇〈貧血的「新生月刊」〉，首句便提到：「奉命擔任『新生月刊』的編排，這一期已經是第四本了。」<sup>27</sup>由此判斷，陳英泰所言無誤，楊達並未因為中文遣詞用字能力較差，而被排除在文化工作之外，並同時參與了壁報和月刊的編輯工作。相對地，以胡子丹所言楊達的中文能力較弱的情況下，仍被委以月刊的編輯工作，顯見新生訓導處是借重楊達的作家身分，以及他豐富的編輯刊物經驗。只是目前礙於史料的貧乏，而無法研究楊達的編選原則。

<sup>23</sup> 蘇振明、蔣萊春、林昌華，《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頁 79。

<sup>24</sup>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市：唐山，2009.12），頁 303。

<sup>25</sup> 胡子丹，〈憶綠島的文青們（上）〉，《中時電子報》2018.10.24。（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4000850-260115?chdtv>，2019.07.16）

<sup>26</sup> 胡子丹，〈憶綠島的文青們（上）〉，《中時電子報》2018.10.24。（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4000850-260115?chdtv>，2019.07.16）

<sup>27</sup> 楊達，〈貧血的「新生月刊」〉，原稿為新生活筆記簿「生活雜記」（1）之手稿，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99。

## 第二節 謠諺的採集

楊逵過世之後，家屬從遺物中尋獲綠島時期的一本歌譜集與三本謠諺稿，謠諺稿中收錄了非常豐富的諺語、歇後語、童謠、民歌。《楊逵全集》編輯團隊請莊永明先生判定，針對謠諺稿部分有以下說明：

楊逵之謠諺稿包括「諺語（歇後語）、童謠、民歌」，應以採集成分居多，尤以諺語、歇後語和「七字仔」（民歌），皆屬民間相傳。

這些謠諺稿應屬個人記憶與「難友」相告知地方民間俗語念謠，並無創作成分。<sup>28</sup>

由此可知，楊逵在獄中進行民間文學的採集，採集對象是來自大江南北的難友們，採集項目則是針對民間的口傳文學部分。除了諺語、童謠、民歌之外，各地人民生活樣貌的四句聯也收錄不少。

此三本謠諺稿內的歌謠與歌譜集中民歌的性質略有不同，為了避免兩者混為一談，以下將謠諺稿中採錄的民歌稱為「歌謠」，並在此先說明謠諺稿的歌謠之定義，是指講唱文學這種介於唱與說之間的文體，也可稱為說唱文學。鄭振鐸定義講唱文學的組成是說白兼具唱詞，散韻交雜，半唱半詠。<sup>29</sup>歌謠的範圍很廣，若從音樂性質來看，包含一般民謠、宗教歌謠、戲曲歌謠、童謠、民間唸謠等等。<sup>30</sup>楊逵謠諺稿中的歌謠主要是民間的口謠、唸謠。這些歌謠因為博採的關係，採錄過程出現重複抄寫的現象，例如「一叢好花是玉蘭」，分別寫在〈諺語、童謠、民歌〉的第一本與第二本。<sup>31</sup>也有同一題目卻有不同版本者，例如楊逵便採集到了兩種版本的〈月光光〉，第一首為：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秀三藏，  
三藏經，挑竿真，竿真浮，踢得牛，

<sup>28</sup> 彭小研主編，〈《謠諺卷》版本說明〉，《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XV。

<sup>29</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04 一版十刷），頁 10。

<sup>30</sup> 簡上仁，《臺灣民謠》（臺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09），頁 20。

<sup>31</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30、95。



牛一走，踢得狗，狗卜吠，牽老爸，  
來吃飯，飯未煮，卜吃米，米未工——，  
卜吃雞，雞未剖，卜吃韭菜，韭菜未□，  
卜吃老婆腳瘡平。<sup>32</sup>

第二首的內容為：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塘  
南塘未得過，拉貓來責罪，責幾枝，責三枝，  
一枝抗（gon）狗，一枝抗豬，一隻抗死貓仔之。<sup>33</sup>

〈月光光〉是首流傳非常廣泛的童謠，傳唱的範圍遍及廣東、廣西、江西、福建、臺灣，發展成粵語版、客語版、閩語版、潮州版、福州版等。<sup>34</sup>黃彥菁曾整理多本童謠專書所收錄的〈月光光〉，<sup>35</sup>筆者比對後，發現楊達所收錄的〈月光光〉未列入其中，可見〈月光光〉尚有未被挖掘的版本，民間文學的多樣性由此可證。

其次，謠諺稿的內容以諺語與童謠居多，一般歌謠數量也不遑多讓。其中收錄不少呈現生活樣貌的歌謠。例如搖籃謠「搖 e 搖，一暝大一尺」<sup>36</sup>流露母親期盼孩子健康長大的親情。月令類謠「正月正」，<sup>37</sup>亦可稱為歲時歌，細數每個月份農作物與農家生活的樣貌。婚慶類謠如：「眠床四角，蚊帳四角，新娘笑笑，子婿 ka lian pak」，<sup>38</sup>用來打趣一對新人，呈現婚慶的歡樂氣氛。生活類謠「天烏雨就到，guang ang 在外頭，雖是別人的子，却掛在我的心肝頭」，<sup>39</sup>看到天色暗

<sup>32</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2。

<sup>33</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8、84。

<sup>34</sup> 黃彥菁，〈台灣客家童謠以〈月光光〉起興作品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20-24。

<sup>35</sup> 〈月光光〉版本的詳盡內容與論述，請參照黃彥菁，〈台灣客家童謠以〈月光光〉起興作品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sup>36</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84。

<sup>37</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00。

<sup>38</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99。

<sup>39</sup> 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89。

下起雨，別人的孩子在淋雨，忍不住為他擔心了起來。愛情類謠「韭菜開花一枝香，土紙落水張張洋，阿娘勸哥著識想，無 tan 憊心追別娘。韭菜開花葉下麻(mua)，葛藤開花罩過山，阿□愈走娘愈看，枉費小娘愿心肝」，<sup>40</sup>生動地傳達女子擔憂心上人移情別戀的心情；「乞食行到 wua 門 ki，千金小姐 sut 目矢，目矢挫落 pon kon 底，pon kon 打破病想思。思想致病十分重，仙祖派藥也無采工，愛卜千金做我某，我的病快輕鬆。」<sup>41</sup>則是逗趣地呈現乞丐暗戀千金小姐，相思成病，幻想有機會和千金小姐共結連理。

另外還有充滿鄉土味的童謠，勾勒兒童念謠的趣味性。例如：

火金姑，姑阿姑，姑您阿姨來吃茶。

茶米香，茶米□，□大姪，做媒人。

大房人剖豬，二房人剖羊，撲鑼撲鼓娶新娘。

新娘揀紅花，瓠仔叢生金瓜，金瓜著狗殺，織子與換土殺，

土殺 pu pu 跳，龜換茄，茄結種，我生你。<sup>42</sup>

以及：

龍眼家，秀紅蝦，秀月半，銀針咬銀線，

銀線板，板板搖，搖幾蕊，搖二蕊，

一蕊 ka 落土，一蕊 ka 落水，

叫姑去，姑無去，叫嫂去，嫂無去，

老婆仔去起來，姑也愛，嫂也愛，

開後壁門剝齊菜。<sup>43</sup>

<sup>40</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20。

<sup>41</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39。

<sup>42</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5。

<sup>43</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22。

以這兩首童謠為例，起頭是動物名稱，也是童謠常見的起興手法。孩童常於田野玩樂間戲耍動物，在玩耍過程中加入童趣幻想。童謠是孩子們學習說話的其中一種方式，將生活素材加入便可成為趣味性的民間口說教材。因為讀來對句押韻，對孩童來說也是語言遊戲。例如數字趣味謠「第一松，第二松，第三狗屎龍」，<sup>44</sup>讀來音韻有致，具有節奏性。臺灣創作童謠知名作曲家施福珍先生認為，童謠的創作必須要口語化，節奏必須簡潔活潑，旋律基礎應以建立在西洋古典樂的和聲，最後必須要富有臺灣鄉土的傳統音樂精神，歌謠才能令孩童琅琅上口。<sup>45</sup>這與楊逵強調通俗簡潔、廣泛流傳的民間文藝概念有著相同的方向。

從以上楊逵記錄謠諺的用字來看，可發現他使用了大量的假借字。例如〈韭菜開花一枝香〉的「土紙落水張張洋」，「洋」應是「溶」的同音字，楊逵只是借音記錄。另一方面也會借助臺灣羅馬或日語的拼音系統，例如：「目矢挫落 pon kon 底，pon kon 打破病想思」，「搖ア搖，惜ア惜，イーイー搖，イーイー惜」，<sup>46</sup>又如〈月光光〉的「卜吃米，米未エ」，「エ」是日文的片假名。可見楊逵在采錄時注意到需保留語言原始發音。假借字雖然會導致閱讀的困難性，可是謠諺早已廣傳民間，植入人民生活，只要借字讀音便容易喚起共同的記憶。

事實上，楊逵重視民間文學並非從綠島獄中開始。早在日治時期，他便已經採取相關的行動。此外，由於三〇年代臺灣話文論戰影響所致，文藝工作者紛紛投入民間文學的採集活動，不少報刊雜誌在編載刊物時，都會蒐集刊載俗諺歌謠。例如《南音》開闢「臺灣話文嘗試欄」，藉著考據漢字音義造新字，和採集歌謠諺，證明臺灣話文的可行性。<sup>47</sup>《三六九小報》和《風月報》收錄非常多男女情思、婚姻家庭、人生感悟、勸善警世等歌謠，貼近底層心聲，是閩南語歌謠收錄最豐富的報刊。<sup>48</sup>當時，楊逵的《臺灣新文學》也編採民間文學，而且種類甚繁，除了閩南語歌謠外，尚有民間傳說、童謠、童話、流行歌等，而且以閩南語的居多，除了是最能貼近民眾生活語言之外，也是臺灣話文論戰之後的產物。<sup>49</sup>至於

<sup>44</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93。

<sup>45</sup> 簡上仁，《臺灣音樂之旅》（臺北市：自立晚報，1988.06），頁 73。

<sup>46</sup>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1。

<sup>47</sup> 楊麗祝，《歌謠與生活：日治時期臺灣的歌謠採集及其時代意義》，頁 117

<sup>48</sup>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臺北市：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20），頁 190-270。

<sup>49</sup>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頁 175。

李獻璋編纂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可說是集三〇年代臺灣民間文學之大成，從臺灣文藝協會幫忙發行，臺灣新文學社協助販售，賴和為之提序來看，這本書受到當時知識分子的重視。學者楊麗祝認為這本書，「反映了臺灣知識份子從事歌謠等民間文學的采集，除了文意、民俗的目的之外，大眾教育也是重要的動力。」<sup>50</sup>楊達不僅參與販售《臺灣民間文學集》，更在主編的《臺灣新文學》刊登出版廣告文加以推薦。

戰後初期，楊達採集民間文學的活動，也記錄在他所編輯的《臺灣文學叢刊》。該刊除了編收北京話文、日本作品中文譯本的作品外，還收錄臺灣民謠〈農村曲〉，以及楊達自創的〈黃虎旗〉、〈却冀掃〉、〈上任〉、〈生活〉、〈不如豬〉、〈勤〉、〈營養學〉等臺灣話語民謠，將臺灣文學立基於臺灣經驗的題材。<sup>51</sup>大量的採集活動卻是在綠島服刑時僅見的，楊達在〈談諺語〉、〈諺語與時代〉、〈諺語四則〉、〈半罐水響叮噠〉四篇文章中以諺語為論述主題，認為諺語是反映民眾當下心聲與批判的紀錄，具有時代性與普遍性，所以從諺語中可以瞭解臺灣人的歷史，與當時人民奮鬥的足跡。這類文章常常是楊達藉由諺語說出一段臺灣人生存搏鬥的紀錄，例如「王爺公無保底，害死蘇有志」，以噍吧哖事件蘇有志支持余清芳等人的抗日運動，最後因活動失敗牽連而死的歷史，說明盲目暴亂的革命運動不可取，這些經驗應被吸收，成為組織建立與科學思想的警惕。<sup>52</sup>另外則是活用諺語來指出某種社會現象，例如「了錢生意沒人做，斬頭生意世界走」，說明民生凋敝時，人民以生命作為代價鋌而走險，只為了生存。尤其在日治時代，這則諺語普遍流傳，人民生活相當艱苦。<sup>53</sup>

楊達在獄中亦曾撰文論道：「諺語是民眾對某項事物的集約表現。」意指諺語其實是民眾共同想法的產物。又說：「它很少會受到宣傳與言論統制的影響，除了所宣傳的確有現實的根據。由事實，我們可以這樣確言。」<sup>54</sup>不斷地提出諺語是活的且能反映歷史事實，絕不是當政者嚴禁就能封口的。例如〈諺語四則〉

<sup>50</sup> 楊麗祝，《歌謠與生活：日治時期臺灣的歌謠采集及其時代意義》，頁 140-141。

<sup>51</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達與中國的對話》，頁 176-177。

<sup>52</sup> 楊達，〈諺語四則〉，首度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4.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75-276。

<sup>53</sup> 楊達，〈諺語與時代〉，原題為〈諺語的時代性〉，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5.1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1-292。

<sup>54</sup> 楊達，〈諺語與時代〉，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0。



所舉諺語例子，皆是日治時代殖民者統治下臺灣人民的心聲。他在附錄中提到：「這四則諺語連貫起來，可以讓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台灣人民的民族性，也可以使我們體會到，日據五十年中臺灣人民的心弦是怎麼樣的了。」<sup>55</sup>楊逵強調諺語有歷史、人民心聲、真實、民族性的性質，其苦心孤詣應該與他少時所看到的《臺灣匪誌》有關。

楊逵晚年經常提到，日本人所寫的《臺灣匪誌》將武裝抗日的臺灣人寫成土匪，而這些所謂的土匪，卻是在他小時候看到日本人開著砲車去屠殺的義士，甚至是無辜的村民。<sup>56</sup>因此所謂的史書，通常是爭鬥勝利者擁有了撰史的話語權而生的產物，《臺灣匪誌》顯然是日本人以自己的立場所撰。先不論客觀與否，對於臺灣人楊逵來說，此書無法反應傳達到臺灣人民的心聲，所以他提出：

諺語要經過千千萬萬人的嘴來流傳，也就必須要得到千千萬萬人的公認，才能傳到我們耳朵來。宣傳要是空虛的，沒有道理、沒有事實根據的，就得不到那麼多人的公認傳誦。言語統制只能夠禁壓那些公開的出版與演講，絕不能封閉了千千萬萬張的嘴。<sup>57</sup>

楊逵強調經過千萬人認同的諺語才等於事實，是不容抹煞的。無論官方文字宣傳如何美化，言語統制如何強勢，不見得會得到人民的公認。故楊逵重視文學能傳遞事實的重要性，以民間文學寫實性對抗官方史書話語權，頗具有他一貫的抗議特性。

### 第三節 民歌的應用

除了諺謠之外，能夠表達民意的尚有民歌民舞。楊逵認為生存必須經過不斷的團結戰鬥，無論對抗大自然或是外族的侵略，生活中充滿了喜怒哀樂，最後投

<sup>55</sup> 楊逵，〈諺語四則〉，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78。

<sup>56</sup> 楊逵口述，王世勛記錄，〈我的回憶〉，原載於《中國時報》，1985.03.13～15，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57。

<sup>57</sup> 楊逵，〈諺語與時代〉，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0。

注在歌聲與舞蹈之中，藉由世代傳承，記錄人民生存的足跡與心聲，<sup>58</sup>所以對於民歌民舞相當注重。在入獄之前的 1949 年初與麥浪歌詠隊的接觸中，楊逵除了歡迎歌詠隊到臺中表演，也積極協助處理表演場地與住宿問題，甚至發表〈介紹「麥浪歌詠隊」〉一文，向臺南文化界推薦。對於他這樣的重視，學者黃惠禎認為：「楊逵之所以熱烈支持麥浪歌詠隊的行動，無非因其演出的曲目以來自民間的歌舞為主，藉由民間文化的形式傳遞人民的感情與思想，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而這確實符合楊逵社會主義者文藝大眾化的想法，也與他正積極提倡建設臺灣新文學的理念相符。」<sup>59</sup>可知楊逵對於民歌民舞的重視，在於這是民眾情感的共同創作，也由大眾共同傳唱，以寫實文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項絕妙的思想凝聚的載體。

其次，楊逵非常強調民間藝術的價值，尤其是民歌民舞。他認為：

民眾把這些戰鬥與工作的紀錄，把這些有喜怒，又有哀樂的生活感情表現出來的歌謠與舞蹈——民眾藝術，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傳到我們的世代來，並非是偶然。這些民間藝術，都是我們民族的偉大文化遺產。儘管在某些時代——特別在日本帝國主義壓制下的五十年中受到蔑視與禁壓，一直根深蒂固保存在民眾心裡頭……（中略）為甚麼民間藝術——民歌與民舞——能夠這樣根深蒂固的呢？簡單一個話可以說，就是因為他已經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中略）民眾以他們的智慧共同創造了它，也由它得到共同的安慰與鼓勵，因此，它與民眾的生活感情之間沒有空隙，它的內容與形式是民眾生活感情最自然的表露。<sup>60</sup>

由此番發言，我們可以瞭解楊逵對於民間藝術看法的重點：

1. 民眾的生活紀錄。

<sup>58</sup>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首度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2），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8-309。

<sup>59</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76。

<sup>60</sup>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8-309。

2. 能世代相傳。
3. 民眾的共同創作。
4. 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簡單來說，民眾是提供創作的素材，是讀者，是記錄者，更是創作家，因此才能與大眾文藝緊密地連結一起。所以楊逵收集大量的民間歌譜，無非是想表達民意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大眾文藝的感染力。

由於楊逵所採集有不少無曲名的歌譜，筆者按照歌譜集的先後順序，將歌譜集的內容整理成表格（請見附錄四），總計收錄 118 首歌曲。<sup>61</sup>歌曲類型分類後，<sup>62</sup>各類型計數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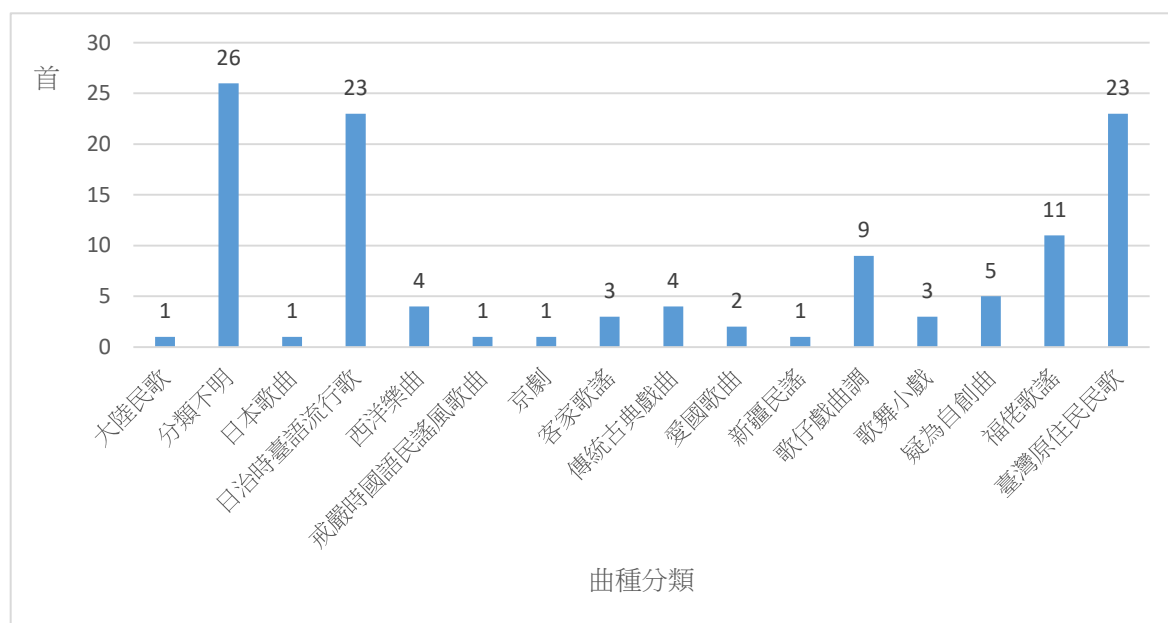


圖 7 《楊逵全集·謠諺卷·歌譜集》收錄歌曲類型計數圖

本論文將所有歌曲依曲種分為 16 類，其中「分類不明」類共有 26 首，係筆者礙於能力所及，無法辨識，暫歸於此類。<sup>63</sup>但這類作品中，除了〈ponpoko〉（編

<sup>61</sup> 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223 之曲，由於楊逵畫了一條斜長線表示註銷，故不在 118 首的計數之內。

<sup>62</sup> 「臺灣民謠」類是指在閩客歌曲間皆有曲譜與傳唱的歌謠，無法直接畫分在客家歌謠或福佬歌謠，故另分一類。類型排序是依照首字筆畫數由少到多。「疑為自創曲」類部分是參考《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內歌曲下的註解。

<sup>63</sup> 筆者在整理曲類時，除了原本《楊逵全集》內原有的標註外，自行辨別的方法有四：一是從曲名尋找，因為楊逵會將原曲改名，所以需要再對照歌譜是否符合。二是從歌詞尋找，有時楊逵會有改詞的習慣，所以比對完後要再對過曲譜是否符合。三是當有曲名但找不到歌曲，或是無曲名無歌詞時，只能按照楊逵紀錄的曲譜利用樂器演奏出旋律，再比對網路上現有的音樂檔。筆者對

號 41)、〈賣香烟〉(編號 81) 外，其餘的也是有曲譜沒有歌詞的狀況，因此增加辨識上的難度。總計歌譜集中僅有曲譜，且沒有曲名與歌詞的「無題」歌曲共有 22 首，但並非全部都屬於「分類不明」類。由於歌譜集每篇附有曲譜，所以有些無題歌曲只要對照曲譜便能知道原曲為何。例如其中有 2 首在《楊達全集》內標註的分別是〈草螟弄雞公〉(編號 105)、〈哭調仔〉(編號 113) 的譜子；3 首疑似楊達新創曲，附有歌詞(編號 116~118)；有 1 首在標題處題「慢悲壯」(編號 104)，應該只是標寫拍子速度與曲風，而非曲名。除了編號 31、116、117、118 這 4 首之外，均是有曲譜卻沒有歌詞的狀態。

除了「分類不明」者之外，歌謠分類範疇之廣，從地理來看包含大陸、日本、西洋、臺灣本土；從時間來看包含日治時期、戰後時期及戒嚴時期；從族群來看，包含客家、福佬、原住民、新疆、大和民族、白種人；從語言來看，包含北京話、閩南語、客家話、日語、原住民語、英語；從曲風來看，包含西洋古典樂、日本電影歌曲、臺語流行歌、民謠風國語歌曲、京劇曲調、歌仔戲調、客家山歌、傳統地方歌謠、原住民歌謠、愛國歌曲，以及疑為自創曲。採集曲調樣式之繁，包羅萬象，堪稱采風彙集。由於新生訓導處的康樂活動有表演活動與體育活動，其中表演活動項目不少，例如京劇、歌仔戲、話劇、國樂表演、西樂表演等，<sup>64</sup>並且舉辦軍民聯歡晚會，推論楊達因此獲得採錄的機會。

從數量來看，以日治時臺語流行歌與臺灣原住民民歌居多。可能因為留聲機的發明，流行歌曲傳遍大街小巷，較不受到獄友背景的区域或種族影響，也較多人傳唱，所以楊達較容易採集到。原住民民歌則以雅美族舞曲為主。根據曹昭蘇的回憶，大約 1959 年夏天，蘭嶼原住民到新生訓導處作客，當場表演豐年舞與頭髮舞，<sup>65</sup>或許這是楊達歌譜集 12 首〈雅美族舞曲〉的由來。由上述推測，除了臺語流行歌曲外，楊達在採錄歌曲時，可能與新生訓導處康樂活動的表演內容有關，而採集到的原住民歌曲數量偏向單一族群，則受限於和原住民交流的機會。

---

於歌仔戲調較熟悉，以此法發現編號 5〈食酒歌〉為歌仔戲留傘調。四是對照歌譜集其他曲譜，楊達會將同曲譜重複抄寫在不同頁數，標以不同曲名。例如編號 5〈食酒歌〉與編號 37〈漁家樂〉、編號 97〈□□民謠〉是同一曲譜。由於筆者本身並非音樂科班出身，礙於能力所及，所以尚有 22 首曲子無法辨識，只好歸類於「分類不明」。其曲種的辨識只能留待之後有興趣的研究者分析。

<sup>64</sup>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頁 43-49。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頁 222-237。

<sup>65</sup> 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頁 347-348。



再以歌詞進行分類，比例圖分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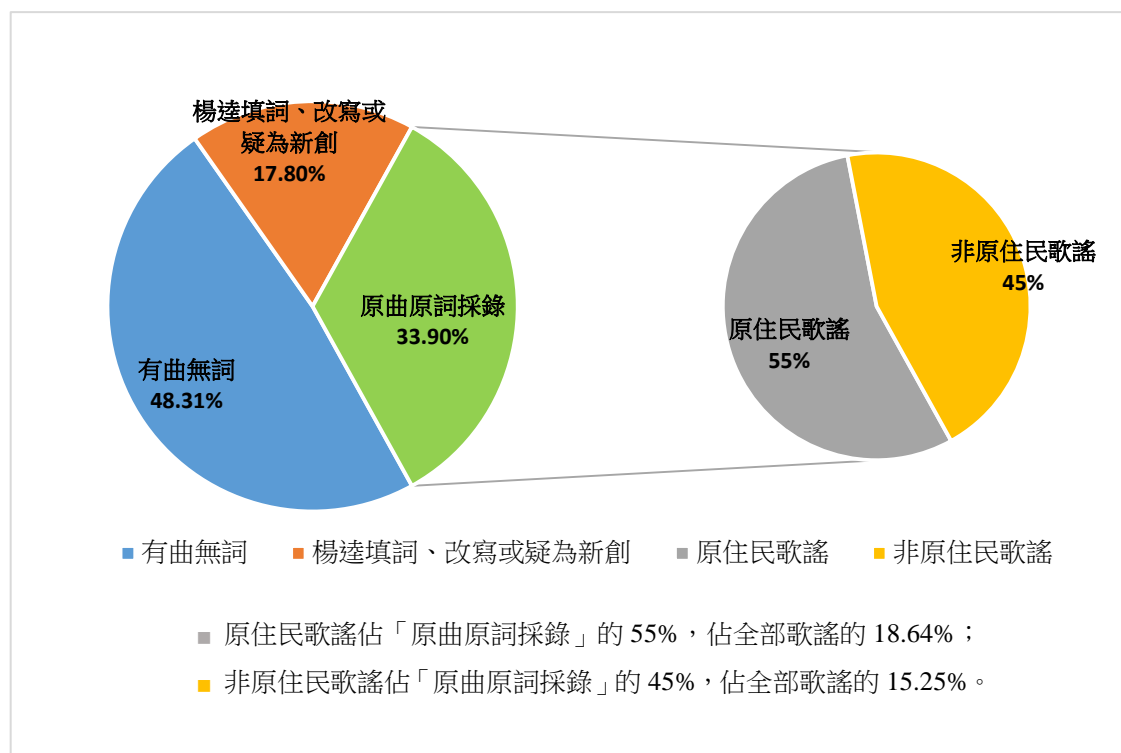


圖 8 楊逵的歌謠集歌詞分類比例圖

「有曲無詞」的歌曲高達 57 首，佔所有歌謠篇數約 48.31%。其餘有歌詞的部分，屬於楊逵填寫、改寫歌詞或是疑為新創的便有 21 首，佔所有歌謠篇數約 17.80%；真正地記錄原曲原詞的只有 40 首，佔總篇數的 33.90%。原曲原詞採錄中原住民歌謠有 22 首，占該類的 55%，佔全部歌曲的 18.64%。也就是說真正具有采風性質的「歌詞」比例，在楊逵的歌謠集裡不高，而且半數以上是原住民歌曲，屬於多數人口的漢族民歌比例反而不是多數。綠島獄中的楊逵曾經提到：「最近被介紹了不少的民歌與民舞，如邊疆的歌舞與台灣的高山族歌舞等，給我們很大的鼓勵，不過，我們漢族家鄉的歌舞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是一個畸形的現象」，<sup>66</sup>很可能就是主要原因。

整理以上所述，楊逵的采風工作看似民歌的採集，實際上真正收錄的重點應該是曲子，歌詞並非必要的。楊逵自己曾言道，民歌民舞是民眾生活奮鬥的紀錄，

<sup>66</sup> 楊逵，〈談街頭劇〉，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11。

是情感的寄託與反映，<sup>67</sup>而這些更需要的是文字的紀錄。但是，真正將原曲原詞採錄下來的歌謠僅是歌譜集內的三分之一，那麼是否可以斷定歌譜集是為了保留民間音樂的成果？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那占有歌譜總篇數 17.80%的楊達填詞、改寫或疑為新創的部分尋找解答。

屬於楊達填寫、改寫歌詞或是疑為新創的 21 首歌曲中，幾乎都是楊達在獄中所編寫的劇本內的歌曲。綠島時期的楊達大力提倡演出「街頭劇」，他認為街頭劇「是新時代的精神，把民歌民舞，民間故事融在一爐的綜合民間藝術。」至於推動街頭劇的原因是，民間藝術受到敵人長期的摧殘，已經奄奄一息，面對這樣的損害，應該要「把這些支離破碎的寶藏重新綜合起來，以新時代的靈魂把它復活過來。把銹磨掉，加一點油，它可以把所有眼睛矇矓的同胞喚醒。」<sup>68</sup>這裡所謂的「新時代的靈魂」便是街頭劇。街頭劇的發展與民歌民舞息息相關，因為民歌民舞是「民眾生活感情很率直的表現」，「是很寶貴的基礎」。<sup>69</sup>所以在這樣的分析上，楊達所謂的「把銹磨掉、加一點油」，就可以解讀成對民歌民舞進行再創造。而這樣的再創造是為了要配合戲劇內容填上適合的歌詞，將人民心聲藉由劇中角色唱出。也就是說楊達改寫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讓民歌更貼近戲劇創作的內容。

從楊達劇作來看，除了附有簡譜與歌詞的曲子，有很多標註「唱」的但沒有曲譜的唱詞。例如〈赤崁拓荒〉中林開發向王玉珍解釋，他是為何會在海上漂流至此，其臺詞如下：

哦！我想起來了！（唱）

自小老父就去世，老母被逼過再嫁，嫁給一個土皇帝，憑文動武展威勢。  
搶人錢財真正多，招搖撞騙逐項會，創人放火無辭退，叫阮母困做奴隸。  
勞働身軀無要緊，全無自由才可恨，開嘴就罵真出神，起腳就踢倒輪輪。  
老母凝心不敢應，病倒床上飢翻身，壁孔摸出一塊銀，叫我逃生較要緊。

<sup>67</sup> 楊達，〈春天就要到了〉，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8-309。

<sup>68</sup> 楊達，〈春天就要到了〉，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9。

<sup>69</sup> 楊達，〈談街頭劇〉，首度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2），引自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13。

我真傷心叫母親，母親斷氣叫飭應，心裡驚惶起腳走，走到海邊營盤口。

躲在船底不敢哭，不知何時船開走，海中遇風船漂流，半沉半浮幾日後。<sup>70</sup>

林開發的這段臺詞是整齊的七言句子，從文意、韻腳來看，正好四句一組，並且以臺語發音。這樣的句式，正好是臺灣民謠最常使用的七字仔、四句聯，也是最基本的曲調。臺灣各地區的小調、褒歌，例如思想起、搖籃歌、駛犁歌、採茶歌、客家山歌、哭調等等，很多被歌仔戲吸收編曲為主要曲調，再藉著歌仔戲的興起與歌仔冊的傳播，成為家喻戶曉的音樂。<sup>71</sup>楊逵的歌譜集收錄不少這樣的臺灣民謠、歌仔戲的曲調，而七字仔正是歌仔戲最典型的句式，例如七字調、大調、都馬調、乞食調等等，均是以四句七言的詩體編寫唱詞。林開發的臺詞，其實可以套上楊逵歌譜集內有七字仔句式的任何音樂。由此推論，楊逵的歌譜集內有曲無詞的歌譜，除了是音樂采風的紀錄外，也是楊逵編寫歌舞劇樂曲素材的來源，更是他寫劇本時的專用工具書。

其次，〈赤崁拓荒〉中王玉珍和林開發兩人互有情意，打情罵俏後，楊逵在〈思想起〉的音樂基礎上重新填詞，將腳色要演繹的臺詞，以歌唱的方式唱出歡樂的氣氛與對美好未來的嚮往，製造男女彼此唱和的相褒歌效果：

林開發：好！（兩人手牽手跑上山坡，唱）

思想起，為著自由的生計

奔波海外窮如洗

一身破衫破草笠

赤手開發新天地

王玉珍：（唱）

思想起，為著自由為平等

人人武藝練得精

<sup>70</sup> 楊逵，〈赤崁拓荒〉，原為手稿完稿，1955年作。曾收入《睜眼的瞎子》（臺北市：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03）。引自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二卷·戲劇卷（下）》（臺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06），頁42-43。

<sup>71</sup> 邱曙炎，〈「歌仔」是歌仔戲音樂的主要聲腔〉，《臺灣戲專學刊》9期（2004.07），頁186-187。

大家協力去拼命  
不惜任何的犧牲<sup>72</sup>

學者簡上仁研究〈思想起〉創作背景與呈現的民間樣貌提到：

在恆春地區，「思想起」一直是人人掛於嘴上的歌謠。每在工作之餘，彼此聚集休閒時，就你唱我和我的抒懷暢心起來，使疲憊全消。亦有許多男女喜歡把心語藉著「思想起」的旋律，來互訴心曲，編織情感。<sup>73</sup>

也就是說，在民間吟唱〈思想起〉時是為表達歡欣的情緒，營造歡快的氛圍，並且可用來男女對唱，互表情意。而楊逵安排林開發和王玉珍的臺詞與劇情發展，確實地呈現男女互訴衷情，與寄託對美麗未來冀望的風貌。可見楊逵對於曲調的性質、音樂背景相當瞭解，編寫劇本時會注意到歌詞內容、劇情安排，必須要配合曲調性質與特色，不可隨意搭配，才能真正地將民歌民舞與戲劇揉合，貼近民眾最自然的情感與生活。若只是將楊逵對於民歌的再創造視為創新，不如說是楊逵在創新之餘，也遵循民謠創造的傳統精神。

再者，楊逵在既有的曲調上填新詞，也是一種「再創造」。學者翁志文、鄭德淵、辛玫芬、蔡素娟在研究許常惠收錄到的五十多種〈思想起〉唱法時，引用 Jaan Ross 和 Ilse Lehist 認為傳統民歌曲調有「再創造」現象，<sup>74</sup>以及學者吳榮順認為臺灣傳統民歌中存有即興唱法的觀點，進一步提出傳統民歌的即興唱法就是「再創造」，如此才能產生民歌的變異。所以即興唱法的再創造性，也就是傳統民歌傳播的重要內涵，才會出現僅〈思想起〉一曲，就能收錄到多種不同唱調與歌詞的狀況。<sup>75</sup>回顧楊逵的歌譜稿歌詞分類中，「有曲無詞」的比例高達全部歌曲的 48.31%，以及楊逵劇本中唱詞可以搭配適當曲調的再創造，即是民歌傳統

<sup>72</sup> 楊逵，〈赤崁拓荒〉，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二卷·戲劇卷（下）》，頁 58-59。

<sup>73</sup> 簡上仁，《臺灣民謠》，頁 58。

<sup>74</sup> 傳統民歌的再創造，指的是傳統音樂在傳授時多是口傳心授，沒有樂譜只有音樂的主要旋律，表演者在表演時即是作曲人，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重新作曲。

<sup>75</sup> 翁志文、鄭德淵、辛玫芬、蔡素娟，〈由微觀陳達《思想起》看臺灣民歌的「再創造」〉，《南藝學報》8 期（2014.06），頁 160-161。



的「即興唱法」的精神。

楊達對民歌的再創造並非是單一特殊現象。日治時期的臺語流行歌曲中，也存在著臺灣民歌的傳統創作精神。歌譜集中，楊達也收錄不少流行歌曲，還是日治時期暢銷作品，除了耳熟能詳，也相當具有時代的代表性。1932 年古倫美亞推出臺灣第一首臺語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開始了唱片業百花齊放的時代。此時日本演歌已進入臺灣市場，而古倫美亞老闆栢野正次郎要求歌曲具有臺灣味，所以當時作詞作曲都有臺灣民歌的影子。<sup>76</sup>例如〈桃花泣血記〉的歌詞依然有著七字仔四句七言的特色，內容如下：

人生就像桃花枝，有時開花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若死去無活時。  
戀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琳姑出世歹環境，親像桃花彼薄命。  
禮教束縛非現代，最好自由的世界，德恩老母無理解，雖然有錢也真害。  
德恩無想是富戶，專心實意愛琳姑，免驚日後來相誤，我是男子無糊塗。

除此之外，鄧雨賢在創作〈望春風〉的曲子時，也是根據傳統五聲音階編寫旋律的。<sup>77</sup>高金福作了〈蓬萊〉、〈摘茶〉、〈觀月〉花鼓系列歌曲，在曲調、編曲與歌詞，甚至是主題構思，均是具有鄉土民謠的特色。<sup>78</sup>1934 年，勝利唱片招攬西洋樂與漢樂的樂師，編寫出富含傳統漢樂的流行小曲，〈白牡丹〉、〈心酸酸〉、〈悲戀的酒杯〉、〈欲怎樣〉、〈素心蘭〉……等傳唱一時。這些曲子也都被收錄到楊達的歌譜集中，甚至將有的歌詞改寫後編入劇情之中，例如〈赤崁拓荒〉王玉珍教林開發跳舞時，配合歌曲便是〈四季紅〉。<sup>79</sup>是故楊達將歌譜收集成冊，就不能僅解釋成單純的采風活動了，而是具有其再利用並賦與民歌再創造之意義。

<sup>76</sup> 莊永明，〈臺灣歌謠史略——兼談日治時代流行歌〉，《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7 期（2011.07），頁 7-10。

<sup>77</sup> 莊永明，〈臺灣歌謠史略——兼談日治時代流行歌〉，《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7 期，頁 9。

<sup>78</sup>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04），頁 94。

<sup>79</sup> 楊達，〈赤崁拓荒〉，彭小研主編，《楊達全集·第二卷·戲劇卷（下）》，頁 53。

## 第五章 楊逵獄中文學與時代的對話

### 第一節 民眾語言與多元文化

檢視楊逵獄中寫作的時間表，會發現自 1949 年 4 月楊逵遭捕，1951 年 8 月移送綠島之後，直至 1952 年 10 月才在《新生活壁報》刊載獄中第一篇新詩〈八月十五的那一天〉。<sup>1</sup>楊逵是多產作家，文化創作是他社會運動體現的一環。這次中斷文學事業卻是超過三年，極為罕見。推究其因，戰後楊逵的創作除了受到監獄與自我規訓的限制，也受到 1946 年後國語運動政策的影響。楊逵長期使用日語，成名作〈送報伕〉也是使用嫻熟的日文創作的，但在中國國語文的語言政策與白色恐怖影響下，楊逵的創作歷程出現空白與斷層。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的 1945 年 3 月，中華民國頒布「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第一通則與第八教育文化列明原則與實行方案，明白指出中華民國已準備以「去日本化」、「中國化」的政策進行文化重建，<sup>2</sup>使得中國的國語具有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雙重性質。因此當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行政長官陳儀在〈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中提到：

我希望於一年內，全省教員學生，大概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文課本。<sup>3</sup>

陳儀訂下 1 年期限不僅短暫，還必須要達到「言、文、史通達」的程度，其目的

<sup>1</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469。

<sup>2</sup> 例如第八項第 44 條：「接管後應確定國語普及計畫，限期逐步實施。中、小學校以國語必修科，公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各地方原設之日語講習所應即改為國語講習所，並先訓練國語師資。」第 51 條：「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概予銷毀。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集圖表。」明確指出行政官署對於語言與文化有著去日本化與中國化的完整計畫。〈台灣接管計劃綱要（1945 年 3 月 14 日）〉，馬振犢主編，《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7.01），頁 372、374。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2017.08 三版一刷），頁 21-33。

<sup>3</sup> 陳儀，〈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三十四年除夕廣播〉，《陳長官治台言論集·第一輯》（臺北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01），頁 45。

便是要將日本在臺 50 年的語言與思想教育連根拔除，達成「中國化」的既定目標。<sup>4</sup>為此目的，1946 年 4 月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由魏建功擔任主任委員，至此開啟由官方統一主導全省的國語運動，目標定調為「講國音、認國字、寫國文」。<sup>5</sup>當臺灣人能夠讀字識字後，施以國文教育，達到「言文一致」，最終便能藉由文字接受中華文化思想，其背後之意義便是思想教育。

1946 年 10 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布禁刊報紙的日文欄，宣傳委員會的理由是：

本署前以臺灣受日人統治達 50 年，大部分臺胞均未諳本國文字，故暫准許新聞紙雜誌附刊日文版，此種措施，原為一時權宜之計。嗣以本省光復，已屆周年，本會為執行國策，推行本國語言起見，特公告自本年 10 月 25 日起，撤除本省境內新聞紙雜誌附刊日文版。經公告並電各縣市政府遵照後，嗣據各縣市政府報告，為本省境內已無新聞紙雜誌附刊之日文版矣。

6



為了執行陳儀於 1946 年推行的政策，禁止日文版報紙的刊行，致使當時慣用日文閱讀的臺灣人與現實產生斷裂。尤其政府只給予語言轉換期 1 年的緩衝，便要中國國語文的聽說讀寫皆能通順無礙，簡直是異想天開。

陳儀政府之所以急於禁用日文欄的原因在於，國語運動常與國家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國語」的產生並非經由自然的文化消長或是語言優勢的過程，而是藉由人為推行國語的政策，將單一語言制訂成官方語言，具有國族整合統一的政治性。<sup>7</sup>相較於日治時期推動皇民化運動的緣故，臺灣文學發展雖短暫造成停滯，至少臺灣人尚能運用日文創作。1946 年 10 月之後，臺灣作家在尚未習得國語前便被語言去勢，慣用日文創作的作家失去發表的工具與園地，臺灣文學再

<sup>4</sup>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1946-196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 期（2005.10），頁 89。

<sup>5</sup>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1946-196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 期，頁 97-98、100-102。

<sup>6</sup> 該資料為 1946 年 12 月之施政報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複印，2005），頁 281。

<sup>7</sup> 黃建銘，〈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 期（2011.06），頁 80。

次出現斷裂。楊逵寫下了當時作家們遇到的困境：

光復以來快要三年了，應要重振的臺灣文學界卻還消沉的可憐。這原因其  
一是在語言上，就是，十多年來不允使用被禁絕的中文。今日與我們生疏  
起來了，以中文就很難得充分表達我們的意思了。其二是政治條件與政治  
的變動，致使作者感著不安威脅與恐懼。寫作空間受到限制。<sup>8</sup>

由此可知，戰後即使推動國語運動三年，中文書寫對於日治時期成名作家們依然困難。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臺灣菁英遭到大量屠殺，尚存的文化人士幾乎被嚇到噤若寒蟬。臺灣人對於官方非常失望，而官方認為臺灣人未歸化大中華思想系統，仍深受日本奴化教育影響，<sup>9</sup>必須加強對國家認同，才能消除臺灣人的反抗性格，因此政策轉向剛性且強迫性。<sup>10</sup>

在尚未習得另一種慣用語言前，又被扣上奴化的汙名，臺灣人陷入被禁語的窘境之中，不僅被剝奪言論的權利，也喪失書寫的能力。陳芳明指出當時臺灣作家面臨的困境：「被奪走發言權的臺灣作家，不僅因此患了歷史失憶症，並且出現了失語症的現象。」<sup>11</sup>主要是因為臺灣文化摻雜日本殖民 50 年的歷史背景，中國來臺官員對於臺灣人的日本經驗本就具有歧視，故而陳儀快速中國化的結果，以及中文的無法掌控加上政治因素的恐懼，導致臺灣文學作家面臨語言及文化認同問題。<sup>12</sup>

國語運動造成的問題，主要在於母語與自民族認同的關聯性高，母語被禁用也等同於否定了該族群的存在。學者黃建銘認為能夠使用母語是代表語言人權的實踐。他說：

<sup>8</sup> 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原載於《臺灣新生報》「橋」百期擴大號及 101 號，1948.04.07~09，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47。

<sup>9</sup> 1946 年間曾爆發「奴化論戰」，論戰雙方的觀點，陳翠蓮有詳盡的論述。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9 卷 2 期，頁 148-150。

<sup>10</sup>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浪潮與國語讀本〉，《國家圖書館館刊》100 年 2 期（2011.12），頁 86-86。

<sup>11</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 219。

<sup>12</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 216-217。



母語展現對族群或民族的自我認同感，母語的使用成為人權的實質內涵，政府能夠對各族群母語加以確保其平等使用之機會，即是語言人權的具體實踐，故母語存續的價值代表對各族群語言人權的尊重，成為促進族群多元共存共榮的關鍵。<sup>13</sup>

使用母語的背後代表族群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也象徵人權與平等。一旦語言消失，等於蘊藏語言之中的族群文化與認同也跟著湮沒。

而國語運動背後的政治意含，學者黃美娥以國體的觀點論之：

使用國語，才能與中國人的看法、想法與精神相連繫、相等同，才算徹底的『光復』……（中略）戰後初期臺灣學習國語，不單只是認識國家法定語言更同時牽涉去除日治五十年的「毒化教育」，以及回歸中國的文化重建工作，語言、認同、文化、國家連成一氣，戰後初期臺灣便在如此的空間政治與語言思維結構中「光復」了，而中國國體至此得以獲得確立與重光。<sup>14</sup>



可見國語運動最後變成民族國家認同議題，並且用以確認國家的存在與榮光，藉此尋找凌駕日本大和民族之上的尊嚴與內戰後喪失的黨國信心時，文化壓迫隨即籠罩在臺人身上，如同日治時期的語言同化問題。結果，在掌握新的語言作為書寫工具之前，臺灣人相對地被排除於文學與文化認同之外。

日治時楊逵曾多次撰文批評臺灣總督府的語言政策，也曾對北京話文創作發表看法。例如 1939 年在《伍人報》發表〈台灣的文學運動〉時，針對「臺灣人作家究竟應該要用什麼語言書寫」，提出以下的看法：

對關心文學的人來說，臺灣的語言政策是最根本的問題，這也是殖民地文學上一個很大的煩惱根源……（中略）臺灣住民本來就幾乎都是漢族，因

<sup>13</sup> 黃建銘，〈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 期，頁 75。

<sup>14</sup>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3 期（2012.12），頁 255。

此文學方面也曾經是大陸的殖民地。但是，自從日本帝國接收臺灣以來，逐漸禁止漢文教育，在初級、中級教育方面又強制使用日本語，因而產生了語言上的畸形兒。因此，長久以來，無法用文字表現文學上的思想或感情。雖然受到中國陳獨秀、胡適之等人士的文學革命運動的刺激後，前述的文論和用中國白話文寫的作品，就斷斷續續出現在《臺灣民報》上，但這些文章主要採用南京、北京方言（在中國被擁護為「國語」，在臺灣卻被視為異端，無從普及），所以對臺灣作者、讀者而言，都像借來的衣服一樣，並不合身。<sup>15</sup>

楊逵指出族群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以及語言政策強制臺灣人使用非母語創作，會造成無法呈現思想感情的畸形狀況。雖然臺灣人多漢族後代，這時的楊逵也認為中國的國語對臺灣文學而言並不合適。言下之意，楊逵認為使用自己的母語才是最好的書寫工具，也才能讓讀者接受與理解。1937 年楊逵在《臺灣新文學》第 2 卷第 4 號的編輯後語，以邀請大家學習日語五十音，來反諷總督府利用語言霸權廢除漢文欄一事，<sup>16</sup>顯然楊逵反對文學脫離大眾生活，並對日本政府的語言政策感到不滿。

戰後初期，中國國民黨也利用國語政策的推動，讓臺灣人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以鞏固在臺灣的政權，造成多族群卻語言單一化的狀況。楊逵曾在 1946 年 5 月發表〈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臺灣新文學停頓の検討〉），提出文學的停頓原因之一乃在於語言問題，注意到語言政策對於文學發展的影響。但是同年 10 月行政長官公署仍宣布禁刊報紙的日文欄，使三〇年代以來臺灣新文學的傳統面臨斷絕的狀況。類似的問題日治時期也發生過，當時的文學家為了遷就客觀環境，也只能使用日文繼續創作。<sup>17</sup>顯然作家面對北京話文的國語運動，為了避免文學生命停頓，學習北京話語創作是必然的趨勢，楊逵亦無法免之。

<sup>15</sup> 楊逵，〈臺灣的文學運動〉，原載於《伍人報》9-11 號，1939.08.16～09.0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頁 364-365。

<sup>16</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96。

<sup>17</sup> 廖偉竣訪問，〈不朽的老兵——與楊逵論文學〉，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84。

大勢所趨，楊逵對於語言政策的應對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語言的學習與實際創作，二是臺灣歌謠的採錄。為了突破語言轉換的困境，戰後初期的楊逵積極運用了日文、北京話文、臺灣話文進行創作。事實上，日治時期楊逵提倡過使用臺灣話文創作，也曾親自實驗寫作，但是假借字過多連自己都難以讀懂，這樣的文學無法深入民眾心中。所以他體認到：「我們撰述可以用漢文，但要台灣語化或客家語化，有些台灣語表現比漢文本身更生動，就應採用。」<sup>18</sup>楊逵晚年所提的草根文學，其一原則便是「使識字的人看得懂，唸給文盲也聽得懂」。<sup>19</sup>文字對楊逵來說是文學的載具，運用適當的語言，讓文學引發讀者共鳴更重要。為了使文學生命能夠延續，戰後初期楊逵與當時持續筆耕的本土作家一樣，學習新的語言文字以利書寫。然而楊逵用了數年時間，中文寫作仍難以達到通順流暢的地步。

20

由於國語運動於小學進行扎根教育，1946 年後的小學生成為最熟稔國語使用的一代。楊逵為了能讓文學創作生命得以延續，和葉陶一起成為七歲次女楊素絹的第一、二位的學生。他創作童謠、諺語讓楊素絹念給他聽，並且計畫寫短篇故事與童話劇讓兒女翻譯和表演，他和葉陶則有機會串場表演以訓練口語能力。只是，楊逵尚未完成這些計畫以習得流利的國語前，於 1949 年被捕入獄。<sup>21</sup>沒有小老師的幫忙完成學習計畫，以及監獄是官方語言政策嚴格執行的空間等雙重原因，使得他在監獄中暫時噤語，造成創作的困難與斷裂。胡子丹曾回憶道：

我曾看過他的手稿，日文語法較多，寫不出來的字使用注音符號代替。在綠島期間，我和他未曾同過隊，也未曾同過工，但有過無數次的「狹路相逢」，時地不拘，他的隨身裝備中，一本破舊的國語字典總是少不了的，使我對他無比尊敬，又極佩服。<sup>22</sup>

<sup>18</sup> 陳俊雄訪問，〈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24。

<sup>19</sup> 陳俊雄訪問，〈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40。

<sup>20</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321-323。

<sup>21</sup> 楊逵，〈我的先生〉，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3-304。

<sup>22</sup> 胡子丹，〈憶綠島的文青們（上）〉，《中時電子報》2018.10.24（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024000850-260115?chdtv>，2019.07.16）。

又說：

那時候，楊逵還是用日文思想，用日文腹稿，最後才用中文寫。他一定用了不只一本國語字典，每次看到他，他隨身佩戴中，破爛的一本國語字典總是少不了的。在那「夢魘」環境裡，也辦有命名為《新生月刊》的刊物，和每周一期的大隊隊際壁報，讓我們可以常常看到楊逵的作品，文字不夠流利。那時候的壁報社幾位編輯，回到台北來，一位告老退休，一位當了牧師，另外三位現在還老本行，是報社的現任編輯，我想他們幾位，有潤飾斧正之助，是無容置疑的。<sup>23</sup>

在綠島獄中的楊逵，仍面臨北京話文創作的困境。首先他必須獨立學習中文書寫，依賴的也僅是國語字典與勤奮不倦的精神，必要時仍得藉楊素絹曾經教過他的注音符號來標示不會的文字。再者，即使他學習了中國文字，仍不習慣國文文法的創作思維，必須以日文文法進行文稿打底，最後才修改成中文稿，楊逵甚至常常需要為了幾個詞句到處請教。學者黃惠禎研究其手稿時認為：「由其創作底稿來看，滿篇盡是塗塗改改的痕跡，就連定稿的謄本上面，也不乏刪修的記號，可見楊逵在由日文轉型成中文作家時，的確遇上了相當大的困難。」<sup>24</sup>就算他再三修改，作品仍嫌不夠流利，需要被加以潤飾，最後才得以在刊物上發表。

戰後中國國民黨的語言政策為北京話文產生文化場域的優勢，相對地就壓迫了其他語言傳承的空間，連帶地影響了民眾使用語文保存文化以及表達思想的管道。到了新生訓導處，礙於監獄的寫作環境與思想監控，楊逵的文章雖未見他針對語言政策駁論或發言，卻運用了大量臺灣話作為材料進行文學活動。例如引用「了錢的生意無人做，斬頭生意世界走」，<sup>25</sup>「相罵恨無嘴」，「相打恨無撻」，「橫柴抬入灶」<sup>26</sup>等諺語進行論述。創作部分，楊逵以臺灣話文寫下童謠〈百合〉：

<sup>23</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349。

<sup>24</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頁 113。

<sup>25</sup> 楊逵，〈諺語與時代〉，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1。

<sup>26</sup> 楊逵，〈談諺語〉，首度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5.1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6。



正月正，半暝聽炮聲，天未光就起行，爬山過嶺來探聽。

你是啥？

牽牛花，滿身帶鼓吹，鼓吹頭喊聲，

爬山過嶺來探聽。

探聽啥？

這邊山，爬到那邊岸，一陣清香一個白影，大鼓吹，嘟嘟叫，叫爹又叫娘。

27

「正月正」是童謠中歲時歌的開頭方式，楊逵模仿起興手法，以及童謠常有的對答結構，押韻形成琅琅上口的旋律感，生活化的用詞貼近兒童生活經驗，成為學習口語的素材。這就是楊逵曾強調的「人民的作家應該以人民的語言寫作」，<sup>28</sup>如同他編輯《臺灣文學叢刊》收錄了臺灣民謠以及自創的臺灣話文歌謠，證明了他「以臺灣民眾的語言從事文學寫作的理想」，也是在回應執政者想將臺灣中國化的時代氛圍。<sup>29</sup>

此外，楊逵在採集謠諺與歌曲譜的素材中，包含大量的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例如前章所述的〈月光光〉的版本有閩語和客語唸法。而原住民語的記錄中，楊逵在歌譜集內收錄了標題為〈雅美族舞曲〉12首，以第一首為例，內容為：

（女）荷衣呀哼海，呀衣呀荷衣，哼荷衣呀荷衣，漢那哼呀漢

（男）荷衣呀衣呀，哼海呀哼，荷衣呀衣呀哼海呀<sup>30</sup>

顯然這是一首男女對唱的歌曲。又如〈種秧歌〉：

衣甯洋，衣甯洋，唉衣呀衣育河印

<sup>27</sup> 楊逵，〈百合（童謠）〉，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44。

<sup>28</sup> 楊逵，〈人民的作家〉，原載於《力行報》，1948.08.23，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258。

<sup>29</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177、223。

<sup>30</sup>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164。

海嘯海嘯河喔河因，汗那河歐河歐因

汗那河歐河衣呀海，嘯河恩，海洋<sup>31</sup>

從兩首原住民歌詞用字來看，顯然是原住民歌謠常用的虛詞，不包含實質意義，孫大川曾說明，「不用固定的歌詞，是為方便即興填唱，反映當前場合的敘事需要。有時實詞與虛詞穿插運用，延伸情緒的營造。這是原住民日常生活中最常出現的歌謠形式，也可以配合肢體律動，增強歡樂的效果。」<sup>32</sup>

楊逵利用擬音方式記錄歌詞，但是詞義對於非原住民者卻是無法理解的。楊逵曾提過民歌的「內容與形式是民眾生活感情最自然的表露」，<sup>33</sup>顯然楊逵想將原住民歌謠中的語言，以最自然的方式保留下來。若是他請採錄對象將歌詞內容翻譯成北京話文，再套上曲譜演唱，就失去了該曲原有的樣貌，甚至有不倫不類的感覺。由此推想，在國語政策的推動下，臺灣的俗諺歌謠等若轉譯成北京話文時，亦會失去原有語言的風貌及意涵。再回顧楊逵自日治時期以來堅持臺灣話文創作的理念，在獄中的楊逵以實際行動的方式，說明作家重視人民的語言與心聲，文學才能貼近民眾文化。

當國語政策獨尊北京話文時，楊逵於 1946 年發表〈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臺灣新文學停頓の檢討〉）提出了文學中的語言問題。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政治因素使得作家發言更加謹慎。1948 年《臺灣新生報》「橋」副刊上引爆了臺灣新文學的論爭，楊逵在「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中，再次指出戰後語言與政治的演變之於臺灣文學的影響，<sup>34</sup>也表示臺灣話文的創作空間已漸漸被壓縮。在此趨勢之下，楊逵發表臺灣話文的歌謠，以行動作為支持臺灣話文寫作的表態。<sup>35</sup>即使 1949 年銀鐐入獄後，獄外已經是北京話文獨尊的天下，楊逵將這些歌謠諺作為街頭劇劇本的創作素材，展演在軍民康樂活動中，顯然是利用表演藝術，實踐他認為文學應該使用民眾的語言進行創作的理念，並

<sup>31</sup>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171。

<sup>32</sup> 孫大川，〈原住民歌謠〉，《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117>，2020.08.09）。

<sup>33</sup>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9。

<sup>34</sup> 楊逵，〈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第二次作者茶會總報告〉，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47。

<sup>35</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380-381。

且延續入獄前對於語言同化政策的反應，正是楊逵以一貫的抵抗精神，回應大時代的語言政策。楊逵引用臺灣話文素材，不只是試圖在中國文學中留下臺灣文學的存在，也是在藉此表達語言保存的重要性，相對地暗示一個國家用單一語言政策建立單一文化的不當，表達對於語言、文化的多元性不容被忽視的理念。

## 第二節 以民為本的階級立場

1949年4月6日之後，中國國民黨除了將楊逵囚禁12年，也將不少知識份子逮捕入獄，許多作家或因語言轉換問題，或因政治恐懼等不同的原因，消失在文壇之上，日治以來的左翼文學傳承因此中斷。<sup>36</sup>1949年5月20日實施戒嚴令，包含言論、出版、遷徙等人民自由，全部納入全景敞視的系統之中，監視無孔不入，警總無所不在。對於國共內戰中的落敗，國民黨內部檢討後認為宣傳策略失敗導致，必須強化宣傳工具，以及加強文藝論述。故於1950年5月4日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成為推動反共文學的重要組織，代表民間響應當局政策，製造輿論傾向官方論述，塑造朝野同心的表象，<sup>37</sup>影響了臺灣五〇年代的寫作方向。同年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獎勵辦法有兩種：一種是每年辦理一次評選，擇優給予豐厚獎金；另一種是一般投稿，錄取之後給予稿費。<sup>38</sup>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鼓勵性質下，推動反共文學的風潮。

官方操作下的文藝政策，大搖三民主義的旗幟時，獲得了不少人的迴響。以共產黨為筆戰的對象，分清楚敵我界限，在同個國族之下又要能劃分出「自由中國」和「共產中國」的差異，並且建立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性，國民黨選擇以詮釋孫文《三民主義》為起點，建立文化霸權，在文藝界掀起了一股團結的風氣，動員文藝人士成功建立政治文宣主題。國族大論述的架構中並沒有臺灣的存在，以反共為前提，成為五〇年代的主要文藝特色。書寫進入全景敞視之下，國家霸權利用警總監視機制形成作家自我規訓，再利用文藝政策形成權力軌道，讓作家

<sup>36</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288。

<sup>37</sup> 胡芳琪，〈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反共文藝論述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50-51。

<sup>38</sup> 陳紀滢，《文藝運動二十五年》（臺北市：重光文藝出版社，1978.03），頁7。

們被迫放棄寫作或選材自由，只能順應國策書寫，造成文學創作主題單一化的現象。沒有反共經驗的臺籍作家出現寫作困難，太多作家前輩被迫噤聲在戒嚴制度下，年輕一輩則對書寫戒慎恐懼，寫作策略因此就顯得非常重要。基本上是配合國語運動學習國語文，再順應反共的文藝政策，在有限的範圍內挑選符合自己生命經驗的材料。<sup>39</sup>根據《文藝創作》的徵稿原則：「本會徵求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sup>40</sup>可以推想當時文藝環境與熱潮需沿著「國家民族」、「反共抗俄」的方向前進，才能安全上壘。臺籍作家無法從「反共抗俄」處下手，但尚有「國家民族」的題材發揮。和來自中國的反共作家都具有相同的抗日經驗，便是臺籍作家能夠發展的方向。

當時的楊逵雖然也在寫作，無法因為綠島地理位置偏遠而避開這波浪潮。在監獄思想檢查的監控下，楊逵必須編輯與投稿《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兩份具有反共性質的刊物，勢必面臨選擇寫作題材的問題。然而社會主義者的楊逵對於共產社會懷有憧憬，「反共」與楊逵的理念不合，當他面對五〇年代反共文藝的背景時，「反共」對他來說不是會選擇來撰寫的主題。所以他採取的策略與獄外作家類似，選擇從抗日題材下手。

學者呂正惠在研究楊逵的小說藝術技巧時，認為楊逵會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而改變小說的題材和表現形式。日治時期楊逵的文學成就多在小說，所選題材多呈現農工階級與資本家的不對等，以現實主義的文學手法塑造典型環境，來呈現殖民國家機器壓迫被殖民者的衝突。<sup>41</sup>綠島獄中處於反共文藝的背景之下，楊逵作品的題材多樣化，題旨包含生活經驗與家庭回憶、民族與國家、主義與民主，或提倡民間文學精神與實作，樂觀正向進取以鼓勵獄友，以及寫作指導等。這些取材與「反共」主題無關，但是可以發現楊逵的文章當中，出現不少「民族」題材的作品。

檢視楊逵晚年的座談、訪問紀錄中，常常會從「噍吧哖事件」日本政府武力

<sup>39</sup> 依據陳芳明對於五〇年代臺灣作家面對反共文藝背景的陳述：「被邊緣化的台籍作家，在一九五〇年代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學習中文的書寫。」「所謂遲疑觀望的態度，顯然是指台灣作家受到戒嚴體制與文藝政策的震懾。」「台籍作家的書寫，便是在不挑戰主流反共文學的條件下，開始觸及台灣本土的歷史記憶與風土人情。」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 288-295。

<sup>40</sup> 轉引自應鳳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03 修訂版），頁 51。

<sup>41</sup> 呂正惠，〈論楊逵的小說藝術〉，《新地文學》1 卷 3 期（1990.08），頁 19、24。



鎮壓、殘忍屠村，軍隊駛過他家門前開始談起，並展示這事件在他心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他說：「對我們而言，噍吧哖事件是對抗日本迫害的民族運動。」並曾提及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帶給他鼓舞與影響。<sup>42</sup>所以描述中國抗戰勝利的一刻，臺灣人民藉此脫離日本統治，是楊逵在這類題材中經常書寫的。而楊逵之所以不斷書寫日本經驗的原因，可從鍾肇政回憶當時在反共文藝主題中，臺籍作家要如何從中尋找書寫題材以獲得印證。鍾肇政說：

因為第一代作家多多少少經歷過日本經驗，被日本人統治的那個年代，所以對於日本人統治臺灣的年代比較有深入的領略，甚至有親身的經驗。他們筆下出現的也是這個年代為主。……剛好國民黨統治下，一些反日抗日的內涵，是比較受到鼓勵的。也不是迎合國民政府的需要，所以才寫那些反日抗日的東西，是因為只有那樣的題材可以讓我好好發揮。如果你說：你們這些人都是迎合政府的文藝政策的、反抗日本人的。這樣的解釋，這樣的判斷，當然也不算錯誤。<sup>43</sup>

以鍾肇政所言，對於戰後第一代臺籍作家來說，如果不想跟著盲目的喊著反共口號，也要能順應自己的經驗與想法，又可以在政策中尋找到寫作的契機，抗日題材確實是很好的選擇。鍾肇政認為若要解釋成「順應國策」也不算不對，畢竟這樣寫才能符合徵稿原則，也能有機會發表，才不會為自己招來更可怕的後果。

獄中的楊逵在面臨反共的國策時，也以抗日題材強調臺灣人堅韌的民族性格。例如〈諺語四則〉中，藉由諺語指出臺灣人「不願做奴隸的堅定的精神。」<sup>44</sup>〈八月十五那一天〉這首詩說：「聽到了嗎？朋友們／『神的兒子』……日本天皇／他，宣佈了／『無條件投降！』／『投降』——這一句／軟弱的悲鳴／喚起了我們的歡騰！／五十年來的奴才／將此解放！／五十年來的奴才／將重回祖國！」<sup>45</sup>從「奴才」一詞可以看到殖民統治不平等的對待，從「祖國」一詞也回應了中

<sup>42</sup> 楊逵，〈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原載於《聯合報》，1982.02.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1、23。

<sup>43</sup>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台灣文學十講》，頁260-261。

<sup>44</sup> 楊逵，〈諺語四則〉，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274。

<sup>45</sup> 楊逵，〈八月十五那一天〉，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2.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

華民族主義的時代氛圍。另外，〈春光關不住〉描述二次大戰後期，臺灣人民被徵調到南洋當皇民兵，基地建設卻是交給一群娃娃兵，直指日本統治對臺灣人的壓迫。娃娃兵林建文在基地發現水泥塊下的玫瑰花，他的數學老師林老師說：「我覺得高興的是，春光關不住，它竟能找到這條小小的縫，抽出枝條來，還長著這麼大一個大花苞，象徵在日本軍閥鐵蹄下台灣人民的心。」而後林建文的姐姐將玫瑰花移植到黃花缸，「黃花缸」即為「黃花崗」的明喻。文末說：「人生固然有許多艱難困苦，特別在異族侵佔之下，但我覺得，只要我們能夠保持鎮靜，就是面臨在徬徨頹喪的深淵，時間也會幫我們解決許多問題的。」<sup>46</sup>提示中國革命的過程與臺灣人民抵抗日軍統治的精神相同，兩者均有對抗異族統治的歷史，也藉此將臺灣殖民經驗和當代反共文藝核心主題作連結。

事實上，從楊逵日治時期社會運動與文學創作內容來看，反階級、反霸權一直是他的核心思想，如何創造民有民治民享的時代，也一直是楊逵追求的目標。但是這類題材批判性強、針對性高，故綠島獄中的楊逵以童話和小說呈現。因為童話與小說可以虛擬背景與虛擬人事發展情節，較容易在監獄的監視下解釋和規避。這類文章多會安排受欺凌的弱者與象徵霸權的強者兩種形象，例如〈麻雀戰勝了老鷹〉的麻雀與老鷹；〈花瓶的故事〉的原主人邱真與收租日人、下女與淫鬼主人；〈寶貴的種籽〉中的勤兒與林懶西；〈春光關不住〉中的玫瑰花與水泥塊、臺灣人娃娃兵與日本人吉田，都是弱者與強者的鮮明對照。結局中，不是弱者獲得善終而強者遭到惡報，就是弱者反擊強者，終能逃離強者魔爪。前者例如勤兒獲得技術與種籽，能餵飽自己並幫助其他農民；林懶西則是空有技術與資源，卻只能面臨挨餓的困境。後者例如麻雀集眾人之力，設下陷阱捕殺老鷹，最後再留下光明希望的結尾。這四篇文章中，只有〈春光關不住〉公開發表在《新生月刊》，<sup>47</sup>也許因為該篇結局背景設定為抗戰勝利，也提到「黃花缸」暗指「黃花崗」烈士事蹟，較容易通過監獄中監視系統的關係。

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42。

<sup>46</sup> 楊逵，〈春光關不住〉，首次發表於《新生月刊》（1957.06），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八卷，小說卷（V）》，頁235-241。

<sup>47</sup> 〈麻雀戰勝了老鷹〉、〈花瓶的故事〉、〈寶貴的種籽〉為楊逵「童話、隨筆、詩」筆記簿的手稿，楊逵生前未發表，分別收錄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710-714、715-717、427-431。

因此，從楊逵的主題選擇設定來看，獄中楊逵的書寫仍具有抵抗意識。有趣的是，當時臺灣已從日本殖民歷史中解放，楊逵卻還是不斷地反覆強調臺灣人民對霸權的反抗。楊逵在談到諺語具有反映時代下民眾心聲的特性時，提到：

時代變了，政治經濟制度變了，民族獨立，人民為主了，政府成為人民的公僕了，大家有工做，有飯吃的民有、民治、民享實現了——如前述所說的那些特殊時代的諺語，也就要成為歷史的陳跡，被搬到博物館裡去了。

48

若真如楊逵所言，國民黨統治的臺灣便與他心中理想的民主社會相差無幾，而且這些控訴當政者的諺語可留在過去，何以他依然在獄中書寫著霸權對於臺灣人民的壓迫？綠島時期的多篇作品如〈談諺語〉、〈諺語與時代〉、〈諺語四則〉，提到諺語可以反應時代與臺灣人民心聲，〈春光關不住〉更是以反侵略作為文意核心，更不用談前言提到的〈麻雀戰勝了老鷹〉等篇以強弱兩個對比形象的創作，其文學活動的思想中心延續日治時期的抵抗姿態，暗示了存在著必須抗議的威權。面對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楊逵藉著「我們祖先這種不願作奴隸的堅定精神，就表現在當時成立的『臺灣民主國』國旗上」，<sup>49</sup>提醒臺灣人民的抵禦意識更是不可丟失，以「要生存與繁衍，就一定要征服自然，也一定要防禦異族的侵犯」，<sup>50</sup>指出必要的抵抗仍須存在。也許礙於寫作背景的限制，楊逵的書寫更加隱晦，但從他一邊稱讚臺灣變成一個以人民為主的社會，一邊卻將強調臺灣主體的素材保留在他的創作之中，可能這是他對政治的期許，也可能是他對當下時局的擔憂。

回顧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文學的困境在於政治因素造成的恐懼，作家在發言中盡量遠離政治話題。當時中國國民黨利用反共文宣鞏固政權，作為國族論述與大中華思想的載體，也削弱了臺灣主體性。楊逵在獄中時遇到的情況亦是類似，反共文學無疑將臺灣文學限制於中國文化思維的範疇中。學者陳芳明評論：「國民黨為了代表中國，遂積極推動中國歷史與右翼的文學教育，而有系統地壓

<sup>48</sup> 楊逵，〈諺語與時代〉，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3。

<sup>49</sup> 楊逵，〈諺語四則〉，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74。

<sup>50</sup>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8。

制台灣本地歷史與文學的記憶。因此原來存在於島上的歷史經驗，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就完全被抽空。」<sup>51</sup>於此似乎能瞭解何以楊逵反覆重申臺灣殖民歷史，以延續入獄前追求臺灣文學獨立性。<sup>52</sup>獄中楊逵的文章提到臺灣的歷史背景，時常是遭到強勢民族的統治，他族的侵略抑或可以視為一種文化霸權侵害自主性的隱喻。反共文學的背景下，臺灣的文學文化落於邊緣化甚至成為他者（the other）時，強調臺灣族群歷史背景無疑也是避免遭到忽視的方法。

其次，楊逵重視「團結」的重要性，在〈談青年〉中提到無論是從事科學、文藝或是生產，應各有其不同的工作方式，「才可以發揮偉大的綜合力量」。<sup>53</sup>晚年他曾針對文學的團結力量清楚說明，「文學對於我，不論是今天、去年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以至於五十年前的今天，都沒有兩樣。」「一個民族如果想要成為文化大國的話，它的文學作品就應該把個別的人民連結團結成一個整體。」<sup>54</sup>顯見楊逵認為文學不應「排他」，更應「容他」的一貫思想。所以他特別強調群體的力量，對於文學的功用不僅可以團結朋友，亦可化敵為友，以團結達到共利。他書寫〈大牛和鐵犁〉寄託思想，牛與犁因私利而被分解，無法發揮它們工具的功用，最終只能看著田園荒蕪。主角兄弟倆達成合作關係才能共享安居，甚至可以共同抵抗入侵的野豬，並且共享利。正如兄弟倆的父親一開始便訓示：「我們能夠有今天這樣的安居樂業，吃得飽穿得暖，就是大家同心協力，和氣謙讓得來的。」<sup>55</sup>楊逵稱這是一部童話為體的寓言，<sup>56</sup>將「唯有團結才能將力量放大化」的意欲寄託其中。而這類的弱勢抵抗霸權的意識，正是楊逵一直以來堅持的信念。

另一方面，反共抗俄劇興起，成為戲劇界被政治意識主導的主流劇型，乃因1947年3月國防部長白崇禧抵台宣撫二二八事件，也將南京「聯勤總部特勤處演劇第三隊」調到臺灣演出不少的抗戰劇，後來這些人成為反共抗俄劇的主幹人

<sup>51</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頁288。

<sup>52</sup>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388-393。

<sup>53</sup> 楊逵，〈談青年〉，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32。

<sup>54</sup> 楊逵，〈文學可以把敵人化為朋友〉，原載於《聯合報》，1980.01.01，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203。

<sup>55</sup> 楊逵，〈大牛和鐵犁〉，原載於《東方少年》5卷7號（1958.07），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八卷，小說卷（V），頁243-247。

<sup>56</sup> 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頁200。



物。1950年3月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公開徵求反共抗俄的各類文藝，其中戲劇類的就有平劇與地方劇本、獨幕話劇本、多幕話劇本、電影分場對白劇本，高額獎金的誘惑之下，吸引大批人士創作，於是反共抗俄劇在五〇年代蓬勃發展。由於反共劇是文藝政策發展成的，是宣傳與教育的工具，內容也因為編劇思想上的服膺國策，作品漸漸千篇一律且僵化，對於觀眾而言失去欣賞的藝術價值，或是缺乏產生共鳴引起興趣的取材。<sup>57</sup>

受軍中文藝的影響，反共抗俄劇也是新生訓導處康樂活動時的戲碼之一。如前所述，反共抗俄不是楊逵創作的選項。除了大量採集歌謠諺語的實踐行動，選擇明示民間文學歷史內涵的重要性，他再度推動「文藝大眾化」的觀點，強調：

這民間藝術，都是我們民族的偉大文化遺產。儘管在某些時代——特別在日本帝國主義壓制下的五十年中受到蔑視與禁壓，一直根深蒂固保存在民眾心裡頭……（中略）為甚麼民間藝術——民歌與民舞——能夠這樣根深蒂固的呢？簡單一個話可以說，就是因為它已經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已經與吃飯、工作、戰鬥生活是分不開的了。<sup>58</sup>

除了延續楊逵原本就重視民間文藝的論點，也將這些民間藝術作為創作的素材，推動街頭劇。楊逵的街頭劇若是從戲劇的藝術技巧來看，學者的評價不高。葉振富（焦桐）認為這些劇作因為是初稿，表演手法顯得粗糙不夠完整，故事開頭格局大，劇尾卻匆匆結束。雖然這些街頭劇本大多數沒有發表的機會，但他認為楊逵的劇作顯然是反映時代的荒謬劇。<sup>59</sup>

楊逵的劇作中，角色設定通常有所象徵。鍾肇政認為楊逵的劇作是要走入民眾，演給民眾看的，而農業社會中以農民占多數人口，自然也不會有知識分子的複雜思維。<sup>60</sup>所以楊逵戲劇中的角色很多是農民。楊逵以往的作品中，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角色，透過知識分子的覺醒與知識，是帶領著群眾走向抵抗團結的改

<sup>57</sup>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 50-51、54-64。

<sup>58</sup> 楊逵，〈春天就要到了〉，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6.02），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08。

<sup>59</sup>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頁 74。

<sup>60</sup>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臺北市：台灣出版社，1998.04），頁 132。

革力量。<sup>61</sup>但是在綠島時期，楊逵小說量銳減，其中〈春光關不住〉尚有教員的角色，街頭劇中知識分子的角色是融入農民之中的，例如〈牛犁分家〉的林耕南原是教員，也是個墾荒的農夫；〈赤崁拓荒〉的王克明雖然也是墾荒的平民形象，但從拿出本子跟女兒玉珍說故事的舉止看來，顯然是識字的人。楊逵劇中角色人物性格扁平，劇情顯得較直線發展，但是因為角色貼近群眾，而且多數以團結反抗的方式對抗壓迫的勢力，也更顯得出階級反抗的氛圍。例如〈睜眼的瞎子〉和〈真是好辦法〉再度呈現楊逵階級觀點，批判林醉生以強權剝削妻兒來獲得自己的利益，小知哥則是以一個資本家的形象構築起惡相角色，呈現資本主義下強權對於弱勢的剝削的隱喻，劇情的說教與呼應國策的意味就更加明顯。林安英認為這是因為「楊逵的戲劇特色在於他的『控訴性』強、人物對比的設計成為模式；但這樣的撰寫劇本，卻一再地流於『資產家』總被抹黑成『壞角』，造成人物塑造予觀眾平板的印象。」<sup>62</sup>

另如〈勝利進行曲〉和〈光復進行曲〉宣傳意味頗濃，〈赤崁拓荒〉的對白頗有反共文藝的形態，例如：「每次我們這樣團圓吃飯的時候，我就會想起那邊患難同胞的慘狀。」<sup>63</sup>這與國民黨文宣口號非常相近，也是接受黨國教育世代民眾對於中國有著落後受難的共同印象。鍾肇政曾說：「楊氏劇作中，有不少劇情也是末尾忽然來了個轉折，形成『惡人伏誅，好人得勝』的結局，正好也證明它們有些的確是符合『當前需要』的。」但是他認為：「以當時楊逵的處境而言，這一點必是有其不得不爾的因素在內。」<sup>64</sup>不免讓人聯想反共抗俄劇的發展，連帶影響其他戲劇的內容，而楊逵劇本的結尾轉折，「符合當前需要」亦有可能。

從另一方面來看，街頭劇仍可視為一種社會劇，與當時流行的反共、懷鄉的劇情有著明顯的歧異。例如楊逵的劇本中大量使用臺語做為臺詞，並且穿插許多民間歌謠（如〈思想起〉、〈駛犁歌〉）與流行歌曲。劇本中不少部分標示唱詞但無歌譜，音樂的來源可從楊逵收集的歌譜集獲得。筆記本中存有大量的曲譜隨時讓楊逵搭配劇本使用，登台表演時載歌載舞，充滿歡樂氣氛。至於劇本故事背景

<sup>61</sup> 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卷7期，頁10-11。

<sup>62</sup> 林安英，〈楊逵戲劇作品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147。

<sup>63</sup>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頁172-173。

<sup>64</sup>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頁130-131。

多設定在荷治與日治時期的農村，劇情貼近民眾生活。如〈睜眼的瞎子〉以戰後臺灣經濟蕭條，林醉生不事生產，靠妻女養活自己，甚至以販賣女兒換取金錢之故事，批評戰後臺灣社會中醉生夢死之輩。〈真是好辦法〉以小知哥仗勢有錢拈花惹草，企圖淫人妻子反被棒打，另一方面遭到自己的妻子戴綠帽，是一部詼諧、教示意味很重的諷刺喜劇。〈豐年〉則是以農民歡喜豐收，打點起孩子的婚事的獨幕喜劇，劇情簡單，但是臺詞是類似順口溜的韻文，呈現令人熟悉的農村景致與詼諧抬槓的趣味言語。

由上述可見楊逵的情節取材不如反共抗俄劇單一化，而且幾乎是來自民眾的日常生活。對於民眾而言，這些生活日常很容易融入其中，甚至容易引起共鳴和討論。楊逵認為戲劇是綜合藝術，可說是最高的藝術，而當中他大力推廣「街頭劇」，因為街頭劇屬於流動型表演、只要簡易的樂器，在任何地點皆能粉墨登場，也能進入民眾之中表演，而民眾亦等於和演員同在舞台上，提升參與感。街頭劇聚集民眾感情，更容易組織，並與民眾生活結合。<sup>65</sup>這也是晚年楊逵提出草根文學時說的：「使讀者有興趣，所寫的內容要與日常生活有所接觸。」<sup>66</sup>對照反共文藝強調中華民族精神，楊逵的街頭劇重視人民心聲，顯得有對比上的反差。

除此之外，對於反共文學這類由上而下推動的政治文藝，顯然是以國家霸權在民眾智識上加諸意識形態，不惜翻轉人民的認同與歷史文化的認知，楊逵提出人民團結與文藝大眾化來回應，藉由文學提出「以民為主」的概念抵抗國家權力無限擴張。他說：「國父的三民主義是主張以民為主，在他心目中的政府，應該是管理人民公共事務的機構，是人民的公僕，應由人民選出它，人民也有權來罷免它。」<sup>67</sup>以中國國民黨標榜的孫文思想作為反制武器，再次強調以民為本的核心概念，又說：

三民主義是重視自由平等與人格的。我們中間不應該有婆婆與媳婦之分，

除了有意見大家誠懇討論、坦白承認自己的錯誤以求改進外，不要對他人

<sup>65</sup> 楊逵，〈談街頭劇〉，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13。

<sup>66</sup> 陳俊雄訪問，〈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先生演講會記錄〉，原載於《美麗島》111 期（1982.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40。

<sup>67</sup> 楊逵，〈諺語與時代〉，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1。

的工作方式或是私生活過於干涉，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來強迫別人。如果有人「夜郎自大」高興站在「婆婆」的地位，把別人都當做「媳婦」看待，任這種封建觀念來發揮，事事干涉、事事壓迫，那就永無安寧之日了。在這樣「婆婆有話，媳婦無嘴」的古老觀念之下，根本談不上互助合作，更談不上民族團結，那麼如何來迎頭趕上人家呢？<sup>68</sup>

楊達以「婆婆」和「媳婦」封建制度為喻，反對思想與階級強迫，認為只會造成國內不安定，人民無法團結合作。

為此楊達提供一個理想社會的想法給當政者，〈豬八戒做和尚〉中以幻燈片搭配〈禮運大同篇〉描繪理想的社會藍圖，再藉棄惡為善的豬八戒之口說：

師父，師兄啊，這樣的生活，倒也不錯呀！做大王，做元帥，發了財，但看老百姓哭哭泣泣，倒不如在這裡同他們整天笑哈哈，蹦蹦跳跳的好。連我自己也想跳起來了。我老豬，搶家劫舍搶人家的東西，力氣還是用得不少啊！如今看他們把力氣都用在生產，建設和學習上，獲得了衣食豐足，住房舒適，多好啊！不要你搶我奪，沒有盜賊，沒有乞丐，多好啊！行旅暢，教育娛樂一切大家享，多快樂啊！<sup>69</sup>

楊達希望傳達的是人民祈求安居樂業的心聲，不啻是在暗諷上位者，與其花費力氣與時間在構築反攻美夢，不如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這塊土地上建立一個桃花源的世界，提供人民一個豐衣足食的國度，這才是以民為主理念的真正實踐。

### 第三節 監獄生活與寫實主義

國家機器掌握文學導向權，加上國語運動推行，擅長使用日語創作的本土作家瞬間失語，殖民時代具有寫實主義代表性的作家，死亡的、噤聲的，亦有蹲於

<sup>68</sup> 楊達，〈談諺語〉，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98-299。

<sup>69</sup> 楊達〈豬八戒做和尚〉，原寫於 1960 年之手稿，首次刊登在楊達，《樂天派》，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二卷·戲劇卷（下）》，頁 150。



苦牢之中，文壇只剩下外省作家以他們的生命經驗進行創作。大量本土作家由於中文表達能力無法流暢，以及截然不同於反共經驗的題材敘事，註定隱沒於五〇年代文學潮流之中。楊逵當時正遠在綠島的角落，這波浪潮看似與他無關，孰不知比起獄外世界，島嶼的封閉性、軍中文藝加上監獄的規訓性質，對楊逵的創作歷程產生巨大的影響。

首先，五〇年代的文壇由中國文藝協會擔任推動政策性文藝的重要機構，在蔣經國的號召下，黨政軍全力配合，形成軍中文藝。不僅有軍中作家、軍中刊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響應反共文學，喊出「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邀請中國文藝協會到軍中舉辦多次講座，<sup>70</sup>因此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套用了中國文化協會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模式，設立文藝刊物，如 1950 創辦《軍中文摘》，1952 年創刊《青年戰士報》；1954 年設立「軍中文藝獎金」，以獎勵吸引軍中文藝的創作，提升參與度；1965 年後召開「國軍文藝大會」而後成立了「國軍新文藝運動委員會」，將文學獎的範圍擴大、獎金提高，最後培養出一批既能拿槍桿，也能拿筆桿的部隊。<sup>71</sup>

陳康芬認為，「軍中作家的大量出現，有助於國民黨不必與文人合作，便具有直接進行文化再製的能力，這不僅對於『文化霸權』的鞏固更有效力，還能主控民間社會的文化生活內容，以營造符合國民黨歷史與文化意識形態所需要的社會語境。」<sup>72</sup>意即國民黨除了將書寫權力掌握在手上，也將槍桿發到民間團體如中國文藝協會手上，借它們的書寫能力，官方與民間雙管齊下，一同進行語境的創造，利用霸權將文化深植人心，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新生訓導處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編制列在軍事機構，更是個思想改造機構。思想改造內容包含反共抗俄，新生們被要求閱讀反共教材，辦理刊物，並附和軍中文藝。獄中康樂活動也有文藝政策的色彩，例如新年時在島上演戲給當地居民觀賞，名為「春節軍民聯歡晚會」。其中所謂的「軍」其實都是思想犯。這些藝文活動與獄外正沸沸揚揚興起的反共風潮類似，並未因為綠島孤懸於太平

<sup>70</sup> 陳紀滢，《文藝運動二十五年》，頁 40-41。

<sup>71</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頁 77-78。

<sup>72</sup> 陳康芬，《斷裂與生成——臺灣五〇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10），頁 55。

洋上而得免，因此新生訓導處成了軍中文藝與監獄規訓雙重禁錮的空間。

在「軍中寫作」項目部分，新生訓導處除了辦理作文比賽，亦辦了《新生月刊》這份監獄刊物，提供稿費鼓勵新生投稿。雖然稿費不如獄外的文學獎豐厚，但對於在獄內需要靠自己籌措生活費的新生們來說，這是一筆重要的經濟來源，確實可以達到獎勵寫作的效果。其稿約開宗明義揭示以反共主題：

本刊以闡揚 國父遺教 總統言行，揭發共匪賣國，俄帝侵略之罪行，暨推廣時事瞭解，加強訓練效能，充實精神生活為宗旨。<sup>73</sup>

稿約內容顯然與獄外雜誌《文藝創作》的徵稿原則——「本會徵求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者為原則」是相呼應的。因此可以解讀《新生月刊》除了是獄中雜誌，也是軍中文藝的刊物。以時代性來看，這是國民黨在臺灣島內各個角落建立文化霸權的手法之一，目的是將臺灣建成復興大業的基地。

由此看來，楊達擔任《新生月刊》的編排，除了是編輯一份監獄雜誌，也等於在經營一份軍中反共文宣。如此則不僅要通過稿件的思想審查，也必須要符合反共抗俄的原則。獄中看過楊達發表在壁報和月刊的文章，胡子丹表示：

遺憾的很，文章的主題雖佳，反共又抗俄，詞句的確不敢恭維，日文式的，台語式的，極其忍耐地每篇都讀完了，我總想在字裡行間發掘些什麼。<sup>74</sup>

鍾逸人回憶楊達必須配合上級要求時也說：「他每個月得寫那些『反共八股』、『歌功頌德』、『無病呻吟』的文章給『政戰部』。」<sup>75</sup>可見楊達和獄外作家一樣，除了書寫工具的轉換，也無可避免地受到反共文藝的影響，面臨順應國策的問題。獄外作家尚能決定棄筆或沉默，楊達卻因為所處場域的特殊性，連閉嘴的權利都沒有。監獄內被套上思想改造檢視機制與反共文藝運動的雙重枷鎖，形成雙重的全

<sup>73</sup> 楊達，《新生月刊》（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1955.04）。

<sup>74</sup>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頁 343。

<sup>75</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6。

景敞視，強迫性也因為離島封閉性質而提高，幾乎無可遁逃。無法倖免於此的楊達被迫必須配合文藝政策而提筆。不反共的社會主義者被迫書寫反共文學，同時面對國策和監獄文藝的兩種壓迫，寫作難度勢必增加。

作家鍾肇政曾在晚年的演講中表示，戒嚴時期的寫作禁忌太多了，若要書寫社會批判的題材格外危險，舉筆時要格外小心翼翼，必須委婉且不著痕跡。<sup>76</sup>畢竟在他之前，文壇前輩有的以思想犯身分入獄，有的以顛覆國家罪名處死。楊達晚年在閱讀《姜貴自選集》後，亦曾引後記的心得寫下了：「無奈的是，假如寫作的尺度為十寸，在作者提筆要寫時，因為處於當下社會等現實因素，憑良心說，他不能不慎重，有時自我約束，寫到九寸為止」<sup>77</sup>的文句，顯然相當瞭解姜貴那種寫作時自縛的掙扎與無奈，在戒嚴時期與警總監視下的自行規訓。這也代表當時作家所能選擇的書寫策略，首先必須要想方設法逃過思想檢視系統。

與楊達 1949 年入獄之前的創作文類內容相比，綠島時期的作品之中，家書、隨筆散文與劇本是主要體裁。而家書的親情聯繫與散文的生活敘事之取材，只要避開對於現況的不滿，純粹個人情感抒發或客觀記事較容易通過思想檢視。例如以日記體書寫的〈園丁日記〉，記錄隊上的曬衣場開闢成花圃，因為氣候炎熱，決定在花圃中間種樹，進而前往山上移植一棵大樹的過程。全文焦點放在植樹、護樹的行為，情感也聚焦在期待大樹種活的希望上，最後再獲得「所有有利人群的各種事業，就是這樣被繼承、擴大、充實起來的」<sup>78</sup>的感想，全文充滿著樂觀積極的氣氛，是一篇鼓舞人心且值得刊登的好作品。

然而，若明白新生訓導處規訓生活的背景，便能發現「隊上決定在晒衣場作一個花圃」，「李幹事帶差，我們一行四個人上山找榕樹」，<sup>79</sup>其實是堅獄內基礎建設的公差，正是監獄以勞役馴服犯人肉體的手段之一。楊達不明說，也不表示任何意見，僅以客觀事實呈現。以「沒有砍幾下，爬進了滿褲裡的螞蟻作怪了，又癢又痛。比米粒大得多的大群螞蟻，成群的游擊，叫我無法對付。尤其躲在要害處，打不能打，抓又抓不盡」，暗指勞役的辛苦，與無法反抗只能承受的無奈。

<sup>76</sup>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台灣文學十講》，頁 260-261。

<sup>77</sup> 楊達，〈姜貴是我最敬愛的一人〉，原載於《聯合報》，1980.12.2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17。

<sup>78</sup> 楊達，〈園丁日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44。

<sup>79</sup> 楊達，〈園丁日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37-338。

但楊達接著以「我們不屈服。輪流砍，輪流與滿身的螞蟻作戰，終於把這根很粗很粗的樹砍斷，轟然一聲把它推下來了」，<sup>80</sup>出現堅強抵抗的姿態。此時螞蟻與大樹便象徵了霸權，他們通力合作終於推倒，暗喻意味濃厚。文中人物對於勞務不僅不覺苦，反而是「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幹得很起勁」，<sup>81</sup>這並非是楊達阿諛逢迎，而是他本身就有「勞動神聖」的社會主義思想。如此書寫，不僅避免怨懟情緒出現在字裡行間，又可以藉由象徵和隱喻手法，將他反壓迫的思想寄託其中。

其次，楊達的寫作手法因遣詞用字更加謹慎，而多了幾分委婉。若是評論文章，內容多選擇文藝的探討與寫作技巧的分享。例如〈評「金公子娶親」〉一文，是楊達看完第五中隊演出的歌劇後的心得感想，也是他在獄中唯一一篇戲評。除了簡略說明故事主題，全文針對戲劇的形式、音樂、佈景、燈光、演員演技、分幕技巧、導演的素質到團隊合作，鉅細靡遺，是一篇非常到位的戲劇分析。但從楊達的評論看來，〈金公子娶親〉只是一齣實驗性高的戲劇，尚有許多不足之處，何以楊達特地寫評刊登於《新生活壁報》？細究其中，會發現楊達花較多篇幅在討論音樂於戲劇上的運用，甚至提到：

歌劇是用音樂來配合整齣戲進行時的，喜怒哀樂的樂曲與每一個場面，每個角色的情緒都要配合的恰當，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情調也要配合的適當，才能充分發揮效果。在這一點，「金公子娶親」還沒做到理想的境地。<sup>82</sup>

如前文所述，楊達劇本中對於民歌的使用，相當注意曲調性質與劇情安排的關係，而楊達提倡的街頭劇，本質上就是民歌民舞與戲劇的結合。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金公子娶親〉的評論，也是楊達戲劇創作觀的延伸。

此外，以〈評「金公子娶親」〉是戲評的性質出發，文末出現的心得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楊達先是寫道：

<sup>80</sup> 楊達，〈園丁日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40。

<sup>81</sup> 楊達，〈園丁日記〉，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37。

<sup>82</sup> 楊達，〈評「金公子娶親」〉，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7.03），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365。



這次演出成功，我認為導演的虛心坦懷，肯聽人家的意見，高興接受人家的批評，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sup>83</sup>

導演是戲劇的領導與靈魂，乍看之下，楊逵稱讚導演的虛心接受與演出成功有相當關係，但是接著又以下文作結：

個人的工作尚且如此，需要多數人合作的演劇要是缺乏了人和，便沒有辦法搞得很好。我們中間很少內行的，有的只有一隻眼，有的只有一隻手，一隻腳的，除了通力合作，要做出一項像樣的東西絕不可能。我們一定要虛心坦懷，聽人的意見，接受人家的批評，才能做出美滿宏偉的事業。要不然，你固執你的偏見，我固執我的成見，吵々鬧々，便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樣子，再要向前推進是更不可能的了。<sup>84</sup>

一篇戲劇評議，最後以合作、接受批評作結，與戲劇本身的主題和藝術性沒有直接相關。若楊逵不是偏題，那麼便是苦心造詣的婉曲手法，以導演為戲劇的領導角色，談及「虛心接納他人意見」，似乎意指對於當權者呈上善意的建言。

再者，楊逵的取材策略較日治時期來得更加隱晦與迂迴，應該是不得不配合被迫交出無病呻吟的反共八股文給政戰部，又要避免思想檢視所致。<sup>85</sup>從取材的技術層面而言，楊逵兼顧了表面回應當局的期待，實地裡不放棄信念的原則，利用配合政策挑選題材作為保護色。例如在各紀念節日書寫特刊，於光復節撰寫〈光復話當年〉，<sup>86</sup>內容卻是強調反侵略、反剝削、反歧視與反壓迫。在青年節撰寫〈談青年〉，<sup>87</sup>灌輸青年追求真知、團結以及大同世界的理想。另外，楊逵創作了一首名為〈我要克難一把琴〉的民歌，與綠島監獄內的政治犯自建克難房及自製克難樂器一樣，留下響應克難運動<sup>88</sup>的痕跡，作為響應軍中文藝的方式。歌詞內容為：

<sup>83</sup> 楊逵，〈評「金公子娶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67。

<sup>84</sup> 楊逵，〈評「金公子娶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68。

<sup>85</sup>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頁 366。

<sup>86</sup> 楊逵，〈光復話當年〉，首次發表於《新生活壁報》（1953.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269。

<sup>87</sup> 楊逵，〈談青年〉，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31-335。

<sup>88</sup> 當時軍中文藝的具體實踐，在蔣經國有感於從海南島退到臺灣的部隊過著克難的生活，而在

患難夫妻異床眠  
離散兒女好久不見面  
破碎家宅何時整  
香蕉樹下看月圓

民國四五希望年  
我要克難一把琴  
藏我的心送你們  
願它帶回美妙音

指頭一撥音清新  
喜怒哀樂一陣陣  
其樂融融彈不盡  
彈到雞啼天大明<sup>89</sup>



歌詞首段開門見山指出作者家破人離的境遇，也映照出所有被囚禁於新生訓導處的犯人「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的心酸。楊逵雖然應和了克難運動，在詩中作了一把琴，卻與蔣經國提倡軍中克難「吃得苦中苦」的精神略有差異，成為寄送親情想念的媒介。末段楊逵藉著彈不盡的琴音表達無盡的相思，直到「雞啼天大明」象徵期待與家人重聚的未來。該詩亦可證明楊逵的響應動作，往往都是另有寓意的。因此，從楊逵寫作手法、取材內容可以看得出楊逵的書寫策略，並非只是一味迎合國策或屈服於規訓之下，他被迫投稿和編輯刊物，忍讓和迂迴其實是讓自己的文學生命有存續的機會，才能持續堅持他的文藝思想。

在楊逵綠島時期的文學活動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

---

1951年1月1日舉辦「克難英雄表揚大會」，進而推動克難運動。當時國防部軍聞社社長漆高儒解釋運動的精神意涵在於：「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險，吃人家所不敢吃的苦，負人家所不肯負的責，忍人家所不願忍的氣。」而後1965年蔣經國亦說明克難運動確實是在建立中心領導，也是為了在當時受挫的環境穩定軍心、建立信心。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臺北市：商務印書館，2003.06）頁263-264。

<sup>89</sup> 楊逵，〈我要克難一把琴〉，1956年作，引自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449-450。

因為這兩份刊物對楊逵而言，除了可作為文學理論發表的舞臺，更是新生訓導處將反共抗俄的徵稿要求設定好之後，主動將編輯權放到楊逵的手上，使他握有刊物主題思想的決策權力。1947 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Lewin 提出「守門人概念」，他定義所謂的「守門人」就是容許訊息通過關卡的人，甚至在生產過程中握有決策權。1950 年 White 最早將守門人理論運用在媒體組織上，將編輯視為守門人，藉著分析編輯者在取捨新聞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後，發現新聞選擇的認定很主觀，訊息是否被選擇為新聞以及如何被報導，皆取決於守門人。<sup>90</sup>戰後初期，楊風和楊逵合作編纂《臺灣文學叢刊》，兩人對於臺灣文學的定義不同，由於楊逵負責編輯工作，選文編排皆由他處理，最後《臺灣文學叢刊》的內容被視為楊逵本人的思想呈現。<sup>91</sup>因此，即使獄中的作品仍須接受檢視，楊逵可以扮演「守門人」，握有決策權，在監獄極為有限的編輯權中，取捨讓閱聽者獲得的訊息。

較為可惜的是，目前現存新生訓導處的《新生月刊》僅見於楊逵遺物，是他以刊物封面裝訂整理他在此發表的作品，而壁報目前也查無檔案留存，無法解讀編選文章的邏輯與原則。但是楊逵在雜文中表達了對於編選與寫作的觀點。例如〈貧血的「新生月刊」〉對於刊物的編寫發表以下的看法：

寫文章的只在形式上變花樣，編排的也就只是在版面上動動腦筋，自然沒辦法提高讀者的興趣，鼓起讀者的精神。怪不得有人說：作者比讀者多了。一本雜誌要辦得有生氣；活潑精彩，就必須針對現實生活，使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去發現缺點，追求真理，這樣才有進步之可言。<sup>92</sup>

楊逵以「作者比讀者多了」，指出《新生月刊》縱使願意書寫的人多，願意閱讀的人卻少了，難以吸引讀者閱讀的問題。其因在於不管寫文章或編輯都只在意形式，導致實質內容的貧乏。

前引這段話所說《新生月刊》在作者與編輯上的兩個弊病：一是投稿的人只

<sup>90</sup> 黃柏堯、邱銘心，〈新聞記者網路之資訊尋求行為與資訊焦慮產生對守門行為影響之初探〉，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2010 海峽兩岸資訊圖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B 輯》（臺北市：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2010.07），頁 382-383。

<sup>91</sup>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頁 219-220。

<sup>92</sup> 楊逵，〈貧血的「新生月刊」〉，彭小妍，《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99。

注意形式的變化，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受刑人逐漸適應脫離社會的監獄環境，行為上趨於被動依賴，思想漸漸停滯，對周遭事物失去關心，缺乏人際信任，具有較高的受暗示性等監獄化之現象。<sup>93</sup>再加上獄中書寫受到規訓的限制，導致眾人的作品逐漸失去文學的活性。二是負責編排的人雖然握有決策權，卻無法善用，並且消極處理，將自己變成調整版面的工具人。藉此，楊達想提醒負責編輯的人，編輯刊物仍須符合現實，從生活中尋求進步，寫實路線才是解決刊物貧血，活潑精彩以吸引讀者的解方。如果作者的主題不明確，便不能獲得讀者回響。所以「作者應該努力與大眾生活在一起，思想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這樣才不致成為特殊人物。以群眾的利益為利益，清楚瞭解群眾喜怒哀樂的根源。這樣才不致與讀者處處脫節。」<sup>94</sup>楊達認為若非立基於現實題材上，即使作者能洞察世情與發掘社會陳腐，亦無法在讀者間推動改革。看來楊達意在官方刊物平臺上掀起一場雙向的文學交流，當中的主題是否能涉及作者與讀者之間共同經驗，會影響文學是否能產生共鳴。

既然楊達希望編者所編選出來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會知道如何挑選作者的文章內容，因此當獄友問楊達「怎樣才能寫好文章？」時，他陸續在 1957 年的 1 月、2 月及 4 月的《新生活壁報》上刊載〈談寫作〉、〈什麼是好文章〉、〈文章的味道〉、〈文章的真實性〉，教導獄友認識寫實主義以及創作的基本概念。〈談寫作〉中昭示，「文章是人類生活的反映，那麼，任何一段有意義的生活，把它記錄下來都是很有意義的。」<sup>95</sup>作者以文藝的方式表現生活中能觸發感情的事物，對於讀者來說，這種經驗分享很有感觸。生活紀錄必須具有真實性，畢竟虛玄的內容是無法引起真實感情，無病呻吟也不能產生共鳴。真實的事物會引起讀者的興趣，進而試圖理解、探索。楊達於〈文章的真實性〉則說明這樣的探索，「這就是人類的求知求真的本能發作，這發作便是興趣的根源。」<sup>96</sup>接著在〈什麼是好文章？〉明指真正的好文章必須能反映人生與時代，內容必須真實不可空

<sup>93</sup> 楊士隆，《犯罪心理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09），頁 305-306。

<sup>94</sup> 楊達，〈作者與讀者〉，原為新生筆記簿（2）之手稿，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頁 679。

<sup>95</sup> 楊達，〈談寫作〉，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74、352。

<sup>96</sup> 楊達〈文章的真實性〉，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70-373。



洞，才能引人回應且體會人生的理念。<sup>97</sup>主題的選擇最好帶有指導性與啟發性，並非只憑個人喜好而不注意讀者所關心的。楊逵於〈文章的味道〉舉例日治時流行一時的私小說，寫的是作者狹窄的生活內容，和大眾想要關注的相差甚遠，最後被自然淘汰，故楊逵認為普遍性和時代性是寫作的基本原則。<sup>98</sup>雖然缺乏史料證明這四篇文章發表時，楊逵是否同時擔任編輯，但是他對於寫作的看法亦可視為擔任編輯時的編選原則。

綜合上述，這些寫作教學文的文學思想，也就是楊逵在日治時就主張的「文藝大眾化」和「寫實主義」的延續。在 1935 年發表的〈藝術是大眾的〉（〈藝術は大眾のものである〉）中，楊逵認為鑑賞對象必須關注到大眾，因為「真正鑑賞藝術的是大眾，只有少數人理解的不是藝術！真正的藝術是擄獲大眾的感情、撼動他們心魂的作品。」<sup>99</sup>文學最終仍需要讓大眾都能閱讀與理解，並且產生共同的想法與感受。因此在〈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批評の基準〉）中，楊逵說：

那麼，所謂原本的文藝，到底是為誰而存在呢？所謂原本的文藝，是為了把作者의思想和感情傳遞給他人的一種手段，既然如此，作者出於自己的立場（是否贊成現有體制，如果不贊成，又渴求那一種體制），以同情自己立場的社會階層為主，當然要盡量讓更多的人來閱讀。因此，作者要以適當的事件和人物來描寫群眾의思想和感情，當然要使更多的讀者和自己來產生休戚與共的感受。<sup>100</sup>

這種用自己的立場來描寫群眾的共同情感，藉著個體真實性的觸發，與全體產生連結，達到普遍性與時代性的要求，吸引眾人產生「休戚與共的感受」，便是楊逵向來主張的寫實主義文學理論。

至於寫實主義的內涵，楊逵在〈新文學管見〉中有以下的詮釋：

<sup>97</sup> 楊逵，〈什麼是好文章？〉，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356-357。

<sup>98</sup> 楊逵，〈文章的味道〉，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359-364。

<sup>99</sup> 楊逵，〈藝術是大眾的〉，原載於《臺灣文藝》2 卷 2 號（1935.02），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40。

<sup>100</sup> 楊逵，〈文藝批評的標準〉，原載於《臺灣文藝》2 卷 4 號（1935.04），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167。

寫實主義是要在自然、人生、社會的真實性中了解這些概念，絕對不是唯心式的觀念論，也不是唯物式的機械論。寫實主義並非是把個體當成個體來觀察，而是把個體當做全體中的一部分來觀察，並試圖由個體與全體的相互關係、全體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來了解個體。所謂「見樹不見林」這類的想法，和寫實主義是無緣的。<sup>101</sup>

按照楊逵「文藝大眾化」、「寫實主義」、「文學必須具有指導性與啟發性」的思維邏輯，以及握有編輯的「守門人權力」來看，楊逵在獄中的寫作系列文已然不是單純的寫作指導，新文學思想理論的教育灌輸意涵濃厚。楊逵利用作者身分以指導寫作為由，向讀者介紹寫實主義與大眾化的觀念；亦可利用《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的編輯權，挑選出想讓閱聽者接受的合適文章。由於這些活動都是在全景敞視的監控下進行，由此可知楊逵的思想在規訓之下尚能流動。



---

<sup>101</sup> 楊逵，〈新文學管見〉，原載於《臺灣新聞》，1935.07.29 至 08.14，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頁 315。



## 第六章 結論

1949 年四六事件發生，除了臺大、師院的學生相繼被捕，楊逵與數位文化界的人士也被警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帶走。這是國民黨鞏固在臺政權的必要行動，被視為白色恐怖時期的濫觴，從此楊逵進入人生中最漫長的一段監禁歲月。一般皆知，〈和平宣言〉是楊逵入獄的導火線。其中真正的理由，從判決書中的「楊逵自稱是共產主義理想者」，看得出國民黨早就將他視為地下組織相關人員，在四六事件中列入第一波肅清的名單，證明楊逵的左翼思想是當局的逆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檔案資料，與楊逵入獄約兩年所寫的〈自傳〉顯示，楊逵入獄時間在 1949 年 4 月 7 日，而非過去以為的 4 月 6 日。

雖然楊逵被捕後未被酷刑以待，更有米少校的照拂，但是軍法處粗糙的秘密判決流程，讓楊逵無法像日治時期一樣為自己辯解。結果是〈和平宣言〉作為罪證，依〈懲治叛亂條例〉第 8 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的「叛亂罪」，判處監禁 12 年。由於保安處大量逮捕犯人，導致軍人監獄人滿為患，故政治犯逐漸被移往綠島新設置的新生訓導處。楊逵於 1951 年 8 月 1 日被移送綠島，雖非所謂的第一批犯人，但也是新生訓導處最初期稍晚登島的政治犯，經歷了新生訓導處的草創時期。

新生訓導處的管理方式建構在規訓理論上，將犯人依照特長進行分類編碼，讓政治犯自己蓋監獄關自己。綠島生活條件差，犯人要想辦法種植生產養活自己，因此新生訓導處的生活充填大量的勞役，使肉體勞苦。另外，在密集的時間表上安排思想改造課程，而且多是反共抗俄內容，必須進行小組討論。討論時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因為這裡充滿著監視的系統，讓犯人無所遁形。

楊逵在綠島嚴密的監控下生存將近 10 年之久，晚年受訪的談話紀錄中卻鮮少提及監獄生活概況。本文藉由同時期新生訓導處受難者的口述紀錄，試圖勾畫出楊逵綠島生活的樣貌。由此獲知楊逵以政治思想犯身分入獄，每天接受思想改造課程與勞役工作，小組討論是他最不喜歡的時間，因為常常被點名發言，連自由選擇發言的權力都沒有。被分在生產班的楊逵，負責農作物的種植。他不抗拒勞役，在於勞動恰可鍛鍊他病弱的身體。另外，他被派以管理報紙的工作，反而



提供了楊達掌握獄外時事訊息的媒介，得以向獄友精闢地分析國際形勢，可見獄中的楊達並非如一般想像的，對於獄外世界無所知地處於封閉的狀態。所以當1958年國民黨當局借調楊達，想安排他到日本滲透廖文毅組織時，楊達才能冷靜分析情況並展開談判。

另一方面，綠島時期的楊達以一本國語字典勤奮學習北京話文書寫。新生訓導處呼應軍中文藝，時常舉行反共康樂活動，也促成楊達在此時大量創作劇本。在獄友眼中有著「大作家」響亮名號的楊達，其堅毅的形象無疑是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與他病弱的外貌產生對比。永不放棄的精神與樂觀的態度，讓楊達在勞役生活中自樂，在他人眼中有著不凡的印象。而楊達愛喝酒一事也令獄友記憶深刻，雖然喝酒是新生普遍有的習慣，養生之外，也可以藉由酒精麻痺被迫入獄的鬱悶。樂觀積極的楊達，在病體與失去自由的境況下，難免有陰暗的心境，便藉著和獄友飲酒酬唱，達到集體自療與精神解放的效果，提升面對困境的勇氣。

對楊達來說，這段囚禁歲月中最放不下的是家人，大量的家書為他構築出與家人同在的橋梁。新生訓導處不阻止家人來訪，除了長女楊秀娥之外，其餘的家人都曾上島去探望楊達，所以獄中的楊達雖然失去了自由，仍有機會和家人團聚。在白色恐怖的背景與貧困如病毒入侵家人的生命情形下，楊達以家書為媒介努力為家人療病，大量的家書也成為當時楊達與家人互動的紀錄。1958年間因國民黨想借調楊達滲透廖文毅組織，1月19日至4月20日，楊達被借調到臺北。和特務單位進行談判過程中，楊達獲得了暫時離開綠島與家人短暫相聚的機會。談判破裂後，楊達再度回到綠島，直到1961年4月6日出獄。

依照獄中制度，服刑期滿出獄之前，考核官會將〈逐月考核總結〉表整理成〈新生處理考核表〉，楊達的考核表評語中提到「思想已改正」，乃是根據總平均77.2分。只是無法被量化的思想用數字來評斷，並不能證明楊達的思想是否改變。必須交代的「教化心得」中，楊達填寫「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也並非為了迎合當局，否定之前自己的運動路線以及社會主義的信仰，而是呈現楊達認為三民主義即是一種社會主義的一貫認知。從楊達提到的「日常生活的自治訓練是民權主義的堅實基礎」，不難看出他對自由民主社會的期待，此與他在戰後追求臺灣自治的理想不謀而合。

文學活動方面，綠島時期是楊達大量創作的最後一個階段，但是在國語運動、

反共文學與監獄封閉的環境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國語運動使得臺灣的日文作家喪失書寫能力，也剝奪本土族群的認同感與歷史文化的記憶。反共文藝的文學政治化，也導致文學走向只能是主題單一化的反共戰鬥文藝，具有高度的宣傳意涵，致使文學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脫離臺灣多數人的生活經驗與感受。監獄書寫一方面受到規訓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受到軍中文藝的束縛，獄中唯二能發表創作的刊物《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本質上也是反共文學的展演場所。楊達受到多重的語境限制，卻仍能進行創作活動、編輯活動與采風活動，這些文學活動均須在規訓與監控下進行，難度很高。

創作活動部分，家書除外，楊達其他文類的獄中書寫運用正向的景物符號，製造出熱鬧群像，時空具有流動感，有別於其他監獄書寫的悲傷色彩，且多客觀情感描述，可避免思想檢視。楊達也時常以象徵和隱喻的手法寄託希望與理想，向獄友傳達不屈不撓的精神，原因在於他認為作家的任務就是要傳達光明的意象。創作同時，楊達被委以編輯《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雖然沒有足夠史料得知楊達的編輯原則，但從他的寫作教學相關文章，可以瞭解楊達重視文章真實性，以及貼近讀者生活經驗的內容。

創作與編輯刊物之外，以綠島監獄內來自大江南北的獄友為主要對象，楊達採集了包含歌譜與謠諺等豐富的民間文學。歌譜集成了楊達編寫街頭劇的材料，民歌民舞與戲劇的揉合，創新之餘也遵循民謠創造的傳統精神，呈現最貼近民眾的情感與生活。至於謠諺題材繁多，呈現民間文化和臺灣多元族群語言的多樣性，保存了許多知識與先民智慧，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符合楊達文藝大眾化的理念，自然也是他採集的目標與緣由。

事實上，楊達綠島時期文學活動的活躍，與時代背景有密切關係，可視為他的書寫策略與時代的對話。面對國語政策的桎梏，楊達進行大量採集活動，收錄多元語言的民間文藝，並在他的街頭劇中大量運用這些素材，可以說是以實際行動傳承本土語言，以及對於國語政策的抵抗。其次，面對反共文學的浪潮，社會主義者的楊達並不反對共產主義，因此用臺灣抵抗殖民政權的歷史素材，傳遞反霸權的暗示；也營造了許多強弱對比的角色，寄寓反階級壓迫的訴求。楊達還多次提到團結的重要，藉此將族群間的差異融合，最終走向大同世界。受到獄中監視的箝制，被迫寫作和編輯時，楊達則會用客觀敘述、隱喻象徵、題材選擇等書

寫策略以迴避思想檢視，並且反過來利用上級長官賦予他有限的編輯權力，在《新生活壁報》和《新生月刊》上教導寫實主義的創作思想。雖然書寫更顯得迂迴隱藏，但是楊逵的創作觀點和入獄前是一致的，並未因為被囚禁而有所不同。

楊逵出獄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經濟窘迫和身體的病弱，只能將心力放在東海花園的經營上。直到 1976 年，國立編譯館將〈春光關不住〉改題為〈壓不扁的玫瑰花〉，編入國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冊後，原本被淡忘的楊逵以抗日作家重新回到世人眼前，〈送報伕〉的抵抗精神被不斷傳頌。七〇年代復出的時候，楊逵提出了「草根文學」的三要點：

第一、使用通俗的語言，平實的技巧，讓一般識字的人看得懂，念給文盲也聽得懂。

第二、情節要帶有趣味性，能夠吸引讀者有繼續讀下去的興趣。

第三、取材於一般人日常生活，反映時代的社會事實，健康的，能振奮人心的。<sup>1</sup>



如此看來，草根文化與他在獄中寫作指導系列文章所強調的，「文章是反映人生的」、「反映時代的真實內容」、「帶有指導與啟發作用的」、「能產生共鳴的」有相同的理念。

出獄後的楊逵受限於戒嚴與經濟困境而曾經沉寂，七〇年代復出後提出草根文學的理念，提倡重建臺灣文化史和抗日史，<sup>2</sup>以及對於「統一」與「一統」不同概念的詮釋，展現他的民主原則與反壓迫的政治理想，在在都與他獄中書寫的題材互相呼應。五〇年代在獄中的楊逵，上承四〇年代的政治與文學思想，下啟七〇年代草根文學的發展，最後再重新投入社會政治運動，皆可說明楊逵的社會主義思想，未曾因為牢獄之災而有所改變，與他筆下的玫瑰花從水泥塊的隙縫，抽出枝條長出花苞一般。正如他晚年對綠島時期作品〈春光關不住〉的詮釋：

<sup>1</sup> 楊逵，〈「草根文化」的再出發——從文學到政治〉，原載於《壓不扁的玫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5），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頁 428。

<sup>2</sup> 楊逵，〈刻不容緩的「臺灣抗日史」〉，原載於《遠東人雜誌》34 期（1976.10），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173-174。

寫這篇文章的原創力是當時我常常想自己雖只是一個四十公斤重的雞蛋，沒有力量抵抗頑石、強權，前後被捕了十餘次，但我每一次都是手鐐、腳鐐，臉上戴著微笑上法庭、上監獄。他們雖然關了我十餘年，卻永遠沒辦法改變我的思想與意識形態，而且春光是關不住的，我相信總一天一定可以看到燦爛的春光，於是我寫了這篇小說。<sup>3</sup>

監獄可以關住楊逵十餘年，卻關不住燦爛的春光。由此看來，創作〈春光關不住〉這篇小說，無疑是獄中的楊逵維持一貫思想，未曾屈服於思想改造的證明。



---

<sup>3</sup> 陳春美訪問，〈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訪人道的社會主義者楊逵〉，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頁 270。





## 附錄

### 附錄一：楊達的〈逐月考核總結〉

1953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之 平均分 數	思想		62	42 年度					
	學習		63.2						
	生活		65.4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情緒 安定	學習 平常	能守 隊規	思想無 改進	學習 欠佳	服務 尚可	較前有 進步	學習欠努 力	服務 尚可
評分	60	61	63	60	61	63	64	61	63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 有改 進	學習 欠熱 心	須多 努力	言行 不一	學習 敷衍	工作 尚佳	未有 改進	學習 敷衍	工作 尚佳
評分	66	62	65	64	62	66	64	62	68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 無改 進	學習 敷衍	工作 負責	思想無 多大改 變	學習 平凡	工作 尚可	未見 改進	學習 欠佳	工作 努力
評分	64	63	70	65	64	70	64	63	70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情緒 低落	學習 不佳	工作 不力	未有 改進	情緒 不安	工作 平常	未有 改進	學習欠熱 心	工作 平常
評分	63	63	68	64	63	68	63	64	68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4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65.8		43 年度					
	學習	67.2							
	生活	68.7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略有 進步	學習 尚佳	服務 努力	未見 改進	學習 平常	服務 平常	未有 改進	研究尚 熱心	服務 平常
評分	65	66	69	65	66	69	65	68	68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未見 改進	學習 尚勤	工作 欠佳	未有 改進	學習 欠佳	服務 平常	精神 欠佳	學習 平常	服務 尚可
評分	65	69	68	65	68	68	65	68	69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未見 改進	學無 進步	服務 不力	未見 改進	不夠 積極	服務 尚可	有待 改進	學習 欠佳	工作 不力
評分	65	68	68	65	68	69	65	68	68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略有 進步	有進 取心	工作較 前努力	未有 改進	欠熱心	工作 尚可	未有顯 明的改 進	學習 平常	服務精 神普通
評分	68	69	70	67	68	70	67	67	70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5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1.4		44 年度				
	學習		72.6						
	生活		75.2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略有 進步	學習 尚可	服務 努力	未見 改進	學習 平常	工作 執石	略有 進步	學習 尚可	服務 努力
評分	68	70	71	68	70	72	69	71	74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行 正執	學習 平常	服務 努力	品行 良好	學習 平凡	服務 努力	略有 進步	細心 研究	負責 守紀
評分	70	71	75	70	72	75	72	72	75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行 正確	學習 細心	工作 熱誠	精神 良好	學習 尚可	服務 努力	精神 較好	學習 熱心	工作 熱心
評分	73	73	75	75	74	78	75	76	78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有 進步	學習 努力	對人 和藹	思想有 改正	學習 虛心	工作 努力	坦白 誠懇	研究 細心	工作 負責
評分	78	76	78	78	77	78	78	78	78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6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8.7	45 年度					
	學習		79.1						
	生活		79.6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略有 進步	研究 虛心	服從 負責	言論 正確	學習 努力	負責 守紀	思想有 改進	學習 認真	工作 積極
評分	78	77	78	78	78	78	78	78	79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論 正確	學習 虛心	工作 積極	思想 純正	學習 熱心	工作 努力	言論 正確	學習 用心	工作 積極
評分	79	78	79	82	83	85	83	83	85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論 正確	虛心 學習	負責 守紀	認識 正確	學習 努力	服務 熱心	有遠大 的理想	研究學 問是他 的興趣	抱病工 作能耐 勞吃苦
評分	84	83	86	85	85	86	80	83	85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見解尚 正確	尚能注 意學習	有禮貌 有責任 感	思想 進步	學習 努力	工作 努力	認識 正確	學習 熱心	工作努 力表現
評分	70	75	78	75	75	75	79	78	81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7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8.5		46 年度				
	學習		89.3						
	生活		77.8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睨□ 正確	學習 欠佳	耐性 有恆	見解無 甚偏頗	熱心 學習	工作 負責	理想 甚高	肯研究	遵守 隊規
評分	79	70	80	78	80	78	80	80	76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理想 遠大	很有 進步	負責	言論積 極認識 正確	虛心	工作積 極守規	思想尚 屬純正	學習 用心	工作欠 努力未 能盡責
評分	78	78	75	85	80	79	76	78	66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見解 透徹	努力 實作	奉公 守法	見解 正確	注意 學習	生活有 規律	認識 正確	自我 學習	守紀
評分	80	85	89	78	78	78	78	72	75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信仰主 義充滿 必勝信 念	能利用 機會學 習	為團體 爭榮譽	觀念欠 正確	頗能 上進	工作日 趨積極	滿意現 狀行動 積極	能利用 機會學 習	心安性 定工作 努力
評分	81	83	80	75	78	80	75	78	78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8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8		47 年度					
	學習	78.1							
	生活	76.1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該新生 47.1.19 至 47.4.20 調司令部公差								
評分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有 進步	用心 學習	守法紀	思想有 進步	自我 學習	工作 努力
評分				78	75	78	79	80	80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有 進步	文詞 簡練	守法紀	認識 正確	學習實 作很用 心	不怕 艱辛	思想有 進步	能實作	欠守紀
評分	78	77	80	79	80	80	78	75	58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論無 偏差	努力 學習	有榮 譽感	認識 正確	虛心 學習	守法紀	認識 正確	肯用功 學習	勤勞 精神
評分	75	78	78	78	80	80	77	82	75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59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5.1		48 年度				
	學習		75.1						
	生活		76.3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認識 正確	用心學 習內容 充實	工作 良好	認識 正確	認真 學習	生活 規律	認識 尚可	學習 用心	生活 規律
評分	78	81	79	75	70	78	65	65	73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看法 正確	用心 學習	工作 努力	認識可 以精神 可嘉	虛心 學習	工作 努力	觀念 正確	肯用功	責任 心重
評分	74	75	74	77	78	78	77	76	76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認識可 以有悔 改之意	自動 學習	工作 尚可	認識 可以	主動 自修	服務 良好	見解 正確	按時 上課	守法 重紀
評分	77	78	74	78	77	79	77	78	78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見解 正確	學習 努力	工作 可以	見解 正確	學習 正常	能遵守 隊規	觀念 正確	學習 努力	尚可
評分	78	78	77	78	78	76	76	77	74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1960 年〈逐月考核總結〉

一年 之平 均分 數	思想		75.2		49 年度				
	學習		77.1						
	生活		77.2						
月別	1			2			3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言論無 偏差	學習 良好	能守 隊規	言行 隨便	學習尚 正常	生活尚 正常	奉公守 法言行 正常	求知認 真工不 忘讀	服務認 真負責 盡職
評分	73	74	73	69	73	72	78	78	78
月別	4			5			6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見解 正確	虛心 向上	熱心助 人工作 努力	心地善 良大有 改觀	對學習 有趣	工作熱 心負責	心理 正常	學習有 興趣	生活有 規律
評分	76	78	80	77	78	80	78	76	74
月別	7			8			9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觀念正 確表現 良好	自修 不倦	工作負 責熱心 自動	思想 進步	努力 向學	熱心 服務	觀念尚 有見地	學有 心得	工作 負責
評分	79	79	80	78	78	78	80	79	79
月別	10			11			12		
項目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思想	學習	生活
考核 結評	思想有 進步	勤學	生活 正常	已有 進步	學而 不倦	能守 隊規	觀念無 偏差	學習有 興趣	生活 正常
評分	78	80	80	70	80	78	70	80	79

大隊長 徐子勳      中隊長 汪午喬      分隊長 曾正綱  
 複核官 副大隊長      初核官 副課長 楊業登      考核官  
 大隊指導員 邱炳坤      指導員 韓光祚      政治幹事 王大學



附錄二：楊達的〈新生處理考核表〉

綜合考核										
項目		思（訓）想			學（教）習			生（管）活		
百分比		45%			30%			25%		
區分		信仰 （主義 領袖國 家）	言論	行動	測驗 成績	學習 情緒	筆記 心得	品德 氣質	勞動 服務	服從 表現
百分分配		20	15	10	15	8	7	9	8	8
優等	評語	篤信 不移	純正	光明 磊落	優良 卓越	精益 求精	記述 詳實	品德 純良	勤勞 不懈	守正 不阿
	評分 標準	17.5 - 19.5	13.5 - 15	10 - 15	13.5 - 14.5	7 - 8	6 - 7	8 - 8.5	7 - 8	7 - 8
	評分									
甲等	評語	真誠 信仰	積極	循規 蹈矩	各科 均優	孜孜 不倦	整潔 充實	秉性 忠厚	熱心 公益	奉公 守法
	評分 標準	16 - 17.5	11.5 - 13.5	7.5 - 8.5	12 - 13	6 - 7	5 - 6	7 - 8	6 - 7	6 - 7
	評分			7.6	12.5	6.1	5.39		6.1	6.1
乙等	評語	信仰 尚堅	言論 平常	言行 一致	成績 尚佳	虛心 學習	有條 不紊	個性 剛強	服務 認真	服從 命令
	評分 標準	14 - 16	9.5 - 11.5	7.5 - 6.5	12 - 10.5	6 - 5.5	4 - 5	6 - 7	5.5 - 6	5.5 - 6
	評分	15.2	11.4					6.8		
丙等	評語	尚能 信仰	消極	行動 不檢	勉能 及格	存心 向上	殘缺 不全	優柔 寡斷	怕吃 勞苦	勉能 服從
	評分 標準	12 - 14	8 - 8.5	6 - 6.5	9 - 10.5	4.5 - 5	3 - 4	5 - 6	4.5 - 5.5	4.5 - 5.5
	評分									
丁等 以下	評語	深表 不滿	荒謬	秘密 鬼祟	各科 均差	敷衍 了事	毫無 記載	刁詐 狡猾	懶惰 成性	陽奉 陰違
	評分 標準	0 - 12	6 - 8	0 - 6	0 - 9	0 - 4.5	0 - 3	0 - 5	0 - 4.5	0 - 4.5
	評分									
備用										

評分					12.5	6.1	5.39			
各項得分		34.2			23.99			19		
總分		77.2								
考核意見及處理意見										附記
處長	審攷	函軍監轉請核釋								
處部	綜合攷評處理意見	政治處	第一組			第二組				
		該生思想已改正	該生學習成績列為乙等			綜合各級攷評該生思想已改正學習平常感訓總成績乙等擬函軍監轉請核釋				
大隊	檢核意見	思想	學習	生活	體格	處理意見	考核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大隊長 副大隊長 大隊指導員			
中隊	初核意見	思想	學習	生活	體格	處理意見	考核官			
		思想改正	學習平常	有規律	年□大 體弱	擬報請准予結訓	大隊長 副隊長 指導員			
	基層攷核	思想	學習	生活	體格	處理意見	考核官			
		思想已改正	學習正常	生活正常	體格較弱	擬報請結訓	分隊長 政事幹事			

附錄三：楊逵的〈新生調查表〉

履歷	姓名	楊貴	化名		別號	楊逵	性別	男	籍貫	台灣省台中市	
	出生	民前六年十月十八日			通訊處	臨時	台中市				
						永久	台中市				
	學歷	日本大學文學系畢業					經歷	台灣文學月刊主編			
職業	作者		特徵	瘦		特長	園藝		學能	文藝寫作	
家庭狀況	稱謂	姓名	年齡	職業		住址	服務機關或行號		在台否		
	妻	葉陶	五七	家事		台中市			在台		
	男	楊資萌	三十	木工		台中市			在台		
	男	楊建	三六	工程師		台中市	大榮鐵工廠		在台		
	女	楊素絹	二二	教員		台中市	大同國校		在台		
	女	楊碧	十八	學生		台中市	台中家職		在台		
經濟狀況		動產		五,000		不動產		竹房一棟		收支情形	平衡
在台社會關係		文化界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交往人物         </div>											
親友	稱謂	姓名	年齡	籍貫	職業	住址	服務機關或行號		在台否		
	友	楊雲萍		台北	教授	台北縣	台灣大學		在台		
	友	黃得時		台北	教授	台北市	台灣大學		在台		
	友	張文環		嘉義	作家	嘉義縣			在台		
偵察審判執行情形		民國卅十八年四月七日被補 即日送保安處 民國卅十九年五月六日 由軍法處判決徒刑十二年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一日送綠島新生訓導處					指紋		照片		
姓名		楊逵		刑名期		叛亂罪 有期徒刑十二年					
刑期起止日期	自卅八年四月七日 至五十年四月六日			羈押日期	卅八年 四月七日		執行屆滿日期	五十年 四月六日			
教化前後	受教誨教育經過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一日到綠島新生訓導處後編入高級以至於今							
	教化心得			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 為求國家獨立社會安定和民生建設最適合我國國情							

		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客 <sup>1</sup> 在中國存在也無法發展
	受教化感想	半工半讀手腦並用是民生主義最理想的教育方式 日常生活的自治訓練是民權主義的堅實基礎
	可能提供之保證	如有犯法情事 願受法律制裁
	未來志願	經營農場 晴耕雨讀
	就業方式	自營
	其他	




---

<sup>1</sup> 「容」之誤。

#### 附錄四：楊逵歌譜集曲調細目表<sup>1</sup>

編號	分類	曲名	作詞人	作曲人	備註
1	西洋樂曲	Serenade		法 C. Gounod	有曲無詞。
2	西洋樂曲	Wiegenlied (搖籃曲)		F. Schubert (舒伯特)	有曲無詞。
3	京劇	二黃快三眼 第一過門			有曲無詞。
4	傳統古典戲曲	寄生草		北管 廣東古曲	有曲無詞。
5	歌仔戲曲調	食酒歌		留傘調	有曲無詞。福佬民歌。
6	歌仔戲曲調	大調			有曲無詞。
7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8	分類不明	趕路歌			有曲無詞。
9	分類不明	歡□調			有曲無詞。
10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1	歌仔戲曲調	乞食歌		乞食調	有曲無詞。
12	歌舞小戲	相罵歌		相褒歌	有曲無詞。
13	客家歌謠	病子歌		客家山歌	有曲無詞。九腔十八調之小調。
14	分類不明	遊街調			有曲無詞。
15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6	歌仔戲曲調	哭調			有曲無詞。福佬系戲劇常用，拍子錯誤多。
17	傳統古典戲曲 <sup>2</sup>	無題		南管	有曲無詞。與本冊〈釣(捕)魚歌〉同曲譜。
18	客家歌謠	採茶歌		客家山歌平板調	有曲無詞。
19	分類不明	遊街路			有曲無詞。
20	分類不明	王大嫂			有曲無詞。
21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望春風	李臨秋	鄧雨賢	

<sup>1</sup> 整理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 124-228。

<sup>2</sup> 即早期來自大陸的先民來臺而移入的戲曲音樂，這裡分類上劃為南北管戲曲體系。



22	福佬歌謠	洞孔的水		宜蘭民謠	有曲無詞。即〈丟丟銅〉。
23	福佬歌謠	恆春調		恆春民謠	有曲無詞。又名〈思想起〉。
24	福佬歌謠	新五更歌		嘉南民謠	有曲無詞。又名〈孟姜女〉，拍子有誤。
25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望郎早歸	陳志生	古關裕而	日本電影「乙女的首途」的主題曲。 <sup>3</sup>
26	日本歌曲	長夜嘆（放浪の曲）	疑為楊達填詞	古賀正男改編	曲譜原名為〈放浪の唄〉，古賀正男改編自朝鮮曲，為電影「さすらい」的主題歌。本曲以臺語歌詞填詞。 <sup>4</sup> 曲名亦不同於原曲。
27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雨夜花		鄧雨賢	有曲無詞。
28	客家歌謠	九連環 <sup>5</sup>		客家民謠	有曲無詞。
29	福佬歌謠	恆春調		恆春民謠	有曲無詞。又名〈思想起〉。
30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31	西洋樂曲	無題	楊達填詞	約翰·史特勞斯（J. Strauss）	歌詞用臺語字，夾雜羅馬拼音。
32	傳統古典戲曲	百家春	楊達填詞	北管	臺灣閩客間常演奏。歌詞用臺語字，夾雜羅馬拼音。用於劇本〈豐年〉，以及〈牛犁分家〉第三幕第一場開幕樂。
33	歌舞小戲 <sup>6</sup>	駛犁歌序曲	楊達填詞	車鼓調	以工尺譜用字標注在

<sup>3</sup> 〈望郎早歸（乙女の首途）〉，《洞簫尺八的天地》（來源：<http://xiaofeet8.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2020.02.12）。

<sup>4</sup> 〈放浪之歌（放浪の唄）〉，《洞簫尺八的天地》（來源：<http://www.xiaofeet8.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2020.02.12）。

<sup>5</sup>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九連環〉，《開放博物館》（來源：[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8406e2d5e8e93ecf48b898f3a36fa75](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8406e2d5e8e93ecf48b898f3a36fa75)，2020.02.12）。

<sup>6</sup> 歌舞小戲是民間戲曲的雛形，施德玉的定義是：「滋生於鄉土的山歌里謠雜曲小調和舞蹈。」也就是所為的「踏謠」，根據《教坊記》所言「且步且歌」。其實楊達所提到童年的「駛犁歌」，以及在綠島上和難友搞的「漁家樂」，都是屬於歌舞小戲，所以楊達才會說：「這些只可以說是『街頭劇以前』，是『街頭劇』的原始形態。」施德玉，《中國地方小戲之研究》（臺北縣：學海出版社，2001.11 二刷），頁 71。楊達，〈談街頭劇〉，彭小妍主編，《楊達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

					簡譜下，是車鼓調的原始唱法。 <sup>7</sup> 另在筆記下方寫歌詞兩筆。用於劇作〈赤崁拓荒〉、〈光復進行曲〉。
34	歌舞小戲	駛犁歌本曲	楊逵填詞	嘉南歌謠	用於劇作〈赤崁拓荒〉、〈光復進行曲〉。歌譜集和〈赤崁拓荒〉標註 C 調，〈光復進行曲〉則是標註 F 調，曲名為〈駛犁歌〉，其餘和歌譜集相同。
35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四季紅	李臨秋	鄧雨賢	歌詞有些出入。用於劇作〈赤崁拓荒〉。
36	傳統古典戲曲	釣（捕）魚歌	楊逵填詞	南管	源於潮劇《蘇六娘》閩南曲名為〈桃花過渡〉，客曲名為〈撐船歌〉。用於劇本〈赤崁拓荒〉。
37	歌仔戲曲調	漁家樂	楊逵填詞	歌仔戲留傘調	和本冊的〈食酒歌〉、〈□□民謠〉同一曲譜。曲名應該是楊逵所取。
38	西洋樂曲	少年 hit 當時	楊逵填詞	約翰・史特勞斯 (J. Strauss)	Hit=彼。
39	福佬歌謠	豐年舞曲（一）	楊逵填詞	宜蘭民謠	與〈丟丟銅〉同一曲調。用於劇作〈赤崁拓荒〉，〈豐年〉 <sup>8</sup> 。
40	福佬歌謠	豐年舞曲（二）	楊逵填詞		用於劇作〈豐年〉。
41	分類不明	ponpoko			歌詞是羅馬拼音書寫。
42	臺灣原住民民歌	雅美土風舞曲			歌詞用日語書寫。
43	臺灣原住民	摘菜歌			歌詞用日語書寫。依

頁 312-313。

<sup>7</sup> 簡上仁，《臺灣民謠》，頁 120。

<sup>8</sup> 〈豐年〉中的末句歌詞將原譜的「十斤重」改成「五斤重」。

	民歌				照本冊楊達排版習慣 會將同類型的匯聚一 同抄寫，故猜測本曲 是原住民民歌。
44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高山族舞曲			歌詞以國字書寫。
45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46	臺灣原住民 民歌	AMI 族舞曲			歌詞以國字書寫。
47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族舞曲之一			歌詞以國字書寫。
48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族舞曲之二			歌詞以國字書寫。
49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三			歌詞以國字書寫。
50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族舞曲之四			歌詞以國字書寫。
51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五			歌詞以國字書寫。
52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六			歌詞以國字書寫。
53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七			歌詞以國字書寫。
54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八			歌詞以國字書寫。
55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九			歌詞以國字書寫。
56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十			歌詞以國字書寫。
57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十一			歌詞以國字書寫。
58	臺灣原住民 民歌	雅美舞曲之十二			歌詞以國字書寫。
59	臺灣原住民 民歌	歡樂歌			歌詞以國字書寫。
60	臺灣原住民 民歌	插秧歌			歌詞以國字書寫。
61	臺灣原住民	四十五年			歌詞以日語書寫。依

	民歌				照本冊楊達排版習慣會將同類型的匯聚一同抄寫，故猜測本曲是原住民民歌。
62	臺灣原住民民歌	伊那那羅彎			歌詞以國字書寫。
63	臺灣原住民民歌	蘭嶼之夜			歌詞以國字書寫。
64	臺灣原住民民歌	鹿野之夜			歌詞以國字書寫。
65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悲戀的酒杯	陳達儒	姚讚福	戰後歌詞填寫為北京話，易名為〈苦酒滿杯〉。 <sup>9</sup>
66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賣花娘		尤生發	有曲無詞。
67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窗邊小曲	陳達儒	姚讚福	
68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南國小調	陳達儒	蘇桐	
69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紗窗月	陳達儒	姚讚福	
70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風微微	周添旺	蘇桐	
71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心酸酸	陳達儒	姚讚福	
72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鴛鴦夢	陳達儒	王福	
73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素心蘭	陳達儒	郭玉蘭	
74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南京夜曲	陳達儒	郭玉蘭	後來更名為〈南都夜曲〉 <sup>10</sup> ，歌詞中的「南京」也改成「南都」。

<sup>9</sup> 楊達所採之〈悲戀的酒杯〉歌詞雖不完整，但可顯見應是陳達儒所填之臺語歌詞，戰後由慎芝填寫成國語版的〈苦酒滿杯〉。所以《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176中，該曲注腳寫道：「日據時代流行歌曲，戰後改填北京話，成『悲戀的酒杯』。」應該是誤寫。

<sup>10</sup> 《楊達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頁185中，該曲注腳寫道：「後來易名為『南部夜曲』，……。」此處的「南部」應該是「南都」。陳金順，〈南都夜曲〉，《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0728>，2020.02.12）。

75	福佬歌謠	五更鼓	楊達填詞	嘉南民謠	源自江蘇民謠〈孟姜女〉，流傳於閩粵，故臺灣閩客皆有傳唱。 <sup>11</sup> 歌仔戲亦做為唱本曲調。 和本冊〈新五更鼓〉同譜。歌詞照例以五更為架構填詞。
76	日治時臺語 流行歌	要怎樣		王福	有曲無詞。即〈欲怎樣〉 <sup>12</sup> 。全集標註為姚讚福作曲有誤。
77	日治時臺語 流行歌	找真愛			有曲無詞。依照本冊楊達排版習慣會將同類型的匯聚一同抄寫，故推測本曲是戰後流行歌。
78	日治時臺語 流行歌	望鄉	謝如李	陳冠華 <sup>13</sup>	即〈望鄉調〉，後被歌仔戲班用來演唱。 <sup>14</sup>
79	歌仔戲曲調	相思	楊達改寫 <sup>15</sup>	應是七字仔 <sup>16</sup>	歌詞為民間歌謠《病相思》。
80	日治時臺語 流行歌	春宵吟		鄧雨賢	有曲無詞。
81	分類不明	賣香烟			歌詞標寫國、臺語。
82	日治時臺語	戀愛風 <sup>17</sup>	陳君玉	王福	流行小曲。 <sup>18</sup>

<sup>11</sup> 陳俊豪，〈五更鼓〉，《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3088>，2020.02.12）。

<sup>12</sup> 莊永明，〈臺語歌謠史略—兼談日治時代流行歌〉，《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7期，頁16。

<sup>13</sup> 本名陳水柳。

<sup>14</sup> 王友蘭，〈陳冠華的吹拉彈唱：臺灣本土說唱音樂保存〉（宜蘭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5），頁66。

<sup>15</sup> 「門口」改成「面前」，「相思櫟」改成「相思樹」，「直溜溜」改成「面憂憂」，「先生」改成「醫生」，「貼心」改成「愛人」。廖瑞銘總編，《大甲鎮志（下）》（臺中縣：臺中縣大甲鎮公所，2009.01），頁1153。

<sup>16</sup> 佐渡守，〈聽庶民說故事〉，《中時電子報》（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721000700-260115?chdtv>，2020.02.13）。

<sup>17</sup> dAVIDE，〈Dance with me〉，《桃花開出春風》（來源：<http://blog.sina.com.tw/28994/article.php?entryid=572464>，2020.02.13）。

<sup>18</sup> 流行小曲即戰後日治時期勝利唱片公司結合西洋音樂和傳統漢樂的「新小曲」。當時流行歌多以西洋樂為基本形態，但新小曲則是以漢樂編制伴奏，傳統漢樂色彩濃厚，影響當時流行歌曲走向，當時一些北管子弟班也加以吸收，成為地方上新曲調。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頁105-107。



	流行歌				
83	日治時臺語 流行歌	夜來香	陳達儒	陳秋霖	流行小曲。
84	愛國歌曲	國旗歌	范煙橋	黎錦光	原名為〈凱旋歌〉，為1947年「長相思」電影插曲。 <sup>19</sup> 楊達改歌名為〈國旗歌〉。用於劇作〈勝利進行曲〉，劇本內歌名改為〈看國旗風翻〉。
85	福佬歌謠	思想起		恆春民歌	有曲無詞，與許丙丁版本的曲子稍有不同。 <sup>20</sup> 用於〈勝利進行曲〉、〈赤崁拓荒〉、〈真是好辦法〉，劇本內歌詞由楊達新填。
86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87	福佬歌謠	六月田水	楊達改寫	嘉南民謠	用於劇作〈勝利進行曲〉，劇本內歌名改為〈做牛拖犁〉。
88	愛國歌曲	無題		李永剛	有曲無詞，但《楊達全集》標註歌詞，根據歌詞查找，此曲應為〈重建大中華〉。 <sup>21</sup>
89	福佬歌謠	透早就出門	楊達改寫	蘇桐	原為〈農村曲〉，歌詞有幾處被改寫。用於劇作〈勝利進行曲〉。
90	分類不明	收工（1）			有曲無詞。該曲用於劇作〈光復進行曲〉，

<sup>19</sup> 周璇，〈凱旋歌〉，《魔鏡歌詞網》（來源：<https://mojim.com/twy102186x5x18.htm>，2020.02.13）。

<sup>20</sup> 因為臺灣民歌具有即興唱法，演唱者改變歌詞時會影響閩南語聲調的變化，使曲調產生改變；或是演唱者在即興演唱過程時，便改變了曲調的拍子，連帶影響音高的變化。因此當許常惠採集〈思想起〉時，便收集到超過 50 種不同的唱法。而楊達的歌譜集內記錄的〈思想起〉之來源，除了可能是收錄難友所哼、或楊達記憶中曾聽過的，亦可能是楊達的再創造。翁志文、鄭德淵、辛玫芬、蔡素娟，〈由微觀陳達《思想起》看臺灣民歌的「再創造」〉，《南藝學報》8 期，頁 157-176。

<sup>21</sup> 李筱峰，〈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來源：[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5&currentPage=9&ArticleCategory=1](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5&currentPage=9&ArticleCategory=1)，2020.02.12）。

					曲名為〈收工〉，楊達填詞。又用於〈勝利進行曲〉，歌名改為〈奴隸的喊聲〉，楊達填詞。
91	分類不明	收工（2）			有曲無詞。
92	大陸民歌	情歌			有曲無詞。用於劇作〈光復進行曲〉，楊達填詞。
93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春天花		鄧雨賢	有曲無詞。即〈四季紅〉的曲譜。用於劇作〈光復進行曲〉，歌詞為李臨秋版本。
94	臺灣原住民民歌	殺漢奸			有曲無詞。用於劇作〈光復進行曲〉，楊達填詞。
95	戒嚴時國語民謠風歌曲	牛犁分家	楊達	楊兆禎	原為〈農家好〉，1952年作品。歌詞是楊達新作。用於劇本〈牛犁分家〉，曲名為〈牛犁分家主題歌〉。
96	新疆民謠	掀起你的蓋頭來	楊達改寫	烏茲別克足的也勒來 <sup>22</sup>	歌詞為臺語用字，應是楊達改寫成臺語歌謠。
97	歌仔戲曲調	□□民謠		歌仔戲留傘調	有曲無詞。和本冊的〈食酒歌〉、〈漁家樂〉是同一曲譜。
98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99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0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1	分類不明	想思曲			有曲無詞。
102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3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4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標題處標「慢悲壯」，應該是指

<sup>22</sup> 「也勒來」翻譯為「歌曲」，唱詞多為民間歌謠。杜亞雄，《聆聽中國：五十六個民族的音樂文化遺產》（香港：三聯書店，2013.03），頁 238-239。

					速度與曲風，而非曲名。
105	福佬歌謠	無題		恆春民歌	有曲無詞。標註是〈草螟弄雞公〉的譜子。
106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7	分類不明	無題			有曲無詞。
108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農村曲		蘇桐	有曲無詞。曲譜部分和蘇桐的版本稍有不同。曲譜用於劇作〈牛犁分家〉，但劇本的臺詞有經過楊逵改寫。
109	分類不明	吉他小節前奏			有曲無詞。
110	分類不明	吉他四小節前奏			有曲無詞。
111	日治時臺語流行歌	前奏四小節			有曲無詞。即〈悲戀的酒杯〉。
112	歌仔戲曲調	宜蘭哭調		宜蘭調	有曲無詞。
113	歌仔戲曲調	無題		哭調仔	有曲無詞。譜無標題，標註是〈哭調仔〉的譜子。
114	疑為自創曲	房子失修	楊逵	疑為楊逵新創	
115	疑為自創曲	一陽來復	楊逵	疑為楊逵新創	用於劇作〈牛犁分家〉。
116	疑為自創曲	無題	楊逵	疑為楊逵新創	首句「想起離散……」
117	疑為自創曲	無題	楊逵	疑為楊逵新創	首句「忍耐艱苦……」
118	疑為自創曲	無題	楊逵	疑為楊逵新創	首句「堅忍堅忍……」



## 參考資料

### 一、 官方檔案及文書

〈身分證・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1。

〈國防部令（50）鏡榮字第 213 號〉（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1=0000227610001

〈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開釋證明書・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2。

〈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50）監克字第 0589 號〉（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2=0000227620001、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2=0000227620002。

〈逐月考核總結〉，《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5、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6、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7、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8、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9。

〈新生月刊登記撤銷案〉（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藏，1951.04），檔號：0070/T1010/R20015。

〈新生處理考核表〉，《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2、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4。

〈新生調查表・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103=0000227630003(fix)。

〈新生調查表・鍾平山〉，《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5293044=159=036=0000223480004(fix)。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4、

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5。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執行書・楊逵〉，《陳軍等叛亂案》（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總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5293750，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77221730=162=099=0000227590003。

〈中華民國刑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1630 號，1935.01.04，頁 2-55。

〈共產黨人自首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2 號，1928.10.27，頁 1-2。

〈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688 期，1931.02.02，頁 1-2。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1001 號，1946.03.06，頁 1-6。

〈戒嚴法第八條修正條文〉，《總統府公報》第 203 號，1949.01.14，1 版。

〈制定懲治叛亂條例〉，《總統府公報》第 230 號，1949.06.27，1 版。

〈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法務部公報》第 61 期，1985.07.19，頁 3-4。

〈國民政府訓令・第 782 號〉，《國民政府公報》第 255 號，1929.08.29，頁 7。

〈國民政府訓令・第 6 號〉，《國民政府公報》第 672 號，1931.01.15，頁 3-4。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總統府公報》第 253 號，1950.06.15，6 版。

〈監獄行刑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962 號，1946.01.19，頁 1-7。

〈暫行反革命治罪法〉，《國民政府公報》第 39 號，1928.03.09，頁 2-4。

## 二、專書

- 丁道源，《監獄學》（臺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法律學系，1974.12 五版），。
- 中華民國年鑑社編，《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中華民國年鑑》（臺北市：中華民國年鑑社，1961.11）。
-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市：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1.07）。
-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司，2014.09 修訂二版）。
-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編，《追尋臺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11 二版一刷）。
- 王歡，《烈火的青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證言》（臺北市：人間出版社，1999.04）。
- 李甲孚，《中國法制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06）。
- 李鎮洲，《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10）。
- 杜亞雄，《鈴聽中國：五十六個民族的音樂文化遺產》（香港：三聯書店，2013.03）。
- 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輯一·秋蟬的悲鳴》（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
- 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二·看見陽光的時候》（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
- 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黃龍興編輯，《走過長夜：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輯三·喚不回的青春》（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9）。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3.02）。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5.01）。
- 林梵，《楊逵畫像》（臺北市：筆架山出版社，1978.09）。
- 吳素芬，《楊逵及其小說作品研究》（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5.12）。
- 法務部監所司，《法務部獄政史實紀要》（臺北市：法務部，1990.11）。
- 施德玉，《中國地方小戲之研究》（臺北縣：學海出版社，2001.11 二刷）。

- 柯旗化，《明哲詩集／鄉土的呼喚》（臺北市：笠詩刊出版社，1986.05 再版）。
-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2001 年版》（臺北市：國際翻譯社，2001.01）。
- 胡慧玲，《島嶼愛戀》（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10）。
-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臺北市：商務印書館，2003.06）。
- 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2010 海峽兩岸資訊圖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B 輯》（臺北市：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2010.07）。
- 馬振犢主編，《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北京市：九州出版社，2007.01）。
- 國史館編印，《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白色恐怖 1950》（臺北縣：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4.11 初版二刷）。
- 張良澤，《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01 初版三刷）。
-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1.07）。
- 曹昭蘇，《十年綠島命殘留》（臺北縣：曹祁碧愛，2000.12）。
- 莫光華、陳伯鏗，《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五·武備志》（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12）。
- 陳芳明編，《楊逵的文學生涯》（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02 二刷）。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10 增訂二版四刷）。
- 陳紀滢，《文藝運動二十五年》（臺北市：重光文藝出版社，1978.03）。
-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臺北市：唐山，2009.12）。
- 陳康芬，《斷裂與生成——臺灣五〇年代的反共／戰鬥文藝》（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10）。
-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06）。
- 陳儀，《陳長官治台言論集·第一輯》（臺北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01）。
- 傅柯（Foucault, M）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苗栗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05 初版七刷）。
- 彭小研主編，《楊逵全集·第二卷·戲劇卷（下）》（臺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

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06)。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八卷，小說卷(V)》(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0.12)。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九卷·詩文卷(上)》(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卷·詩文卷(下)》(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一卷·謠諺卷》(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0.12)。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三卷·未定稿卷》(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十四卷·資料卷》(臺南市：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12)。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02 第一版第二刷)。

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0.06)。

黃文成，《關不住的繆思——臺灣監獄文學縱橫論》(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04)。

黃文車，《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臺北市：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20)。

黃玉齋主編，《臺灣年鑑(1)》(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03)。

黃克武、陳儀深、許文堂、沈懷玉訪問，李郁青、潘國華、曹如君、鍾玉霞紀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二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12)。

黃克武、賴惠敏、陳儀深、胡國台、許文堂、沈懷玉訪問，丘慧君、李郁青、潘國華、曹如君、鍾玉霞、林秀貞紀錄，《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第三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1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2017.08 三版一刷)。

黃富三編，《戒嚴時期臺灣政治事件檔案與口述歷史》(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

- 會，2001.12)。
- 黃惠禎，《楊逵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市：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07)。
-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07)。
- 黃惠禎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4・楊逵》(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03)。
- 黃惠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07)。
-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4.06)。
-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4.04)。
- 楊士隆，《犯罪心理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6.09)。
- 楊逵，《新生月刊》(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1955.04)。
- 楊逵，《綠島家書》(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87.03)。
- 楊逵，《睜眼的瞎子》(臺北市：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03)。
- 楊逵，《樂天派》(臺北市：合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03)。
- 楊逵，《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臺北市：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09)。
- 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08)。
- 陳翠蓮、李鎧揚，《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7.12)。
- 楊麗祝，《歌謠與生活：日治時期臺灣的歌謠采集及其時代意義》。
-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台灣文學五十七問》(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7.06)。
- 廖瑞銘總編，《大甲鎮志(下)》(臺中縣：臺中縣大甲鎮公所，2009.01)，。
- 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上)》(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12)。
- 臺東縣政府編，《臺東縣綠島鄉誌(下)》(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2014.12)。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北市：國家圖書館複印，2005)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



- I》(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12)。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蔡伯璦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Ⅱ)》(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8.11)。
- 趙安雄總編，《綠島鄉志》(臺東縣綠島鄉：綠島鄉公所，1988)。
-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04 一版十刷)。
- 龍紹瑞編著，《綠島老同學檔案》(臺北市，人間出版社，2013.01)。
- 應鳳凰，《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7.03 修訂版)。
-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12 二版一刷)。
-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交遊錄》(臺北市：台灣出版社，1998.04)。
- 鍾肇政著，莊紫容編，《台灣文學十講》(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10)。
- 簡上仁，《臺灣音樂之旅》(臺北市，自立晚報，1988.06)。
- 簡上仁，《臺灣民謠》(臺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09)。
- 蘇振明、蔣榮春、林昌華，《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03)。
-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11)。

### 三、論文

#### 1. 期刊論文

- 王才友，〈高牆內的”派系”輪替：國民黨感化教育政策在江西的推行〉，《民國檔案》3期(2016.08)，頁86-101。
- 吳潮聰，〈酒，飲酒及酒癮〉，《當代醫學》8卷12期(1981.12)，頁972-978。
- 呂正惠，〈論楊逵的小說藝術〉，《新地文學》1卷3期(1990.08)，頁17-31。
- 邱坤良，〈文學作家、劇本創作與舞台呈現——以楊逵戲劇論為中心〉，《戲劇研究》6期(2010.07) 頁117-147。
- 邱曙炎，〈「歌仔」是歌仔戲音樂的主要聲腔〉，《臺灣戲專學刊》9期(2004.07)，頁181-231。

- 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 卷 7 期（1973.12），頁 4-20。
- 徐瑋怡、張宇岱，〈酒癮與焦慮症的共病機制〉，《慈濟醫學雜誌》17 卷 2 期增刊（2005.10），頁 51-52。
- 翁志文、鄭德淵、辛玫芬、蔡素娟，〈由微觀陳達《思想起》看臺灣民歌的「再創造」〉，《南藝學報》8 期（2014.06），頁 157-176。
- 張恆豪，〈楊逵有沒有接受特務工作？〉，《南方》2 期（1986.11），頁 122-125。
- 莊永明，〈臺灣歌謠史略——兼談日治時代流行歌〉，《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7 期（2011.07），頁 1-21。
- 許雪姬，〈楊雲萍、陳逸松、呂赫若這三個文化人與他們的時代〉，《師大臺灣史學報》9 期（2016.12），頁 53-98。
- 陳芳明，〈臺灣文壇向左轉——楊逵與三〇年代的文學批評〉，《臺灣文學學報》7 期（2005.12），頁 99-127。
- 陳淑娟，〈賴和漢詩中的“酒”字探析——兼論其生命觀與處世哲學〉，《國文學誌》8 期（2004.06），頁 195-240。
-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灣史研究》9 卷 2 期，頁 145-201。
- 黃建銘，〈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39 期（2011.06），頁 71-104。
-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3 期（2012.12），頁 223-270。
-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台灣「國語」運動〉（1946-196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 期（2005.10），頁 79-107。
- 黃惠禎，〈綠島家書——監獄中的楊逵心事〉，《文訊》415 期（2020.05），頁 30-33。
- 楊素娟，〈心襟上的白花——父親與我、兼記母親葉陶女士〉，《聯合文學》8 期（1985.06），頁 26-32。
- 楊翠，〈家族斷離事件——1949 的一個斷片〉，《文訊》285 期（2009.07），頁 87-90。

- 楊翠，〈即使只是一線光隙〉，《文訊》415期（2020.05），頁60-62。
- 楊鏡汀譯，〈楊逵的文學活動〉，《臺灣文藝》95期（1985.07），頁194-213。
- 葉石濤，〈日據時代的抗議文學〉，《聯合文學》5卷8期（1989.06），頁162-169。
- 葉雪淳，〈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日子：貝殼畫、伙委、海膽菸灰缸〉，《台灣風物》60卷3期（2010.09.30），頁155-171。
- 劉育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審判結果之研究——就已知二百二十個案件的分析〉，《臺灣文獻》56卷2期（2005.06），頁305-564。
- 劉明憲，〈政治犯思想改造——白色恐怖時期感化教育初探〉，《通識論叢》21期（2018.06），頁59-81。
- 蔡盛琦，〈戰後初期學國語浪潮與國語讀本〉，《國家圖書館館刊》100年2期（2011.12），頁60-98。
- 藍博洲，〈楊逵與中共臺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批評與再造》12期（2004.12），頁39-58。
- 蘇瑞鏘，〈政治犯的歸屬——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監獄和「獄外獄」〉，《傳記文學》100卷1期（2012.01），頁113-124。
- 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論〉，《臺灣文獻》63卷4期（2012.12），頁209-240。

## 2. 學位論文

- 王建國，〈百年牢騷：台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06）。
- 吳曉芬，〈楊逵劇本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 李玉芬，〈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沈德汶，〈日治時期臺灣浮浪者取締制度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林安英，〈楊逵戲劇作品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胡芳琪，〈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反共文藝論述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張朝慶，〈楊逵及其小說、戲劇、綠島家書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郭勝宗，〈楊逵小說作品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國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陳瑞琪，〈記憶變奏曲——「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沿革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7）。

黃彥菁，〈台灣客家童謠以〈月光光〉起興作品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楊明青，〈抗議與隱忍風格之外——楊逵與鍾理和書寫及其背後的家族群像〉（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3. 會議論文

楊翠，〈楊逵的疾病書寫——以「綠島家書」為論述場域〉，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2004.06.19~20）。

## 四、 報紙文章

〈二記者被拘訊〉，《公論報》，1949.04.08，3版。

〈火燒島（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4.03，2版。

〈代用監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09.25，2版。

〈留置場之監督〉，《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10.16，2版。

〈被捕學生已送地院〉，《公論報》，1949.04.13，3版。

張良澤，〈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中央日報》，

1975.10.22～25。

楊建，〈萬水千山，見父一面——一九五四年楊逵、楊建的綠島父子會〉，《台灣日報》，1997.08.11，27版。

楊建，〈壓不扁的玫瑰——拒絕出賣兒女的楊逵〉，《自由時報》，1999.08.29，37版。

董芳蘭，〈父祖身影中找自己的臉——楊逵與他的愚公世代（上）〉，《中央日報》，1997.03.22，19版。

## 五、 電子媒體

〈放浪之歌（放浪の唄）〉，《洞簫尺八的天地》（來源：

<http://www.xiaofeet8.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  
2020.02.12）。

〈張文環〉，華人百科（來源：<https://www.itsfun.com.tw/張文環/wiki-0201019-8407778>，2019.06.10）

〈望郎早歸（乙女の首途）〉，《洞簫尺八的天地》（來源：

<http://xiaofeet8.com/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7>，  
2020.02.12）。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來源：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detail.jsp?sysId=0006496300&dtdId=000075&search\\_type=detail&mark=basic&la=ch&checked=&unchecked=0010006496300,0020006495249](http://readopac1.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detail.jsp?sysId=0006496300&dtdId=000075&search_type=detail&mark=basic&la=ch&checked=&unchecked=0010006496300,0020006495249)，2019.12.02）。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物典藏查詢系統》（來源：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tl\\_collectionsweb/GalData.aspx?GID=MZMNM RMGMNMD](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tl_collectionsweb/GalData.aspx?GID=MZMNM RMGMNMD)，2020.01.23）。

dAVIDE，〈Dance with me〉，《桃花開出春風》（來源：

<http://blog.sina.com.tw/28994/article.php?entryid=572464>，2020.02.13）。

江寶釵，〈黃得時〉，《臺灣文學辭典》（來源：

<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175.html?keywords=黃得>



時，2019.06.10)。

佐渡守，〈聽庶民說故事〉，《中時電子報》（來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721000700-260115?chdtv>，  
2020.02.13)。

李筱峰，〈兩蔣威權統治時期「愛國歌曲」內容析論〉，《李筱峰教授個人網站》  
（來源：

[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5&currentPage=9&ArticleCategory=1](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SN=8725&currentPage=9&ArticleCategory=1)，2020.02.12)。

周璇·〈凱旋歌〉，《魔鏡歌詞網》（來源：

<https://mojim.com/twy102186x5x18.htm>，2020.02.13)。

林春蘭，〈楊雲萍〉，《臺灣文學辭典》（來源：

<http://tld.nmtl.gov.tw/opencms/dictionary/Dictionary01179.html?keywords=楊雲萍>，  
2019.06.10)。

孫大川，〈原住民歌謠〉，《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117>，2020.08.09)。

孫文，〈三民主義：民生主義 第二講〉，《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來源：

<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gswweb/cgi/ccd=2F5JUhg/rapheviewer1?dbid=CF77777777779>，  
2019.06.22)。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九連環〉，《開放博物館》（來源：

[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8406e2d5e8e93ecf48b898f3a36fa75](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e8406e2d5e8e93ecf48b898f3a36fa75)，  
2020.02.12)。

陳金順，〈南都夜雨〉，《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0728>，2020.02.12)。

陳俊豪，〈五更鼓〉，《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3088>，2020.02.12)。

楊翠臉書（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2462523961>，  
2019.05.05)。